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基督教思想》杂志第4卷

编著：《基督教思想》杂志社编辑部

原著出版日期：1886年7月至8月

=====

=====

=====

=====

=====

=====

=====

=====

=====

=====

=====

《基督教思想》第 4 卷

1886年7月至8月。

=====

=====

=====

=====

=====

=====

=====

=====
=====
=====

关于科学迷信的论辩。

CHARLES F. Deems, D. D. , LL. D.

本世纪头十年，一位法国农家女正在户外放羊，突然一条铁链掉在了这位年轻牧羊女的脚下，就像从天而降一样。显然，这铁链不可能来自别处，因为在那片空旷的田野上，她的头顶和万里无云的天空之间空无一物。她无疑是怀着迷信的敬畏之心来看待它的。据说，在她那个时代之前的许多世纪，就有这样一尊神像从天而降，成为人们迷信的对象，不仅仅是不识字的农民，还有诗人、哲学家和国王。

于是，人们很可能会教这个法国牧羊女相信，伟大的上帝是通过这个女人来降启示的，——为什么伟大的上帝不能让某些灵魂获得自由，并将束缚它的锁链实体化，将其抛在这位处女的脚下，使其成为智力和精神解放的象征，永远激发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呢？数以千计的崇拜者可能会被吸引到为这条锁链建造的圣殿中来，并举行类似于希腊的多多纳神庙和奥林匹亚神庙的闻名遐迩的典礼的仪式。

这样的事情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人们很快就发现，一位当时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并不出名的年轻人于 1886 年 6 月 15 日发表了关于一次空中热气球旅行的精彩的演讲。

当少女从惊讶中回过神来，抬头想看看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否在空中留下了下落的痕迹时，距离地球表面近两万英尺的热气球却没能吸引她的视线，或者说已经离开了她的视野。

铁链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就像它砰地一声砸在地上所显示的那样。附近没有树，没有塔，也没有山。就她所能发现的而言，铁链是从天上掉到地上的。如果这个法国女孩和她的邻居以及整个国家都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将是一种迷信，因为这将是一种无法证明（如果是真的），也无法证伪（如果是假的）的信仰。如果排除气球的知识，她就无法向自己证明（或证伪），也没有人能够向别人证明（或证伪），链条是从我们地球大气层很高的区域掉下来的。

这个相对较新的事实表明了许多古代和现代迷信的起源。人类从不缺少迷信。宗教并没有消灭迷信。科学似乎助长了迷信。在所有人的头脑中，无论受过训练还是没有受过训练，迷信都在顽强地生长。难道基督之后的十九世纪不和基督之前的十九世纪一样

迷信，即相信那些无法正式证明或反驳的东西吗？外在的发展可以不同，而内在的萌芽却始终如一。迷信在人与人之间的表现，就是人的智力发展和实际生活的基础。一个命题无法通过相当于论证的比对过程，以逻辑理解力证明其为真，这并不能表明它不是真命题。因此，没有人能向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他所能构建的任何三段论都必须是，在它的前提中，至少有一个前提是要证明的事物。但他仍然可以相信，是的，而且必须相信。一些外在的逻辑学家可能会斥责他迷信，认为他相信了无法证明的东西，但他灵魂深处的内在、非正式的逻辑却认为，“他的存在”这一命题所表达的事实对他的意识来说始终是确定无疑的。

因此，迷信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有些时代强调宗教迷信，有些时代强调实用迷信，有些时代强调科学迷信。

我们这个时代属于最后一类（即科学迷信）。我们的趋势是，在抛弃宗教色彩的迷信的同时，也更快地坚持那些以科学为雏形的迷信。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科学工作者的所有基本信仰，他们一致认同的信仰，那些可以被视为普世科学教义体现的教条，就像古希腊或古罗马的宗教迷信，或者现在印度婆罗门的宗教迷信一样，肯定是迷信，也就是说，是对未经证实和无法证明的命题的信仰。

在请你们注意这些科学迷信时，请你们记住，我们并没有对它们

进行攻击。它们的合理性甚至都没有受到质疑。我非但没有试图推翻它们，反而与所有见多识广的人一道，真诚地支持这些信仰形式。我的目的是要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它们不属于理性的范畴，而属于想象或信仰的范畴，但却被认为是可信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逻辑学，这是科学中的科学，是科学的创造者、保护者和救赎者。它的主要工具是三段论，人们相信，充分了解三段论的力量和用途，就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演绎或归纳推理过程中发现任何谬误。

这种知识的价值似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一过程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即凡是肯定或否定一个类的任何东西，那么也可以肯定或否定其中的每一个成员。一个简单例子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是凡人；约翰是一个人；因此，约翰是凡人。再举一个科学领域的例子：所有导体都是非电导体；液体是导体；因此，液体是非电导体。长久以来，这（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一直是研究的偶像之一。千百年来，南部非洲荒野中的布须曼人对其神物的崇拜，莫过于学校的学生对这一（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过程和这一过程所依据的伟大论断的崇拜。然而，它的基础却是一种迷信。

我们相信，在所有正确的（三段论）演绎法中，若有两个前提是真实的，那么从这两个前提必须推论出第三个前提，而第三个前

提必然也是真实的；但让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真实的前提中，一个包含了另一个，所以逻辑学家称大前提为包含前提，小前提为解释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困难在于，除了全知全能的存在者之外，没有人能确定大前提或包含性前提（如果它是普遍肯定或普遍否定的话）是真的。例如，如果我断言“所有人都是凡人”，这只是一个假设。我不认识现在活着的所有人。如果他们活着，他们就没有死；如果他们没有死，他们可能是凡人，也可能不是凡人。在我到来之前，地球上似乎生活着无数的人。我只认识几个人，就是我在这里发现的那几个人。对于在我之前的那些人，我只知道有少数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死亡，并被埋葬了，但还有许多人可能已经被转移了，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星球，以某种其他方式离开了我们的领域，而不是通过死亡的过程。因此，当我断言所有人都是凡人时，我只是在陈述我不知道的、其他人也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即使这是真的，也没有任何有限的存在者能够证明它是真的。要确定任何普遍命题，就必须了解整个宇宙。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科学说明。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电导体，因此他不可能感性地知道所有的导体都是非电导体。如果这个命题是真的，那么没有人能够证明它的真实性。

因此，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就假定无法知道的东西是真的。这不仅是对假设的信仰，而且是对不可能被证明为真的假

设的信仰。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我们通常不会以正式的方式陈述我们的推理。我们说“约翰是凡人，因为他是人”，并假设所有人都是凡人，这个假设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如果是真的，显然是无法证明的。

辩证科学的每一个部门都是如此。所有我们认为最清晰、最安全、最无可争议的东西，都是一些命题，这些命题要么本身无法证明（如果是真的话），要么是建立在其他命题之上的命题，这些命题即使是真的，也无法证明是真的，更有甚者，如果是假的，也无法推翻，因为这些命题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信仰之外显然无法立足。

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迷信所包含的假设比论证法这一不可或缺的原始教条更大、更无偿、更未经证实、更无法证明。我想我最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巨大的假设；但我还是站在这里，庄严而真诚地说：“信条！我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口号：de omni et nullo”。当我重复这一信条时，所有属于“普世科学”“教会”的人都必须回应“阿门”，否则将被逐出“教会”。

现在让我们从思想转向物质。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应该知道的，那就是物质及其构成。物质对我们所有的感官都是开放的。如果我

们不能确定物质是什么，我们还能学到什么绝对的知识吗？那么，科学在物质方面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在古代思想中，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有一种观点显然很有道理，那就是不可能想象出小到无法分割的微粒。但是，现代化学家认为，事实上，物质的可分性是有限度的。这就是李比希所说的：“当化学家承认物理最小粒子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时，他只是维护了他的科学坚实而不变的基础”。

现在，在物质构成方面被假定为无可争辩的真理的，恰好是这样一个命题：如果它是真的，就无法证明；如果它是假的，也无法通过证伪来反驳。没有人假装见过最小粒子。

此外，它还把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的东西作为所有物理科学的绝对基本要素，提出来让我们相信。

看看“最小粒子”这个名字，它是无法切割或分割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部分。为了相信关于物质最终构成的公认学说，我们接受了两个绝对不可调和的命题。我们相信存在着一些小到无法切割或分割的物质，同时我们也相信，没有任何物质可以不具备构成可想象的细分基础的特质。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划分、细分、再划分，并无限地延续着这些细分的想象；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持续数百万年，不做任何其他事情，然而，在我们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着物质微粒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上，想

象力可以使用无限小的剪刀，仍然在细分中细分。

对于任何不是无限的头脑来说，最小粒子不仅是不可知的，而且是不可想象的。你必须首先相信一个人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然后你才能想象出一个人能够想到“最小粒子”，更不用说知道“最小粒子”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对“最小粒子”这个词产生智慧的认知，那么他的感知力就一定能够超越人类在这一思维领域所能达到的所有水平，进入细分的深渊。但是，许多人认为相信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是一种迷信，因为这就等于相信了无法证明（如果是真的）的东西。相信有这样一个人的人，就像相信有一个无限的上帝的人一样不理性。

如果说相信一个具有无限位格的上帝是迷信，那么当科学向我们提出它关于纯粹物质的最终构成的第一个基本命题，并要求我们相信一个与任何无限一样难以想象的东西时，科学就助长了迷信，因为它要求我们先相信一个与无限上帝等同的人格（位格），然后才能有对它本身的概念。

相信最小粒子理论比相信任何有神论者、三神论者或多神论者所相信的要迷信得多。

在这方面，科学还要求我们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即：我们应该相信，同一种元素的所有原子具有完全相同的重量；不同元素的原

子具有不同的重量；表示任何元素原子重量的数字在该元素的组合数或等价数中是相同的。这门科学还依赖于这样一个命题：任何化合物在任何地方都有完全相同比例的成分。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一些量；在合成中，我们使用这些量。水、盐和所有其他复合物都是按照某些固定的比例定律组合在一起的，虽然不同物质的比例定律不同，但在同类化合物中是不变的。物质的构成是数学化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数字组成表格来表示任何化合物的构成。人们还认为，数字组合定律既适用于化合物，也适用于元素。

现在，科学向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那就是我们要相信有这样一个一个人，他有智慧和能力，能够潜入人类观察的深渊，进入一个最强大的显微镜也无法进入的区域，在那里塑造出小到不可能有大小的东西，但却能够按照某些固定的比例定律而不是其他任何定律相互结合，因此，人类完全不可能发明出任何方法来违背这些比例组合。有一种宿命论，铁一般坚硬，牢不可破，贯穿了整个物理宇宙，如果我要继续研究物理化学，我就必须相信这一点。我们称穆罕默德教徒为迷信者，当命运来临时，他静静地说：“安拉—安拉”，然后顺从，因为他相信一切都在他的宿命论上帝的天平中称量、测量和固定；他不仅与基督徒一样相信普遍和特殊的天意，而且相信没有人能够比宿命分配的时间多吸一口气或少吸一口气，多活一分钟或少活一分钟。在任何宗教中，没有什么比科学在向我们提供最小粒子理论时所要求的信仰更迷信的了。

然而，即使是科学工作者，也不会永远静静地躺在同一迷信的重担之下；如果他们无能为力，当他们厌倦了在一个肩膀上承受重担时，他们就会把重担转移到另一个肩膀上。

我们将坚持它，尽管如果它是真的，也是完全无法证明的；我们将坚持它，直到有其他更能吸引我们想象力的迷信把它赶出这个领域。

假设以太是物质，无论多么微小。如果是这样，那么整个以太，就像整个大气层一样，一定是由互不接触的粒子组成的。那么是什么填充了间隙呢？是更缥缈的以太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更微细的以太一定是由漂浮在超微细以太中的原子组成的，而超微细以太又是由漂浮在超微细以太中的原子组成的，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哦，朋友们，请不要亵渎和嘲笑我们的“最重要的物理概念”，说它类似于东方的迷信，认为世界立于大象之上，大象立于巨大的乌龟之上，如此往下，一物立于另一物之上，如此往下，以至于超越了我们的视觉边界的深度，往下看让我们晕眩和恶心，以至于我们不再关心万物是虚无还是虚无是万物。

但对于以太，这是我们真诚的信条。我们相信，有一种物质充斥

着整个空间。它具有无限的弹性，完全不受重力的影响。同时，万有引力影响着物质的每一个微粒，没有任何物质不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这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此外，人们普遍认为万物要么是物质，要么是精神，尽管也有人认为除了物质之外不存在任何物质，而那些看似精神作用的现象只不过是微妙的物质的产物，是由某种特殊的力量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作用于大脑的，思想与大脑的关系就像胆汁与肝脏的关系一样。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以太呢？它要么是物质，要么不是物质。它是物质吗？据计算，它的数量是其他所有物质的 11,000,000,000 倍。它具有无限的弹性。它完全不受重力影响。它无所不在，贯穿一切，存在于一切，与一切同在。如果以太是物质，那么万有引力就会以一种固定的规律作用于所有物质，其作用力随着距离的平方增大而减小，万有引力会发现一些物质无处不在，这些物质的体积超过了所有其他种类的物质，但却完全不受万有引力的影响。

如果以太不是物质，那它就是精神，我们有一个无限的无所不在的精神，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如果以太是物质，它就是上帝的身体；如果不是物质，它就是上帝的精神。这就是科学给我们的启示。

没有什么宗教迷信比以太学说更矛盾了。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些；

但我还是站在这里，庄严而真诚地说：“信条！我相信有一种充斥着所有空间，甚至是被其他物质占据的空间的实质性介质，同时我相信不可渗透性是物质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以太是所有物质中最大的一部分，它缺乏所有物质的基本特征”。当我重复这一信条时，每一个希望继续作为普世科学“教会”成员的人都会回应：“阿门”。

还有一种我们坚信不疑的科学迷信。我们不仅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建立在这种毫无根据的想象之上，而且还把我们的实际生活也建立在这种迷信之上，这就是迷信所谓的“自然界的统一性”；所谓“自然界的统一性”，指的是物理事件的永恒连续性，就像我们以前所观察到的那样。

这是一种对未来的信仰——永远的未来；一种相信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将一直延续下去的信仰，只要还能创造出历史，它们就将一直按照它们所表现出的重复和连续的顺序延续下去。

关于自然秩序持续存在的迷信不仅不是不证自明的，而且也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我们所熟悉的连续性和反复性是由于没有原因，还是由于某种单一的原因，或是由于许多原因？如果它们是无因的，仅仅是偶然性的产物，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同样的偶然性不会在某一天呈现出混沌的状态，就像它现在似乎还保留着宇宙的形式一样。但是，如果它们是由原因造成的，那么没有任

何证据表明，现有宇宙的原因不会在某一天成为混沌的原因。无论任何行为或一系列行为重复了多少次，我们都无法从这种重复中绝对保证它不会结束。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千百万次事件的连续发生，可能只是使这一连串事件更接近其终结点，正如，我们也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重复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事件将会继续发生下去。事实上，前者是更合理的假设，因为它更符合我们对宇宙过去物理历史的了解，或者说我们相信我们所了解的宇宙过去物理历史。

以我们自己的星球为例。我们相信，它曾一度只是由气体组成；在第二阶段，它是炽热的液体；而现在，在第三阶段，它是冷却的固体。现在，让我们假想一下，当地球只是一团难以想象的剧烈燃烧的气体时，它有理性的居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个气体世界可能有一代又一代的居民。让我们想象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善于观察、交流和记忆的生物。让我们想象他们中间也有科学工作者，就像我们中间有科学工作者一样。这些早期的气体之子可能会追溯到比人类历史时代更久远的时期，并对某些现象产生兴趣，比如我们的太阳升起和落下，比如我们的播种和收获，比如我们的夏天和冬天，他们可能把地球会变成熔融体（液体）的信念视为迷信。现在我们知道，回过头来看，这些气体时代的哲学家将他们的智慧建立在一种迷信之上——这种迷信就像熔融体（液体）的居民相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会像熔融体中的事物一样，永远持续下去一样。他们可能会探究这样一种想法：地

球会凝固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熔海的漩涡会堆积并固定在高山上，无形的气体会变成液态水，液态水会变成坚硬的岩石冰，就像我们极地的屏障一样。他们会争辩说，这与经验相悖，因此不可能发生；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他们看来就像相信奇迹一样迷信。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那些存在于气态或熔态星球上的哲学家们本身也受到科学迷信的影响。然而，这种迷信却是当今科学的信仰，也是人们因基督教关于奇迹的教义而拒绝基督教的依据。休谟先生说，奇迹与我们的经验相悖，而经验是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所有理性和结论的基础。但我们认为，逻辑理解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我们在未来事物方面依赖经验的依据，因为我们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任何关于未来的经验。

我们坦然承认，因为我们不能不意识到，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科学是相冲突的。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理性生物的经验是，所有事物都一如既往。我们迷信地断定，万物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我们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所有的天文学研究、所有的实验测试和所有的逻辑过程，而我们从这些研究、测试和过程中得出的最值得信赖的结论，却破坏了它们赖以建立的基础：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热量辐射到太空中，虽然在短暂的几年中几乎无法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球在其轴心上的运动速度一定会降低，以至于地球的日与地球的年变得相同。类似的情况实际上也发生在我们的月球上，月球绕着它的轴心自转，在时间上与它绕地球公

转的时间相同。地球是这样，其他行星也是这样。许多现象都揭示了能量不断耗散的事实，我们知道这种耗散最终会导致所有行星都坠入太阳。

我们还知道，在这种灾难发生之前，这个星球（地球）可能会与其他星球相撞。我们从未穿过彗星的核。我们觉得永远不可能。然而，我们有可能。据说我们不止一次穿过彗星的尾部。但我们不知道彗核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或许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与任何一颗彗星相撞的可能性都非常小，但谁又能知道彗星的数量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担忧可能微不足道，但当我们得知许多彗星在无垠的空间中都有双曲线轨迹时，我们的科学告诉我们，在那些遥远的空间中一定存在着黑暗的天体，它们或大或小，或少或多，但很可能是无数个。当航海者在黑暗的海面上看到从某个灯塔中射出的亮光发生变化时，他知道在他的眼睛和灯塔中的光焰之间有一些暗体存在。当天文航海家扬起他的望远镜，航行在这无边无际的太空海洋中时，他看到了恒星，这些恒星的亮度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称之为“周期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呢？他说不清楚。

在遥远的太阳（我们称之为恒星）周围，可能有其他天体在旋转，这些天体逐渐冷却，直到它的亮度消失，在它的轨道上留下一片

黑暗。按照正常的运动速度，我们的太阳需要漫长的年代才能到达最近的已知恒星，但当它向恒星掠去，带着我们的星球时，谁又能知道我们会不会突然撞上什么黑暗的固体块，造成无法弥补的世界灾难呢？就好像在最黑暗的午夜，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轮船在满载蒸汽的情况下急速前进，撞上了一艘不知名的轮船的船身，该船上的灯火已经熄灭，轮船在海槽中翻滚，没有舵。科学证明这是可能的。

如果“东方号”满载着硝化甘油，与其他小船一起航行在大海上，顷刻间，这一大堆毁灭性物质爆炸了，庞大的船只被炸得四分五裂，我们是否相信，在爆炸声中，海中的宁静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而随行的小船上的一切都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科学告诉我们，地球有可能因可怕的太阳毁灭而毁灭。

此外，在我们所想象的船队中，最小的飞船也可能在它的船舱里装载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由于它的限制或由于飞船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可能会爆炸并把飞船炸成碎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后，万物是否还能保持原样？科学证明，地球因内部原因而毁灭绝非不可能。

但是，除去对世界毁灭的大灾难的思考之外，我们无法保证万有引力定律不会被改变或废除，也无法保证反射定律不会被修改或废除，更无法保证力的相关定律不会被扰乱或完全废除。对自然

秩序的信仰完全不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而完全属于迷信的范畴。我知道，自然秩序这一命题并非公理。我知道从来没有人证明过它。我相信没有人能证明它。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相信它能被证明。

没有任何宗教迷信比自然统一秩序学说包含着更严重的矛盾；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些矛盾，但我还是站在这里，庄严而真诚地说：“信条！相信人类所经历过的物理事件的连续性和重复性在未来会继续下去。”当我重复这句信条时，不仅所有属于“普世科学会”的人，而且所有其他能够理解这句话的人，都会感到有义务回应“阿门”。

现在，整个问题的实际结论是什么？难道我们要因为科学的基本原理无法验证而放弃科学吗？我们要因为“omne”和“nullum”涉及无法验证的普遍性而放弃逻辑学吗？难道我们要因为最小粒子的存在无法验证而放弃关于物质最终构成的原子论吗？难道我们要因为以太的存在无法证实，而放弃认为存在无限精细和虚无缥缈的介质，通过它传播热量和光线的假说吗？难道我们要因为整个未来，无论是最近的还是最遥远的，都被绝对地排除在人类的所有经验之外，而放弃自然界均匀性的教条吗？

当然不是。为什么不呢？只因为，无论我们能否证明它们，我们都离不开它们。在逻辑学中，如果不接受无法验证的东西，我们

就无法进行推理。在物质世界中，如果不接受无法证实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有物理科学及其在精神文化和物质进步方面的丰富成果。没有对未来不可证实的信仰，我们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实际生活。拒绝所有这些迷信（如果你坚持这样称呼它们的话），你就会躺下等死，就像你的身体会被饿死一样，你的智力也会被饿死。可证实的东西是有用的，不可证实的东西也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当我们转向我们本性的另一部分（从理性转向信仰）时，我们是否应该拒绝精神世界中无法验证的东西，从而使我们的灵魂挨饿吗？最近的一位作家马修-阿诺德在《文学与教条》的序言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放弃对智慧的第一因（即上帝）存在的信念，因为关于这种存在者的假设是无法验证的！但这种信念是所有宗教或道德体系的基础。如果出于上述原因，我们必须放弃对上帝的信仰，放弃对耶稣为了某种赎罪目的而将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信仰，放弃对圣灵的影响的信仰，那么我们就必须放弃一切科学、一切系统知识和人类进步。

不，我们既不能放弃后一种信仰（科学），也不能放弃前一种信仰（宗教），因为我们离不开它们。放弃前者是将有形变为无形，放弃后者是将无形化为乌有。时间和永恒就像狮身人面像一样相互对峙着，在这两张常常缄默的面孔之间，站着一个人惆怅的不信者，他能够让这两张面孔说出最崇高和最神圣的无法证实的真理，但他却在这两张面孔的沉默中——出生为谜，死亡为谜。

事实上，人本身具有双重能力，即——相信证据和相信证据之上的能力。信仰和理性携手攀登阶梯，直到到达可见的最顶端，理性在那里停顿，而信仰却继续前进；继续前进，继续攀登，不是踩着虚空，而是把脚步踏在阶梯的梯级上，梯子确实是看不见的，但却和任何显现在眼前的东西一样存在，一样坚固。理智向信念喊道：“下来吧，你在迷信的区域里”。的确如此，有一种东西凌驾于我们的理性之上；有一种东西的存在，理性无法将其显现出来，就像视觉神经无法感知不发光的热射线或太阳放电射线一样。

在英国，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和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在美国，约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和约翰-麦克洛斯基（John McCloskey）都很成功。这些约翰中，有两位是宗教界的，两位是科学界的；但这四位约翰都是奇特的，就像那位更伟大的约翰一样“迷信”，因为拔摩岛的世界末日异象的光辉照亮了他那双充满祝福的眼睛（见圣经启示录一章）。

所有这些都相信你我必须相信的东西，即有些无法证实的东西并非不可思议。人的信仰抓住的是上面的东西，人的理性触及的是下面的东西。你可以说这是“迷信”，也可以说这是理性，但正因为人有信仰，所以人才有理性。一个人用信仰之手越是顽强地抓住那些未经证实、无法证明的看不见的东西，他就越是可

牢牢地抓住那些看得见、能够证实的东西。

为了让我的意思更清楚，对于需要超自然知识才能解释、而其本身又是完全自然的事物，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世纪植物”。尊敬的“亚当”在查茨沃斯的花园里生活了八十年，他可以向来自墨西哥的游客展示龙舌兰的精美标本，并详细介绍这种植物的性质和习性。“是的，”陌生人说“它马上就要开花了”。“开花，阁下，”园丁说，“它从不开花。”“这是美洲芦荟，”旅行者又说，“我认识这种植物，你很快就会看到它长出二十英尺长的茎，然后开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它的了，先生，”老亚当回答说，“自从老主人引进它以来的七十年里，我每天都能看到它，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它从来没有开过花。”“你会看到的，”墨西卡诺先生说；亚当几乎要惊叹和钦佩死了，因为他发现，在经历了一百年的枯萎和贫瘠之后，这株植物焕发出了新的力量和特性，像天鹅一样，在一种意味着“*nunc dimittis*”的和谐声中翩翩起舞。

谁知道巨大的地球本身会有哪些尚未发育的花朵？在经过漫长岁月的观察，人类的心灵即使没有达到神性的境界，也有了阳刚之气，更不用说人性了，在此之前，谁会对大自然的法则详尽知晓呢？

=====

=====

=====

=====

=====

=====

=====

=====

保罗信仰的辩护价值。

[1886年8月21日在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发表的演讲]

作者：亨利-A-布茨，博士、

德鲁神学院院长。

每个时代都必须亲身审视并深刻理解自己信仰的基础。所有的真理对我们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过去为我们提供的真理材料，我们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考虑它们，我们必须确定最初支持它们的论据在多大程度上仍然站得住脚，然后我们才能无条件地赞同它们。我们的宗教信仰尤其如此。马蒂诺先生在他对哲学研究

的呼吁（“哲学和神学论文”，第 400 页）中说：“你可以在新西兰原住民中间架设电报机，并训练他们使用它；据说印度人和中国人掌握了许多机械规则和天文方法，但他们却早已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样，一个保存着传承技艺的民族可以在停滞和衰落中继续以奇特的精确度传递信息和编制历书，并从过去的科学中获益。但是，道德和宗教的崇高真理，除了柱子和电线之外，还有另一个栖息地，它们不能被铺设在穿越海洋的电缆中；没有任何形式主义可以容纳或使用它们（道德和宗教的崇高真理）。它们只存在于那些从自身中全新发现它们的人；它们在被领悟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它们的使用和应用本身就是我们本性的核心、而非表面，当它们不再被重新发现和重新信奉时，它们的功能也就消失了。换句话说，只有对新真理的渴求才能保留旧真理；而当智力（理智）不再祈祷和向往时，它甚至连自己的品格都将不复存在”。

这一关于哲学的深刻论述在思想领域的应用，没有比在基督教证据领域的应用更恰当的了。”宗教学生（学者）如果忽视现在的思考和研究模式，就会像仅研究现在、而忽视过去一样误入歧途。停止对宗教基本主题的讨论，对宗教的进步和智力发展都是致命的。它不仅会推翻教义，还会推翻生活。正是本着这种探索精神，我们提议对“保罗信仰的辩护价值”进行思考。保罗的信仰涉及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事实，对人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八个世纪过去了，它们是否仍然令人满意和可靠呢？

根据不容置疑的证据，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一个执著而有良知的犹太人，成为了耶稣基督真诚的门徒，并承认他（耶稣）是弥赛亚；记录他（保罗）生平的《使徒行传》包含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写给罗马人、哥林多人和加拉太人等的书信都是他的真实作品。超自然宗教的公开反对者至少承认了这一点。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了一个讨论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在目前是不会受到质疑的，尤其是那些最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

从保罗这些公认的著作中可以肯定，他相信《旧约》的神圣起源和权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格（位格），包括四位福音书作者所记录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埋葬、受难和复活。因此，他相信这些有关基督的伟大史实，这些史实已被基督教福音派所广为接受。这些事实不仅被他（保罗）明确断言，而且与他（保罗）的全部著作交织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些事实作为关键，他（保罗）的著作就无法理解。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开头，他宣布这些教义，尤其是基督的复活，构成了他传道的精髓：“弟兄们，我又将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也是你们所领受的，也是你们所站立的；你们若记念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因此得救，除非你们妄信。因为我首先传给你们的，就是我所领受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这

些话中，我们看到了保罗信条的实质，这一表述与他在其他地方所写的所有内容都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章，斯坦利院长说（“注释”，I. c.）：“它包含了可被称为早期教会信条的已知最早样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不同于所谓的信条，信条这个名称不仅是用来称呼新皈依者所接受的教导，而且是他们在皈依时所表白的。但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使徒口头教导的确切形式。在前四个世纪的各种形式的信条中，有两处（德尔图良和埃皮法尼乌斯的心信条，尼西亚信条可能是从他们那里衍生出来的）包含了这里重复了两次表述，‘按照圣经’，这两处可能是从这里模仿而来的”。

自从保罗向世人宣告了他的信仰以来，已经过去了 18 个世纪。他的信仰对今天的我们还有价值吗？在后来（现代）的批评者的攻击下，我们还能依靠它们吗？对保罗信仰的任何讨论，其重点都在于它们为神迹的存在提供了见证，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不打算对神迹进行正式的讨论，但提及神迹对任何有关保罗信仰的陈述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话题自然分为两个部分：一、神迹是否是通过人类证词的普通法则来证明的适当对象？二、使徒保罗所提供的证词的性质和效力是什么？

赫胥黎教授所著的《约瑟夫-休谟的生平》中，从反面批评的角度，对当前科学思想关于奇迹的立场进行了最新阐述。赫胥黎先生是科学思想流派中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言论可以说代表了科

学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观点。这本书的写作当然具有这位杰出科学家所有著作所具有的清晰、敏锐和有力的特点。如果需要对一个科学门外汉冒险涉足这一领域表示歉意的话，那么可以从科学家们毫不犹豫地大胆进入圣经批评领域这一事实中找到歉意。赫胥黎教授说：“科学不过是将常识应用于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常识的准则应用到他的工作中。

赫胥黎教授并没有局限于对休谟立场的陈述，而是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评论，并指出了他自己与这位怀疑论哲学家之间的一些分歧点；他正在为这位哲学家写传记。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他在本书中表达的观点，而不是休谟的观点。他提出了以下准则，作为一般法则，我们无需犹豫就可以接受，即“事实陈述越是与以往的经验相冲突，证据就必须越完整。”

叙述这些事件的受启示的（圣经）作家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为基督历史中怀疑论者最有可能质疑的部分提供了大量证据。福音书作者对基督道成肉身和复活的事件进行了特别细致的描述，福音书的伟大阐释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根据人类的见证证明了基督的复活。

然而，当赫胥黎教授着手说明他的立场时，他的观点与基督徒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我提请注意的第一点与神迹的性质有关。他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如下说明：“如果一个人告诉我他在皮卡迪利大道上看到了一匹驢马，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但是，如果同一个人告诉我他在那里观察到了斑马，我可能会对是否接受他的证词犹豫不决，除非我对他以前是否认识斑马，以及他在这次事件中的观察能力和机会非常满意。然而，如果我的见证人向我保证，他亲眼看到一只半人马在那条著名的大道上奔跑，我则会坚决拒绝相信他的说法；即使他是最圣洁的人，并愿意为支持自己的信念而殉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会怀疑证人的诚意；我要质疑的只是他的能力，不幸的是，他的能力与诚意或信念的强度关系不大。事实上，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样的证词能让我确信有一个活生生的半人马存在。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柏林已故的约翰内斯-穆勒（Johannes Muller）——我同时代最伟大的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勉强断言他见过活的半人马；我肯定会被这样一位权威人士的断言所震惊。但我只能暂缓判断。因为，总的来说，即使是他也有可能对他所观察到的事实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而不是，像半人马这样的动物真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位非常称职的研究者精心撰写的专著，并附有半人马所有重要部位的数字和测量结果，而且是在毫无疑问伪造或误解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那么就不可能让一位科学工作者感到他是在根据证词证据表达他相信半人马存在的信念时是认真行事的。根据常识或科学的准则（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准则）来判断，所有奇迹都是半人马，否则它们就不是奇迹；有理智和有科学头脑的人都会以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它们”。我详细引述的这段话

的最后部分，是赫胥黎教授及其学派的一个根本性错误的关键所在。它在于“所有奇迹都是半人马”这句话。

我们不妨注意一下我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他（赫胥黎）的教条的力量，即：我们承认，“事实陈述与以往经验的冲突越多，证明我们相信它的证据就越必须完整”。没有人质疑证明奇迹需要强有力的证据。人们也承认，证明一个人看到过“活的半人马”的证据必须非常充分，而我本人无法想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活的半人马的存在。

赫胥黎教授的错误部分在于对奇迹（神迹）性质的误解。我们的奇迹（神迹）一词有基督教的含义，这是公认的，讨论必须围绕其公认的含义进行。他承认有必要给出确切的定义，他（赫胥黎）说：“与所有其他讨论一样，讨论的第一步是明确理解所用术语的含义。在争论者就‘奇迹’一词的含义达成一致之前，关于奇迹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又是否可信的争论只是空谈”。休谟虽然没有他（赫胥黎）一贯的敏锐，但却按照奇迹信徒的惯常做法，将奇迹定义为“违反自然法则，或因神灵的特殊意志，或因某种无形的主体的干预而违反自然法则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赫胥黎教授不同意休谟关于奇迹的定义，因为它假定了神灵，而赫胥黎的观点却没有；于是他（赫胥黎）用自己的定义取而代之。“奇迹”这个词—miraculum—在其原始而合法的意义上，仅仅意味着奇妙的事情。因此，有了这个定义，他（赫胥黎）说“所有奇迹都是半人

马”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一种对神迹的解释完全符合讨论的要求，那就是描述神迹的作者所采用的解释。我们应该理解的是它们在《新约圣经》中的含义，而不是其原始含义。

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四个词有被混淆的危险。

1. *Θαυα*. 这是一个表示惊奇、钦佩或惊讶的词。（色诺芬的“Anabasis”vi. 意料之外的事）。在 LXX（七十士译本）的《约伯记》xvii, 8 中，它被用来翻译希伯来语 *shamem*，意思是惊讶、惊奇。在《新约圣经》中，它只作为名词被使用过一次，即《启示录》第十七章第 6 节，在这里它保留了“惊奇”的意思。“我非常惊奇”（*αὐθα*）。

2. *Τέρας*. 奇迹、预兆、神迹。在 LXX（七十士译本）中，它是希伯来文 *mopheth* 的译文，意思是奇迹、神迹。主要意思是预兆、奇事，指未来。

3. *Ἐνυετόν*. 记号、标记、象征，指标记或表示任何事物的东西，如《罗马书》第四章第二节，割礼的记号。在 LXX（七十士译本）中，它是希伯来文 *'oth'* 的译文。

4. *Δύναμις* 能力、权力、力量。*Θαύματα* 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在《新约》中从未用它来指代神迹。此外，*Τέρας* 也不能被视为神迹的

表征，因为在新约中，它总是以复数形式与 *onueia* 连用，有几次是 *Tépas* 在前，但通常是 *onueia* 在前。

奇迹的这种双重特征——有意义的东西 (*onueiōn*) 和令人吃惊的东西 (*répas*) ——不是某个作家的构想，而是贯穿于《新约圣经》的整个命名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和《保罗福音》都采用了这种词语组合。我们并不是说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词语都具有经文中神迹的所有特征，但新约中的这一概念是显而易见的。在《新约》中，神迹的概念是能力、*δύναμις*、目的或使命、*σημεῖον*、奇妙性、*τέρα*ς，即超自然的东西。

赫胥黎教授的整个理论都不成立，因为他给奇迹下了一个错误的定义。我们可以承认，如果他的定义成立，那么奇迹就只是“半人马”。然而，如果把这当作完整的定义，那就是在引出整个问题。为奇迹辩护的人一直抗议赫胥黎教授的定义。他只是在与一个稻草人作斗争。他的战斗非常灵巧，他的打击非常有力，但他的敌人只是他自己的想象。《新约》中的奇迹旨在证实某些事情，而不仅仅是超自然力量的展示。《希伯来书》第二章第 4 节指出了神迹的一般性质：“神也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并各样的能力，圣灵的恩赐，向他们作见证”。关于神迹的这一观点是所有现代作家对这一主题的看法。亨利-史密斯 (Henry B. Smith) 教授在他的《护教学讲座》(第 94 页) 中提到了我所引用的《新

约圣经》中的话，然后补充说：“神迹是一种奇妙的现象：因此，奇迹是奇妙的现象，无法用已知的规律或自然机构（第二原因）来解释；是超人神力的产物和证据；旨在为神的启示提供证明”。莫兹利教授（“奇迹八讲”，第 21 页）说：“奇迹被视为单纯的神迹或预兆，是否显得卑下、粗鲁、琐碎和幼稚？要从这种不真实、不充分的方面转到奇迹的真正方面。把它看作一种工具，一种在基督世界的实际结果中显示并证明了其力量的强大工具”。

因此，我们可以同意赫胥黎教授否认奇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观点，但我们一刻也不能赞同他关于“所有奇迹都是半人马”的说法。奇迹是引入一种新的力量，或者说是引入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同一种力量，以达到一个明确的、有价值的和必要的目的。创造宇宙的上帝控制着宇宙，“在天上的军队和地上的居民中”实现他的旨意。所有《新约》中的神迹都有明确的目的。它们证明了启示的真实性和耶稣的神圣使命。

拉撒路的复活和基督的复活尤其如此。它们是超自然力量的展示，是为了明智和有益的目的。它们不是半人马，而是与人类的愿望和希望相一致。人类的这种渴望表明，这种对未来生活的证明并非反常，而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这些并不只是神迹，也不像世界上的魔术师那样试图让人惊奇。这些都是事实，必须用证据来证明，我们和赫胥黎教授一样，相信支持这些事实的证据应该是非常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赫胥黎教授论述的另一点是，他试图证明“不可能证明现代奇迹——这意味着不可能证明所有奇迹”。我强调他所说的“现代奇迹”，因为他的论述的谬误尤其就在这一点上。他一如既往地有力而清晰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可能很少有宣称相信奇迹的人考虑过，在自称是当代奇迹创造者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证明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例如，假设A. B. 死了，C. D. 使他复活。假设 A. B. 和 C. D. 都是无可挑剔的人，都是诚实可信的人；C. D. 是 A. B. 遗产的下一任继承人，因此有强烈的动机不让他死而复生；A. B. 的所有亲戚，那些对他怀有深厚感情或对他活着有兴趣的有名望的人，都说他们亲眼看到他死了。此外，让 A. B. 在康复后被他所有的朋友和邻居看到，让他和他们关于他现在还活着的证词被记录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正直和敏锐的地方法官面前；所有这些会构成 C. D. 创造了奇迹的推定证据吗？毫无疑问不能，因为整个证据链中最重要的一环缺失了，那就是证明 A. B. 真的死了。在这一点上，普通观察者的证据是毫无价值的。即使是医学证据，除非医生具有非凡的知识和技能，否则可能也没有什么价值了”。换句话说，似乎不可能完全证明一个人已经死了，因此也就不可能证明复活。我忽略了他对历史巧合的说明，因为这种说明肯定不能说明问题，我只想谈谈他对要求的陈述。他问“当代奇迹创造者”需要什么？当一个当代创造奇迹的人作为人类的救世主出现，并有一个可以证明的

宗教时，我们可以考虑，但我们只需要考虑《新约》中创造的奇迹。

我们承认，如果向我们提供一个像他所说的故事，以及他所引用的所有证据，我们也会拒绝接受，并要求提供最严格的证据。但是，现代的奇迹和基督时代的奇迹截然不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人有关，他的生平和教义以及他的奇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的教诲至今仍是人类最崇高、最纯正、最广为人知的。基督的神迹与他的人格（位格）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试图用所谓的科学方法将事实与产生事实的特殊条件割裂开来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如此多的混乱。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今天有什么能让我们信服，而在于如果一个被预言和期待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人应运而生，并与这些期待相吻合，他的外表和言语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公开做了如此奇妙的工作，并声称这些工作是他使命的证明，那么会有什么能让我们信服，又应该有什么能让我们信服。我们今天不是在争论神迹，而是在争论当时所证明的奇迹。这样的期望，这样的主张，不可能不受到详尽的调查。

《新约》提供了一个赫胥黎教授所要求的测试案例。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耶稣被叫去。他没有匆忙赶来，声称他的死是为了一个目的——上帝的荣耀。耶稣来的时候，埋葬已经完成。他（拉撒路）在坟墓里躺了四天。姐妹们抗议他（拉撒路）复活的可能性。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吧。”他出来了，“手脚被坟墓的衣

服捆绑着”。耶稣说“松开他，让他走”。“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利亚那里 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就信了他”。如果你承认这段历史，你就会看到一个死亡和复活的案例。所挑战的每一个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这段叙述不符合历史。如果不能证明《约翰福音》的非历史性，那么这个答案（即否认其历史真实性）又是在引出整个问题。

桑代在谈到《约翰福音》时也说：“《福音书》就像那件神圣的外衣，从头到尾都没有接缝；它要么全部是真实的、真确的，要么全部是虚构的、虚幻的；后一种选择比奇迹更难以接受”。

如果接受任何（自然）理论来解释这些记录的事实，将它们置于物理定律的范围内，并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从而撇开圣经的明确陈述，那么莫兹利的评论（“论神迹”，第 119 页）将是中肯和无法回答的：“将福音奇迹归结为物理定律的做法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任何哲学假设，而仅仅是因为（不信的）人顽固地认为，本来那些对事实的一种更真实的历史评价，是对事实进行了修改”。拉撒路复活故事的条件有力地证明了其字面的准确性。它没有任何杜撰的痕迹。它太直接了。从来没有人对它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自然）解释，能够满足（自然）科学确定性的条件。施特劳斯的神话学说和勒南的幻觉学说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不用说令人满意的说明了。无法想象有哪种情况能比赫胥黎教授提出的条件更完全符合，即复活的人（拉撒路）实际上曾已经死

亡。

在我们现在的讨论中，只剩下赫胥黎教授提出的另一个命题，即：如果承认《圣经》中提到的事实是奇迹，那只会导致我们对自然法则和自然力的观念的修正。然而，他自己的话最能说明他的立场。

他的语言是对休谟说法的批评：“死人复活是一个奇迹；因为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从未出现过。这就是说，有一种统一的经验反对这种事件，因此，如果发生这种事件，就是违反自然法则。或者说，这种说法是赤裸裸的荒谬：——‘如果不违反自然法则，那么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如果一个死人真的活过来了，这个事实将证明，不是任何自然法则被违反了，而是这些法则，即使它们表达的是非常长期和统一的经验的结果，也必然是基于不完整的知识，只能作为或多或少合理的期望的理由”。

这就是赫胥黎教授的语言，他否认超自然现象的可能性，假设所有发生的事情，无论多么奇妙，都必须在自然法则的范围之内。这是对有争议的问题的最赤裸裸地引出更多的问题。基督教思想家声称发生过某些事件，如拉撒路的复活和基督的复活，是基于他们相信有一种超越自然规律的神圣因素介入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如果像赫胥黎教授那样说，如果承认了这些，那就只能说明

自然规律的范围超出了我们以前赋予它的范围，这就等于说，一件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以前一直如此，——而这（是否真的如此）才是真正要讨论的问题。

然而，让我们跟随赫胥黎教授的论断：“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把他有权断言的事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他就不会断言太阳和月亮在阿加隆山谷静止不动；也不会断言一座城市的城墙在号角声中倒塌；更不会断言水被变成了酒；因为这些事件违背了统一的经验，违反了自然规律。如果他能证明与此相反，明天这些事件可能就会出现在自然规律中。但是，常识和常人的诚实都迫使他要求那些想让他相信这些事件确实发生的人提供与这些事件偏离概率程度相称的有力证据；这些证据至少要像那些说他看到了半人马的人所必须提供的证据一样有力，除非他甘于被认为是过于轻信或不够诚实”。这段冗长的引文是为了让我们充分理解他的观点。

没有人会质疑，“常识和常人的诚实都迫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提供与这些事件偏离概率程度相称的有力证据”。他（赫胥黎）假定，如果这些事实被证明，那么就需要有一种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而这种力量必须被寻找到，并且这种力量将在自然法则的领域中找到，而不是超自然的力量。由于有许多以前被视为神迹的事情，现在被证明属于自然法则范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上文这里所说的这些事实（如果它们是事实的话）将会被发现占据同

样的（自然）领域，并且必须以同样的（自然）方式加以解释。这也许是现代人对历史奇迹（神迹）的所有反对意见中最似是而非的一种。它是对当前人类进步信念的一种呼吁，但也纯粹是一种否定。这是最纯粹的臆想假设。它只是说，这里有一种现象，我们不知道它的（自然）起源，但我们一定会找到的。确定事物的原因是哲学的职责所在。如果你承认奇迹的存在，那么你也必须承认，现代思想还没有找到解释奇迹的方法。另一方面，《圣经》不仅给出了事实，而且从一开始就对它们做出了充分而一致的解釋。他们（那些不信神的人，例如赫胥黎）会把它们（奇迹）的起源追溯到一种无形的（自然）力量，而他们对这种力量一无所知；我们会把它们的起源追溯到《圣经》所启示的无形的上帝。我们申明，这些事实一经证明，就证实了神性因素的存在。

在没有任何矛盾证据的情况下，后者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奇迹的某些特征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是不一致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其中一个特点，即：《新约》中的神迹在很大程度上与耶稣基督的人格（位格）有关，不能脱离他来考虑。另一个特点是，神迹与人的意志有关，是在那些创造神迹的人认为合适的环境下发生的，因此不具备普通自然法则的基本特征。

莫兹利（“论奇迹”，第 118 页）很好地表达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方面：“但是，说奇迹（神迹）中发生的物质事实可以归因于未知

的自然原因，并不是说奇迹本身可以归因于未知的自然原因。奇迹是指物质事实与明确的宣布、或行为明确的超自然预言相吻合。正是这两个事实的对应构成了奇迹。如果一个人对一个盲人说“看”，而他看见了，我们要解释的不仅仅是他突然恢复了视力，而是他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恢复了视力。因为从道义上讲，事件与命令或通知的这种完全一致不可能仅仅是偶然的，或者我们应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巧合，尤其是如果这种巧合在其他情况下重复出现的话”。

消灭超自然的观念是与人类的普遍共识背道而驰的。人类普遍相信有一个创造并控制世界的存在者，这种信念与自然界秩序统一的观念一样深刻而普遍。超自然的存在深深地印刻在人类的心中，无法根除。肯定超自然的不存在，以及不可能通过人类的证词证明奇迹的存在，是非理性的极致表现。

如果可以证明奇迹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证明任何超出我们个人知识范围的事情。

在使徒保罗那里，证明奇迹的可能性是最基本的信念。对神迹的反对意见的总体回顾，使我们开始考虑使徒保罗见证的性质和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基督复活是神迹的证据，因为这一事件的证据是与保罗的信仰相关的调查主题。他假定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需要作为一个事实加以证明，但证据的说服力要

与这一主题的重要性相称。他还假定基督的死和埋葬是众所周知和公认的。他还指出，根据圣经，基督第三天复活了。他毫无疑问地相信基督复活。让我们考虑一下他的信仰对我们的价值。

我列出了五条证据准则，如果这些证据在任何个案中被认定为真实的，那么这些证词就必须被人们公认为足以确立任何历史事实。它们并不新奇，而且符合可靠证词的自然要求。

1. 证人必须在时间和地点上与他所说的事实足够接近，才能就这些事实提供准确的证词。

这句话适用于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同时代人。年表学家们虽然对保罗出生的确切年份有不同看法，但对其出生的时间范围却达成了一致。（金口（Chrysostom）公元 2 年；施拉德（Conybeare & Howson）公元 14 年；迈耶（Meyer）公元 10-15 年）。如果我们假定公元10年为保罗的出生日期，那么当基督在耶路撒冷传道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他至少已经二十岁了。他在家乡大数接受早期训练后，被派往耶路撒冷跟随著名的拉比学习，他的拉比就是迦玛列。他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当时耶路撒冷正被耶稣所受的审判和处决所唤醒。

这些都是当时在犹太教会乃至整个犹太民族中激起轩然大波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像保罗这样一个受过全面训练的犹太人，会

不对这些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对其产生的条件进行彻底的调查。

在前面提到的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时间的痕迹，根据斯坦利院长（Dean Stanley）的说法，这封信大约写于耶稣复活后的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我们有权假定，他熟悉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后他对信仰的进一步说明。他给出了一系列有力的证据：“之后，有五百多弟兄同时看见了他，其中大部分人直到今天还在，但有些人已经睡了”。这是对他同时代人的见证的呼吁，如果不是事实，在正式的论证中就会显得很荒谬，比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的论证；如果不是事实，就很容易被驳倒。此外，证据的陈述也很细微，只有细心的调查者才能做到。他表明自己不仅仅是在抄袭福音书作者的记录，因为他提到了福音书作者没有提到的复活见证人。他对雅各的描述不见于福音书，但不一定是不正确的；他自己的调查或直接的启示可能是他知识的来源。因此，我们所有的事实表明，毫无疑问，保罗是在不仅不排除可以调查，而且要求调查的时间范围内。保罗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曾在耶路撒冷居住过一段时间，他有分析和探究的头脑，熟悉耶稣的出现、生平和理解所引起的争论，却不调查他的信仰所依据的见证，这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里并不试图证明他确实进行了这样的调查。这里只是表

明，他生活在事实的范围之内，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知道真相。他出现的时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2. 证人的偏见（如果有的话）不应有利于他作证的一方，如果是相反的一方，他的证据就会相应地更加有力。

这是很常见的一句格言，只需提及并应用于我们正在考虑的案例中即可。他（保罗，或扫罗）赞成“处死”新信仰的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他甘愿成为毁灭新生教会的工具，这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他不是被征召为敌对的祭司长服务的，他也不是半心半意的使者，他是自愿要与基督和他的门徒们作对。他去找大祭司，希望得到他的授权书。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的措辞非常有力：“扫罗仍旧对主的门徒发出屠杀威胁，就去见大祭司，向他要往大马士革犹太会堂的书信，若是遇见，无论是男是女，就可以把他们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九章第1、2节）。在给加拉太人的信中，他（保罗）谈到了自己这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我曾是怎样迫害神的教会”（加拉太书第一章第13节）。

他对基督和他门徒的敌意给初生的教会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听到他信主的消息时大吃一惊，好不容易才被说服接受他为弟兄。保罗信主后，主指示亚拿尼亚去拜访他，亚拿尼亚犹豫了一下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起这人，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作了多少恶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13节）。只有在

主的直接命令和保证下，亚拿尼亚才去见保罗，并传达了神圣的信息。保罗立即开始传道，所有听到的人都惊奇地说：“这不是想要毁灭他们的那位吗？这不是在耶路撒冷要消灭求告这名的人，并为此而来，要把他们捆绑带到祭司那里去的那位吗？”（使徒行传第九章 21 节）。

之后，当他提议加入耶路撒冷的门徒时，“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使徒行传第九章第 26 节）。巴拿巴发现有必要解释他信主的历史，以便向他们保证，曾经是他们众所周知的可怕对手的保罗现在是他们的朋友和勇士。

因此，保罗曾经是带着对基督教首领最顽固、最敌对的偏见来研究基督教的。这些偏见是继承性的，也是有良知的：“我心里实在想，我本可能会做许多对抗拿撒勒人耶稣之名的事”。因此，无论保罗为基督教的伟大事实作了什么见证，都是一个因出身、训练和行动而与之敌对，而非友好的人所作的见证。

3. 如果有任何不寻常的不适当影响，他事后应该有时间修改或收回在这种影响下得出的结论。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保罗的思想受到了影响，他的判断和行为也受到了影响。对他产生如此奇妙影响的事件发生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完整地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中。我们不必在此争论这种

影响的确切性质。他完全相信，而且这种相信从未离开过他，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场合，他看到了复活的基督本人，听到了他的声音。这是最强烈的个人见证。如果说保罗所看到和听到的是闪电和雷鸣，或者说整个事件是主观的，那么其效果仍然是所有历史中的奇迹之一。历史上最奇妙的事件之一就是保罗身上突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奇妙，以至于除了按字面理解保罗自己讲述和路加记录的事件（使徒行传9章）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适当的解释能够令人满意。这种转变是彻底的；迫害者变成了代言人，严厉的法利赛人变成了耶稣慈爱的门徒，毁灭的使者变成了因信基督而得救的传教士。无论影响的性质如何，其结果都是持久的。

然而，如果他有可能搞错了，他就会回想起来并收回他的声明。他肯定地说，他看到了复活的主，他称呼了主的名字，主指定了他的工作。他不但没有质疑启示的准确性，反而在不同的时间提到它，以此作为对自己生命的申辩。他甚至回忆起基督的原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任何缺乏现实基础的东西在一段时间后都会淡出人们的视线。幻象、狂喜，无论在当时产生多么奇妙的效果，最终都会失去影响力。几个星期、几个月，最多几年，它们要么被人遗忘，要么不再是影响人们的因素。激动人心的巨浪常常会席卷社区和国家，但除非建立在永久性思想的基础上，否则很快就会消逝。钟摆被某种不正常的力量带得太远，很快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返回。但保罗在这件事之后生活了三十年；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那奇妙一幕的记忆和影响从未停止过对

他的影响。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守着这一信仰。他相信自己看到了基督复活时的异象，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肯定的。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一个人被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异象所左右，并且在长达多年的生命中一直被异象的影响所绝对改变。

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的能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敏锐，在他的思想中，神圣的呼召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信主这一奇妙事件的持久影响证明了其所依据的重大事实的真实性。在人类的思维中，像他这样被不真实事情所左右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4. 他的信仰的持久性和深刻性应通过这样的考验来证明，——这样的考验将使人们对他所持信仰的正直性不容置疑。为信仰而受苦并不能证明信仰的正确性，却能证明信仰者的真诚。对任何见证人的最大考验莫过于对使徒保罗的考验。在《哥林多前书》第 xi 章第 23-30 节中，保罗用自己的笔生动地描述了他所经历的苦难。人性可能遭受的各种苦难在这段叙述中都能找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使徒行传》中路加所记历史的证实。有强烈的身体上的剧痛、灵魂深处的痛苦、假弟兄们的危险、个人的软弱感，——只有他相信神的力量与他同在，他对所有教会的关怀，才能忍受这些痛苦。即使是在监狱的高墙内，他也坚守信仰，尽管他知道监狱的门打开之时也将是他被处死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宣称“但我不以此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保罗的诚

信经受了最大的考验。与他的种族和亲属疏远，丧失他所有的自然愿望和希望，遭受人们很少经历的痛苦，——这些都证明了他的信仰是正直的。

5. 他的天赋和后天能力，使他的判断和言论得到深思熟虑的人们的赞赏。在这里，我们的立场是极其重要的。保罗所相信的历史事实受到了（那些不信神的现代派人士的）质疑，但使徒保罗判断事实的能力从未受到过成功的攻击，实际上也从未受到过质疑。罗伊斯说（《新约史》，第一卷，第 134 页）：“当然，他用自己的光芒照亮了教会的东方天空，在他的光芒所及的东方和西方，他都是正义的传道者，直到像太阳一样，在完成了一天高尚的工作之后，在遥远的西方落下。就像世间一切真正伟大的事物一样，他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结果不是被憎恨就是被误解，或只被理解其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是其内在含义；对于世间的聪明人和谨慎的人来说，他现在是活生生的光，现在是不和谐的苹果”。这位谨慎的、常常是非正统的批评家（罗伊斯）的话表达了对保罗的批评性评价。他（保罗）的信仰的最尖锐对立者也承认了他的伟大和智力上的优越性。在他（保罗）身上集逻辑、学识、崇高和智慧于一身。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研究他的著作。今天，这些著作已跻身于公认的人类智慧杰作之列。如果今天人们知道任何人能准确无误地诠释这些著作，成千上万的学生将会聚集到这样一个人的脚下寻求指导。现代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解释保罗十八世纪以前所写的东西。《罗马书》第八章、《哥林多前

书》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是古往今来任何作家都无法超越的。人们公认他学识渊博，才智敏锐，逻辑严密，充满诗意。

没有人会质疑他的判断力值得我们思考。没有人可以信誓旦旦地说，他（保罗）把臆想当作事实，或者未经深思熟虑就接受了《新约》的教义。

6. 除了保罗的个人见证，我们还有福音史上重大历史事实的目击者的无可辩驳的见证。路加在叙述之初就声明了他调查的仔细程度。从四部福音书所记录的情况来看，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堪称奇迹。它们在一些细微之处似乎存在分歧（然而可以得到良好的解释），但在所有具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却完全一致，这并不令人惊奇。

因此，我们确信福音书中重大事实的真实性是基于似乎坚不可摧的证词。如果奇迹是通过证词来确定的，那么肯定没有任何科学事实能提供更可靠的证词了。

然而，我们被（那些不信神的现代派人士）告知，这样的证词虽然对信徒来说已经足够好了，但却无法满足现代历史批判的要求。赫胥黎教授的《休谟生平》是对不可知论或唯物主义思想要求的最新阐述之一。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并加以运用。在“论自然的秩序与奇迹”一章中，赫胥黎先生问道：“但是，有没有记录在

案的奇迹，其证据符合基本道德的简单明了的要求呢？休谟以历史专家的权威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丝毫犹豫。’ 在所有的历史中，找不到任何奇迹是由足够多的人证明的：——这些人的善良、教育和学识毋庸置疑，足以让我们避免对他们自己产生任何错觉；他们的正直毋庸置疑，足以让我们完全不怀疑他们企图欺骗他人；他们在人类心目中的信誉和声望，使他们一旦被识破任何谎言，就会蒙受巨大损失；同时，他们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在世界上如此著名的地方，证明他们所做的事实，使他们若有虚假就会被人识破是不可避免的。’ ”

关于休谟对证词的这一要求，赫胥黎教授评论道：“这些都是严肃的断言，但它们最不可能受到那些以权衡证据为己任，并在适当地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道德责任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人的质疑”。

基督教辩护士的目的并不是要低估证明奇迹（神迹）所需要的证据。相反，为了他们自己的安慰和真理的事业，他们要求支持超自然现象的证据必须坚不可摧。正因为满足了历史批判的这些严格要求，他们才声称判决对他们有利。例如，我们在保罗的事例中找到了这一点。他（保罗）本人满足了对个人见证的所有可能要求。

1. 他（保罗）的善良、教育和学识毋庸置疑，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对他产生任何错觉。
2. 他的“正直毋庸置疑”，不会让人“怀疑他有欺骗他人的企图”。
3. 他“在人类心目中的信誉和声望”肯定“足以使他在被人识破任何谎言（如果有的话）时蒙受巨大损失”。
4. 事件发生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若有不符合事实，就会不可避免地会被发现。

因此，证人（保罗）是可信的。

然而，要完全满足休谟的要求，还剩下一点，那就是要有足够多的在场证人。前面已经说过，保罗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问题上讲到了许多见证人，并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一个事实，需要通过证词来证明；他还特别肯定地提到了他（耶稣基督）向五百多名弟兄的显现，其中大部分人直到他（保罗）写这本书信的时候还在。此外，福音书的作者们各自陈述了重大的事实，并有细节不一的说法，以证明他们作为见证人的独立性。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保罗的信仰基本上满足了尖锐而充满敌意的批评家约瑟夫-休谟的所有要求。可以肯定的是，保罗比他那个时代以来的任何人都更多的机会了解真相；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于保罗，没有哪

位现代作家对探寻真相更感兴趣，也没有哪位现代作家对探寻真相更无私；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于保罗，即使休谟先生或赫胥黎教授也不能声称自己有更强的辨别力或更准确的判断力；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保罗）的证词无效，那么有效的证词就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基本事实得不到证明，那么任何事情都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证明。

像保罗这样的人认为这是可以证明的；保罗的信仰认为这是事实；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一致认为它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些都为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和复活这些基本教义的真实性提供了至少与（那些不信神的现代派人士的所谓）现代科学思想反对它的声明一样有力的推定。因为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与这些事实相反的东西（即那些不信神的人所提出的各种质疑）从未被证明过，而信仰反对者的唯一武器是在证明奇迹的可能性方面，而不是在具体证明本身方面。保罗在罗马狱中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仍然没有动摇；它必须继续代表上帝教会的持久信仰。

=====

=====

=====

=====

=====

=====

设计的证据，主要来自解剖学和生理学。

[1886年3月4日在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宣读的论文]

作者：安德鲁-H-史密斯，医学博士，纽约市。

三个月前，亨利-A-道斯牧师在研究所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良心对上帝的见证”。在随后的讨论中，我发表了一些看法，有人要求我对这些看法进行补充，并写成一篇论文。我已经这样做了，我相信当时在场的各位会原谅我重复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

也许，除了那些基督徒生活是从童年开始的基督教教育中产生的情况之外，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在个人接受上帝启示的观念之前，理智必须确信上帝的存在。我说理智必须被说服，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情感还没有被调动起来，而理智是审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法庭。如果我们追溯任何形式的宗教的起源，就会发现，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它并不仅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冲动或本能，要依附于某种高于自身的东西，而且是理智感到有

必要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只有假定存在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必要性才能得到满足，而根据对这种力量所形成的观念，就会形成宗教的特殊形式。在此之前，宗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纯粹的智力过程，但当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的概念一旦形成，人们的情感就会向它奔涌而去，爱、敬畏、崇敬和其他情感属性就会发挥作用。需要研究和推理的抽象原因变成了需要崇拜的具体神灵。

基督教与其他形式的宗教一样，必须经历以下发展阶段。

因此，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必须先于证明（上帝）启示真实性的论证。

这方面的论据有很多来源，在座的各位都耳熟能详。我只想谈一个，即自然界中设计的证据，即智慧地调整手段以达到结果。这种调整的规模之大，种类之多，是无法用纯粹的巧合来解释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智慧的杰作，它显明了有足够的智慧来构思计划，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计划。这种智慧将所有自然界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因此高于自然界，这就是关于“上帝的设计”的基本概念。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不言自明的，似乎不需要任何论证来支持它；然而，现代怀疑论却通过一种奇怪的心理戏法，试图用一种非智慧、或自然力量的体系来取代智慧的第一因，而它（现代怀疑论）

并不试图解释这种力量的起源。它把工具推到了使用者的位置上，就好像房子是由锯子和锤子而不是木匠建造的一样；怀疑论者颠倒了推理，要求科学来帮助他进行论证。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只是为设计的和谐性增添了新的例证，却又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万物都是偶然的結果。

这种推理方式的趋势现在特别突出，因此值得重复一下反对这种推理方式的论据，虽然我不能说什么以前没有说过很多次的话，但从有机生命中得出的某些考虑因素让我特别感兴趣，我将简要地加以说明。

属于高级动物生命形式的个体是最完美的机器，这是想象力所能企及的。它的构造几乎体现了物理科学的所有原理。直到科学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才发现光的折射定律。但是，很显然，人类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发展出来的东西，早就已经在眼睛的构造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几乎在在座的一些人的记忆中，艰苦的研究和巧妙的实验成功地建立了气体扩散定律；但却发现自从肺开始呼吸、血液开始循环以来，这些定律早就决定了呼吸和循环器官的结构。渗透定律似乎只是昨天才被宣布为一项辉煌的发现，然而现代生理学表明，整个生理营养计划都是以这一定律为基础的，它调节着不同密度的液体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膜组织的运动。热量的辐射和传导受制于近代才制定的定律，然而第一只温血动物的构造却符合这些定律。因此，我几乎可以无限制地继续下去，

说明人类的思想在其最遥远的地方只是成功地发现了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和利用的东西。根据过去来判断未来，我们可以自信地预言，如果未来在物理科学中发现任何新的原理或定律，都会发现它早已经被高等生物的结构所认识和应用。

由此可见，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有一种智慧已经知道并利用了人类后来所发现的东西；同时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智慧已经制定了周密而精确的计划，以实现所提出的明确结果。举一个生物学中的例子：所提出的目标是将营养物质分配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并从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清除衰老和磨损的物质。所使用的手段包括一套复杂的器官系统，通过这套系统，从外部获得的食物被转化成一种叫做血液的液体，这种血液通过血管输送，这些血管又分成数百万个细小的分支，这些分支渗透到最偏远的身体结构中，向它们输送所需的营养物质，并接收废物和腐烂产物作为回报。然后，血液通过另一组血管回到肺部，在那里，废物被抛到空气中，净化后的血液再次开始循环。其中许多装置的作用效率和构造的巧妙（如果我可以恭敬地使用这个词的话）都是非常奇妙的。首先，推动血液通过这些微小的通道需要巨大的力量。它的能量总和相当于每次（心脏）搏动都能举起 50 磅以上的重物，平均每分钟约有 70 次搏动。实际上，有两个心脏并排放在一个共同的包里—右心接收不纯净的血液并推动其通过肺部，左心接收肺部净化后的血液并推动其通过整个身体系统。每个心室都是一块中空的肌肉，放松时将血液吸入腔内，完全膨胀时收缩

并推动血液向前流动。但是，血液必须从不同的出口流出，这就需要在入口处设置一个瓣膜，以防止血液倒流。现在，如果瓣膜有一个坚硬的骨质框架，就会影响心室的扩张和收缩。因此，瓣膜在左侧由两片薄薄的膜瓣组成，右侧由三片薄薄的、柔韧的膜瓣组成，这些膜瓣很容易被流向它们之间的血液分开，但在心室收缩时，它们又会摆动在一起，关闭心室口。然而，这些薄而柔软的“帘子”的自然趋势是在后面血液的压力下从内向外翻转，从而随着血流方向的每次改变而前后翻动。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在“帘子”的边缘和心室壁之间分别连接了一些无弹性的“细绳”。但如果仅止于此还不够，因为当心室收缩时，这些“绳索”的两端就会相互靠近，“绳索”就会在应该绷紧的时候松弛下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这些“绳索”并不直接连接在心室壁上，而是连接在从心室壁伸出的小肌肉锥体的顶端。当心室壁收缩时，这些锥体也随之收缩，而每个锥体的顶端被向后拉，就像它的底端被向前推一样。这样，连接“绳子”的点就保持不动了，“绳子”也就保持了张力，尽管“绳子”被拉伸的空腔面积大大缩小了。这确实是一个成功的机械工程师的智慧！

但是，沿着血液循环的路线，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非凡的工程。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来进行不间断的工作。供血来自心脏，路径非常短且直接。然而，心脏收缩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如果血管以完全笔直的路线通向大脑，那么心室的每一次搏动都会给这个非常脆弱的器官（大脑）带来严重的冲击。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每条主动脉都会在其走向的某一点突然弯成直角，在水平方向运行约半英寸，然后再次弯成直角，继续向上通向大脑。血管走向的这种慢动作的作用是在每一波血液到达大脑之前将其部分阻断，这样血管壁就会受到大脑所逃避的冲击。但是，这种连续不断的撞击是没有支撑的血管壁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弯曲就发生在头骨的底部，血管的水平部分连同两个直角被整齐地固定在一个小骨盒中。

对血管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血液向上流动的静脉，也就是逆重力方向流动的静脉，都有许多彼此距离很近的瓣膜，这些瓣膜有助于承受血柱的重量。但是，那些血流习惯性向下流动的静脉却没有瓣膜。

音乐家的手指在琴键上飞舞，十根手指各司其职，准确无误，快如闪电，却又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可能是我们所知的最完美的机械装置。在动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精确性方面，人类发明的任何机器都无法与它相媲美。

让我们来看看魔术师的精彩表演吧，他们的动作是如此灵巧，如此迅速，以至于费力辨认的眼睛都完全无法辨认出来。外科医生在某些手术中，尤其是在眼部手术中，必须几乎切到头发丝的宽度，否则手术就会失败。有些机械工作需要非常精细和准确的操作，以至于最好的视力也不足以引导手指，必须借助强力镜片。

诚然，现在制造的机器比最娴熟的手操作得更快更准确，但它们只能做一件事，只能执行一个动作，而手所能做的不同动作的数量是无法计算的。

不包括手腕在内，手部有二十一个关节，需要肌肉来活动。那么，如何安置这些肌肉，才能使手最有效地实现其设计目的呢？一般来说，身体的肌肉都紧贴着它们要作用的关节，这一点很少有例外。

手指需要发挥巨大的力量。因此，它们需要大量的肌肉来作用。假设按照在身体其他部位观察到的一般计划，将这些肌肉放置在手指本身的关节附近间隙中。毫无疑问，手指会很强壮，但每根手指的粗细就会有手腕的一半，而且只能笨拙地服从意志。这样的手可以挥剑，也可以握住铁匠的锤子，但它永远无法达到音乐家的目的，也无法回应艺术家的灵感。

但是，大自然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赋予每根手指必要的力量，又能保持其特殊功能所需的纤细和优美的比例。她放弃了一般的规则，为这一特殊目的采用了特殊的计划，将肌肉放在前臂的一定距离处，通过纤细的肌腱将每一块肌肉与它需要活动的关节连接起来。为了防止这些肌腱在手指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位移，我们每隔一小段距离就会让它们穿过一座小桥的拱门。最后，为了保证动作的流畅性，在每根肌腱的周围都套上了一个坚固的鞘，从

鞘的内表面不断分泌出像蛋清一样的乳白色液体，润滑着肌腱和鞘的光滑表面，有效地消除了摩擦。如果机械师能够模仿这种安排来制造发动机的活塞杆，他将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呢？

但是，上文所述的这样的手还是不完整的，因为除了作为机械装置的功能外，它还有其他功能。手指是触觉的主要部位，除了提供有关物体的光滑度、硬度和温度的信息外，还经常在视线无法到达的地方充当眼睛。因此，它们所覆盖的皮肤中埋藏着被称为触觉体的微小体块（触角），直径约为一英寸的五分之一，这些体块具有接收构成触觉的印象的特殊能力。在食指的表面，每平方英寸的表面上大约有 25 万个触角，每个触角都是通向大脑的神经丝的末端。

但是，尽管手指拥有如此强大的活动能力，其神经又如此敏感，它们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又需要另一种规范。手指末端皮肤的表面不适合抓住和握住非常细小的物体。为此，必须有一种更坚硬的物质呈现出薄薄的边缘，而且这种安排必须使两个这样的边缘能够相互靠近，并将物体压在它们之间。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每个手指都有一个指甲。指甲的硬度足以牢牢抓住任何被指甲抓住的小物体。但是，要抓住如此细小的东西，必须借助触觉。现在，指甲并不敏感——它不包含触觉细胞；但为了弥补这一点，它所处的基质非常敏感。因此，当指甲与坚硬的物质接触时，就会通过指甲向基质传递一种印象。就像我们能够通过手

中的拐杖感受到人行道上的起伏不平一样。

我还可以从解剖结构上举出更多的例子，但如果可能的话，在生命的各种过程中追踪创造性设计的证据会更有趣。我只举出其中的几个例子，因为这个问题就像生理学本身一样博大精深。此外，它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因为在其他地方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在这里却在许多方面被完全颠覆了。例如，在整个无机自然界中，化学亲和力将物质的组成简化为数学公式，而在有机结构中，化学亲和力却被完全忽略或颠覆；因此，我们看到化学狼与化学羔羊同居，化学豹与化学狮子同卧。

生命的原理，也就是区分生命物质和死亡物质的原理，是一种完全无法定义、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往往只与复杂的生物体联系在一起，比如那些有大脑、神经、肌肉的生物体，或者植物的根、茎、叶等。但它也是基本原生质的一种特性；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原生质只是一种没有形态或结构的“果冻状”物质。大量的原生质可以分离成无数的微粒，但每个微粒仍然可以存活和运动，这些微粒可以再次聚合，再次分离，但仍然具有运动和改变形态的能力。不仅如此，这个没有手脚、没有嘴巴、没有胃的无形块体还是一只捕食野兽，它能抓住并吞噬任何可能与之接触的无助的动物微粒。在显微镜下观察从大西洋中部海底浮上来的一小点附着在铅上的渗出物。你会看到细小的原生质块，即所谓的“单体”，它们没有规则的形状，不断地运动，不

断地改变形态，先是在一侧发出突起，然后在另一侧发出突起，这些突起交会、连接，像不规则的网状结构一样包围着空地，部分突起脱离出来，开始独立存在，或者过一段时间又与原来的质块或其他一些突起重新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就是在展示着无休止的活动。但是，在发生这一切的这滴海水中，还有其他生物。这里有一种被包在一个小贝壳里的生物——硅藻。它游来游去，直到接触到单细胞的某个部分。“果冻团”立刻把它包围起来，你可以看到它（硅藻）在透明的外壳中停留了一会儿，里面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又恢复了运动，硅藻被推向果冻团的圆周，最终被抛出。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活物了。除了外壳，什么都没有留下。有营养的部分已经溶解，变成了捕捉者的物质。

现在，只要单体的生命力还在，这一切就会无限地继续下去。但是，当生命力消失的那一刻，所有的运动都停止了，分解发生了，物质消失了，变成了它形成时的化学元素。

那么，这个赋予没有大脑意志、没有肌肉收缩的物质以运动能力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最强大的显微镜所能显示的而言，它只是一团无形的同质物质，没有一丝组织，也没有各部分的区别。就我们所能发现的而言，这种原生质是生命的终极所在，是物质与精神、物质与非物质的主要结合。仅仅是化学分子的组合的物质，是什么被加入了它的生命，而当它的生命停止时，又是什么从它

那里被夺走了呢？唯物主义者回避了这个问题，说这是一个不可知的领域；而基督教信徒则回答说，这是神的原始创造力的延续。

让我们更进一步。低等动物，甚至人类本身，都受到某些我们称之为本能的冲动的驱使。这些冲动不同于理智的运作，因为它们恰恰在理智最缺乏的地方最为活跃，而且与理智不同的是，它们会立即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因此，当理智通过缓慢而渐进的步骤获得成长时，本能则是生来就完全成熟的。一只孵化在笼子里的鸟，从未见过鸟巢，如果被解放出来，就会像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一样，迅速而完美地筑起它的第一个鸟巢。而且，它的筑巢也会遵循一定的模式，这也是所有鸟类筑巢的特点。

捕食的野兽会巧妙地诱捕它的第一个受害者，就像经过长期失败的教训一样；松鼠从未见过冬天，却会根据它生活的严酷气候囤积食物。

然而，只要稍加理智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本能）行为可能是不必要和徒劳的。与主人一起长途跋涉的狗会把骨头埋在路边，尽管它在其他事情上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会告诉它，它再也不会走那条路了。被囚禁的海狸会在笼子的栅栏间编织稻草，并付出无限的劳动，在想象中的河流上筑起一道虚幻的堤坝。母鸡在一堆麦子中间，会像在一蒲式耳的糠里寻找十几粒麦粒一样，勤奋地抓取每一粒麦粒。由此可见，这些行为不是思维过程的结果，而是

一种盲目冲动的结果，是一种动物无法控制，但却受其控制的东西；是一种并非源于动物内部，而是从外部作用于动物的东西。这种东西从何而来，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它与原生质体的生命来自同一源头；它不过是神圣能量的运作，旨在保护它最初注入的生命。

生命一旦被赋予，就会得到精心的守护和保护，这一点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让你们中不习惯体力劳动的人跟我一起去健身房，在空中飞人器械上锻炼一小会儿。几分钟后，你就会搓手，检查手掌时，你会发现它们又热又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发热和发红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有这个过程才能使整个文明结构成为可能——没有这个过程，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野蛮状态？你们的手又软又嫩，因此，粗暴的摩擦刺激了它们。如果你的手继续这样柔软，继续这样使用，那么几小时后，你的手掌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开放的、流血的伤口，后果就是完全残疾。但是，你所观察到的发热和发红是皮肤血管扩张导致血液外流增加的结果，这种血液供应的增加带来了营养物质供应的增加。这种物质以角质的形式沉积在皮肤的网状结构中，这种角质越来越多，直到形成一层致密的抵抗层，有效地保护了下面较柔软的结构免受伤害。现在，手已经适合成为劳动工具，而文明的胜利也是单靠体力劳动取得的。因此，劳动者坚硬的手既是种族更高发展的徽章，也是造物主为维护其创造物而提供的关爱的象征。

在外部温度变化很大的情况下，人体保持均匀热量的机制非常有趣。这种机制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可以在短时间内保持高于水沸点的温度而不受伤害。我自己曾在一个温度计显示为 225 华氏度的房间里待过几分钟，当时必须站在厚厚的羊毛地毯上，并且避免接触任何固体物质。如果把手放在门把手上，马上就会起水泡。然而，当时房间里的高温虽然让人不舒服，却并不令人痛苦。这可以从大量的汗水中找到解释，汗水迅速蒸发，冷却了身体表面，使其温度不会上升超过几度。每当温度很高时，就会要求使用这种（汗水）装置。但是，如果体温升高的程度较低，或者说，如果体温在正常范围内有任何变化，只需增加或减少流向体表、并暴露在大气冷却影响下的血液量即可。这是通过皮肤血管壁上的环形肌肉纤维的作用，使血管直径增大或减小来实现的。这些纤维反过来又受到皮肤表面接收到的神经印象的刺激而发挥作用，这些神经印象被传导到神经中枢，并以运动脉冲的形式返回到肌肉纤维。例如，如果身体变得太热，一种印象就会沿着神经传到中枢神经节，并从那里将脉冲传到皮肤血管的肌肉外皮。在这种冲动的作用下，纤维放松，血管扩张，更多的血液分布在表层结构中。这些血液在大气的作用下冷却，然后由静脉回流到身体内部，同时又有新的温热血液从身体内部输送到体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整个血液的温度降低到正常标准为止。

另一方面，如果身体变得太冷，皮肤血管就会收缩，而血液主要被限制在身体内部，在那里产生的热量最活跃，体温就会迅速升

高。所有这些都是自动进行的，个人不会意识到，如果血管运动神经的这种调节作用暂停，哪怕是短暂的暂停，也会严重影响健康，甚至毁掉生命。与我刚才描述的机制有些相似的机制被用来根据不同器官当时的活动情况，按比例向它们分配适当的血液供应。因为任何器官在需要增加血液供应时，身体系统都会向其增加血液供应量，这是一条毫无例外的规律。在精神高度活跃的情况下，大脑获得的血液供应量比相对静止时要多得多，而且伴随着温度的升高，其幅度之大足以用头皮上的温度计来测量。事实上，通过让大脑中的不同功能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极度活跃的状态，然后记录下每个功能表面热量最大的点，就可以对大脑中的不同功能进行定位。

在消化过程中，胃和肝会充血，而在进食时，唾液腺的血管会膨胀。在适当情绪的影响下，泪腺会得到更多的血液供应。当肌肉的运动量超过其正常活动量时，通向肌肉的血管就会增大。在这些例子和其他许多例子中，血液供应的增加都是血管运动神经作用下血管扩张的结果。

看起来，似乎必须有一个中央智能系统沿着不同的神经发出指令，就像在一个大火车站的瞭望台上的人移动杠杆，打开和关闭控制来往列车的无数开关一样。但这不是个人的智慧。他不知道自己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即使知道也无法控制。然而，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它达到了目的。目的意味着意志的行使。既然不是个人

的意志，那是谁的意志呢？答案只有一个——是造物主的意志，是“让世界存在”这句原话的持续回响！在这一指令下，分子因其微小而不可估量、宇宙因其广阔而不可估量地诞生了。时间与永恒者无关，永恒者的话语也不受时间限制。他的创造性话语一旦说出，就无需重复。它是一种持续的力量，直到他愿意重新唤起它。在此之前，它将作为原生质的运动、神经细胞的能量、肌肉的收缩力、本能的冲动——总之，作为生命的原则继续存在。

不要说更高级的生命形式，更不要说意志和意识，即使是最低级的生命形式，如果说仅凭物理原理——也就是说，仅凭无生命物质各部分的相对运动和相互作用，无论多么精炼和升华——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生命），那简直是不科学的。物理科学中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这种想法提供丝毫支持。

=====

=====

=====

=====

=====

=====

=====

=====

=====

胚胎学。

Wm. Archer CoCKE, 佛罗里达州。

[致编辑的信摘录]

许多世纪以来,从亚里士多德到 1651 年的 Wm. 哈维博士(Dr. Wm. Harvey) 的时代,人们认识到动物有三种不同的生成方式:卵生、胎生和自发。哈维发现卵生和胎生是相似的,胎生涉及卵生。科学表明,在脐带发育的方式和形式上,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独立胚胎学。在人类胚胎中,绒毛膜—子宫内胎儿的外膜—与尿囊膜(低等动物特有的胎膜)相同,只是其空腔因壁的粘连而变得模糊不清。

脐带在人体内的形成、发育和使用,以及胎儿排出后脐带的最终分离,在人体内与其他任何一类动物都是不同的;在人体内,脐带的使用和生长不能被绒毛膜和尿囊膜的任何组合所替代,在任何其他动物体内,脐带也不能取代绒毛膜和尿囊膜的位置。这在生理学上是正确的,因此很明显,在人类的基础上形成的任何杂交动物的形态、作用或发育过程中,都不可能使用脐带;绒毛膜或尿囊也不可能被改造成任何替代脐带的物质。受孕、胚胎作用

和胎儿发育具有特殊的作用形式——自然的动物作用——以防止受孕、胎儿生命力和分娩的任何联合努力，这必须在人类与任何其他动物发生杂交之前，或在不同物种的任何动物之间发生杂交之前，或在可以繁殖的品种之间发生。

如果人类目前从胚胎到分娩的生长和受孕形式是从任何其他动物传下来的，那么作为一个生理事实，受孕和胎儿形成过程就会呈现出某种相似性。但这些差异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们表明人类与低等动物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能够产生受孕或胎儿发育的联系。

众所周知，不同动物的羊膜和尿囊在胚胎形成和作用方面的差异表明，不同物种的羊膜和尿囊在胚胎形成和作用方面是不同的，这种有机的发展不仅禁止了不同物种的杂交，而且向解剖学家证明了它们不同功能的变化，因为它们各自的作用与通过其特殊和独特的胚胎作用产生胎儿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人类脐带的形成、发展、用途和目的都是如此，它的形成、发展和作用，以及肚脐与胎儿的连接，都与自然史上已知的任何其他动物不同。

我没有提及杂交定律；对于生理学家来说，众所周知，杂交定律与上述观点并不冲突，而是在各个方面都支持我的立场和对自然定律的陈述。

这足以使科学工作者确信，进化论的观点既荒谬又不忠实，它曾诱使许多怀疑论者用它作为论据，来反对《圣经》的真理和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的信仰，并认为人类可以追溯到某种低等动物的后裔。

我所理解的科学是指所有建立在证据和推理基础上的知识，这些证据和推理与要求我们同意普通科学命题的证据和推理具有相同的性质，如果有人能够证明他的神学建立在有效的证据和合理的推理基础上，那么在我看来，这种神学就必须作为科学的一部分占有一席之地。

备忘录。

关于摩西。R. L. 帕特森牧师是一本关于“进化论的错误”的书的作者，这本书具有非凡的力量和价值，在谈到摩西时，他说道：“一位古代作家能够区分光的存在和太阳的存在；能够将太阳作为对地球的影响而首次出现的时间与植物的季节环出现的时间相吻合；能够将人类作为创造的最后一个产物，将人类和他自己的意志与低等动物的生产完全分开，并如此准确地分配给他他所占据的位置和他所拥有的统治权；能够清楚地阐明目前的创造安息日的事实，即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后，地球表面就没有再进行任何创造活动的事实，那么，即使是常识也允许，他一定是从

某个外部来源得到了造物主的目的的启示（无论是通过视觉，还是通过寓言，或者是通过直接的口述，除了作为一个好奇的问题，与我们无关），对造物的秘密和神秘的生命过程都有清楚和密切的了解。”

G. F. 潘特科斯特博士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受过一半教育的年轻人是如何被异教徒阶级的所谓科学家的粗糙和未经证实的理论引入歧途的：“不久前，我在一间探究室里发现了一个十四岁的小伙子。我与他交谈，惊讶地发现他对宗教问题的冷漠程度在年轻人中并不多见。他是和他的一个同学朋友一起来的，他想和我谈谈。他声称自己不相信《圣经》。我对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如此不忠感到惊讶，便问他不相信《圣经》的理由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创世纪》中的科学难题让人无法相信《圣经》是真实的。我发现他就读的公立学校的老师是赫伯特-斯宾塞的弟子，他成功地将斯宾塞的怀疑论灌输给了学生。此外，这孩子还有一个哥哥在耶鲁大学科学学院学习，他声称该学院的一位主要教授是无神论者。此外，我还发现，为了支持他的不忠，这个孩子还指名道姓地说有一大批我国著名的青年教育家不相信《圣经》的神圣权威。显然，他的老师给他灌输了很多东西。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在教师和学生中是罕见的；但同时我们也担心，这种情况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例外。就这样，这种不忠悄无声息地从高年级渗透到低年级和年轻班级”。我们担心，我们的普通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宣传不忠。如果一位教师承诺向他的学生传授基督教信

仰，他可能会因为被发现而失去职位；但任何教师不是都可以很放心地向他的学生灌输任何反基督教的谬论吗？

利物浦的 T. Mellard Reade 先生在最近一期的《地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地球年龄的论文，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这篇文章对威廉-汤普森爵士著名的世界古老程度估计进行了批判。他假设地球在某一时刻处于均匀的炽热状态，估计温度比我们现在的地表温度高出 7000 华氏度，据此推算，地球表面适宜居住的时间可能不超过一亿年。在这篇文章中，Reade 先生试图说明“这种推论的巨大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多么不可靠的基础之上”。首先，在确定地球组成材料的平均热传导率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确定热传导率是问题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地壳主要由厚度和导热率不同的地层组成，层状结构很可能有利于热量的保持。总体而言，Reade 先生认为解决方案中使用的导热系数过高。由于我们对温度向下升高的速度一无所知，结果就更加不准确了。W. Thomson 爵士假定从地表每下降一英尺的平均增加温度为 1 华氏度，但作者（Reade）坚决反对这一假定。如果这些数据不正确，根据它们进行的计算当然需要修改。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是如此之少，以至于目前从这些计算中寻找任何可信的结果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尽管这些推测无疑是有趣而巧妙的，但地质学家不能不对它们产生怀疑。因此，Reade 先生很好地将自己置身于地质学家和数学家之间，向前者展示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

关于书籍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提及近期出版的书籍，尤其是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书籍。没有篇幅进行详细评论。只要注明书名、出版商、已知价格，并简要说明其流向，就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任何提及的书籍将由纽约 71 圣经之家的威尔伯-B-凯查姆 (WILBUR B. KETCHAM) 在收到价格后邮寄。

“这本书是最近对心理科学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值得所有思想家阅读。本书的一大优点是清晰明了；无论是否接受温特沃斯博士的意思，只要知道这门学科通常使用的词语的含义，就不会有丝毫困难理解他的意思。作者坚持正确的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进而指出，通常被认可的归纳法不仅不是真正的方法，而且是一种错误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他并没有贬低归纳法，而是非常赞赏归纳法，认为它是物理研究中应遵循的真正方法，培根就是为了物理研究才采用归纳法的。然后，作者指出了试图将归纳法应用于精神科学的恶果，追溯到霍布斯和哈特利的唯物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现代感觉主义、实证主义和其他恶果。他坚持认为，所有这些弊端都源于试图采用一种只适合于物理事实的方法，即我们通过感官所了解的事物，而根本不适合于本质上不同的心理事实。他之所以认为这些只是尝试，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唯心主义者成功地为我们的提供了一个将归纳法规则应用

于意识事实的真实例子。在本书的正面部分，温特沃斯博士努力证明，通灵哲学的各种目的不是通过归纳法而是通过直觉过程达到的。我们大胆地建议，在这本非常有能力的书的争议部分少一点温情，会增加它的价值。

《逻辑学手册》由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约翰-J-蒂格特（John J. Tigert, A. M.）所著，是一套简明的逻辑学说，包括现代的补充内容，并附有大量的实际练习题。作者相对来说还很年轻，但这本书显示出他有很强的能力来收集、组合和介绍他的学科知识，使普通读者对这些知识感兴趣，同时他的内容安排也使这本书成为课堂上的一本好书。事实上，这本书已经通过了作者以及其他教师的检验。这本书已经被我们的几所学院作为教科书使用。它内容充实而不冗余，简洁而不残缺，晦涩难懂。我们向各位教师推荐这本书。（1.25美元）。

《神学与进化》由约瑟夫-S-范-戴克（Joseph S. Van Dyke）博士撰写，A-A-霍奇（A. A. Hodge）博士、法学博士作序（Armstrong & Son出版社，1.50美元）。它没有向进化论假说宣战，而是对那些打着某种形式的进化论旗号，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的不科学的无神论进行了打击。和许多朋友一样，我们反对这位作家的观点是，他有时将“进化”与“发展”等同使用。如果我们接受斯宾塞、赫胥黎、海克尔等公认的进化论者对进化的定义，“有神论的进化”就是自相矛盾的。终极发展满足了科学并允许上帝存在。进化论

排斥上帝。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论著应遵守这一区别，并相信，除非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得到允许，否则我们将发现朋友们在黑暗中打击朋友。凡-戴克博士坚持认为，无论在哪里，进化都是由上帝引导的。但是，进化论无处不在，而且排斥上帝。如果能注意到这一区别，这本我们衷心推崇为好读物的非常出色的书就会得到改善。

伦纳德-伍尔西-培根博士为他的布道集所起的题目是“基督里的简单”(THE SIMPLICITY THAT IS IN CHRIST)。(Funk and Wagnalls, 1.50 美元)。我们知道有一类读者会对这本书产生强烈的反感。这本书的“简洁”是刀具的简洁。书中处处可见巧夺天工的痕迹。所有年轻的传道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这样他们的布道就不会像这本书一样，而是可以学习一个人，一个新鲜、新颖、温柔、恭敬、独立的传道人，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布道时不花费太多心思。

塞缪尔-W-达菲尔德牧师所著的《英文赞美诗；作者与历史》(Funk & Wagnalls, 2.50 美元)非常全面、令人满意地介绍了 1,500 首著名的流行赞美诗。每首赞美诗及其作者都有一段历史。达菲尔德先生在完成这项任务时，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而且还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诗歌品味，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本诗集对牧师以及所有其他抒情诗和圣诗爱好者都极具价值。了解一首赞美诗的历史往往会增强其教育意义。达菲尔德先生为

普世教会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

约翰-W-埃利斯 (John W. Ellis) 医学博士所著的《新戒酒政策下的葡萄酒问题》一书，收录了五本关于戒酒问题的不同书籍。这本书包含了从许多来源收集到的大量信息。该书由作者在纽约出版。

《新约圣经希腊文和英文对照》是一本著名的书籍，对于神学生和神职人员来说确实不可或缺。我们只想提请大家注意这本书的新版本，它是在《基督徒》编辑霍勒斯-L-黑斯廷斯 (Horace L. Hastings) 的指导下编写的，并由哈佛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以斯拉-艾伯特 (Ezra Abbot) 修订完成。本书为8开本，742页。售价 2.50 美元。

J. H. Kedzie 所著的《太阳热、沉积和太阳黑子》配有 22 幅插图。S. C. Griggs & Co. 。已故迪尔伯恩天文台的 E. 科尔伯特教授告诉我们，该书作者提出的论点，即使在基本思想上不是全新的，但在应用上也是部分新的。

”约翰-莱顿牧师所著的《犹太祭坛》是一本 126 页的小书 (Funk & Wagnalls, 75 美分)，其目的是摩西祭坛仪式的律法为基督的十字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预表，甚至是必要的预表。本书写得很有能力，也很用心。虽然其中的某些部分与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普

遍持有的观点相冲突，但作为一个整体，这本论文将对释经学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当然也值得广大读者阅读。

《哥特霍尔德的恩典》是一本有两百年历史的书，德国基督教读者普遍知道这本书，他们在他们中间很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为英国和美国读者所熟知。罗伯特-孟席斯 (Robert Menzies) 根据德文第 28 版翻译的大部头译本现已在美国出版。(T. Y. Crowell & Co. 1.25 美元)。该书的朴实精神和古朴风趣值得称赞。副标题是“用制造出来的东西理解看不见的东西”。

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年度成员名单。

[更正为1886年7月]

非常重要——由于我们的出版物是免费邮寄给所有会员的，因此及时通知我们地址的变更非常重要，以节省麻烦和费用。

本名单中的任何错误都将得到及时更正，并对举报者表示感谢。

所有名字都将保留在学会的账簿中，直到收到适当的终止通知为止。会费账单每年都会寄给每位会员。在此期间，我们会将所有

出版物转发给会员，并希望会员支付截至停办之日可能产生的所有欠款。

捐赠会员。

[这份名单包括向捐赠基金捐款 100 美元或以上的会员，按订阅时间顺序排列。他们都是终身会员]

DEEMS, CHARLES F., New York.

VANDERBILT, CORNELIUS, New York.

斯托克斯-安森-菲尔普斯，纽约。

DODGE, WILLIAM E., New York.

JAMES, D. WILLIS, New York.

JESUP, MORRIS K., New York.

FISK, CLINTON B., Seabright, N. J.

SCHIMMELL, O. O., New York.

终身会员。

[向普通基金缴纳 50 美元或以上]

阿盖尔公爵，D.C.L.；阿盖尔山庄，坎普登，伦敦；以及因弗瑞山庄，因弗瑞，苏格兰。

tle, Inverary, Scotland, \$50.

BAKER, CHARLES J., Baltimore, Md., \$50.

BALDWIN, S. L., D.D., East Boston, Mass.

BIDEN, LEWIS, F.R. H.S., Portsea, England, \$50.

BOYNTON, FRANK H., M.D., New York, \$50.

BRADFORD, AMORY H., D.D., Montclair, N. J., \$100.

BROWN, W. HARMAN, New York, \$100.

BUTLER, CHARLES, LL.D., New York, \$50.

CHITTENDEN, SAMUEL B., Brooklyn, N. Y., \$50.

CRAWFORD, ROBERT L., New York, \$50.

CROSBY, HOWARD, D. D., LL. D., New York, \$100.

DANA, JAMES D., LL. D., Professor, New Haven, Conn., \$50.

DEEMS, FRANK M., M. D., Ph. D., New York, \$50.

DEEMS, Rev. EDWARD M., A. M., New York, \$50.

DEEMS, Prof. J. HARRY, Baltimore, Md., \$50.

FAULKS, Rev. J. B., A. M., Morristown, N. J., \$50.

GETMAN, NORMAN, M. D., Richfield Springs, N. Y., \$50.

GRANGER, Rev. ROBERT, Richfield Springs, N. Y., \$100.

HITCHCOCK, ROSWELL D., D. D., LL. D., New York, \$50.

HUNT, SANDFORD, D. D., New York, \$50.

HURST, JOHN F., D. D., LL. D., Bishop, Buffalo, N. Y.. \$100.

JEWETT, HUGH J., New York, \$100.

LAKE, J. E., B. D., Atlantic Highlands, \$50.

LATHAM, JOHN C., New York, \$50.

LEE, G. W. CUSTIS 将军, 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 50 美元。

LEONARD, THOMAS, Leonardsville, N. J., \$50.

LESLIE, Mrs. FRANK, New York, \$50.

MCDOWELL, Wm. O., New York, \$100.

MCDOWELL, Wm. T., New York, \$100.

MCTYEIRE, HOLLAND N., D.D., Bishop, Nashville, Tenn., \$100.

OSBORN, Prof. HENRY F., Sc. D., Princeton, N. J., \$50.

POTTER, Hon. O. B., A. M., New York, \$100.

RANKIN, DAVID M., D.D., Richfield Springs, N. Y.,

\$100.

RASSAM, HORMUZD, Isleworth, England, \$50.

SCOTT, THOMAS Jefferson, D.D., Bareilly, India, \$50.

SEELEY, Rev. FRANK H., Delhi, N. Y., \$100.

SHEPARD, ELLIOTT F., New York, \$100.

SIMPSON, Prof. A. R., M. D., F. R. S. E., Edinburgh, Scotland,
\$50.

STOKES, G. G., D. C. L., LL. D., F. R. S., Professor, Cambridge,
England, \$50.

STURGES, EDWARD, New York, \$50.

TAYLOR, WILLIAM M., D. D., LL. D., New York, \$50.

VAN DEUSEN, EDWARD M., D. D., Carrollton, Md., \$100.

WILSON, Mrs. AUGUSTA EVANS, Mobile, 阿拉巴马州, \$50.

WOOLSEY, THEODORE D., D. D., LL. D., New Haven, Conn., \$50.

成员:

ABBOTT, LYMAN, D. D., Cornwall-on-Hudson, New York.

ADAMS, Rev. JOHN Q., San Francisco, Cal.

AINLEY, Rev. WM., Hantsport, Nova Scotia.

ALEXANDER, GEORGE, D.D., New York.

ALEXANDER, HENRY C., A. M., D.D., Professor Hampden Sidney
College, Va. ANDREWS, ISRAEL WARD, D.D., LL.D., Marietta,
O..

ARMSTRONG, GEORGE D., D.D., LL.D., Norfolk, Va.

ARMSTRONG, J. G., D.D., Richmond, Va.

BALDWIN, Hon. HENRY P., Detroit, Mich.

BALDWIN, WILLIAM, New York.

BALLARD, Prof. ADDISON, D.D., Easton, Pa.

BARNES, Rev. CHARLES R., Paterson, N. J.. BARNES, Rev.
WILLIAM H., Barrie, Ontario, Canada.

BASCOM, JOHN, D.D., LL.D., Madison, Wis.

BATCHELOR, Mrs.

BATTLE, Hon. KEMP P., LL.D., President, Chapel Hill, N. C.

BAYARD, Hon. THOMAS F.,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
C.

BEATTY, ORMUND, LL.D., President, Centre College, Danville,
Ky.

BEDELL, Rt.

BEECHER, Prof. WILLIS J., D.D., Auburn, N. Y.

BEHREND, ADOLPHUS J. F., A.M., D.D., Brooklyn, N. Y.

BETHUNE, Gen. JAMES N., Warrenton, Va.

BETTS, Rev. W. A., Ph. B., Greenville, S. C.

BICKNELL, THOS.-W., LL.D., Boston, Mass.

BISSELL, ALLEN P., D. D., Shelter Island, N. Y.

BLANTON, L. H., D.D., Chancellor Central University,

Richmond, Ky.

BLAUVELT, Wm. W., D.D., Easton, Pa.

BOARDMAN, C.H., M.D., St. Paul, Minn.

BOLLES, ALBERT S., Philadelphia, Pa.

BOLTON, HORACE W., D.D., Boston, Mass.

BOOTH, HENRY M., A.M., D.D., Englewood, N. J.

BORLAND, SAMUEL C., Lake De Funiak, Fla.

BOSE, RAM CHANDRA, Lucknow, India.

BOWEN, WILLIAM C., President Female College, Bordentown, N.
J.

BOYD, WILLIAM A., New York.

BOYLE, Rev. W. K., Baltimore, Md.

BOYNTON, NATHANIEL A., New York.

BOZEMAN, NATHAN, M. D. , New York.

BRACKETT, GILBERT R. , D. D. , Charleston, S. C..

BRADFORD, Rev. BENJ. F. , Oxford, N. Y.

BRANCH, THOMAS P. , Augusta, Ga.

纽约州亚历山大-布兰登。

BROOKS, Rev. ARTHUR, D. D. , New York.

BROWN, REV. FRANCIS, A. M. , Prof.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

BUCKINGHAM, Mrs.

BUNKER, Mrs. WILLIAM E. , New York.

BURDGE, FRANKLIN, LL. B. , New York.

BURDICK, Prof. FRANCIS M. , Clinton, N. Y.

BURGWYN, WILLIAM H. S., Esq.

BURR, ENOCH F., D.D., Lyme, Conn.

BURROUGHS, JOHN H., B.A., Philadelphia, Pa.

BURT, THOMAS, Warwick, N. J.

BUTTZ, HENRY A., D D., Pres. Drew Theological Seminary,
Madison, N. J. CABELL, JAMES L., LL.D.,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ALDER, GEORGE, New York.

CALDWELL, J. C., D.D., West Chester, Pa.

CALDWELL, JOHN J., M.D., Baltimore, Md.

CALDWELL, Rev. LISLE B., Ph.D., Athens, Tenn.

CAMPBELL, HENRY F., M.D., Augusta, Ga.

CARTER, ABRAHAM B. , D.D. , Dubuque, Ia.

CATTELL, W. C. , D.D. , LL.D. , Philadelphia, Pa.

CHAMBERS, WILLIAM J. , Philadelphia, Pa.

CHENEY, C. E. , LL.D. , Bishop, Chicago, Ill.

CHEW, JOHN M. , A.B. , New York.

CLAPP, ALEXANDER H. , D.D. , New York.

CLARK, DANIEL H. , St.

CLOPTON, DAVID, Associate Justice Supreme Court, Montgomery,
Ala. CLYDE, Rev. JOHN C. , Bloomsbury, N. J.

COBBS, DANIEL BOONE, B. Ph. , Mobile, Ala.

COBBS, JAMES, LL.B. , Mobile, Ala.

COCKE, Rev. Alonzo R, Lexington, Va.

COLES, ABRAHAM, M.D. , LL.D. , Scotch Plains, N. J.

CONGER, Hon. A. B., A.M., New York.

Cook, Rev. JOSEPH, Boston, Mass.

库克夫人，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COOPER, JOSEPH T., D.D., Allegheny, Pa.

科内尔，莱蒂娅夫人，纽约。

COWGILL, CLAYTON A., M.D., Penn, Fla.

CRANE, Mrs M. HELEN, Asbury Park, N. J.

CRUIKSHANK, ROBERT, D.D., Highland, Kan.

CURRY, DANIEL, D.D., New York.

CRYER, Rev. S. S., M.A., Rock Island, Ill.

CUTTING, Prof. GEORGE R., Auburn, N. Y..

DABNEY, Prof. ROBERT L., Austin, Tex.

DARLING, H., D.D., LL.D., Pres. Hamilton College, Clinton,
N. Y..

DAVIS, CHARLES M., A.M., Bloomfield, N. J.

DAVIS, JOHN, M.D., Gomer, Allen Co.

DAVIS, Hon. JOSEPH J., Louisburg, N. C.

戴维斯, 诺亚, 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DAVIS, NOAH K., LL.D., Prof. University of Virginia, Va.

DAVIS, P. SEIBERT, D.D., Philadelphia, Pa.

DAY, HENRY, New York.

DEMAREST, W. JENNINGS, New York.

DENNIS, LABAN, M.D., Newark, N. J..

DIKE, Rev. SAMUEL W., A.B., Royalton, Vt.

DIMMICK, Rev. F. M., A. M., Santa Rosa, Cal.

DIX, MORGAN, S. T. D., New York.

DODD, JAMES W. , LL. D. , 教授,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DODD, Prof. THOS. J., Nashville, Tenn.

DODGE, D. STEWART, New York.

DODGE, Mrs. HARRIET, New York.

DORMITZER, Mrs. HENRY, New York.

Dows, Rev. HENRY A. , M. A. , New York.

DREAR, Mrs. MARY, Philadelphia, Pa.

DRINKHOUSE, EDWARD J. , M. D. , D. D. , Baltimore, Md.

DRURY, JOHN B. , D. D. , Ghent, N. Y.

DUFFIELD, Rev. SAMUEL W. , B. A. , Bloomfield, N. J.

DUNCAN, DAVID R. , Spartanburg, S. C.

DUNCAN, THOMAS, D.D., Baltimore, Md.

DUNN, Rev. BALLARD S., Idaho.

DUPRÉ, Ovide, New York.

DWIGHT, JOHN, New York.

EDWARDS, Rev. FRANCIS M., Coman's Well, Va.

EDWARDS, J. T., D.D., Randolph, N. Y..

EGBERT, Rev. JOHN P., Buffalo, N. Y.

ELKINS, STEPHEN B., A. M., New York.

ELLIOTT, JOHN, New York.

ERRETT, ISAAC, D.D., Editor Christian Standard, Cincinnati,
O., New York.

EVANS, Rev. MORRIS, Millersburg, Ky.

EVERSZ, Rev. MORITZ E., Milwaukee, Wis.

FABER, Rev. WM. FREDERIC, B.A., Westfield, N. Y.

FAIRBAIRN, ROBT. B., D.D., LL.D., Pres. St.

FARRAND, Prof. S. A., Ph.D., Newark, N. J.

FISHER, JAMES H., M.A., Rochester, N. Y.

FORSYTH, John, D.D., LL.D., Newburg, N. Y. .

FRESHMAN, Rev. JACOB, New York.

FRISBIE, E. S., D.D., Wells College, NY.

FRY, Rev. CHARLES L., A. M., Lancaster, Pa.

FULTON, E. M., New York.

FUNK, I. K., D.D., Editor Homiletic Review, Brooklyn, N. Y..

GAST, Prof. FREDERICK A., D.D., Lancaster, Pa.

GERHART, EML. V., D.D., Pres. Theo. Seminary, Lancaster, Pa.

Gildersleve, CHARLES E., Sec. Soc. Prevention Crime, New York.

GILL, Rev. WILLIAM J., Lawrence, Mass.

GILL, Rev. WILLIAM I., Brooklyn, N. Y.

GLADDEN, WASHINGTON, D.D., Columbus, O.

GODBAY, Rev. JOHN E., St.

GOODMAN, Hon. RICHARD, Lenox, Mass.

GOUCHER, JOHN F., D.D., Baltimore, Md.

GRAHAM, WILLIAM, D.D., Nashville, Tenn.

GRAMMER, JULIUS E., D.D., Baltimore, Md.

GREEN, Rev. F. M., Kent, O.

GREEN, Rt. Rev. WILLIAM M., D.D., LL.D., Sewanee, Tenn.

HAINES, Mrs.

HAINES, RICHARD T., A. M., New York.

HALL, Rev. E. E., Fair Haven, Conn.

HALLOCK, JOSEPH A., Principal, Newark, N. J.

HAMILTON, Prof. EDWARD J., S.T.D., D.D., Princeton, N. J.

HAMILTON, S. M., D.D., New York.

HAMLIN, CYRUS, D.D., LL.D., President Middlebury College,
Vt.

HAMLIN, Rev. TEUNIS S., Cincinnati, O..

HAMMA, M. W., D.D., A.M., Baltimore, Md.

HARDENBERGH, ABRAM J., New York.

HARK, Rev. J. MAX., A.B., Lancaster, Pa.

HARPER, Mrs. IDA A., Terre Haute, Ind.

HARPER, Prof. WILLIAM R., Ph.D., Yale College, New Haven,
Conn.

HARRIMAN, SAMUEL K., M.D., Natick, Mass.

HARRIS, JOHN A., D.D., Philadelphia, Pa.

HARRIS, ROBERT, New York.

HARRIS, Rt. Rev. SAMUEL S., D.D., LL.D., Detroit, Mich.

HARRISON, MINNIE R., Hulmeville, Pa.

HASTINGS, Rev. HORACE L., Editor "Anti-Infidel Library,"
Boston, Mass.

HATCH, ALFRED E., Baltimore, Md.

HAYS, GEORGE P., D.D., Cincinnati, O.

HENDERSON, Rev. HARRY G., A.M., Newport, Ky.

HENDERSON, HOWARD, D.D., New York.

HENDRIX, EUGENE R., D.D., Bishop, Fulton, Mo.

HENKEL, SOCRATES, D.D., New Market, Va.

HENRY, FRANCIS A., Ridgefield, Conn.

HENRY, FRANCIS A., Ridgefield, Conn.

HIBBARD, FREEMAN G., D.D., Clifton Springs, N. Y.

HIGBEE, E. E., D.D., Supt. HIGBEE, E. E., D.D., Supt.

HILL, Rev. ROBERT W., Salem, Or.

HINMAN, Rev. FRANK H., Auburn, N. Y.

HIMROD, WILLIAM, New York.

HOFFMAN, Rev. HERMAN S., Philadelphia, Pa.

HOLDEN, Hon. Wm. W., Raleigh, N. C.

HOOK, EDWARD B., B. S., Augusta, Ga.

HOOK, Hon. JAMES S., Augusta, Ga.

HOPKINS, MARK, D. D., LL. D., Williamstown, Mass.

HOPKINS, ISAAC S., Ph. D., D. D., President Emory College,
Oxford, Ga.

HOVEY, ABBOT, D. D., LL. D., Newton Centre, Mass.

霍伊特 THOMAS A., D. D., Philadelphia, Pa.

HUNGERFORD, Rev. EDWARD, M. A., Adams, Mass.

HUNT, Mrs. SARA K., New York.

HUNTINGTON, CHESTER, A. M., Flushing, N. Y.

HUNTLEY, E. D., D. D., LL. D., Washington, D. C.

HURLBUT, JESSE L., D. D., Plainfield, N. J.

HYATT, Col. THEODORE, M. A., Chester, Pa.

HYDE, WM. DE WITT, Bowdoin College President, Brunswick, Me.

INCH, JAMES R., LL. D., President Wesleyan College, Sackville,
New Brunswick. IVES, WILLIAM JAY, New York.

JARVIS, Hon. THOMAS J., Raleigh, N. C.

JEROME, Hon. DAVID H., Saginaw, Michigan.

JEWELL, Prof. JAMES S., Evanston, Ill.

JOHNSON, Mrs. MARY S., Boston, Mass.

JOHNSON, Prof. HERRICK, D.D., Chicago, Ill.

JOHNSON, WILLIAM M., D.D., Cohoes, N. Y.

JONES, JOHN W., M.D., Wake Forest, N. C.

JONES, TURNER M., D.D., President Greensboro' College, N.

C.

KEASBEY, Hon. A. Q., A.M., Newark, N. J.

KELLEY, DAVID C., M.D., D.D., Nashville, Tenn.

KELLOGG, CHARLES D., New York.

KENNEDY, JOHN Stewart, New York.

KETCHAM, WILBUR B., New York.

KETCHAM, ALEX. P., A.M., New York.

Kittredge, JOSIAH E., D.D., Geneseo, N. Y.

KNOX, Rev. WILLIAM W., A.M., Bayonne, N. J. LADD, WILLIAM
W., A.M., New York.

LADD, WILLIAM J., New York.

LANDRETH, Prof. OLIN H., Nashville, Tenn.

LANSING, Prof. JOHN G., New Brunswick, N. J.

LAPRADE, Rev. WILLIAM H., LaGrange, Ga.

LARKIN, ETHAN P., Ph.D., Alfred Centre, N. Y.

费城，威利姆-L. 牧师。

LEWIS, ABRAM H., A.M., D.D., Plainfield, N. J.

LEWIS, Rev. ALLEN, Lebanon, Ind.

LINNARD, Mrs. E. L., Philadelphia, Pa.

Little, Joseph J., New York.

LITTLEJOHN, Rt. Rev. A. N., Brooklyn, N. Y.

LITTLEPAGE, S. C., Fairfield, Tex.

LODGE, Prof. LEE DAVIS, Washington, D. C.

LONG, DANIEL A., A.M., Pres. Antioch College, O.

LORD, CHARLES E., D.D., Newburyport, Mass.

Lorimer, GEORGE C., D.D., Chicago, Ill.

LYON, PHOEBUS, W., Summit, N. J.

MACCRACKEN, Prof. HENRY M., D.D., Vice-Chancellor

University of New York. MACKAY-SMITH, Rev. ALEXANDER, New
York.

MAGIE, Miss PHEBE T., New York.

MAGOUN, GEORGE F., D.D., Pres. Iowa College, Grinnell, Io.

MANGUM, Prof. A. W., D.D., Chapel Hill, N. C.

MARLING, Rev. FRANCIS H., New York.

MARTIN, Prof. DANIEL S., New York.

MARTIN, DAVID G., Oroville, Cal.

MAXWELL, Hon. AUGUSTUS E., Pensacola, Fla.

MCALPINE, Mrs.

MCBRIDE, WILLIAM A., New York.

MCCANN, JAMES, D.D., Editor Champion of the Faith, London,
England.

MCDOWELL, Mrs.

MCDOWELL, CHARLES E., Bloomfield, N. J.

MCDOWELL, FREDERICK H. , New York.

MCKIM, RANDOLPH H. , D.D. , New York.

MCWHINNEY, THOMAS M. , D.D. , Franklin, O.

MELL, PATRICK H. , D.D. , LL.D. , Chancellor University, Athens,
Ga.

MENEELY, CLINTON H. , Troy, N. Y.

MERRIAM, HOMER, Springfield, Mass.

MERRITT, Rev. STEPHEN, New York.

METCALF, LORETTUS S. , Editor of Forum, New York. MEYBERT, ASA
P. , M.D. , Ph. B. , New York.

MIDDLEDITCH, R. T. , D.D. , Brooklyn, N. Y..

MITCHELL, Mrs. JOHN, Norwich, Conn.

MITCHELL, STUART, D.D. , Bloomsburg, Pa.

MOIR, JAMES, New York.

MOOAR, Prof. GEORGE, D.D., Theological Seminary, Oakland,
Cal.

MOORE, SAMUEL M., D.D., Tyrone, Pa.

MORAN, ROBERT S., D.D., New York.

MORAN, Rev. ELLSWORTH E., Asbury Park, N. J.

MORGAN, HENRY A., Aurora, N. Y.

MORRIS, Rev. EBENEZER J., New York.

MULFORD, Rev. HENRY D. B., Franklin Park, N. J.

MUNGER, THEODORE T., D.D., New Haven, Conn.

MURRAY, R. D., M.D., U. S. Marine Hospital Service, Biloxi,
Miss.

NEWCOMB, Prof. GEORGE B., A.B., Ph.D., New York.

NEWTON, Prof. J. C. 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NORTH, Prof. EDWARD, Clinton, N. Y.

NORTON, EX.

NOYES, CHARLES S., B.A., Montclair, N. J.

OBERHOLSER, JACOB, Red Bank, N. J.

OLCOTT, CORNELIUS, M.D., Brooklyn, N. Y.

ORRIS, Prof. S. STANHOPE, Ph.D., Princeton, N. J.

OSBORN, AMOS O., Waterville, N. Y.

OSBORNE, JOHN H., Auburn, N. Y.

PADDOCK, WILBUR, D.D., Philadelphia, Pa.

PALMORE, Rev. W. B., Springfield, Mo.

PARKER, JOSEPH, D.D., London, England.

PARSONS, WILLIAM H., New York.

PATTERSON, Rev. J. G., Editor Presbyterian Observer,
Baltimore, Md.

PATTON, A. S., D.D., Editor Baptist Weekly, New York.

PATTON, Prof. FRANCIS L., D.D., Princeton, N. J..

PATTON, Col. JOHN M., Ashland, Va.

PEARCE, Rev. E. H., Danville, Ky.

PECK, J. O., A.M., D.D., New Haven, Conn.

PELOUBET, Rev. FRANCIS N., Natick, Mass.

PETRIE, Capt. FRANCIS W. H., Hon. Sec. Victoria Ins., F.R.S.

L. 等, 英国伦敦。PIERSON, EDWARD F., Ramapo, N. Y.

PIKE, Rev. GRANVILLE R., Clayville, N. Y.

PLATT, WM. H., D.D., LL.D., Rochester, N. Y.

Porter, NOAH, D.D., LL.D., Ex-Pres.

PORTER, HUGH, New York.

Potter, EliphALET N., D.D., LL.D., President Hobart College,
N. Y.

POTTER, Rt. Rev. HENRY C., D.D., New York.

POYNTEK, WILEY T., D.D., Shelbyville, Ky.

POWELL, JAMES, D.D., Editor American Missionary, New York.

PRATT, Capt. RICHARD H., U. S. A., Carlisle, Pa.

PRIME, WENDELL, D.D., Editor New York Observer, New York.

PROUDFIT, Mrs A. M., New York.

PURVIANCE, Mrs. Admiral, Baltimore, Md.

PUTNAM, HARRINGTON, New York.

RANDOLPH, A. D. F., New York.

RANDOLPH, J. J. F., New York.

RANDOLPH, T. E. F., New York.

RANKIN, J. E., D.D., Orange Valley, N. J..

RAPELJE, Mrs.

REED, Rev. EDWARD A., New York.

RICHARDSON, HAYNES L., M.D., New York.

RIGGS, Mrs.

RIGGS, Rev. JAMES F., Bergen Point, N. J.

RIPLEY, ALLEN P., D.D., Buffalo, N. Y.

ROBERTS, WM. C., D.D., Elizabeth, N. J.

ROBINSON, JAMES L., Augusta, Ga.

ROOSA, D. B. ST. JOHN, M.D., New York.

ROSS, REUBEN, New York.

ROWE, Rev. EDGAR H., Murfreesboro, N. C.

ROYALL, Prof. WILLIAM, Wake Forest College, N. C.

RUUTZ-REES, Mrs. JANET E., New York.

RYLANCE, J. H., D.D., New York.

SABINE, Rev. WILLIAM T., New York.

SAWYER, Prof. W. C., Ph.D., Appleton, Wis.

SCHAFF, Prof. PHILIP, D.D., LL.D., New York.

SCHAUFFLER, Prof. ALFRED T., New York.

SCHIEFFELIN, S. B., New York.

SCOTT, ANDREW, New York.

SCOVEL, SYLVESTER F., President.

SEXTON, GEORGE, M.D., D.D., LL.D., F.R.G.S., etc., London,
England.

SHAW, ALEXANDER, Baltimore, Md.

SHERWOOD, JAMES M., D.D., Brooklyn, N. Y..

SHIPMAN, JACOB S., D.D., D.C.L., New York.

SHIVLER, MARGARET 夫人, 纽约布鲁克林。

SHOTWELL, JOSEPH L., M.D., Memphis, Tenn.

SILLIMAN, HORACE B., A. M., Cohoes, N. Y.

SIBLEY, WILLIAM C., Augusta, Ga.

SKIDMORE, LEMUEL, New York.

SKINNER, Mrs. EDWARD L., New York.

SMEDES, Rev. BENNETT, A. M., Raleigh, N. C.

SMITH, ANDREW H., M.D., New York.

SMITH, GOUVERNEUR M., M.D., New York.

SMITH, Rev. EDWARD J., M.A., Cuyahoga Falls, O.

SMITH, Prof. FRANCIS H., University of Virginia, Va.

SMITH, HENRY P., New York.

SMITH, SAMUEL G., A.M., Ph.D., St. Paul, Minn.

SMYTH, Rev. G. HUTCHINSON, New York.

SOUTHALL, JAMES C., Editor Central Presbyterian, Richmond,
Va.

SPENCE, JOHN F., S.T.D., Pres. E. Tennessee Wesleyan
University, Knoxville, Tenn. SPENCE, Mrs.

SPENCER, SHELDON S., Lancaster, Pa.

STANTON, Rev. HORACE C., Ph.D., Albany, N. Y.

STEWART, Rev. GEORGE B., A.B., Harrisburg, Pa.

ST. John, WILLIAM P., New York.

STOCKTON, CHARLES S., D.D.S., Newark, N. J..

STOIBER, LOUIS, Brooklyn, N. Y.

STORKS, RICHARD S., D.D., LL.D., Brooklyn, N. Y.

STROBRIDGE, GEORGE E., D.D., New York.

STRONG, JAMES W., D.D., Pres. Carleton College, Northfield,
Minn.

STRONG, THERON G., New York.

STURTEVANT, Miss CECILE, New York.

SUNDERLAND, BYRON, D.D., 华盛顿特区。

SWART, SAMUEL A., New York.

SWEENEY, Rev. Z. T., Augusta, Ga.

TAYLOR, Hon. JOHN W., Newark, N. J.

TAYLOR, Mrs. WILLIAM S., Brooklyn, N. Y.

THAW, WILLIAM, Pittsburg, Pa.

THOMAS, JESSE B., D.D., Brooklyn, N. Y.

THOMPSON, CHARLES L., D.D., Kansas City, MO.

THWING, Rev. CHARLES F., Cambridge, Mass.

TIFFANY, CHARLES C., D.D., New York.

TIFFANY, OTIS H., D.D., Philadelphia, Pa.

TILLET, Rev. WILBUR F., D.D., Vanderbilt University,
Nashville, Tenn.

TODD, E., M.D., New York.

TRAVER, Rev. ALLEN, Junius, N. Y.

TREAT, E. B., New York.

TROWBRIDGE, Prof. WILLIAM P., New Haven, Conn.

TRUEHEART, Mrs. S. C., Stanford, Ky.

TRUMAN, Mrs. EMILY M., Owego, N. Y.

TUCKER, HENRY H., D.D., LL.D., Atlanta, Ga.

TUCKER, WILLIAM, D.D., Mt. Gilead, O.

TYLER, Rev. BENJAMIN B. (Associate Ed. Christian Standard of Cincinnati), New York.

UPHAM, FRANCIS W. 教授, 纽约。

UCHIMURA, JON KANZON, Amherst, Mass.

VAN ANTWERP, Mrs.

VERDERY, MARION J., New York.

VINCENT, JOHN H., D.D., LL.D., Plainfield, N. J..

VINCENT, MARVIN R., D.D., New York.

VIRGIN, Rev. SAMUEL H., D.D., New York.

VOORHIES, Mrs.

WALLACE ADAM, D.D., Ocean Grove, N. J.

WARD, Mrs. Roslyn, N. Y.

WARDLAW, Rev. ALBERT G. A.M., Culpeper, Va.

WARNER, LUCIEN C., A. M., M.D., New York.

WARREN, EDWARD, Bey, M.D., C.M., LL.D., Paris, France.

WATERS, HORACE, New York.

WATKINS, WILBUR F., D.D., New York.

WATSON, LORENZO D., S.T.D., Ph. D., LL.D., Geneva, N. Y..

WAYLAND, H. L., D.D., Ed. 国家浸信会, 费城, 宾夕法尼亚州。

WEBB, Rev. EDWARD, Lincoln University, Oxford, Pa.

WELCH, Prof. RANSOM B., D.D., LL.D., Auburn, New York.

WESTBROOK, JOHN C., New York.

WESTWOOD, HENRY C., D.D., Providence, R. I.

WHEATLEY, RICHARD, D.D., New York.

WHEELER, Prof. JOHN H., University of Virginia, Va.

WHITEHEAD, Rev. J. HENRY, Passaic, N. J.

WHITNEY, GEORGE H., D.D., Pres. Cent. Col. Inst.

WILLARD, SYLVESTER, M.D., Auburn, New York.

WILLIAMS, Prof. E., M.D., Cincinnati, O..

WILLIAMS, Rev. G. MOTT, Detroit, Mich.

WILLIAMS, Prof. HENRY S., Philos. 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
哲学博士

WILSON, JAMES P., D.D., Newark, N. J.

WILSON, JOHN A., A.M., St.

WILSON, Prof. Wm. WILSON, Prof. Wm. D., D.D., LL.D., L.H.D.,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 Y. WINCHELL, Prof. ALEX.,
LL.D., Ann Arbor, Mich.

WINSLOW, Rev. Wm. C., B. A., A. M., Boston, Mass.

WINSTON, Prof. GEORGE T., Chapel Hill, N. C.'.

WINTERS, Rev. DAVID, Williamsport, Pa.

WITHERSPOON, THOMAS D., D.D., LL.D., Louisville, Ky.

WOODS, Miss ELIZA, New York.

WOOTON, WILLIAM S., Danville, Ind.

WORCESTER, E. D., New York.

WORRALL, JOHN M., D.D., New York.

WYTHE, WILLIAM W., M.D., Ocean Grove, N. J..

YEREANCE, JAMES, New York.

YOUNG, Prof. CHARLES A., LL.D., Princeton, N. J..

悼念

研究所缅怀以下已故成员：

1882.

ALLEN, WILLIAM H., LL.D., President Girard College,
Philadelphia, Pa.

格雷厄姆 (GRAHAM) , 詹姆斯-洛里默 (JAMES LORIMER) 将军,
纽约。

SMITH, MARSHALL B., D.D., Passaic, N. J.

1883.

COLLINS, Rev. CHARLES TERRY, Cleveland, O.

EWER, FERDINAND C., S.T.D., New York.

MALLET, Gen. EDWARD J., New York.

MARTIN, Prof. BENJAMIN NICHOLAS, New York.

MEANS, ALEX. D.D., LL.D., Oxford, Ga.

PHELPS, Prof. MOSES STUART, Northampton, Mass.

1884.

COLLISSON, Rev. HENRY M., Chicago, Ill.

HALSTEAD, Gen. N. NORRIS, Newark, N. J.

HORN, G. W., D.D., Colorado Springs, Col.

1885.

BRECKENRIDGE, Rev. EDWARD W., Binghamton, N. Y..

BROWN, SAMUEL GILMAN, D.D., Utica, N. Y..

CONSTANT, SAMUEL S., New York.

HAWLEY, CHARLES, D.D., Auburn, N. Y..

KERR, Prof. WASHINGTON C., U. S. Geol. Sur., Asheville, N.
C.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COOPER, Earl of, London,
England.

1886.

DOUGLASS, THOMAS, New York.

DUNNING, WILLIAM H., Brooklyn, N. Y.

LOTHROP, SAMUEL K., D.D., Boston. 马萨诸塞州

伊利诺斯州杰克逊维尔市朱利安-M. 教授、博士、法学博士斯图尔特万特 (STURTEVANT) 。

都柏林大主教, 爱尔兰。DEEMS, D.D., LL.D., President.

副主席

JOHN BASCOM, D.D., LL.D., Wis.

HON. K. P. BATRIGHT, LL.D., N. C.

HON. THOMAS F. BAYARD, Del.

W. C. CATTELL, D.D, LL.D., Pa.

REV. BISHOP CHENY, III.

RT. REV. BISHOP GREEN, Miss.

R. D. Hitchcock, D.D., LL D .N.Y.

Mark Hopkins, D.D., LL. D., Mass.

REV. BISHOP HURST, Iowa.

RT. REV. BISHOP BEDELL, Ohio.

GEN. G. W. CUSTIS LEE, Va.

REV. BISHOP MCTYEIRE, Tenn.

P. H. MELL, D.D., LL.D., Ga.

F. L. PATTON, D.D., LL.D., N. J.

NOAH PORTER, D. D. , LL. D. , Conn.

ALEX. WINCHELL, LL. D. , Mich.

Executive Committee.

A. H. BRADFORD, D. D. 、

MR. WM. HARMAN BROWN、

S. M HAMMILTON, D. D. 、

Howard Henderson, D. D. 、

H. M. Maccracken, D. D. 、

REV. A. MACKAY-SMITH、

MR. T. E. F. RANDOLF、

REV. Henry M. Sanders、

REV. S. H. VIRGIN、

MR. JAMES YEREANCE.

Trustees.

MR. Cornelius Vanderbilt、

Mr. William O. McDowell、

Sylvester Willard, M. D. 、

GEN. Clinton B. Fisk、

Mr. Owen O. Schimmel、

Mr. CHARLES M. DAVIS, Sec.

Mr. WM. HARMAN BROWN. 财务

本协会成立的目的是促进以下对宗教和科学都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一。全面公正地研究哲学和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圣经中揭示的伟大真理有关的问题。

第二。将已经从事此类研究的科学界人士和作家，以及可能对这些研究感兴趣的所有其他人联系起来，以便通过联合来加强他们的努力；通过这些工作的成果，经过充分讨论后，汇集到一个机构的印刷事业中，使那些如果仅由个人提出，可能鲜为人知，甚至被忽视的证明和论点具有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第三。考虑目前科学所分成的几个不同分支中得出的各种科学结论的相互关系，以消除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假说，从而促进真正科学的真正发展；研究和讨论所有假定的科学成果，以最终原因和更全面、更基本的哲学原则为参照，这些原则建立在对万物的创造者——一位永恒的上帝的存在的信仰之上。

第四，发表在学会上宣读的论文。为实现上述目标，以期刊或研究所论文集的形式，发表在学会上宣读的论文，以及对论文讨论

情况的全面报告。目前，学会的机关刊物是《基督教思想》，每两个月出版一期。

第五，在对主题进行充分讨论之后，通过举办更受欢迎的讲座来宣传讨论结果，并出版此类讲座。

第六。使有学识和无学识的男女基督徒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发行和阅读产生兴趣，从而促进知识和宗教文化的发展。

会员资格和订阅。

不收入会费。会员每年会费五美元。如果向捐赠基金捐赠 100 美元，则可成为终身会员；如果向普通基金捐赠 50 美元，则可成为终身会员。

会员有权免费获得邮寄一份每期的官方出版物，其中载有在研究所宣读的论文；还有权免费获得研究所主办的每期讲座的入场券；还有权免费使用研究所的图书馆。

研究所尤其需要一笔 20,000 美元的捐赠。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秘书、

谁来捐赠？

先生 查尔斯-戴维斯

4 Winthrop Place, New York.

=====
=====
=====
=====
=====
=====
=====
=====
=====
=====
=====

基督教思想。

哲学与信仰的一致性。

[1886年8月25日在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发表的周年演讲]

作者：兰索姆-B-韦尔奇，博士，法学博士、

奥本神学院教授。

哲学是否与信仰相一致？

哲学是否与信仰相一致一直受到质疑和否认。

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涉及到本研究所存在的理由——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存在的权利。

在本文中，我想指出哲学与信仰之间的一些突出联系点——因为本文篇幅太短，确实不可能对所有联系点作出充分的说明。

鉴于当前的重要问题，让我们追溯哲学的意义、方法和目的，以及其结论的有效性和价值。

我想，在这五个方面，我们都会发现哲学与信仰之间的坚定一致。本文所使用的“信仰”一词既是有神论的，也是基督教的。救世主对门徒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这个简短的陈述中，他给了我们信仰的重要原则，以此为中心，可以描述信仰的整个回路。

在开始时，我们不妨一劳永逸地指出，信仰权威地谴责“虚妄的哲学和科学”，但欢迎真正的哲学和科学。人类的理性和常识赞同这种谴责。

信仰与生俱来就具有敏感性和辨别力，而真正的哲学也是如此，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

哲学和信仰一样，都有它的假设或规范原则。让我们来谈谈其中的一些原则：

(1) 哲学必须确保其真正的出发点和目标。它必须有原则和目的。只有包含了这两点，哲学才是合理的；因此，只有包含了这两点，哲学才是有效的。

它必须从最接近和最确定的已知事物开始，即从理性或思维的灵魂本身开始。所有知识都始于意识。我们意识到什么，我们就知道什么。这是第一假设，是基本的、不可否认的。意识的最深层要素是自我意识，它让我们确信自己的精神存在。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继续学习其他知识。没有这一点，我们甚至无法在知识的道路上起步。

(2) 哲学必须承认并运用心灵的所有事实和能力—智慧、情感、选择、欲望、良知、理性。哲学尤其不能抛弃高级或理性的力量。

如果哲学否认心灵的事实和能力，特别是如果这些事实和能力是更高级的事实和能力，那么这种哲学本身就必须被否认和拒绝，因为它是不科学的，而且其不科学的缺陷是不可原谅的。

(3) 哲学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否则就是自杀；而自杀既是一种失误，也是一种犯罪。

(4) 哲学必须遵循意识对人和人所处环境的指导，即人是什么，人如何与环境相关或相应。

(5) 哲学必须区分不同的种类和程度——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精神的和肉体的。

(6) 哲学必须寻找和认识心灵的特征和表现，无论它们存在于何处，无论是人本身还是环境中；哲学必须对它们给予应有的考虑，并根据他对自身、他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本性中的这些特征和表现的估计，将它们视为具有更高的价值。

(7) 哲学是追求智慧，而不仅仅是追求知识。虽然没有知识就没有智慧，但知识并没有穷尽智慧的概念。就连诗歌在这方面也有所辨别。一位桂冠诗人写道：——

“让知识知道她的位置；

她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位的。
如果一切不是徒劳的
引导她的脚步，与智慧并肩前行
与智慧并肩前行，就像年幼的孩子：
因为她是尘世的心灵、
而智慧是灵魂的天堂”。

科学可以只追求知识，如对事实的积累和分类，并将其作为献给哲学的应有之物，供哲学作更高的用途。但哲学要在所有这些事实的起源中寻找合理的原则，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并在这些事实的开始和结束中寻找合理的目的。这是它的目标，也是它的起点。

(8) 哲学以经验为起点，这种经验，无论其起源如何，总是内在的——一种灵魂内部的经验；否则，它就不是经验。

(9) 哲学是在比经验更高的东西，即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然而，它从未超越经验，也从未怀疑或排斥经验。因此，它的立足点是坚定的，它的指导是可信的。经验和理性，对于哲学的确定性而言，永远是相互检验和证明的。特别是在这一点上，真正的哲学有别于虚假或虚妄的哲学。

在理性的光辉下，我们可以看到经验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理性本

身又是如何成为哲学的安全指南的。在这种卓越的光辉下，哲学的原则和过程都是理性的。正如巴特勒主教所说，“理性”是一种“验证能力”。

(10) 第十，也是最后一点——那么，哲学在其原则或起点，在其目标或终点，以及在其过程中，都是理性的。在这三个首要的基本特征中，它赞扬并证明了自己的哲学称号——智慧之爱。

现在，如果它的原则、目的和过程是真实的，那么它的成就就一定是有效的，而有效的成就就一定是有价值的。这并不是说哲学是万能的，因为它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也不是说哲学是全知全能的，因为它完全否认这一点——有限的理性肯定否认这一点。

我们的立场是，哲学与信仰并非完全相同，而是一致的——哲学的原则和目标与信仰并非不谋而合，而是一致的；哲学的过程与信仰并非必然平行，而是真正一致的。

哲学和信仰都与理性灵魂有关。它们只对人有预言性，从不对事有预言性。二者都是理性的过程，是理性所固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禁止或压制。

知识始于意识。然而，意识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挑战：——内在的和外在的——哲学和信仰。根据灵魂的力量和环境的力量，每个

人的训练工作（从出生以后）迅速开始。年轻的灵魂，由于它的依赖性，被训练去信任；由于它所看到的事物，被训练去在爱的认识中进行哲学思考，从而寻求看不见的东西；被训练去相信和肯定它自己的自我的真实性，尽管它是看不见的；被训练去相信和肯定外部事物的真实性，以及像它自己一样的其他人的真实性。在这两个方向上，只有现象是可见的；然而，真正的本质的人，真正的本质的事物，尽管是不可见的，却无可置疑地得到了肯定。

在哲学和信仰中，孩子已经显现出“人”的真实面目。不知不觉中，也许是有意识地，至少是真正地，他开始了哲学和信仰的真正工作——他不能被迫放弃这项工作，如果他能放弃，他也不会放弃，如果他愿意放弃，他也不能放弃。

哲学和信仰对人是正常的，对人的构成和环境也是正常的。一方面，人在童年早期就已认识到自我的巨大现实性，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体验的主体，是人的一切行为或选择的始作俑者或个人原因；另一方面，人又认识到外部事物的现实性，它是人的一切感觉的物理原因，是人的行为和选择的物质对象。

“婴儿初识天地

他稚嫩的手掌紧贴着乳房

从未想过‘我’。

但随着他的成长，他收获了很多，

学会了‘我’和‘我’的用法
发现‘我’不是我所看到的，
也不是我所接触的事物
于是，他开始有了独立的思想
从那里开始清晰的记忆
就像透过束缚他的框架
他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

他很快就学会了识别和辨别快乐和痛苦、好的和坏的、负责的和不负责任的、个人的和非个人的原因。这种认识也许是从他个人的因果关系开始的；这种辨别也许是从他自己的行为开始的。但是，无论如何，对自己和自己行为的认识和辨别都会指导和证实他对他人的判断。

因此，他很早就认识到物理原因和精神或道德原因，并区分道德和非道德。

他已经从哲学角度认识到道德义务和道德荒漠。他已经相信良知，相信辨别是非，相信值得称赞和值得指责。换句话说，他已经从哲学的角度认识了道德治理；无论他是否使用这些术语，他都相信道德法律及其奖惩制裁。

他的哲学和信仰正在迅速超越看得见的和短暂的事物，向看不见

的和永恒的事物延伸。这些事物在他幼年时就存在于他的周围，并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增加。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不断涌现。

意识；“我”与“非我”，都是真实的，都是相关的；“果”与“因”，都是真实的，都是相关的。哲学和信仰已经认识到，良知与顺从、顺从与不顺从、优点与缺点、看见的与看不见的，都是真实的，都是相关的。至此，哲学与信仰确实是一致的。哲学和信仰已经不可逆转地共同步入了思想的轨道，它们不仅渗透了广度，而且渗透了空间——不仅渗透了时间，而且渗透了永恒。

如果真如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所说，“作为真正理性的人，永远都在追求智慧”，那么我们马上就能找到真正哲学的精神和源泉——它最深刻、最真实的意义。

它的名字本身就表明了它的特性。哲学谦虚地自称不是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爱。这意味着所有精神力量的共鸣，不仅是智力，还有情感、理智、良知和意志。这就为做好哲学工作和取得哲学成果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在这一点上，哲学有别于科学，后者是知识性的，它通过观察和分类来科学地认识事物。但哲学与科学又有更大的区别——科学会对现象进行分类，以便了解它科学地称之为规律的一般秩序；而哲学则相信有一种比单纯的秩序更深层、更有效的东西，它忠实于自己，试图了解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产生并有效地构成了秩序，而无需咨询科学；它具有一种科学

必须屈服的权威，具有一种科学无法废除但必须公正地报告和解释的意义，否则就会被揭露为虚假的科学。

但是，哲学与科学的更大区别在于，它相信存在着比单纯的现象更多的东西，无论它们多么井然有序——有比单纯的现象更多的东西需要它去处理，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它去寻找和发现——有产生现象的东西——有真正的东西，它是现象的起源，它看不见，隐藏着，更强烈地挑战着哲学去寻找和发现——有现象的真正核心、生命和灵魂，哲学的灵魂可以与之交流。

为此，哲学甚至受到科学本身的训练，它是在母性的怀抱中，雏形的哲学家感受到了爱的脉搏，这种爱是隐秘的，也是可视的。在母性的爱恋中，爱使眼睛炯炯有神，爱使胸怀和怀抱充满活力，是个人之爱的重要象征——在不断增长的经验中接受稳定而彻底的训练，超越文字而理解印刷品的意义，超越现象而理解其环境的现实——现实的环境向外延伸，延伸到现实的人和世界——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

因此，哲学并没有（像人们有时反对的那样）抛弃经验。相反，它像科学一样充分采纳和利用了经验；但它并不停留在现象上，它并不像计算器那样仅仅列出表格，它并不止步于经验。它寻求经验的意义，现象的原理。在向更高、更广、更深的成就稳步迈进的过程中，它从未抛弃已经获得的真正知识。

它用以验证其基础知识和不断增长的知识的原则，能够验证更高的成就。因此，在向前的同时，它的方法就是稳妥地前进。

在这一点上，哲学不同于科学，在这种方法上，哲学与信仰是一致的。

但是，哲学在采纳和利用经验的同时，也对经验的事实加以区分，并认为用心灵来表达物质现象是毫无根据和不合理的，例如：股票或石头有思想、有意志、有理由、有记忆、有爱憎。这是不合理的。同样，试图用物质来表达心灵的现象，例如心灵有长度、宽度和厚度，也是不合理的。因此，信仰区分了身体与灵魂、精神与物质、造物主与被造物（《创世纪》第一章第 1 节），它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信全能的父上帝，天地的创造者”。

按照这种公正的区分，哲学主张外在与内在、物质与精神、物质与心灵这两种伟大的现实——一种是我们通过感知认识到的，另一种是通过自我意识认识到的。

因此，信仰讲述的是“看得见的、暂时的”和“看不见的、永恒的”。后者是属灵的，信仰尤其要关注这些。神圣的导师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神的国不是酒肉，乃是公义、平安、圣灵里的喜乐”。“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哲学在接受这些双重现象作为真实生活经验中的事实时，承认——肯定了由双重因果关系——物质的和精神的——产生的效果，不仅肯定了前因后果的时间关系，而且肯定了前因后果的因果关系，即哲学关系。哲学认为这一真理是首要的、公理的、普遍的——不仅适用于一个结果，而且适用于每一个结果。

哲学认识本体或原因的方式与认识现象或结果的方式不同。然而，哲学对本体或原因的肯定程度并不亚于对现象或效果的肯定。

哲学在肯定果和因的真实性时，必须走得更远，根据理性肯定原始因果性的伟大原则，这意味着最终起源的真理，果或变化最终可以追溯到这个真理。关于这个原始原则，哲学毫不犹豫，而是极其肯定地指出，某种东西是自在存在的，是外在的；这种自在存在的外在的东西，是一切开始存在的事物的基础、起源、原因或作者；是一切开始存在的事物的充分原因。在这里，哲学与信仰是完全一致的（希伯来书 xi.3）：“我们因信，就晓得万物是凭着神的话而造的，所以所看见的，并不是凭着现成的物造的。”（另见《约翰福音》第 i 章第 3 节）。

哲学所追求的不仅是足以产生每一种效果的因果效率，而且，作为智慧之爱，它所追求的是智慧在这种因果效率中的体现，即智慧与目的在有序的因果效率中的结合。事实上，哲学作为理性本

身，在找到一个有效的充分原因或万物的创造者时，也就找到了一个无条件的或隐含的终极原因。有效的果预设了终极的原因，并真正包含了最终的原因。充分的因果效率或万物之主，明智地朝着一个有价值的目的行事，预先调整适合于确保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是理性的要求。（在这里，我们有了所有归纳科学和演绎科学的有效基础，也是唯一有效的基础）。因此，哲学通过理性研究世界问题和追溯影响的紧迫性，发现了一个合理有序的宇宙或世界，而不是一个混乱的宇宙或世界，并通过完全统一于一个最高的理性原因和一个最高的理性目的，满足了所有科学和哲学的渴望。哲学的这些伟大结论虽然不尽相同，但却与信仰相一致，如《启示录》第四章第 11 节：“你创造万物，万物是因你的喜悦而有，也是因你的喜悦而生。”“照他旨意所喜悦的”，保罗如是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 5 节）；大卫如是唱（诗篇第三十五篇第 6 节）：“耶和華所喜悦的，他就成就了。”

哲学通过观察现象或表现（通过观察所造之物）来了解原始原因或作者。意识到个体的精神存在和个性特征，哲学就会通过其他原因或人的表现来认识他们。因此，通过合理而有效的过渡，它通过万物的表现来认识万物的主因或作者。哲学上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最高的力量 and 目的、最高的智慧和设计、最高的智慧和圣洁都有表现。但这些都是人格（位格）的要素。因此，最原始的原因或起源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有位格的耶和華，“我就是我”（“我是自有永有的”）。

哲学与信仰在这一至高无上的真实—真理中的真理—方面是一致的（罗马书—20）：“因为他创世以来那不能看见的事，借着所造之物，乃是清楚可知的，连他永恒的权能和神格也是清楚可知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显明神的作为。白昼到白昼显出言语，黑夜到黑夜显出知识”。（诗篇第十九篇第一章第 2 节）。

这一经久不衰的哲学和信仰法则并没有因为现代的发现而失效，反而得到了加强。它不需要在我的手中得到平反；它在现代肆无忌惮的批评面前得到了平反。哲学发现人的思想是一种现实——一种我们意识到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知识的基础和可能性。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否认知识，就等于哲学自杀。相反，它以个人自我意识和人类共识意识的所有保证得到了肯定。哲学以其优越的理性权利，将自己置于这种意识之上，认为它是根本的、坚不可摧的。在大自然中，在小事物和大事物中，在特殊事物和一般事物中，在典型事物和普遍事物中，关于智慧、心灵、思想、计划、目的和预先调整的例证、证据和证明比比皆是。我无需在此赘述。合理的目的、智慧的作者的证据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其充分性令人尴尬。

当今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之一、道森校长说过“宇宙一定有一个开端”“没有人需要被告知”。美国最重要的植物学家之一——阿萨-格雷瑟斯博士则有力地指出：“对我们来说，一个偶然的宇宙是不可

想象的。另一种概念选择是设计好的宇宙”。

伟大的归纳哲学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不惧矛盾，他宣称：“自然之光足以证明神性。正如从工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能力和技巧一样，上帝的作品也表达了造物主的智慧和全能”。因此，正如培根所暗示的那样，哲学无需证明神性的存在，而是从证明神性的自然之光中追寻证据；因为“人是自然的牧者和解释者”。“我宁愿相信《传说》、《塔木德经》和《阿尔科兰经》中的所有寓言，也不愿相信这个普遍的框架没有思想”。培根这一表白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归纳科学的证实。

正如波特校长所言，达尔文的语言中充满了目的论术语。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理论的核心原则，即“所有有机物的发展都是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的变化”，是从一位受过灵性和有神论学派训练的作家那里借来的；他（斯宾塞）最终统一于一种超世俗的力量，即伟大的未知力量，正式且不可避免地承认“信仰是哲学的必要补充”；他断言“这种超世俗的力量是一种人人都必须敬畏和崇拜的力量，这不仅承认人类知道一定存在上帝，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人类知道上帝是谁和是什么”。一位现代进步神学家和有神论进化论的倡导者的著作中的一句话包含了对斯宾塞的科学理论的充分回答，尽管这个回答是不故意的：“我们追溯得越远，就越能感受到造物主的力量和存在”。

事实上，进化论（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如果被承认和证明，它所说明的不是产生，而是进行——不是起源，而是持续——不是开始，而是成为。在真正的哲学之光和真正的信仰之眼中，任何形式的“进化”都只有在与上帝的思想和目的相互渗透的过程中才能变得可解释和有光彩。

诗人席勒在《唐-卡洛斯》第三幕第 10 节中写道：“环顾四周，瞻仰上帝的杰作：

我们看不见造物主；他平静地

隐藏在永恒的法则中；

怀疑者看到的不是他，而是它，他们惊呼：‘何来上帝？世界本身就是上帝。’

基督徒对他的赞美，

反衬了这个怀疑论者的褻渎”。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见《信仰与现代思想》，第 272 页），信仰宣称心灵是终极的，心灵是无限的、永恒的。因此，心灵是首要的、至高无上的；如果进化论得到证实，那么进化论将是由神圣的智慧和力量所创始和控制的；而大自然的法则同时也是有效的、统一的、高效的，虽然根据神的旨意而变化，但由于神的信实而统一，“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赫伯特-斯宾塞宣称，“完全统一是哲学的实质事业，是哲学的目

标”。(F.Prin.》第 40 和 45 节)。

不可知论在推测统一的过程中，忽视了自称包含在内的高级事实和心智能力，而这些事实和能力要求更理性、更全面的统一，不是统一于一个我们必须敬仰和崇拜的伟大的未知的、不可知的东西，而是统一于一个我们可以认识、爱戴和侍奉的、个人的最高作者。

唯物主义所推测的统一，不是心灵的统一，而是物质的统一，它否认和拒绝有别于物质的心灵事实和能力，从而与意识相矛盾，否定良心和理性的权威，把理性的人贬低为物，最终导致无神论。

泛神论通过排除物质与心智之间的所有真正区别来推测统一，并在与唯物主义相反的极端上，将不同的事物都归结为“泛神”这个怪物，把神变成万物，把万物变成神。对这种猜测的最好回答之一就是其本身的简单的陈述。现在，如果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当，我们已经充分表明哲学是有神论的。

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这些基本要素上，哲学与信仰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正如汉密尔顿爵士 (Sir Wm. Hamilton) 所简述的那样，哲学证明了自己的特性：“理性对其合法对象的应用；关于所有知识与人类理性的必要目的之间关系的科学；关于绝对的科学；”

或者，正如《大英词典》中更全面地描述的那样：“这门科学致力于确定思维本身运作所遵循的规律或终极原则；这门科学力图发现其所知或所想的一切的终极基础；发现其自身是什么以及其与万物的关系是什么，并因此力图从所有这些终极规律或原则中形成一个体系。这种体系可以称为绝对意义上的哲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思想和现实的这一原始领域，真正的哲学是公认的有神论哲学。

但是，思想和现实还有其他更高的领域，即道德和宗教领域，这些领域向哲学提出了挑战，并邀请我们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哲学已经达到的有神论概念实际上在逻辑上包含了道德和宗教真理，这些真理在所有哲学探索和发现中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哲学可以合理地利用这种理性的暗示，并通过这种简捷的演绎方式来获得有效而重要的结论。哲学中关于万物的至高无上的、智慧的、有位格的创造者的概念，包含着至高无上的、神圣的道德和至高无上的道德管理，贯穿于理性的、道德的创造物的整个领域。

“全地的审判者岂不行善？”

“你喜爱公义，厌恶不义”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主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不要被欺骗，人种什么，收什么”

此外，这种哲学概念还意味着宗教是理性生物的一种相应关系——

一种由有限存在者的依赖、道德义务和宗教冲动所强化的关系。这种宗教关系，就像有神论概念中隐含的道德关系一样，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无需停下来证明它，甚至无需加以说明。

这些哲学结论与信仰是一致的：

“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你只可侍奉他”。

但是，虽然哲学可以而且确实在利用这种简短的、演绎的、有效的途径来得出这些伟大的道德和宗教结论，但它也有一种归纳的、有效的途径来得出同样伟大的结论。

关于伦理和宗教领域的这些实际而重要的真理，哲学有两种相互印证、各有定论的方法。

在这里，让我们通过归纳法，首先对道德领域进行一次快速的哲学考察。

通过经验和观察，我们知道道德义务是存在的，它不仅仅是习俗。道德源于人格—理性、良知和意志。理智肯定了对与错之间的真正区别（尽管它不一定在所有具体情况下都能公正地理解这种区别）。良知使每一个理性的灵魂承担起做正确的事和避免错误的义务。无论是否愿意，每个人在道德上都要对自己和他人行为进行是非对错的检验。道德判断是理性灵魂的最高判断。他对自

己和他人负责——在道德上负责。习俗、利益、快乐、成功、欲望或激情的满足、恶意、嫉妒、报复都不能为犯罪者辩护或开脱。这一道德准则适用于个人、家庭和国家。这一道德准则是至高无上的，它能区分有罪与无罪、功与过。在我们自己和社会中，有一种道德力量使人变得正直，即有一种非我们自己的力量使人变得正直。但正义是一种个人品质。在理性的光辉下，道德法律的作者（上帝）和道德法律的神圣管理已经清晰可见。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伦理学应该寻找一个有位格的道德立法者（上帝）。良知以一种权威说话，它向个人的灵魂传达了一种非我们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造就了正义；因此，良知明确无误地指向一种非我们自己的人格（位格）（上帝），这种人格（位格）（上帝）造就了正义。归纳的证据越来越多，并汇聚到这个个人（位格）（上帝）的、道德的、至高无上的问题上。每个人和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处于道德法律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并非由我们创造的道德法则——一种通过制裁（奖励和惩罚——顺从的奖励，不顺从的惩罚）来执行的道德法则——一种符合理性的道德法则，它针对的是理性的人，而不是事物；这是一种具有执行力的道德法则，这种执行力使正义变得更加真实和个人化，它不仅迫使我们对个人的一切行为进行道德评判，而且迫使我们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并将道德和精神的价值置于卓越的顶峰。道德和德治的归纳证据趋于同一结论，归纳和演绎都是不可否认的。

在物质世界中，我们处于道德法律之下，我们的选择是顺从和安

全，还是反抗和毁灭。

在更高层次的道德领域，我们无疑也处于法则之下，而选择是顺从和幸福，还是不顺从和死亡。

哲学现在可以毫不惊讶地聆听信仰的教诲了：“生命胜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是的，人的一切都要献上，以换取自己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灵魂呢？”

“有一条律法写在心里”；“良心为它作证”；“思想或推理彼此控告或开脱”；“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更大，他知道一切”。

若从不可知论的低级推测，或泛神论的低级冷漠，或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低级开始，我们在道德上就不可能不偏离这些伟大的道德结论。

哲学（如果有哲学的话）应该在道德和宗教（如果有道德和宗教的话）中寻求最好的东西。这将对个人自私、社会审慎和公民福利的支配和管理。在这方面，基督教确实达到了理性思想的顶峰。律法是神圣、公正和善良的。作为以马内利（Immanuel），神与人同在，律法的制定者（耶稣基督）在他完美的人间生活中

体现了完美的律法。任何道德观念都无法超越基督的道德诫命和实践。

我们说，真正的哲学应该寻求知识，并在智慧之爱的驱使下寻求道德和宗教的最佳境界——这是理性的必然和内在的冲动所驱使的。否则，就是对自己不忠，也是对正确的理性主张不忠。

理性的主张。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有一种伦理学哲学具有理性和良知的权威。它以这种权威审视文学艺术、社会习俗和政府管理。它的正确原则是道德权利。它的合法目的是人类的道德福祉。它的职责是保护社会。作为首要假设，它宣布社会是有机的，具有持久和不断扩大的生命力，充满了成长或进步的法则。社会的健康生活和成功发展需要道德规则的应用——个人和公众的道德义务。脱离了道德，文学就会变得放荡；艺术就会变得堕落；社会习俗就会变得腐化；公民政府就会变得专制。但是，伦理学哲学虽然包括而不是排斥文学和艺术、真与美，但却特别追求善——排除恶的善。它的愿望和目标必须是道德的卓越和道德的幸福。就其本质而言，它不仅应该而且必须追求最好的，只有道德完美才能满足它。哲学伦理学认为，社会进步法则的关键因素是个人和公众的道德义务——爱的法则，或道德的、个人的尊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哲学原则必须切实追求和促进每个人和所有人的道德利益。它必须稳步寻求更确定、更全面的应用，越来越迫切地针对每一个人的良知，越来越多地提醒社会在道德上的兄弟情

谊，没有人是为自己而活；与唯物主义进化论的虚假伦理相反，它宣称：“我们强者应当承担弱者的软弱，而不是取悦于自己；每个人都应当取悦于他的邻居，以造就他的好处——在荣誉上彼此相爱”。但这既是信仰的教导，也是道德哲学的诫命。在这里，在道德的更高层次上，哲学与信仰是一致的。事实上，哲学热爱智慧，不断追求道德的至善至美，在理性上受到约束，在感情上被吸引，去采纳信仰的道德法则，因为它在道德上是至高无上的。这是真正的哲学在道德领域的愿望和目标。保罗以他的软弱和力量——哲学的、伦理的保罗——表达了我们所有人的道德情感和信仰告白：“律法就是律法。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所不愿行的，若行了，就显明我是有罪的，律法是善的。”

但是，道德与人有着唯一的关系，它的最高源泉是至高无上的人格（位格）（上帝），它与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真正的哲学应该上升到的更高的层次——哲学不能忽视或拒绝的更高的关系——人的精神关系。毫无疑问，除了道德哲学或心灵哲学、自然哲学或历史哲学之外，还有宗教哲学。我们已经在哲学的大环境中观察到，哲学以同情的态度成功地追溯了它与物质和心灵、与历史和道德、与非个人和个人的关系。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哲学作为智慧之爱，其本质和义务都是追求真实和最好。在这里，“真”就是“善”，“善”就是“真”。

所有其他关系在此都具有最高意义。如果说物质的价值不在于其

本身，而在于思想，思想的价值取决于它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那么，物质和思想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它们与精神——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精神（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任何地方都以某种方式得到了承认。在这一点上，人类的共识提供了完整的说明和确凿的证据。信仰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肯定，“宗教因素是人类灵魂中最强大的因素之一”（赫胥黎先生（“非宗教布道等”，第 16 页），并说宗教情感是“人类最崇高、最人性化的情感”。T. W. 希金森先生宣称“心灵的宗教永远不会消亡，因为它是人类的本能”。赫伯特-斯宾塞认识到宗教情感是人类与生俱来且不可磨灭的，他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老战场上举起了休战的旗帜；面对科学所不可捉摸的力量和神秘的存在，他（斯宾塞）提议在宗教与科学之间达成和解。最近，亨利-德鲁蒙德（Henry Drummond）也从宗教的角度回答了科学界的这一建议，即希望科学与宗教和解。

正如有人说过的，也许是正确的，至少是有说服力的，“斯宾塞先生肯定了科学的背后存在着宗教因素。德鲁蒙德先生确认，宗教的背后有科学的因素，而科学的因素正是那些生物起源和自然选择的法则，这些法则被前人认为是宗教最坚固的壁垒”（乔治-马西森博士）。

自然神主义论、泛神论、不可知论从哲学上承认了这种持久的人类情感，并允许或提倡崇拜。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确实曾试图并蓄意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排除宗教。但是，由于受到抵制和反弹，它

不得不承认这种精神因素，并将其纳入自己更加成熟的体系。这一反动彻底扭转了孔德的宗教态度，他从早先排斥宗教的态度出发，进而阐述了“人性宗教”，《实证主义教义》（Catéchisme Positivist）使公众对这一宗教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就要求人们每天三次向被神化的、作为集体人类代表的女性祈祷。崇拜、教条、纪律、建筑、祭坛、祭司、象征、手势、圣礼——所有这些细节都在这种实证主义宗教仪式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所有这些都 不情愿但又不可避免地证明了宗教情感的力量。

我之所以花了较长的篇幅论述信仰的敌人和朋友的这一承认——承认人是一种宗教存在——是因为它是有神论的根本，也是其固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但所有宗教都指向最原始、终极的真理——上帝。事实上，严格来说，宗教是一种被认可的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对上帝的依赖。离开了这一点，宗教一词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沿着这些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方向，哲学与信仰是一致的。人类的斗争和进步应该是朝着道德和宗教的方向发展；在道德方面，如何最大限度地改善个人，如何最好地把人们团结在社会中；在宗教方面，如何最好地净化心灵，如何最好地把人们团结在上帝面前。正如信仰所指示的那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

难怪那位“律法师”的提问被挫败后，基督回答说：“你回答得对，你这样做就必存活”。

这的确是道德和宗教的完美体现。真正的哲学承认双重义务是公正和神圣的，人类的理智低下了眉头，低下了头，虔诚地向神屈服。

但现在，根据人类历史和普遍经验，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告白：人类道德需要帮助和矫正，需要指导和监护；宗教需要净化、提高和完善。在确定的哲学知识中，道德邪恶盛行，罪恶泛滥，死亡横行。整个造物都在痛苦中挣扎，等待帮助，渴望拯救。

生命的问题——尤其是道德和精神的问题——是哲学所面临和关注的，因为它是人类所面临和关注的。哲学不能无视或回避这个问题。但哲学能解决问题吗？秉承她的方法，在人类理性的光辉下解读人类的经验，哲学能够回答所出现的道德问题吗？如何对待罪？用正义的方法还是恩典的方法？是惩罚还是赦免？如果是惩罚，惩罚到什么程度？如果赦免，依据什么理由和条件？如果采用恩典的方式，如何使其与正义相协调？如果要赎罪，祭品是什么？如果要调解，谁是调解人？恩典应交付给谁？恩典的管理会永远持续下去吗？如果不是，何时结束？如果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罪的试探，恩典是只惠及被试探者，还是也惠及试探者？

诸如此类，都是人类理性为了人类灵魂和神权的利益而必须提出

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哲学如果忠实于自身，就会在这些至高无上的问题上寻求智慧，寻求从上而下的智慧，在黑暗和深切的渴望中等待光明的照耀，等待来自神圣理性的声音，指出道路、真理和生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最明智的哲学态度就是让有限的人类理性等待神圣的理性，倾听那权威的声音。

这些伟大的问题不仅驳斥了理性主义的傲慢，即那种——相信人类的理性是万能的——态度；它们还证明了人类理性在精神解救、救赎和恢复方面的无能和无力。面对这些至高无上的问题和灵魂的需求，哲学通过理性之光看到了对更高之光的必需。它从这些至高无上的问题中看到了向罪人的世界提供完整启示的迫切需要。在对智慧的热爱中已经寻找和发现的东西的训练下——也在最高的道德和精神需求的训练下——它与信仰高度一致地等待着——等待着神的使者和他的信息，没有排斥，甚至没有惊讶，而是满足于信仰的解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是真光 照亮了所有来到世上的人”；“上帝爱世人”。

从苏格拉底时代起，哲学就一直渴慕上帝向这个因罪而与他分离、迷失的罪恶世界显明他自己。但很显然，如果上帝向人类启示自己，那就必须通过言语，或亲自，或两者兼而有之，这样人类才能理解启示。如果是通过话语、那么就用人人类能够理解的语言。”一切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使它（圣经）成为有益的启示。

因此，真正的哲学会断言，上帝对人最充分的启示必须是道成肉身。信仰也是如此：过去，上帝曾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藉着众先知向列祖说话，在这末世，又藉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真正的哲学本来就是有神论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基督教的。这与基督的诫命“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并有权快速前进。道成肉身是救赎工作中的第一重伟大行动，它引出了第二重，即：为罪人中保；并引出了第三重，即：在基督子民的心中并通过普世教会组织基督的国度。

这些都为哲学和信仰提供了保证，即在上帝的理性目的和恩典计划中，他的国度不会失败。

道成肉身解释并照亮了整部圣经。预表和象征、预言和应许以及实现都以基督为中心，在他身上焕发出意义，并将永远增强对基督教哲学和信仰的意义。在这个道成肉身的阶梯上，雅各在异象中看到怜悯的使者上升和下降。因此，从救赎工作中的第一个伟大行动开始，我们依次追溯其他行动，其中包括对上帝在地上和天上的国度至关重要的一切中保；在普世教会中上帝儿女心中组织这个国度；通过救世主所说的“父要奉我的名差遣”的圣灵的

管理来管理这个国度，以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也不是倚靠权柄，乃是倚靠我的灵”所要成就的一切。

这五个伟大的行为——道成肉身、中保、组织、管理、成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这些构成了基督教哲学和信仰的最高研究。“这些事天使们都想研究”。它们以深远、崇高的视角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现在只能说出它们的名字，甚至不能试图追溯它们。要想勾勒出它们的轮廓，至少还需要另一篇论文。

在它们的最高一致性中，哲学不仅是有神论的，也是基督教的；而信仰相信上帝，也相信基督。

如果现在有人问：人类的理性能够完全理解基督教吗？信仰回答说：不能；它是一种生活，而不是生活哲学。它能被证明吗？信仰同样欣然回答：是的，通过神圣的见证和基督徒的经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它的真实性呢？答案是：通过尝试。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检验了，也没有比这更容易为人类理性所接受的了。答案永远是，也不可能是别的：“你们若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道理。”

在确保这一结果成为个人经历的过程中，要特别记住圣灵的有效工作——对罪、义和审判的推理，使道德力量迅速进入新的生活——对上帝之子的信仰生活。

新的经历是这种新的信仰生活的稳定的精神结晶。这种亲身经历对灵魂来说是永恒果实的恳切，是精神上的支持和捍卫，是任何形式的怀疑或虚妄哲学都无法战胜的——更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撼动的捍卫和支持。对于怀疑者、敌意者、好奇者、坦率的探究者，基督徒经验的哲学和实践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弥赛亚。来看看吧。”

这不是抽象的或神话的，而是理性的、简单的，是在无限理性的光辉下对人类理性的褒奖。从此，信仰因爱而起作用。属灵的冲突和恒久造就了属灵的力量和品格。“直到我们在信德和认识神子的知识上合而为一，成为完全人”。

信仰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合法特权。在哲学的同意下，它将目光投向了人类哲学之外更高的东西。它向人类理性推荐一种最高的指导，甚至是神圣的指导。它提出了最崇高的动机，甚至是无限和永恒的动机；提出了信仰和生活的完美准则，甚至是神圣的话语；提出了全能的救世主，甚至是耶稣；提出了不朽的见证者、伴侣和安慰者，甚至是圣灵。它以祝福回报顺从，并通过展示一个完美无瑕的模范——完美的基督——来促使我们更加顺从；他在各处受过试探，就像我们一样，却没有罪，给我们留下了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他是一位神圣的朋友，他理应变得像他的弟兄们（从而成为人的样式），以便成为仁慈信实的大祭司；俯伏在我

们卑微的地位上，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与他一同升到他神圣威严的宝座上；鼓励并帮助我们得胜，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就像他也得胜了，与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启示录三 21）。

这样，生命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哲学感到满意；基督的国度得以建立，使信仰感到喜乐。在上帝的智慧中，这就是哲学和信仰同声欢呼的恩典成就。

有鉴于此，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应运而生，为这一伟大的运动尽一份绵薄之力。它的特殊目的是以更综合、更集中的方式展示基督教哲学，从而以更有效的形式。我们说，是展示，而不是生产；因为基督教哲学早已在这一领域开展活动，尽管还没有结合起来，但其活力和勇气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不断向前推进。

本基督教哲学研究所的宗旨在组织章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我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第一、第二和第三条：

第一条。全面公正地研究哲学和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圣经中揭示的伟大真理有关的问题。

第二条。将已经从事此类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作家，以及可能对这些研究感兴趣的所有其他人联系起来，以便通过联合加强他们的努力；并通过将此类工作的成果，经过充分讨论后，汇集到一

个机构的印刷事业中，使那些如果仅由个人提出可能鲜为人知，甚至被忽视的证明和论点具有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第三条。研究目前科学所分成的几个不同分支中得出的各种科学结论的相互关系，以消除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假设，从而促进真正科学的进步；研究和讨论所有假定的科学成果，以最终原因和更全面、更基本的哲学原则为参考，这些原则建立在对万物的创造者、永恒的上帝的存在的信仰之上。

二十年前，英国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学会，名为维多利亚学会或英国哲学学会。

沙夫茨伯里勋爵是英国最高贵的贵族之一，他能干、谦虚、忠诚、真诚，是公认的朋友和慈善事业的领袖。

研究所一致推选英国皇家法学博士F. R. S. E. 斯托克斯教授（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曾担任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教席）作为他的继任者，他也是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的终身会员——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哲学家。

在上帝的眷顾下，迪姆斯博士为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所做的工作就像沙夫茨伯里校长为维多利亚研究所所做的工作一样——见证它安然度过萌芽期的危险；完成它的组织；增加它的资源；扩大

它的人数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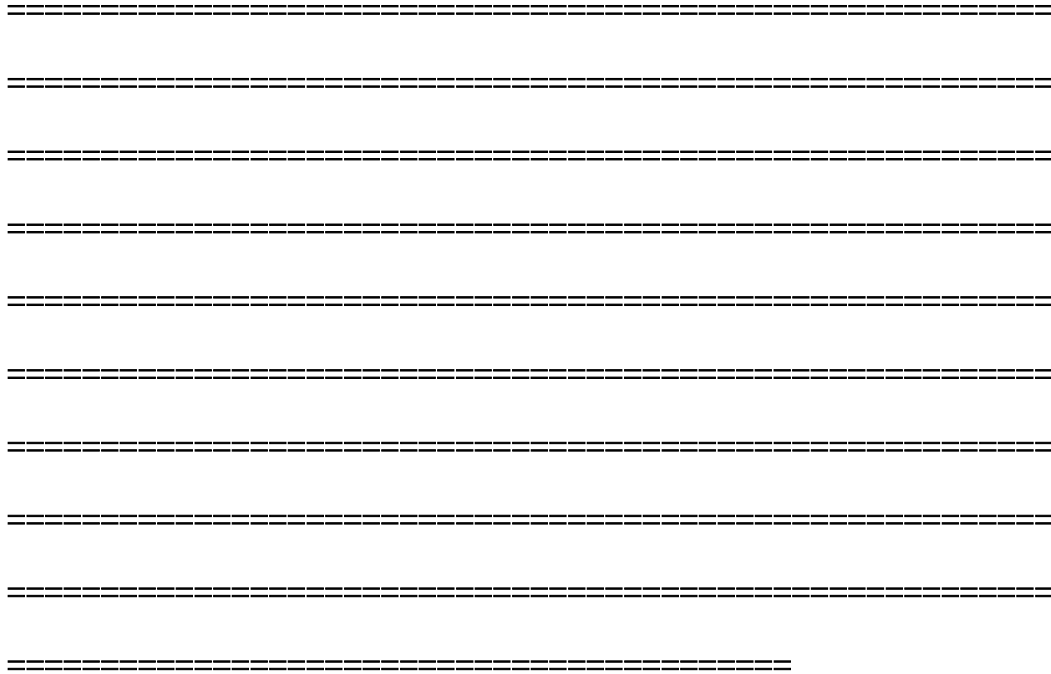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学院成立二十年来，会员人数已达到约一千人；而美国学院在其组织完成的第五年，会员人数已达到五百人。正如其名称所示，它所寻求的并不完全是深邃而成熟的思想家（尽管它特别寻求这些思想家），而是那些热爱智慧的人，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愿意思考的男人和女人，以及渴望自己在哲学思想领域取得进步并促进他人进步的人。

为此，重要的是要获得关于基督教哲学各个分支的优秀论文；从而提供各种有效的哲学文献，以满足我们这个时代国内外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国家受过教育的青年的迫切需求，以及刚刚崛起于基督教文明、难以摆脱虚妄哲学和虚假宗教的国家的更直接需求。

因此，本研究所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需求——增加其成员；增加其资金；聘用基督教哲学方面最优秀的人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机会和责任；扩大其对善的影响，直到它遍及我们整个国家，并漂洋过海，到达遥远和更遥远的海岸。这样，本着祈祷的精神和日益增长的奉献精神，我们就能极大地促进人类的福祉和我们神圣的主和救世主的荣耀。

“最能取悦他的人

在和平中遵行他的旨意”。



土耳其帝国的美国学校

[1886年4月1日在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宣读的论文]

作者：REV. JAMES F. RIGGS.

1874 年夏天，许多人前往萨拉托加湖观看一场引人注目的赛船比赛。日报的记者们都在现场，发表的比赛报道强调了人们对各种船队、事务管理、裁判裁决的兴趣，尤其是大量旁观者的真正热情。然而，在讨论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一位纽约记者补充了这

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真正的戏剧发生在赛艇上”。

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困难重重的问题。在任何国家，在最明确的条件下，教育的整个主题都被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所包围。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是众所周知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真正的戏剧在船上”。真正的教育家，像古代勇敢的赫梯战士一样站在“最激烈战斗的最前线”的人，有时会看到“城市编辑”或“轻松座椅”所不清楚的案件性质。

基督教教育的伟大事业现在正处于挑战之中；这个问题不是推测性的，而是实践性的；我们要说的是，世界是否会在二十世纪见证这场革命。因为世界将在基督教教育的影响下发生革命，而问题在于方法。整个世界是我们努力的领域。楔子的一端已经插进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圣经已被翻译成一百八十多种语言。任何地方积极开展福音工作的中心都是由传教士努力建立起来的核心，我们知道这样的核心不胜枚举。那么，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我们应该努力消除的障碍是什么？

我们有机会，世界是开放的。我们有最高的媒介——圣经。我们在这个异地有数以百计的新生教会，每一个都适合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核心。但“工人很少”。这就是障碍。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对外工作已经停滞了半个多世纪。其后果在许多地方都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印度，那里缺乏有效的本土力量是最值得注意的。

有些人认为，世界将因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的传教而改变。我们认为这只是痴人说梦。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有足够多的使徒，他们或许可以做到；传教士却永远无法完成这样的事业，因为他们人少，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与他们的种族群众隔绝，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想想一个传教士，无论他多么有效率，他的教区里有一百万灵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传教士，我们还需要一支受过教育的本土牧师队伍。我们对上帝派遣的先知和使徒不是天使，而是人这一事实怀有感激之情，而使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样思路，再向前推进一步，就使中国人、亚美尼亚人、帕西人或贝都因人——所有人都应接受作为他们亲属的人的属灵关怀——的要求变得非常合理。我们为外国宣教的成功祷告；让我们为每一个外国宣教地都能成为本土宣教地祷告。

要认真而持续地关注与东方有关的主题是很困难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涉及的社会阶层是如此之多，故事是如此奇妙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整个东方问题，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都是一个谜，深不可测。它是浪漫主义的顶峰；它是梦幻之地；它是古怪和愚蠢的扭曲组织，永远无法像我们这些生活在更寒冷的天空和更沉闷的氛围中的人所面临的问题那样加以估量。

长长的樱桃木烟斗，漂亮的琥珀口罩；白色薄纱头巾和金线编织

的红色腰带；小毛驴和大骆驼；古老的清真寺，优雅的绿色瓷片；在这高贵美丽的阴影下，是七英尺见方的土屋；千姿百态的奢侈，以及无知到无法抱怨的苦难人类，这些都取代了东方问题。在地中海的尽头，新旧问题层出不穷！伊甸园的遗址、阿拉拉特的山脉、尼尼微的石碑、巴比伦的土丘、无数哑巴和无名的巨石雕像、赫梯人的碑文、拜占庭的传说、万里无云的神秘天空、埃及的大河及其封存过去，这些都让游客陶醉于一种全新的、难以名状的感觉，即他正站在一个陌生世界的边界线上！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怪诞、可怜的国度，然而，在一切可悲和令人厌恶的事物之上，却散发着柔和、醇厚的光芒，让人联想到童话世界，联想到《一千零一夜》中的盛情款待，联想到阿拉丁神灯，联想到一种朦胧、无痛苦的喜剧，与我们西方和北方生活中的严酷斗争相比，这种喜剧具有奇特的反差。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的图景是用硬线条描绘出来的：没有东方的图景，只有一连串溶解的景色。

罗马作为伟大思想的发源地，雅典作为艺术和诗歌的源泉，令旅行者激动不已；但东方就像一幅华丽的油画，就像仙女的梦境。

像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城市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还是历史、考古、教会、政治和商业等各种兴趣的集中地。这座城市的一些特征让人想起希腊人清晰的辨别力、罗马人强烈的常识、僧侣们艰辛的

忍耐、早期教会的真诚和热情，以及知道如何牺牲的英雄们的坚韧！

十九世纪在奇异和粗俗的比例上丝毫不落后于其他世纪。浪漫与血腥、灿烂与令人厌恶的事物层出不穷，让人不知该从何处着手创作或叙述。曾经，东方是主人，西方是学习者，但现在问题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圣经》之地再版《圣经》”这句话很好地表达了摆在我们美国教会面前的任务。

教会从未被允许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在任何土地上开展工作，但在东方却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干扰。从使徒时代的迫害开始，历史就在鲜血、动荡、漫长而无用的战争中书写。希腊人、罗马人、哈里发、十字军一次又一次地使车轮倒转。在本世纪，法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人、鞑靼人、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交锋。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暴怒中，向教皇尼古拉四世（Pope Nicholas IV.）提议，使用竖立在穆罕默德大城市附近的焦镜烧毁这些城市。但在我们的现代十字军东征中，我们建议在这些城市附近建立机构，向它们集中光照，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圣经》和基督教文化。

目前，在土耳其开展活动的教育力量非常强大；所取得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功于此。美国董事会在土耳其（不包括叙利亚和埃及）有六百多名当地助教，这支庞大的队伍代表了学校的效率。

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人去传道、教导和负责分发圣经。

精确而严格的分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项工作的各个部分并不完全系统化；例如，“高中”一词在东土耳其传教会和西土耳其传教会的用法就不一样。神学教学有时也与文学和科学相结合，因此很难说某所学校是中学还是神学学校。

但可以笼统地说，学校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和学院。低年级人数众多，入学学生以千计。

土耳其帝国本土（不包括叙利亚和埃及）的学生总人数约为 15000 人。这只适用于由美国董事会控制的学校，而不适用于由当地人管理的类似学校。

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约有一千人是各种中学和神学院的学生，八百多人是女子寄宿学校的学生。最近发表的文件中报告的数字确实令人鼓舞。

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代表福音派教育制度给该帝国人民带来的福祉，但它们可以作为某种估计的基础。很明显，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都证明了他所来自的家庭取得了一些成就。

在这种学校制度中，我们绝对有必要从底层做起，直到达到顶峰。

原因很明显，那就是迄今为止一直在使用的错误方法；长期以来在基本要点上的错误；故意采用的反常的口味和歪曲的公式。对东方现有的东西进行任何修补都无法达到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这句话甚至适用于文学品味的外部框架，适用于风格问题，适用于将许多原有的形式加以新的使用。我们必须对较好的东西施加压力，迫使较差的东西退避三舍。一个关于穆罕默德人文学品味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规划作为基础的作品时是多么重要。

一位土耳其历史学家在描述 1738 年德涅斯特河附近的一场战役时说：

“许多注定要下地狱的被诅咒的人，致命地跳过了由真正的信徒闪闪发光的军刀形成的拱门，跳进了无尽的深渊”。

另一篇关于圣城的文章写道：

“撒马尔罕是地球的脸面；布哈拉是伊斯兰教的骨髓；如果马什哈德没有蔚蓝色的穹顶，整个世界将只是一条沐浴的沟渠”。

在与基督徒的战争中，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表现出一种恶劣的精神。如果基督徒战败，那么他们就是“狗”，但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他们就是“不虔诚者”、“噬血的敌人”。

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真正的改善，因为存在着同样的不良精神，同样完全缺乏真正的同情。穆罕默德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在道德和教育计划中成功嫁接。我们必须在他们面前树立一种新的男子汉形象，从字母表开始！因此，我们要仔细观察我们的整条战线，我们要搜索整个葡萄园，寻找阳光充足的地方，我们要组织我们的学校，以便尽可能全面地占领整个教育阵地。我们希望，所提供的教育将是如此充分和慷慨，以至于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志于此的青年都能在我们的小学、中学或高中找到自己的—席之地。

此外，我们还将在这样的地方开办学堂，使任何年轻人都不会因条件所限而被迫在智力上挨饿。在土耳其帝国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任何学生都不应该被迫走一百多英里的路去上大学。我们还没有达到土耳其的这种状况。有些学生要走五百英里的路才能到达罗伯特学院。

每所学校对整个工作的真正价值，都取决于教师的个人能力和道德力量，因此，任何概括性的总结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在一个地方，一个书本知识有限的人可能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而在另一个要求更高的地方，一个知识渊博得多的人相比之下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但是，高等学校的定义可以更加准确。在土耳其西部传教团中，可以称得上“高等学校”的学校位于马索万、巴格切

茹克、锡瓦斯、凯泽里和君士坦丁堡（部分时间）。这些学校在许多方面都做得很好，特别是在播种方面，这些种子将在下一个世纪的收获中得到证明。目前正在认真努力重组马索万的中学，使其具有学院的名称，并真正增加设备和捐赠，使其能够开展学院的工作。

君士坦丁堡的罗伯特学院是众所周知的；新成立的土耳其中部学院也很有实力；东部地区的哈波特也有一所类似的学院。萨莫科夫、马索万、哈尔波特、马拉什和马尔丁都有专门培养传教士的神学院。其中，只有马索万的神学院已经连续开办了二十年。即使在那里，就毕业生而言，两年一班也是平均水平。所有这些神学院都受到了考生、资金以及大多数情况下准备工作质量低下的严重阻碍。关于每所独立院校的历史，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的细节，也可以为每所院校提出恳切的请求，要求提供捐赠、更多的仪器设备、更充实的师资队伍、更好的宿舍、更多的应急基金，最重要的是，要求提供更多的资金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但是，抛开所有这些细节不谈，我们准备讨论一个更全面的问题。

把教育制度作为我们对外传教工作的公开政策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我们没有必要根据一次试验的成功来进行详细论证；我们也不打

算根据罗伯特学院的结构来确定工作方向。但是，在提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时，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代宗教工作的历史中汲取整体经验：如果现在还不是教育本地工人队伍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呢？

花必须长在茎上。市场必须从田间地头供应。铲子是一种非常廉价的用具，铲子的数量也很多，但在制造出一把铲子之前，大量昂贵的机器已经开始运转。

我们所使用的短语“受过教育的本地牧师”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的培训，意味着资源和文化。但希金森（T. W. Higginson）说，我们必须等到第三代才能看到真正的文化，这一判断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证实。那么，难道不是必须采用一种教育制度吗？受过教育的阶级是我们培养出来的牧师可能开花结果的茎，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假定应该在传教事业的领域中提供一个实质性的永久教育机构，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明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计划？怎样才能使这一体系迅速扎根？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损失取得最好的成果？对现场的传教士来说，这些都不是小问题。失误可能会酿成悲剧。今天的快乐灵感可能是明天的天才，也可能只是一场梦。

机械时代的奇迹——那些强大的船用发动机，必须安装在足够坚固

的框架中，以承受发动机的作用，否则船就会被反作用力击沉。我们的道德机器也必须安装在一个合适的框架中，不能任由它在毫无保护的地方摇摇欲坠。我们已经受够了外来的压力。这不是我们所建议的政策的目的。我们不会采用任何制度，但我们希望看到一种真正的、有价值的自然发展，最终形成一种基督徒可以引以为豪的制度。福音必须是动力；所发展的伦理必须是纯正的圣经伦理；但气候、环境、特殊适应都有其规律，发展必须从一开始就与之相协调。

在非洲的一些地方铺设铁路时，人们发现木制的枕木毫无用处，因为几周之内就会被那里盛产的白蚁吃光。同样，在其他地方，薄铁制的枕木也不适用，因为它们很容易沉入泥中。哪种方法最有效，必须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决定。

很久以前，在土耳其帝国传播福音的传教士确实采取了教育工作的方针，并沿用了若干年，直到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用钱的方式是严重的错误，是对基督教国家为传播福音所做贡献的滥用。

但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反应引发了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之后，培训和指导那些可以接受培训和指导的人的伟大而崇高的工作，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信念基础上，重新占据了上风。人们看到，花在年轻人身上的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以后会

向自己的同胞传教。人们看到，年轻而聪明的人比年老而迟钝的人更容易与福音接轨。

在美国，有人担心传教士把他们的飞行纵队派到离基地如此之远的地方是在冒很大的风险（用一个军事上的比喻），他们的论点是应该先建立一个由虔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社区，然后再发展学校。

但是，我们主的门徒是先接受教导的，而福音的传播则是在此之后。

对于飞行纵队来说，继续前进要比将其召回并在后方重新打开封闭的通信线路容易得多。把已经引发的辩论进行到底，比压制和封闭辩论要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

土耳其帝国目前的工作情况如何？有哪些部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美国委员会在这些地区的工作进行大致分类，我们可以得出三类结论。

1. 监督当地教会。

2. 出版部。

3. 教育部门。

“照顾所有教会”的使徒职责落在了那些驻扎在内地的传教士身上。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亲自访问这些教会，并与当地牧师通信。为了更明确地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在西土耳其传道团的东部，有一座锡瓦斯城，即古代的塞巴斯蒂。从技术上讲，这座城市是传道局的一个“站”，即一名或几名传教士的住所。锡瓦斯曾经是一座比现在重要得多的城市，无论是在商业意义上还是在道德意义上。即使在穆罕默德统治时期，它也曾是一个教育中心，但在目前的管理下，它只是一个遗迹。然而，25,000的人口为常驻传教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即使让他成为当地的牧师和传教士，他也会全力以赴。在许多情况下，采取这种做法就等于放弃了在被称为“外站”的城市和乡村的工作。锡瓦斯的外站分布在南北长约150英里、东西宽约130英里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真正福音派宗教的发展，在令人痛心的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中心的锡瓦斯所付出的努力。那里有大城镇，偶尔会有人去，还有许多较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恩典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它还能继续吗？是否要加以扶持？

或者我们应该对皈依者说，我们鼓励了你们的希望，但我们现在无法支持；我们已经种下了希望，但我们不能留下来浇灌已经萌

发的希望？任何虔诚的灵魂都会本能地回答，绝不放弃这样的开端！因此，传教士必须亲自前往北边的托卡特和尼克萨，东北边的卡拉希萨尔，南边的库尔德库拉克、曼贾卢克、古伦和德伦德。他必须经常、耐心和警惕地前往这些地方。由于当地交通工具落后，每次都要骑马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这是多么浪费时间和精力啊！如果传教士能在每个城镇派驻一名值得信赖的哨兵，并在其中较重要的城镇派驻一名真正的传教士，一名受过教育的牧师，那么传教士将多么乐意放弃漫长而疲惫的旅行，放弃不可避免的风雪、泥泞和不适！如果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传教士会多么乐意通过写作来履行他的主教职责！但是，在这项工作中，在监督最重要的教会方面（更不用说那些刚刚开辟的、还没有教会的领域了），困难在于合格的本地传道人少得可怜！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培养这样的人是可能的，把工作交到他们手中也是可能的，但准备好的人，能被派到已经开辟的禾场的人，却很少。

因此，布道工作的迫切要求是增加受过教育的本地弟兄的工作力量。

工作的第二大部门是出版。在这方面，翻译和出版圣经的最高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提供无限量的《圣经》已经成为印刷厂机械化操作的问题，因为五十年的工作成果已经以电版的形式储存在圣经之家。但问题还有其他方面。除了圣经，还必须为任何民族提供纯文学作品；必须维持定期的印刷，培养独特的品味。这样

的工作需要工人：这样的工作不仅需要从异国他乡获得的广泛而全面的综合能力，而且需要只有当许多人都投入到同一项工作中，当有许多读者和许多作者时才能得到的支持。

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把作为读者和作者的全体神职人员都减去，我们美国的基督教文学和定期报刊会是什么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文学部门将不复存在。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争论是多余的。出版部门的迫切需求是增加受过教育的本地弟兄的工作力量。

现有的各级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神学培训学校，都已竭尽全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所有的工作都在这些学校里进行。教师们充满热情，本地青年每天都在寻求入学机会。

我们意识到，这些青年中有些人非常认真，决心接受教育，哪怕要等很久，要吃很多苦，这激励着我们去努力。有些人在腐败的（东正教）教会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学校，最近在特雷比宗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位富裕的亚美尼亚绅士在圣彼得堡购置了房产，他为在该地建立一所学校捐赠了一大笔钱，但这当然是在古老的亚美尼亚教会的影响下进行的。

一些年轻人寻求进入（天主教）耶稣会学校学习，少数人，极少数人，去了遥远的地方，如巴黎或海德堡。但到目前为止，新教徒在精神文化的高度和价值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但愿我们能为广阔的亚洲大陆上的所有福音派机构提供这样的动力，使它们的特性得到认可，它们的价值得到承认。但愿它们有这样的基础，使人们不再有任何借口去法国寻求（天主教）教育。过去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未来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完成了开创性的工作：《圣经》现在已经发行：人们要求在文学和教育方面取得更全面、更深刻的成就。

我们生活在一个严苛而刻板的诘问时代。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是一理所当然的，而那些被视为社会支柱、公民和宗教生活基石的事实，也必须经过探究的过程。顺着这一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每一个部门都在轮番讨论，并充满了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教育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直觉，但现在却受到了挑战，人们注意到，以前为学校辩护和为所使用的方法辩护的论据中存在许多弱点。从长远来看，这种挑战将证明对教育大有裨益，因为它将在需要改革的地方迫使人们进行改革，它将在批评过于草率的地方促使人们作出冷静的反应。

但是，在一个拥有传统基督教特权的国度里，这种不稳定的辩论状态不应该让人联想到在作为传教士活动领域的土地上也会出现类似的疑虑。因为这两者相差甚远，只有经过仔细而有鉴别力的研究才能进行比较。对于耶鲁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低年级的最佳课程，学生们应该读埃斯库罗斯（Æschylus）还是莫里哀

(Moliere)，可能会有真诚的疑问；但对于乡村学校小学部的课程，所有人都应该学会阅读和拼写，则不可能有合理的疑问。因此，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最好的计划可能是抑制学院的要求，强调福音的另一个方面；同时，新组织的学院可能是亚洲和非洲文明和纯洁的唯一希望。我们相信这是事实——主要是因为在传道方面，福音的未来取决于这些机构。

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一论点具有特殊的力量。这是亚洲基督教学院的黄金机会，因为当地人的思想正处于等待的状态。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季度是在我们中间谨慎行事的时候，也是在东方开展大胆运动的时候：在这里进行准确检验的日子到了，在那里迅速建设的日子也到了。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等国，群众的友好态度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从现在起的一百年后，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在亚历山大-达夫博士的生平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件奇事，可以作为教育问题的例证。在一次恒河洪水泛滥时，许多人躲进了地势较高的一间平房里，当他们挤在一起惊叹于水量时，突然看到一只体型硕大的孟加拉虎在水中迅速游向他们所站的平房。所有的人都惊奇地看着它，它从水里爬上来，看上去非常温顺，蜷缩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吓得浑身发抖。它没有对平房里的任何一个人施暴，因为老虎被这场大洪水彻底吓坏了，它凶猛的本性暂时被抛到了一边。在如此惊恐的情况下射杀一只瑟瑟发抖的可怜动

物似乎是一种暴行，但他们还是射杀了它，而且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只要它变得温暖、干燥和舒适，它就会再次表现出老虎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并没有改变。这可以作为我们论证的寓言。无知和迷信并存，是非常糟糕的组合。迷信无知的力量可以为非作歹，伤害人们的肉体 and 灵魂，是名副其实的猛虎。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亚洲世界目睹了奇异的景象，聆听了令人好奇的传闻。新思想、新影响、新力量的巨大洪流已经开始起作用，老虎在它的生命中被吓倒了一次。它曾经在丛林中搏斗过，但不是与这个敌人。它从老窝里爬出来，出人意料地跑到它的传统敌人中间，躲在他们脚下。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现在，福音派教育有了一种有利条件，在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可能再也不会有了。理由是什么？怎么会有丝毫的疑问呢？形势摆在我们面前，它大声疾呼：杀虎口！在亚洲开办任何一所学校或学院，学生们都已准备就绪：谁能告诉我们一个世纪之后的情况会如何？

要认识到最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意义并非易事。就拿现在提到的事实来说，亚洲青年很容易进入基督教学院。为什么我们说它如此重要呢？把这个问题转过来，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新的印象。让艾资哈尔大学的半打穆罕默德莫拉（教师）来到费城，购买财产在这里开办一所学院，教授穆罕默德教会法和阿尔-加扎利的伦理学。有多少学生会报考这样的学校？一个也没有！莫拉们（穆斯林教师们）不仅会成为这座城市的笑柄，而且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反对他们的舆论是一个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城市中的

传教士可能会成为笑柄，但当地的公众舆论绝非一致反对他们。相反，寻求在外国教师手中接受教育的人却非常多。难道我们不能想象情况并非一定会一直如此吗？难道我们没有理由把现在称为绝佳的宝贵机会吗？这样的机会如果被忽视，我们的工作岂不是要在浅滩和流沙中承受许多年的后果？

没有人会主张突然而剧烈的变革，但这里已经提出了一个永久性政策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有什么方法能比把一百美元用于教育本地传教士更能使世人皈依上帝呢？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让这笔钱在这方面发挥一半的作用吗？

目前，我们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地区，人们正在朝着上述方向作出崇高的努力，即组织和资助大学和基督教神学教育机构。这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当地的教友们表现出了新的热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严重的自我牺牲。

多年前已经有了一个开端，但这是一个不能停留在开端的事业：它必须前进：它必须有得有失：必须不断提供高等教育，否则就会出现明显的调子下降。我们有时会发现，论证过程中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逻辑高潮，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

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此。向任何一个人介绍圣经思想，都不可能不把学习圣殿的大门敞开：而大门敞开之后，结果

会怎样呢？是让那些想进入的人望而却步，还是敞开大门？

最后，我提出两点建议：

1. 大学生活有利于福音的传播。这只是说智力是一种祝福。事实的确如此：但许多人认为，在我们称之为学院的特殊组织中，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报纸上向公众报道的事情明显不相称。一个混乱的案例被完整地报道出来，摆在五百万读者面前，而对同一所学院每天举行的祈祷会的出席情况却只字不提。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美国大学的历史，看看在这些大学里发生的复兴、皈依和灵性的觉醒，然后再比较一下一个居民人数相等的村庄在社会生活中的记录，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优势是在追求知识的一方。如果我们比较两个年轻人，一个在上大学，一个在过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会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生更专注，更有思想，更容易接受福音的热情。这是他年复一年地关注他的导师，不断培养自己的能力的结果。但是，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当福音传开时，这种专注力（在高度发展的状态下可被视为天才）也会影响一个人的灵魂呢？

事实上，即使是来自基督徒家庭的年轻人，也会受到这种影响。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等地，这一论点具有特殊的力量，因为在那里，基督教学校或学院是唯一可能替代虔诚的家庭教育的场所。

在亚洲，基督教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所有祝福都非常缺乏，众多饥渴的灵魂要求制定某种制度，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可悲的不足。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结果呢？适度的大学教育制度？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后在东方开展工作的战略基础吗？

2. 所建议的计划符合东方人的思想。在所有东方国家中，都有一种将教育和宗教工作结合起来的明显趋势。在我们看来，世俗事务和教会事务的区别是如此明显，而在亚洲，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区别却模糊不清。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这种区别似乎根本不存在。所有以任何方式受到穆罕默德影响的人都必须感受到穆罕默德生活观念的结果。对正统穆斯林来说，理论上只有一种启蒙：清真寺内或清真寺外只有一种道德规范。他们中有些人的思想是如此堕落，以至于他们无法像我们习惯上对此类问题做出任何区分。对于大多数人，我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但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事情都被一股潮流所席卷。在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的基督教会中，从僧侣中挑选主教也是一种习惯，因为只有在修道院中才能得到必要的训练。这种情况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其结果是，今天土耳其帝国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是宗教活动的适当载体。

鉴于上述事实，鉴于我们只能暗示的更多事实；鉴于反对的性质，鉴于土耳其帝国对我们工作的欢迎程度，鉴于这只老虎暂时受到

的惊吓，鉴于它现在驯服地躺在它的传统敌人触手可及的地方，美国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但愿所有人都能就责任达成一致！但愿在敌人面前能有一个统一战线！在我们实际状况的限制下，我们有可能集中精力开展这项工作，培养一批合格、自立、积极进取的本土传道人。

难道这里没有机会实践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所说的伟大原则吗？

“如果我们在不朽的思想上下功夫，如果我们向他们灌输原则，灌输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同胞的爱、我们就会在这些石碑上铭刻下永恒的光辉”。

REV. 小亚细亚马索万学院教授爱德华-里格斯（EDWARD RIGGS）
牧师补充道：

一千八百年前，忠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小亚细亚为传播福音和建立基督教会而努力。起初，他们受到冷遇和忽视，但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皈依者聚集在这些耐心、谦卑的教师周围，教会组织起来，温顺地忍受并战胜逼迫，最终，这项工作进展迅速，在三百年内，基督教被公认为流行的宗教，并被国家采纳。没有人

会怀疑这项工作的真实性，圣灵的果实在社会中广泛显现。然而，任何研究过该地区现代历史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高贵的使徒式基督教已所剩无几，甚至在仍被称为基督教的机构中也是如此，令人痛心。基督徒学生羞愧地问道：为什么会如此颓废？难道我们神圣的宗教中没有自我延续的力量吗？它能像人类的一种推测哲学体系或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那样轻易消亡吗？或许可以提出一个答案，将基督教的这种明显失败归咎于穆罕默德的大举入侵，它以可兰经或刀剑的可怕选择横扫一切！对于那些盲目、狂热的虚假信仰的解释者来说，可怕的责任轻如鸿毛，但必须承认的是，这场可怕的入侵与其说是基督教衰落的原因，不如说是基督教衰落的后果。如果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我们所熟知的基督教的样子，那么伊斯兰教（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范围内）的广泛（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保罗和提摩太、波利卡普和格列高利的精神是小亚细亚基督教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主旋律，那么任何反基督教势力都不可能将其击溃。

在这个传教时代，基督徒劳动者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问题——我们现在试图建立或重建的东西是否会再次被新一轮的腐朽和堕落所席卷？东方必须再次派遣传教士去启迪西方的时代是否会很快到来，然后在第二次点燃西方的火炬之后，它是否会再次熄灭，成为插座中的一盏些微闪烁的灯？白昼和黑夜就这样永远在我们的道德世界里互相追逐，既不能带来更明亮的白昼，也不能带来更短暂的黑夜吗？深思熟虑的基督徒的回答是自信的、胜利的否定！

在问题的要素中存在着本质的、根本性的差异，这使我们能够最自信地相信，现在正在退去的黑暗的阴霾将永远不会再用它的浓荫笼罩那些有趣的土地。现代福音派基督教最重要的特征是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打开的《圣经》，而且每个人都受过足够的教育，能够独立地理解上帝的话语。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人们知道并阅读《圣经》，也有一定程度的教育。但这两种特权都仅限于少数人。书籍极为稀少，独立的个人研究对广大信徒来说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个时代打破了中世纪的死亡魔咒，为自由基督教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大陆，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无价之宝——印刷术，它注定要成为文学和教育的得力助手。对人类大众进行彻底的精神约束（抵御罪恶）不仅成为一种可能，而且成为基督教精神的自卫和永恒的力量。代数或语法知识并不能拯救灵魂或重塑生命，但灵性的基督教在通识教育所孕育的智慧的渗透和塑造下，获得了工作和成长的平衡和内在力量，这注定了它能抵御异端和迷信的侵蚀，并以绝对优势征服人类。

因此，任何福传体系，如果不能给予教育以宽松的地位，就必然无法取得每一个福传体系所要达到的永久而崇高的结果。这一真理在教会迄今为止的福传努力中只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而在未来，它应该成为教会政策的指导原则。经验清楚地表明，在直接传福音的同时，绝对有必要推进教育设施。现在，基督教世界的注意力正被吸引到这一点上来，希望永远不要再回到“无知是虔诚之

母”的可怕教义上来。

小亚细亚的福音工作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现在，在她的版图上有许多发光点，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它们的光芒会不断地延伸和倍增，直到旧日的黑暗一丝不剩。在这些冉冉升起的新星中，最年轻、在某些方面最有前途的是马索万的安纳托利亚学院。该镇位于小亚细亚中部偏北，地理位置优越，非常适合作为广大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的影响中心。它的组织结构也是如此，只要上帝旨意中的好日子来临，基督徒有机会在这个陌生而有趣的民族中开展活动，它同样可以为更多的土耳其人服务。该机构现正呼吁基督教进步的朋友们提供其重要工作所需的资金。该地区人民的贫困使他们无法完成这样一个机构的捐赠。他们已经做出了崇高的自我牺牲努力，但还必须得到大洋这边的人们慷慨解囊的补充。

=====

=====

=====

=====

=====

=====

=====

=====

=====

信仰与科学的得失

1881年7月22日在基督教哲学暑期学校发表的演讲。

作者：约翰-巴斯科姆，法学博士、

威斯康星大学校长。

我们发现，谈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很方便；这种语言为我们掩盖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显眼的事实。然而，科学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冲突，除非其中之一或两者都被误解。只要它们都与事实有关，都是事实，它们就必须作为一个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和谐相处。

我们在开始讨论科学给信仰带来的得失时，首先要对伴随着科学的发展而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进步表示最彻底和最感激的认可。科学揭示了上帝国度的一部分。它是自然神学的附属品，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精神视野。关于科学的适宜性和益处的讨论，并不比关于光的适宜性和益处的讨论更多。那么，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中，冲突和损失的机会在哪里呢？

在协调知识的过程中，有两种情况会造成混乱和错误；有两种原因会导致我们谈论知识不同部分之间的冲突。我们将科学和宗教分别与我们对它们的概念相联系。我们对两者都没有绝对的标准。因此，在两者都没有被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种差异的正常结果是在一个或两个方向上修正和扩大我们的知识。与科学相比，这种形式的修正将更多地归于宗教，因为科学是更近期、更深入、更谨慎的探索的结果；而完整的宗教则是在许多黑暗的世纪中以许多晦涩难懂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在科学中，理性的力量更大；在宗教中，历史发展的力量更大。

自由地认识这两种知识来源，并将它们结合起来，对人类生活进行全面而和谐的考察，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一项伟大的工作。科学和宗教作为知识的两个部门，围绕着不同的中心，它们之间需要重建的问题包括：上帝治理世界的方法、世界的自然和超自然因素、上帝的国度赖以发展的条件。随着我们知识的不断丰富，这些问题以及延伸到物质和精神两个思想领域的类似问题，都将在很长时间内得到修正的答案。关于冲突的第一个原因，即科学和宗教的观念都是狭隘和不完善的，我们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就像所有真理部门一样，它们需要通过成长来找到和解。

造成混淆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所使用的词语含义多变，而且我们赋予它们一种含义上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只属于含义狭窄得多的词语。因此，我们给科学赋予了一种专制主义，而这种专制主

义在其主要表述和狭义上确实属于科学，但在与信仰有关的讨论中经常使用的广义口语含义上却根本不属于科学。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为对物质世界的经验知识；把心理学理解为对心灵的经验知识；把宗教理解为对精神生活事实的经验知识；把哲学理解为通过涵盖这三种形式的适当思想来调和这三种形式的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在构成我们生活的这几种事实之间发生冲突的机会相对较少。分歧和破坏性的批评几乎都出现在我们称之为哲学的领域，即位于科学、心理学、宗教背后的超感性领域，在那里，思想在其理性生活中努力追求最高的统一。科学提出了它对宇宙的哲学解决方案；心理学提出了它的解决方案；而宗教则反过来提出了它的解决方案。这些范围广泛的解释分别来自所涉及领域的三分之一，但立即就会相互冲突。现在，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科学在哲学领域提出的这些建议具有与其经验事实领域相同的权威性，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它们对心理学和宗教的公认事实产生破坏性影响。每支进攻的军队都在哲学领域安营扎寨、调兵遣将，然后侵入对手的领地。这种战争是不充分的哲学造成的，这种哲学不能自由地接受实证科学、实证心理学和实证宗教的所有事实，并将它们统一在一个全面的观点中。只有更高更健全的哲学才能克服这一困难，这也是对这种哲学的巨大激励。

不过，科学在这方面也有优势。它的事实比心理学的事实更多，更容易验证；比宗教的事实更直接，更持久；在某种意义上比两者都更明显，也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因此，科学思想获得了一

种简单的假设和不被察觉的自负，这很容易压倒反思能力较弱的头脑。在这种冲突中，心理学需要更仔细地分析和确认其事实，而宗教更是如此，因为宗教的经验是如此多变、如此多样，而且如此广泛地散布于整个历史领域。尽管宗教真理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但它在人们的眼前一闪而过；必须对人类生活进行仔细而有鉴别力的探究，才能找到其终极的、不可否认的要素。正因为如此，实践宗教在将所讨论的事实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往往是对理论上的不信的纠正。

在这最后也是最大的真理调和中，我们目前在哲学上遇到的困难在于，我们面前的三类事实，即物质事实、心灵事实、精神生活事实，并没有它们的鲜明特征和全部力量。一种形式的经验遍布表面，就像油覆盖在水面上一样，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它自己的闪烁和色彩的反映。补救的办法是，在这些部门中提供更广泛和更好的事实；在它们的调和中提供更广泛和更明智的哲学。

为了思路清晰，我们首先介绍了现有冲突的原因及其最终解决办法。现在，我们更直接地谈谈我们现在的目的，即说明信仰的得失。

科学的巨大成就给信仰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文明得到了改善。这些先进的生活条件使道德力量倍增，使道德问题更加坚实和广泛，使人们的思想对精神和准精神的影

响更加普遍和强烈。我们所呼吸的思想氛围比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一种氛围都更加活跃，更具有精神真理的氧气。这一点在我们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的诗人不仅仅热爱大自然，他们热爱大自然是因为他们对大自然有一种探究、分析和精神上的感觉。无论他们能给心灵以最终的解答和安慰的话语有多少，他们都在不断提出生命的深层问题。他们不再像波普那样，沿着老生常谈的道德箴言踟躅不前，仿佛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在熟悉的号角上再吹一回圆号。诚然，我们提出的问题比我们所能回答的要多，但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这是第一步；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社会对这些问题有了极大的觉醒。这种扩大和活跃的生命舞台，对于生命，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以及最终对于上帝要完全占有世界的那种令人印象深刻和强大的生命，都是价值连城的。

第二个收获是我们的法则意识大大增强。一个复杂而影响深远的计划，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看来必然是混乱的。世界秩序的范围和控制它的原则太深奥了，不可能完全显而易见。在上帝的管理下，困难和异议随处可见，除非对第一原理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否则是无法消除的。长期以来，自然神学只是智慧领域的一个拾荒者，在死物或活物中发现了一些似乎表达了神的预旨和监督的好的适应性。现代科学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到处追踪着秩序的一般规律法则，这些规律又延伸出最广泛和最遥远的适应性。计划和关系的观念已经普及。世界上没有死气沉沉的物质，没有简单被动或消极的东西，一切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谐的。从

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无异于上帝的思想打破了其表达的遮蔽，在我们的每一个角落变得可见可闻。科学是上帝智慧的无所不在。光不再是穿透云层的微弱光线。它使云层在它面前分崩离析。这种对绝对无处不在的计划和目的的感觉，对人们的思想具有无穷的价值。本世纪思想的明显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两百年来，我们一直将令人陶醉的知识挂在嘴边。我们正等待着同样的智慧和恩典的馈赠来使我们清醒。

从这种普遍规律法则的意识中，我们立刻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保留权力的感觉。法则在哪里，我们就能在哪里遵循和利用它的规定。世界因其法则而掌握在我们手中，它对我们不再是死的，就像它对无限理性不再是死的一样。它处处涌动着理性的生命，受制于理性，而我们也分享着理性。我们发明的成功在精神上令我们震惊。我们对着木头耳朵说话，几英里外，闷闷的声音就会传到人类的耳朵里。难道这个框架、这片土壤和岩石，就像人的躯体对心灵的触碰一样，可以被合适的机构渗透吗？

力量，普遍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伴随着这个普遍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计划，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上帝的同工；不仅仅是当我们播种我们的田地，把收获交托给他照看的时候，而且当我们建造我们的商店，行走我们的道路，制定我们的法律，为我们的后代奠定物质、智力和精神生活的基础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处处与我们同在，以我们的智慧和美德来扩展和繁荣

我们的劳动。

我现在几乎不需要说，在这一制度下，一个始终在成长的观念就是责任，而责任是精神生活的萌芽。精神生活建立在力量感之上，而力量就存在于知识的增长之中。因此，我们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仅像是活生生的树那样对土壤、阳光和雨露占有，而且是我们对我们头顶上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全面地占有。我们所爱的天父，我们在他里面生活、运动和存在；我们的天父无所不在；这才是真正的新耶路撒冷。

我们被这些在进步中逐步展开的普遍规律事实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世界不仅能够被救赎，而且正在被救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推动这项工作？有一种思想一直困扰着宗教，这种思想的形象基础是真理的一种流逝形式，即世界是魔鬼的盟友，人应该从世界中得到救赎，而不是与世界一起得到救赎。在科学的事实面前，这种思想慢慢地转变为其真正的表达方式。世界上伟大的物质和道德运动被揭示了出来，我们在其中的角色也被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从天而降的征服者的情况下，基督将在地球上统治，其丰盛程度是那些最早预言到这一事实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每天都在为有条不紊的救赎工作，为现在和未来的无限发展而努力。

宗教中另一种被扭曲的情绪是，神的崇高与人的贬低成正比，两

者之间存在某种对立。这种印象是罪导致的早期幻觉之一，在海市蜃楼中具有重要意义。当人将生命和盼望的真流汇入神圣的灵中时，他就会明白，在某种非常完整和恰当的意义上，这些都是上帝直接赐予的礼物，而在他拥有能力的程度上，他就是上帝的形象，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能够进入他（上帝）的尊荣之中。狂热的友谊取代了恐惧的跪拜，而且这并不失谦卑，因为他不正是被搂抱在无边无际的力量之海中，他不正是有意识地来到真正伟大和崇高的覆盖之下吗？

这些更高的精神境界作为科学的成果尚未完全实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常常陷入与之截然相反的境界。这是精神建筑和所有建筑的共同事实。一堵墙可能会被筑起，但它却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两边也是破破烂烂的。我们必须等待，直到作品按比例成长，直到每一个表面都被处理过，在一个完成的整体中面对面。也许到那时，这些最粗糙的部分就会呈现出艺术的最佳效果。在我们现在只有愚蠢的自以为是的观点的地方，我们最终可能会得到神圣思想最完美的反映。

但在这里，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更明显的事实，即科学给信仰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伤害，我们习惯的道路被建筑材料阻塞，我们的脚被那些碎片绊倒。这些思想的幻觉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出来的，它们部分归咎于掌握世界科学的眩晕的头脑，部分归咎于掌握世界宗教的恐惧的头脑。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科

学所提供的固定不变的法则概念是如何与宗教所提供的（上帝）自由意志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以及两者是如何像凝聚在一起的水滴一样围绕着一个中心。在这种结合中，宗教观念很可能成为私生子，并失去其地位。上帝的固定意志，上帝的选择，当它沉淀为一种自然法则时，就会作为（自由）意志完全消失。一直徘徊在精神世界的“半物理概念”为科学的突然入侵铺平了道路。

但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的真正秘密，是人类的思想倾向于极端和无补偿的运动，它通过交替的过度（钟摆效应）而有节奏地前进。人的任何生产力或原则，都要在所有相关的错误中耗尽自己的力量之后才会停止那种错误。今天，有一种思想统治着知识界；这就是狭义的物理定律下的定律。尽管物理世界不过是宇宙的一半，而且是较低的一半，但物理探究的方法及其观念却占了上风。

这场有利于一种观念的世界革命，以及它对我们的痛苦统治，就像世俗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头等大事。虽然它的收益是巨大的，但它的弊端也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最终会消耗在信仰上。这场革命是一场有利于物质而非心灵的革命，物质掌握并决定着世界的生产力。斯宾塞或任何哲学家都拒绝表达物质或心灵作为最终存在的意见，但这并不重要，心灵的法则与物质世界的法则具有相同的必然性和固定性；科学的目标无疑是用物质和运动来解释智力和道德世界的全部事实。规律被普遍

化，必然性被与规律相联系。因此，那种只属于物理事实的固定性和宿命性，就像低地的薄雾升起并弥漫在山丘上一样，悄悄地笼罩了所有的事实。物理世界的巨大延伸，它在人的思想出现之前的不可测量的先验，成为思想和想象的令人印象深刻和压抑的条件，——这些结果的末端应该比产生它们的事物有任何其他或更高的规律，——这种想法似乎是荒谬的。是的，（根据“科学”），物质和运动自古有之，而人类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社会行为，都必须转化为这些表现形式，然后才能看到其真正的起源和真正的价值。因此，我们有了一种宇宙哲学，一种自然世界的哲学，人只是出现在这出大戏的一幕中，而在这一幕中，与其说是完成了剧情，不如说是剧情的简单延续。

这就是新哲学、经验哲学、宇宙哲学在与信仰的关系中造成的第一个损失。在物质与人之间，在所涉及的规律的基本特征方面，不再有任何区别。（根据科学），生命的法则、思想的法则、行为的法则、社会的法则，都是以物理法则为基础的，都渗透着这些基本的动力。智慧、思想、自由、责任，都变成了土壤的最新产物。如果不是人们对这种宿命论式的致命蜕变一知半解，这种蜕变会比现在更令人震惊。旧哲学的语言被保留了下来，并以一种闪烁的方式带着先前信念的印象。欲望、思想、意志、选择都被命名为“我”，并被认为是“我”的自体，而这种（新）哲学的用词却连这些概念的影子都没有。

尽管斯宾塞表面上非常清晰，但我敢断言，在我们的语言中，很少有比他的哲学著作更晦涩难懂、更容易误导人的了。如果它的结论能够摆脱语言的幻觉，能够用严格的物质和运动的术语大胆而直截了当地表述出来，那么这些结论就会立刻被摒弃。经验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在巧妙地发挥想象力，通过物理图像来解释精神事物，但却没有涵盖所涉及的事实的实质，也没有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人们所认为的宇宙哲学，其实是一种“物理哲学”。人们所认为的自然世界哲学，不过是将物理关系的影子投射到个人的精神观念的背景上，并与之无限混淆。其结果是，心灵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和遮蔽，尽管我们可能不会发现它们已经遭受了全蚀。

信仰的第一种损失会带来第二种损失。如果人的理性力量减弱，那么宇宙的理性力量也会相应减弱。如果人是土壤的产物，如果人的精神活动可以用一个物理公式来表达，而这个公式的一边只剩下已知的物质和运动，那么无限理性（上帝）就会受到与其类型有限理性（人）相同的待遇。宇宙的终极公式是可以物质和运动来表达的，而人格化的力量对这些观念所能做的一切，对神性的存在也能做到，仅此而已。没有什么比这种人格化的力量所表达的人心中潜在的人格、精神因素的力量更令人惊讶的了。当一种哲学消除了信仰的所有理性基础，深入到物理事实的基石，触及到宇宙中的终极元素、散落在各处的建筑木石时，为了安慰

自己和它的弟子们，它就会释放出这些人格化的力量、 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时候，在这些理性的灰烬中，已经出现了神灵的朦胧倩影，再次唤起了人们的敬畏，唤起了人们的信仰。人们的精神本性在沉沦时受到了多大的伤害，他们似乎就会在它开始回升时多高兴地发挥它的浮力。很多宇宙哲学都是以睿智、嘲讽、玩世不恭的微笑开始，以闭目和颂歌结束。我们不想批评这首国歌，我们只想说，它是圣殿中的油被耗尽后，插座中的最后一束光。在宇宙哲学中，一致性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完全一致，它很快就会自我毁灭。

随着对宇宙中普遍存在的理性的清晰认识的丧失，不朽的信念也就理所当然地开始消逝。如果至高无上的理性（上帝）并不包含有意识的人格（位格）（即否认上帝是能听、能看、能作为、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而只是在物质中找到模糊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期望，有限的理性（人）在有利的物质条件下获得片刻的意识，当这些条件被一扫而空时，它还能保持这种意识（即否认人灵魂的不朽）。我们对不朽的应许源于我们的理性与至高理性的相似，源于我们的理性与至高理性的契合，而当这些条件被简化为物理规律的协调时，如果我们想就未来提出任何问题，就必须回到物理世界，而这个世界在坟墓的迅速腐朽中做出了回答。

在这里，这种哲学所揭示的最显著的事实又是，它在从土壤中刨

出所有精神根源时发现了巨大的困难。个人的不朽刚一丧失，一种种族的不朽就被提出来取而代之。我们不会活着，但其他人会继续活着，让我们赞美他们的生命。这是一种高尚的冲动，是我们残缺不全的精神本性的又一次零星发芽；但它不能取代整株植物。凡人的延续不是不朽，而是无尽的死亡。这就是“死亡”这个词，它被拉长并强调到最后一个字母。无论我们在改善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方面多么成功，这种改善都不会带来救赎。我们只是在为弥诺陶洛斯挑选最美丽的青年。我们每年都在让生与死的对比变得更加可怕。因为生命更值得觊觎，所以从我们身上夺走生命的速度并不慢。不，种族的可塑性并不是对（个人）死亡的真正补救。乔治-艾略特真正发现的，她真正珍视的，是包裹在自己精神中的人类之爱。唉！一张承载着如此才华的餐巾竟藏于尘世。

因此，弗雷德里克-哈里森以先知的热情宣扬的人性的综合不过是一种事后的想法。它是在第一条诫命（“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你的神”）已经消亡的情况下挽救的第二条诫命（“你们要爱人如己”）。这种手段就像是灰烬，试图让火花再次飞向天堂。当人们已经失去了做一件好事的直接动机时，再去敦促它（做好事）是一种令人气馁的努力。约翰-莫利对真正精神态度的总结令人钦佩。在谈到伯克时，他说：“我们只能希望，岁月带给他的，正是我们所有人在与自己和与环境的长期斗争结束时所热切祈求找到的东西——对幸福的向往、时间让一切变得明朗

的沉着精神、不叛逆的脾气以及对人类不泯灭的希望”。

但是，只有当我们充分感受到精神生命的力量，感受到我们体内的生命对我们周围宇宙中更高层次的生命做出回应时，这样的结果才能实现。

物理科学背后的哲学试图在过于狭窄的地基上建立一个精神王国，而这种地基和材料又过于粗糙和不坚实，难以承受它的劳动。因此，它导致了精神生活概念的不断贬低。怎样才能消除这一弊端呢？我们认为是一种更广泛、更健全的哲学，一种不仅涵盖物质世界的事实，而且涵盖心灵和宗教事实的哲学。这种哲学的障碍，除了夸大的科学情绪之外，还有一种虚假的宗教情绪，它既不诉诸理性，也不愿意接受理性的决定。人们不信任理性，好像它不是上帝的主要恩赐，好像它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结盟，与信仰对立，随时准备浪费启示的果实。眼睛之于光明，理性之于真理。如果我们真的能指控任何体系不合理，那么该体系就必须让步；如果我们能肯定任何陈述是合理的，那么该陈述就必须在我们的思想中站稳脚跟。我们有两套天赋，一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理解力，二是要理解的事物——上帝给这些能力的这样或那样的启示。

（理解）能力是一个最基本的天赋。如果宗教贬低这些力量，或剥夺它们的任何作用，就会危及所有的健康成长。

但虔诚的人会说，这一论断是在忽视圣灵的作用时作出的。在这

里，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理性与信仰之间、上帝在我们体内的行动与他在我们之外的行动之间出现了一种模糊的对立。科学应该帮助我们纠正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这一点上的冲突倾向。我们绝不能失去超自然，但也不应把它与自然对立起来，或用它取代自然。正是宗教中这种盲目追求超自然的倾向为科学的攻击提供了一个弱点。当人的思想最活跃、最公正的时候，圣灵就会出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圣灵的职责是武断地凌驾于理性之上，就像它的职责是遮蔽眼睛或关闭耳朵一样。有谁敢说，真理之灵（圣灵）在什么程度上存在，真理本身就不会被看到和理解？请问，除了最神圣的洞察力之外，对属灵真理的深刻理解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洞察力不是要通过最彻底和最谨慎的努力才能达到和保持的吗？坚持谦卑是正确的，不是因为谦卑会使我们的思想变得谦卑，而是因为谦卑是一种智慧，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所有的原生能力、所有的勤奋探索、所有的指导方法和最纯洁的精神，作为健全哲学的条件，这种哲学将广泛地揭示上帝的道路，这些道路像光束一样照耀着天堂，而不是在黑暗中摸索。

为了确保这种哲学，我们需要一种清晰、谨慎、大胆的态度。在它们自己的基础上，根据它们自己的经验形式，对心灵的事实和宗教的事实作出清晰、谨慎、大胆的陈述，并将其视为至少与任何事实一样朴素、原始、值得信仰。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哲学在其解释中破坏了心灵领域的最初经验事实，所以这个领域似乎随时都会像沉没的岛屿一样被淹没在遗忘之水的淹没之

下。没有什么比心灵的思考更简单明了，心灵的思考就是对真理法则的服从，这种服从包括对真理的清晰感知和对真理的自由追随。忘掉这些首要原则，让这种运动成为必然的物理事实，思想本身就会消失，至少这种系统化的退化哲学也会随之沉沦。世界充满了生命事实、智力事实、道德事实和宗教事实，而自然宇宙哲学只能把这些事实解释为幻觉。但它们并不是幻觉。如果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任何一部分应该被抛弃——（没有任何一部分应该被抛弃）——那就是我们身体经验中的酸甜苦辣、冷热硬软、静止喧闹、红红绿绿，它们既不存在于这里，也不存在于那里，既不存在于事物之中，也不存在于器官之中，也不存在于心灵之中，而是由所有这些维持着的一组可变化的印象，就像光线在运动中的溪流表面上跳舞一样。回到最初的事实，即我们所想、所爱、所计划的经验事实；让这些事实带着它们在对它们的任何理性理解中所包含的东西，从那时起，整个物理概念的入侵大军就被击溃了，只能再次在它自己的干旱平原上搭帐篷。

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达到自然和超自然的境界，并看到一个境界是多么稳固、多么安静地凌驾于另一个境界之上，就像天凌驾于地一样。这两个词相互阐释。我们在理解或使用这两个词时，如果失去了其中一个，就会失去另一个。自然包括所有其本质被定义在固定力量和固定法则之下的事物；所有除了在其准备好的沟槽中滑行、顺从其已有的属性和能量之外一动不动的事物。

自然的一种类型，它是一台已经在施加给它的经过测量的力的作用下发生了运转的机器。那么，这个广阔的物理世界、自然世界本身能做什么呢？它能完成自己的回路，仅此而已。它不能理解自己，除非“理解”是它自己的一个轮子的转动；它不能利用自己；它不能指挥自己。它只是一个复杂运动的事实，但却是一个死寂的事实。

我们给自然带来了超自然。我们所说的超自然，指的是所有的力量，它们的规律给出了行动的界限，但没有给出行动的路线，它们的发挥包含着可变的适应性，一种自发的冲动使自己积极地适应紧急情况。纯粹的思想就是这种类型，是一种从自身内部向真理推进逻辑过程的思想。如此理解的超自然，为了使它能做任何事，从自身的运动中产生任何永久的事实，必须与自然联系起来。它能立即理解、引导、塑造和利用自然。二者相互关联，具有即时而完整的意义。自然本身是稳固的，只是为了让超自然能够抓住它、利用它、使用它，并通过它来记录自己。另一方面，超自然本身具有自由，这是一切思想、使用和力量的基本条件。在自然与超自然两者之间，构建了理性的宇宙。一切固定的都是有目的的固定，一切灵活的都是有目的的灵活。知识在发展，使用在发展，行为在发展，性格在发展，但它们都不是确定的，也都不是易逝的。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所发现的道德宇宙。

现在，从更狭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到《启示（圣经）》

所扮演的角色。眼睛的净化达到了预言性视觉的地步，意志发出超越身体神经的指令，并在有形事物中以神奇的方式发挥作用，就好像这些有形事物也被组织成顺从的、有生命力的联系一样，它们毕竟与世界中的超自然事物完全一致，而超自然事物本身就像大气层一样，无处不在自然事物之上和周围。奇迹不过是对自然的一种揭示。

超自然超越其普通界限的显露。它告诉我们，这些限制只是秩序的暂时条件，在新的紧急情况下可以收缩或扩大。氧化作用可能缓慢进行，没有热量和光线；也可能突然爆发，产生强烈的热量和耀眼的光线。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基础是自然；超自然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启示不过是镀金的星星、十字架和球体，在这里和那里为塔楼和炮塔加冕。科学正在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不是让我们失去超自然，而是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超自然和自然。宗教的最大错误在于它将两者割裂开来，并轻而易举地以一种方式取代另一种。宗教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就源于此。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说过，当需要在正义和宗教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时，神职人员往往表现出对道德的漠不关心。原因很简单。他们把两者对立起来，而这两者是不应该对立的。如果超自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进入自然，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自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向超自然靠拢，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作用。自然和超自然就像

人的身体和精神一样，是一种经验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应该共同对待，而不会失去任何一方。

我们正是向着这一综合体迈进，而不应是在单纯的肉体疗法和肉体训练的庸医下苦苦挣扎。

=====

=====

=====

=====

=====

=====

=====

=====

=====

=====

观点和评论。

基督教思想界。

在晚期哲学暑期班上，有人建议成立读书圈，以创建并提高人们对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培养的研究部门的兴趣。研究所的每一

位成员和《基督教思想》的每一位订户都可以邀请几位朋友，无论男女，每周或每月聚会一次，不需要太多正式的组织，每次聚会都可以阅读和讨论《基督教思想》上发表的一些论文，论文由公司领导选定。在纽约，研究所的会议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晚上举行，因此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人很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来到这里。我们诚挚地邀请陌生人参加这些会议，会议在陌生人教堂的客厅举行，地址是温斯洛普广场 4 号，靠近第八大街，距离纽约酒店一个街区。我们不确定是否还能在城市里建立其他的聚会圈；然而，那些住在城市远郊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这样做是可行的。在学校和学院，在遥远的城市和乡村，由一位实干家提出的计划似乎非常可行。已经装订成册的三卷《基督教思想》以及本卷提供了一份论文汇编，麦克克莱肯副校长在就任纽约大学哲学教授的就职演说中说：“我在这附近遇到了基督教哲学研究所，该研究所由大学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主持。它每年举办的讲座和杂志本身几乎就是整个国家的哲学研究生院”。

当然，我们认为每篇文章都值得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选出两门课程，每门课程由 12 篇论文组成，这两门课程将同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娱乐性。一位朋友建议如下。1. 达尔文、爱默生和《圣经》，作者是布鲁克林的杰西-B-托马斯博士；2. 美，作者是哈佛大学的皮博迪教授；3. 圣灵默示的主要理论，作者是辛辛那提的埃雷特博士；4. 杰出的不信教者的屈服，作者是范德堡大学的蒂勒特院长；5. 我自由了吗？ 作者是弗吉尼亚大学的诺

亚-K-戴维斯教授；6. 伟大的信徒，作者是新泽西州纽瓦克的查尔斯-S-斯托克顿医学博士；7. 《与进化论者共话半小时》，医学博士阿布拉姆-科尔斯（Abram Coles）著、8. 鲍登学院海德校长的《伦理学与宗教》；9. 麦克克莱肯副校长的《康德与洛茨：1785-1885》；10. 西奥多-芒格博士的《音乐作为上帝和基督教的启示》；11. 华盛顿-格拉德登博士的《艺术与道德的关系》；12. 现代科学之光中作为救世主的耶稣基督。当然，这是一份非常诱人的清单。我们在清单上标出了另一个由莱曼-阿博特博士、波特校长、巴斯科姆校长、E-F-伯尔博士、已故的马丁教授、W-H-普拉特牧师、普林斯顿大学的帕顿教授、奥本大学的韦尔奇教授、爱德华-J-汉密尔顿教授、密歇根州的哈里斯主教牧师、弗吉尼亚州的乔治-D-阿姆斯特朗博士和拉法叶学院的巴拉德教授等人撰写的十二卷系列丛书。除了这两套丛书外，我们还标注了另外十二套丛书，我们将对它们的卓越表现表示认可；这样，这份名单就不会太长了。除了装订成册的书卷外，我们还列出了本卷的书目，我们认为这些书目是前人所没有超越过的。现在，如果朋友们愿意尝试组建和开展基督教思想交流会，我们将很乐意尽我们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如果有任何关于这项有益工作的实践报告，尤其是关于任何论文的讨论报告，我们将不胜感激。

哲学阅读课程。

有人曾多次向我们提出建议，希望我们为那些从事实际工作，但

又希望利用部分时间学习哲学知识的人们提供一门学习课程。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咨询，并听取了几位最杰出的哲学教师和哲学著作作者的意见，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学习课程，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

此外，我们还决定，将不时给参加该课程学习的人写信，答复他们的询问，以便在确实需要的情况下，使哲学函授学校成为研究所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之一。回复这些信件的工作将由一位杰出的哲学教授负责，他的名字将是全面性的保证。

此外，还将向第一部分的合格者颁发合格证书，向第二部分结束时能通过令人满意的考试的人颁发更显著的证书。

关于整个计划、学习课程、考试方式、奖励等的完整说明，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并附上 50 美分，即可寄到纽约温斯洛普广场 4 号秘书查尔斯-M-戴维斯先生的地址。这一公告至少可以表明，是否有足够的需求来扩大和延续这项事业。

研究所诚邀各界人士和学生就这一主题进行交流并提出建议。研究所官员的愿望是使这一新部门真正发挥作用，表明研究所并非只为思想高深的隐士和学生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激发他们的愿望，并从他们那里了解有能力的思想家应该沿着什么思路进行思考。当今的哲学必须走出门廊和学院，与基

督一起“行善”。

作者：W. Cahall, M. D., Philadelphia.

恩培多克勒是希腊高尚哲学家中最引人注目、最具画意的人物之一，他是西西里岛阿格里根图姆人，大约在公元前 490 年至 430 年间在那里繁衍生息。

尽管他的许多生平细节都被不确定性所笼罩，但仍有许多值得信赖的细节足以使他成为最杰出的人物。他出身名门望族，自然参与公共事务，但他并不只是作为政治家而广为人知，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物理学家、医生、预言家和改革家。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提倡自由制度，反对暴君的侵犯；作为诗人，他创作了一些宏伟但晦涩难懂的六行诗，令卢克莱修非常高兴；作为物理学家和医生，他使塞利尼乌斯周围的沼泽变得肥沃健康，设计了一种方法来缓解给阿格里根特姆的收成造成严重破坏的狂风，据说他还让一位长期处于濒临死亡状态的妇女起死回生。他的许多行为和预言现在都很容易解释，但他似乎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超自然力量的印象。

他似乎助长了人们对其神性的信仰，因为他的习惯是身着紫色长

袍，腰系金带，脚穿铜制凉鞋，长发用德尔斐花环束起，身后跟着一队奴隶。

关于他的死，有一种传说告诉我们，恩培多克勒在为自己举行了一场盛宴之后，把自己扔进了埃特纳火山口，希望人们永远不会发现他的遗骸，此后人们会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但火山又喷出了他的铜鞋，从而使他的计划落空了。

现在，作者特别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的哲学学说，因为这些学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未来的发现具有无与伦比的预见性和预感性的例子。

他的学说与他同时代和前辈们的学说完全不同，自然法则、研究手段和方法现在已成为人们的共同财产，而当时人们却几乎想都不敢想，这使得他的推论即使正确，也更加令人震惊。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两千年前这位奇特的哲学家已经预示和预见现代科学的许多最令人骄傲的成就。

首先。恩培多克勒与他那个时代的观念的第一个重要分歧是，他教导人们说，万物不是由一种原始形式的物质转化而来，而是由各种永久性元素组合而成；这些元素在爱与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不断组合和分离，这两种力量与物理上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是相同的。这就是化学的最初萌芽，因为在自然界的元素结构被证明

之前，化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化学结合和分解的所有规律都取决于原子固有的相互吸引和排斥力。正如布兰德所定义的那样：“化学教给我们基本物质的特性及其相互结合；化学探究影响它们结合的规律和支配它们结合的力量；化学研究它们结合的比例，以及结合后分离它们的方式”。

第二。詹姆斯-萨利（James Sully）（《进化论》，《大英百科全书》）指出，“他（恩培多克勒）关于原始紧密物质（sphorus）的假设，其中爱（吸引力）是至高无上的，与现代宇宙进化学说通常提出的原始云雾物质的概念有一些奇特的相似点和对比”。

第三。他再次宣称，没有新的事物或力量产生，也不可能产生，唯一可能发生的变化是元素与元素并置的变化，而新的属性只是先前属性的总和。牛顿只是模糊地知道力的守恒理论，但在这里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至少是部分地预见到了。

克拉克-麦克斯韦教授是这样定义力守恒原理的：“任何物体或物体系统的总能量都是一个既不会因这些物体的任何相互影响而增加也不会因这些物体的任何相互影响而减少的量，尽管它可以转化为能量所具有的任何一种形式。（“能量”，《大英百科全书》。）

廷德尔教授说：“从广义上讲，力守恒原理断言，宇宙中力的数量与物质的数量一样不可改变；创造力和消灭力都是不可能的”。

（《科学碎片》，第 21 页）。

第四。恩培多克勒所讲的进化论，今天最先进的唯物主义者也应该感到满意。他从爱（吸引力）至高无上的原始物质开始，描述了爱（吸引力）和恨（排斥力）在对立中变得更加活跃的后续阶段，并通过元素的连续聚合和分离，形成了地球和海洋、太阳和月亮以及大气层。

在这里，他也没有对元素的力量加以限制，而是大胆地通过元素的组合和再组合，一直追溯到下面一点。

第五，生命的自发生成。生命的自发生成，这是恩培多克勒坚定不移的观点。现代唯物主义进化论者赞同恩培多克勒关于进化和生命自发起源的观点，这一点从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引文中不难看出。

“为了解释太阳系的起源，斯宾塞先生在我们星球的形成以及有机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发展中使用了星云假说”。斯宾塞先生试图说明，进化的原因涉及物质、力和运动的终极规律，其中他非常重视现代的能量守恒学说”。斯宾塞先生由此接近了最早的宇宙进化理论，他告诉我们（《第一原理》，第 482 页），在一个巨大的时期内，吸引力战胜了排斥力，而在另一个巨大的时期内，吸引力与排斥力的关系则相反。与之相反的巨大时期交替出现”。（“

进化论”，《大英百科全书》）。

以下引文摘自廷德尔教授的著作：“思想也没有在此停滞，而是穿过熔融的世界，游荡到那片云雾缭绕的朦胧之中，哲学家们把它视为一切物质的近源，这是有道理的。我试着观察这团宇宙之云，它本身就预示着后来发生的一切；我试着把它想象成那些力量的所在地，这些力量的作用将产生太阳系和恒星系，以及它们所涉及的一切。难道现在奔向它的思想只是回到了它的原始家园？”

（《科学片段》，第 123 页）“动物的物质是无机物。动物组织中没有任何物质不是来自岩石、水和空气。那么，有机物的力量在种类上与无机物的力量不同吗？当今的哲学否定了这个问题。每个动物体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还原成纯粹的无机物。这种还原过程的完美逆转将使我们从无机物进入有机物，而这种逆转至少是可以想象的。事实上，现代科学的趋势就是要打破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的隔阂，将两者还原为同类但组合复杂程度不同的力的作用”（同上，第 414 页）。“那么，假设人体的分子不是取代其他分子，从而更新先前存在的形式，而是从自然界中收集到第一手资料，并按照它们在人体中所占据的相同相对位置组合在一起；它们具有相同的作用力和作用力的分布，相同的运动和运动的分布——那么这种有组织的分子集合体会作为一个有知觉、有思想的生命体出现在我们面前吗？似乎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它不会。或者，假设有一颗行星从太阳上脱离出来，围绕着自己的地轴旋转，并以与我们地球相等的距离绕着太阳旋转，那么它的冷却后果之

一会是有机体的发展吗？我倾向于肯定”（同上，第 415 页）。

第六。在跨越了那道令许多科学家望而却步的鸿沟之后，——通过解释生命是盲目偶然的产物，通过偶然的元素漩涡，科学家们跨越了无机和有机之间的鸿沟，——从原始生物体进化出植物和动物，并通过动物进化出人类，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他（唯物主义科学家）认为生命进化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

第七种。自然选择。因此，我们发现，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对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著名的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不过是二十世纪前被埃特纳火山吞没的那个神秘人（恩培多克勒）的回声。

他以我们普通人只能望而却步和惊叹不已的天才一瞥，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统一性，即植物、动物和人都是由相同的元素组成，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并通过一连串本身往往是粗糙和不科学的推理，阐明了斯宾塞如此恰当地定义为“适者生存”的原则。

他（恩培多克勒）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认为——感觉、意识和思维能力取决于身体的构造，因此一个人的道德观念会随着他胃中食物的性质而变化，而人毕竟只是“火的创造物和太阳的孩子”。

现代作家很容易引用类似的学说。“因此，根据类比我可以推断，

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所有有机生物可能都是从某种原始形态演化而来的，而且，当这个星球按照固定的万有引力定律循环往复地运转时，从如此简单的起点出发，无穷无尽的最美丽、最奇妙的形态已经并正在演化（第十四章）。尽管选择的过程可能是缓慢的，如果孱弱的人类能够通过他的人工选择的力量做很多事情，我看不到变化的数量、所有有机物之间的共同适应的美丽和无限的复杂性有任何限制，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大自然的选择力量可能会影响到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第四章）。但是，如果确实出现了对任何有机物有用的变异，那么，具有这种特征的个体肯定最有可能在生命的斗争中得到保存；而且，由于遗传的强大原理，它们往往会产生具有类似特征的后代。为了简洁起见，我把这种保存原则称为自然选择”（第五章）。——（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

“这个假说（自然选择）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剥去它的外衣，你就会面对这样一个概念：不仅仅是动物或动物生命的更卑劣的形式，不仅仅是马和狮子的更高贵的形式，不仅仅是人体的精致和奇妙的机制，而且人类的心灵本身——情感、智力、意志和它们的所有现象——都曾经潜伏在火热的云层中”。（廷德尔教授在《科学片段》中）

现代思想家对恩培多克勒学说的概括包括：建立在化学基础上的自然元素结构的概念；现代星云假说的概念；对能量守恒理论所

依据的原则的明确声明；他对自然统一性的教导；对最新的唯物主义进化论的惊人接近；对生命自发产生的信念；以及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进行的。

其中一些学说已被各种观点的科学家所接受，而其他学说则只被超唯物主义阶级所坚持。

本短文的目的是不是要捍卫或攻击这些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条，因为这可以明智地委托给其他更聪明的人，而只是要记录这样一个事实，即本世纪对哲学的许多最重要的贡献，其颁布和阐述使一些名字几乎不朽，都是通过那个紫色长袍和头戴花环的人表达出来的，在亚里士多德出现在雅典的一个世纪之前，他的铁鞋在阿格里根特姆的街道上的石头上叮当作响。

=====
=====
=====
=====
=====
=====
=====
=====
=====
=====

基督教思想。

道德和宗教思想的起源，以及关于现代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

[1886年8月19日在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发表的演讲。]

作者：REV. W. D. WILSON 牧师，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

我们在此相聚是为了一个严肃的宗教目的。它不亚于基督教思想的展示，也是对我们所宣称的基督教思想基础的平反，特别是对当今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我的不幸在于，我的主题无法引起大众的兴趣。他们不学习哲学。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乐于利用那些自称哲学家的人的假设和言论，为自己的趣味、兴趣、倾向——或许甚至是他们的情欲和粗俗的感情——所倾向的道路辩护。当然，我们不能希望通过在这里对哲学问题的讨论来接触这些人。但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阻止这些问题流淌的水流；尽管这个问题不可能流行起来或引起广泛的兴趣，但必须有人来处理它；也许由一个不能令人满意地做任何其他事情的人来处理它，效果会更好。

在这一讨论中，我们使用的语言来自常见的知识理论，它将知识

视为一个集体整体，由事物的观念构成，就像宇宙是由事物本身构成的整体一样。

这些观念被视为存在于头脑中，不仅代表了自然界中存在的所有物体，只要我们已经认识到它们或想到它们，而且还代表了笛卡尔无穷无尽的幻想——“虚构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占据了我们的思想”。

现在，正如物质宇宙中的物体——数不胜数、无穷无尽——是由极少数元素组成的，同样，那些被认为存在于头脑中的事物的观念，实际上也是由相对较少的元素组成的。因此，“白度”就是这样一种元素；“硬度”是另一种元素。但是，“白”和“硬”是我们周围无数物体的属性，就像氧气、铁、硫和氢作为化学元素一样，是许多物体的共同属性。同样，经过适当的修改，所有基本概念都可以这样说；而事物的复杂概念都是由这些基本概念组成的。

人类知识的起源、性质和范围，自人类开始探索以来，一直是人们探究和感兴趣的课题。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知识论”，认为知识是由造物主在人类降生到这个世界之前就放在头脑中的观念组成的。1641年，笛卡尔开启了猜测哲学的新时代。他认为，我们的部分观念是通过对外部世界中的物体的认知而产生的。1690年，洛克发表了《人类理解论》，他在其中彻底否定了先天观念的真实性，并认为观念的所有要素或“物质”都是通

过经验或实际认知产生的；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对周围物质对象的感性认识产生的；另一部分是通过意识产生的，或者正如他所说的，“对我们自己内心思想活动的感知”。他把我们对“黄、白、热、冷、硬、苦、甜以及所有其他我们称之为感官品质的东西”的观念归于前者。而后一个来源则是我们对“感知、思考、怀疑、相信、知道、愿意以及我们心灵的所有不同行为”的观念。（论文 B. 二，第一章，第 2-6 节）。这里显然有两类或两类观念——一类代表物质对象，另一类代表心灵和精神对象。但是，整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没有基本观念，也不能得到任何观念，除非我们实际认识了实质性的对象或现实，无论是心灵还是身体，这些观念实际代表了它们的属性。

洛克本人虽然非常自信地主张他的理论，但似乎并没有完全看到和理解其范围，他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一样，忽略了、或者说忽视了充分利用意识从心灵本身衍生出来的那类观念。

但我认为洛克是对的；我还认为，如果他看到了它的全部范围和他的基本原则的所有后果，并利用了他的事业所要求的，或至少是它所提供的机会，那么，从那时起，现代欧洲的猜测哲学过程就会与现在完全不同。我们就不会有伯克利的“唯心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或现代科学家的“不可知论”。

在德国，哲学也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康德会认为没有理由否

认我们对“事物本身”的认识。费希特不会有理由怀疑事物的实质存在，世界也不会出现黑格尔令人烦恼的悖论或叔本华令人作呕的悲观主义。

因此，不可知论者像洛克本人一样，忽视、或未能认识和使用洛克第二类的基本思想。他们有时忽视，有时接受洛克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对每一类思想的所有认识都是通过认知获得的；他们喜欢使用康德的学说，即我们只认识现象而不认识现实。

但唯心主义者完全忽视了康德的基本原理。因此，他们看不到理念与外物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也无法确定外物的真实性。——他们认为这一点从未被证明过，也永远不可能被证明——他们不知道虚假的感知与真实的感知之间有任何区别，也不知道我们梦中所见的物体与清醒时所见的物体之间有任何区别，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承认心灵是思想的器官或媒介、我们是通过心灵来思考和成为人的、也只有上帝自己才能使我们通过心灵成为人。

1785年，苏格兰的托马斯-里德（Thomas Ried）博士看到洛克的理论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被接受和应用时所表现出的怀疑倾向，开始了一场旨在抵制这种倾向的运动。他否认思想的真实性。但他认为知识中一定有一些元素不是来自感觉。他没有明确指出这些要素是什么。但它们不属于洛克的第二类——源自心灵本身的意识——其自身的行为和状态。（关于智力的论文》，《论文集》，第二

卷，第四章，第2节）。

我认为，里德和苏格兰学派所开创和证明的观点现在是，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英语国家人们的主流观点。但是，近来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在我们中间越来越盛行——就是接受苏格兰学派的学说，或者说在苏格兰学派的学说中注入一种经过修改和稀释的黑格尔主义，而且我认为，这种倾向对黑格尔主义的真正含义和倾向并不十分清楚。它取悦于人们的幻想，似乎提供了一种逃避的途径，也是人们所看到的唯一一种逃避洛克体系中似乎更难、更严酷、更令人厌恶的不可知论特征的途径。

1829年，维克多-库桑（Victor Cousin）考虑到唯心主义的总体发展，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试图更明确地说明他所说的先验观念或知识要素的性质，这些观念或知识要素是无法从感觉中获得的。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那些不倾向于接受从“洛克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哲学家们似乎都认为有必要承认某种形式的先天的或先验的观念。

但是，承认任何形式的先天的、先验的或直觉的观念（如果我们的意思是包括基本观念的话），都会遭到许多严重的反对；不可知论学派的哲学家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幌子和逃避结论的方便途径，而任何承认感官知觉是观念的起源和来源——唯一的认识途径——的体系都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此，如果我们无视洛克的基本原则，只把第一类观念视为不可知论；而知识，如果我们严格而恰当地使用这个词，也仅限于可见的物体和物质世界；——那么它剥夺了道德中的一切制裁，也剥夺了宗教中的一切义务感。崇拜不过是一种软弱，积极的教条式教导不过是一种祭司技艺，是僭越等级制度的外在枷锁。

另一方面，黑格尔主义者否认这一原则，我们却有一个唯心主义体系，它确实承认道德和宗教情感，允许，实际上是鼓励基督教教义的宣扬，以及宣扬这些教义的语言的使用；但它破坏了实体事物的现实感，并倾向于将奇迹，甚至我们的主复活的奇迹化为纯粹的神话，留下了信仰的形式，却剥夺了信仰的力量。形式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这是形式对实质价值的证明。

在这个场合，我无意试图证明不存在先天或先验的观念，而是想表明，我们不必诉诸这样一种假设，作为解释我们实际拥有的观念的手段。我认为洛克的建议足以达到所有目的。

不过，我们不妨指出，即使我们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基本观念，它们能否成为实际知识的要素或手段——或者说，我们能否甚至有词语或术语来表达它们，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举例来说，假设我在一片漆黑之中拿起一个从未见过的物体。尽

管我脑海中有关于颜色的所有想法，但我无法也不应该知道我手中的物体是什么颜色。

我脑海中所有关于颜色的想法，无论是否与生俱来，都无济于事。

还是那句话。假设我有一个关于某种基本属性的先验观念，但我并没有通过实际认知获得它。我怎样才能为它命名呢？如果我们面前有两个或更多的对象，我们可以发明一个名称，如果我们还没有的话。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象，没有对它的实际认知，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想法与他的想法进行比较，也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词，作为我们之间的共同符号，来表示或表达这种想法。

如果这个想法是一个复杂的想法，一个代表一个真实物体的想法，或者甚至是一个可以分解成更简单元素的物体的属性，我们也许就能给它下定义，或者对它进行描述，从而让一个从未见过这个物体的人也能理解我们的想法。因此，虽然灰色、绿色和橙色是复杂的颜色，但我们确实是从单一的认知行为中获得对它们的想法的。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或描述它们，例如，一个从未见过灰色物体，但见过白色和黑色物体的人，就能够理解我们一想象一个物体是灰色的。但我认为，即使我们有一个关于基本特性（比如白色）的先验观念，也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它不可能成为知识的要素，我们也不可能为它命名。

库桑为证明先验观念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所做的努力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细致、最完整的。他表面上的成功取决于两个致命的错误：（1）他忽略了洛克的第二类基本观念；（2）他提出的检验词表示复杂观念，以至于使他的整个论证失效。（关于“现代哲学史进程”的讲座，第二卷，第 xvi.-xxi. 或亨利的《表兄弟的心理学》，第二章至第六章）。

库桑提出了七个测试词：“时间”、“空间”、“物质”、“原因”、“个人身份”、“善恶”和“无限”或上帝。

现在，我们必须记住，在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上，所有关于事物的观念都必然是复杂的：例如，“橘子”这个概念是由至少四种不同的感官（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从橘子中提取的元素组成的。正如物质世界中的所有物体都可以通过化学分析分解为六十四或五种元素一样，我们对事物的所有观念也可以分解为一些元素，或表示其属性的基本观念。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看库桑的测试词——前三个词——时间、空间和物质——在头脑中是由复杂的观念来表示的。无论这些对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其中任何一个对象所预言的任何属性，都不是我们对某些物质对象所预言和赋予的。库桑并没有试图证明我们是这样做的；他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空间是扩展的吗？本文也是。有哲学家颇为诙谐地说：“空间不可能

是一种物质，因为它没有属性。它不能成为一种属性，因为它存在于没有物质的地方”。那么，它当然只能是一种虚构，就像赤道或环绕地球的“虚线”一样。

时间是永恒的吗？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吗？我写作的笔也是如此。我们如何看待物质？它有任何属性吗？如果有，那也只是物质对象的属性，而我们正是从物质对象开始了抽象的过程，并由此得出了“物质”这一概念。这个过程不会给我们开始时所拥有的东西增加任何东西。

库桑认为这些观念是先验的。我从未见过尼罗河或埃及金字塔。然而，我对它们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从在实际认知这些对象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观念是先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直观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直观行为——或者说通过想象来观察对象——来形成这些观念的，就好像它们是存在于感觉器官中的，而事实上它们并非如此。

但是，当我们考虑其他四个概念，即“原因”、“人”、“上帝”和“善恶”时，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事实。

让我们来看看前两者，即“原因”和“人格”或“个人身份”。自我、人或我们自己的思想，当然是从意识中获得的；其要素包含并列在洛克的第二类中——“思考、相信、怀疑、愿意”。如果库

桑所说的“同一性”是指“自我”或“人格”这一概念所隐含和包含的东西之外的东西，那么我们几乎可以从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物体中得到它：物体在时间和它所能存在的各种存在方式的多次变化中保持不变——“完全相同”。

库桑认为，“原因”的概念来自于我们的意愿和努力。因此，这种观念显然属于洛克的第二类或范畴。洛克自己也说过，我们对“力”的最明确的概念是“引起力”，因此也是“原因”或“因果关系”——“从我们自己的思想在意愿或选择行为中的观察中”。（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第 1、4 节）。

在继续讨论剩下的两个检验标准——“道德的善”和“上帝的存在与属性”——它们构成了现在特别摆在我们面前的主题之前，有必要对洛克的第二类——或我们观念的要素类——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对其内容作比洛克本人似乎做得更彻底一些的扫描。

我已经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即即使洛克本人似乎也没有看到他的基本立场的全部范围，也没有将它们应用于解决他面前的例子。

他谈到了我们认知对象的心灵的“行为和活动”。但他没有提到我们心灵的被动状态，这种状态代表了我们对对象的感受，至少代表了我们与对象的某些关系。

例如，我们对痛苦的认识来自对痛苦的感受；我们对美的认识来自看到人们称之为美的事物并“感受到它的美”。我们对爱和恨的理解，来自于其他人和事物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感受。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道德和宗教观念——即其中的要素或内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首要因素”——也属于这一类，尽管它们的等级更高。它们来自我们的意识，用洛克的话来说，就是“心灵在认知或思考某些对象时对其自身状态和感受的感知”。

对象本身激发了感受，因此感受——或者说我们对感受的想法——成为我们对对象关系的认识的源泉。

我认为，在我们研究的这一阶段，有必要提请注意观念与判断之间的区别和重要差异。如果我称一个行为或一个对象为“好”，我就表达了对它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可能基于感官知觉行为，也可能基于意识行为，或者基于我们的感觉状态，或者基于推理过程。我现在要探究的不是判断或肯定的依据，即我们肯定它的原因，而是谓词——“好”——所表达或肯定的观念的起源。就像我说纸是白的，我表达了对它的判断；然而，在我们肯定或否定这个命题之前，这个判断就意味着“白”这个概念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我们称行为为善，而是我们是如何得出我们所肯定的“善”的观念的？

我想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说，我们是通过意识到我们对某一对象的感觉——该对象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感觉——来获得这种观念的，就像我们称某一对象为白色、红色或黄色，是因为它在我们心中产生的感觉的特征和种类一样。在一种情况下，我们从对物体的感官知觉中获得观念，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从对物体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感觉的意识中获得观念。

我认为，库桑在他对洛克《论》一书的评论中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善”或“好”的观念并不仅仅来自任何单纯的感觉或感官知觉；它在种类上不同于任何可以从单纯感觉中获得的观念。我想，如果把这个问题笼统地说出来，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的主张；除了那些体验过“责任”、“义务感”、“悔恨”、“怜悯”和“对上帝的爱”这些词所代表的感情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就是我的主张：我们的道德和宗教观念的要素来自于我们对周围某些事物所激发的情感的意识。(1)事实上，在我们体验到观念所代表的感受之前，它们从未在意识中出现过。(2)当认知器官或认知方式缺失或不活跃时，它们根本不会出现，就像那些没有眼睛或眼睛由于某种原因不活跃的人永远不会产生“白”的概念一样；(3)它们无法被定义或描述，无法让任何从未体验过它们的人理解它们是什么，也无法让我们用来表示它们的词真正意味着什么。我曾举例说明过身体或肉体上的痛苦、个人的感情、

美—或对美的感觉和赞美—对正确事物的责任感或义务感、对所犯错误的悔恨，以及对上帝的虔诚、敬畏、爱和感激。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或不同的主题。(1) 我们对道德善的看法。(2) 我们对责任感或道德义务的看法。(3) 我们对上帝的品格和属性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的看法。

I. 关于第一类观念。我倾向于认为，“善”的观念起源于肉体的痛苦和快乐的感觉，并首次进入意识。在意识的发展顺序中，这些感觉必须是第一位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们时，才会产生关于它们的观念或思想。在这一阶段的经验中，我们非常肯定地把给我们带来快乐或愉悦感觉的东西称为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经验的增加和思考的深入，我们开始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只是令人愉快的。我们经常会说，某样东西令人愉悦，但它并不好，或者“我怀疑它是否对我有益”。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就会发现，“愉快”一词指的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仅指我们自己或主要指我们自己，而“好”的概念则有更广泛的含义。善”指的是其他人，或许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更广泛的经验；因此，正如上文所说，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等同于“对立”的差异。

因此，如上所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等同于对立的差异，不令人愉悦的东西可能被判定为善，反之亦然；许多暂时令人愉悦的东西最终可能并不是善。

那么，你会问，“好”的概念从何而来？我认为，“善”的概念来自于快乐或享受的概念，因此，从长远来看，能够促进所有人或我们自己的快乐或幸福的东西才是“善”，为此，如果需要的话，必须牺牲单纯的快乐和当前的享受。

然而，有些人坚持他们所谓的“绝对的善”，或者说是一种不可能来自我们实际经历的想法。因此，所有的理想都超越了经验；但它们只是经验的理想化。我想苏格拉底说过，对某物不好的东西，只能是对无物好；除了永远好和为所有目的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上的绝对好。

现在来看看我们对善和正确的判断，我们会发现另一个因素。在这里，我想我们会发现卡德沃斯、塞缪尔-克拉克、理查德-普赖斯等唯心主义者以及该学派的人所真正主张的一切。

除了基于经验并与事实相关的判断之外，我们还有某些先验的原则或公理，这些原则或公理纯粹基于我们对事物本身的性质和可能的关系及其属性和模式的洞察力。事实上，所有科学都部分地建立在这些不言而喻的公理之上。数学完全建立在这些公理和定

义之上，用定义来代替事实。正如数学家们已经证明，如果物体存在，就必须符合算术和几何所指出的数和形式的规律；如果物体作为独立的物体存在于空间，并且相互之间有不同的距离，就必须像惠威尔所证明的那样，存在于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万有引力定律下的旋转系统中；此外，如果它们要作为单独的物体存在于任何地方，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它们就必须像黑格尔所证明的那样，存在于分类关系中，包括并依赖于对总属的从属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关系；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先验地表明和证明，如果像我们这样有智慧、有选择和道德行为能力的生命要存在，它们就必须生活在某种社会关系中，而这四种关系，即仁爱、诚实、正义和服从上级并忠于上级，是而且必须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它们不仅是人类福祉的必要条件，而且在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某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某种规律。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有一些“必然的和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具有这样的性质，并且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之上，以至于任何只承认从感觉中产生的观念的哲学体系都无法解释它们的存在，也无法证明我们有理由为它们要求任何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但是，我们是这样构成的：一旦我们看到了规律，或者理解了证明它是必要的和建立在事物本质上的证明，我们就会觉得它是强制性的，并认为服从它的人是有功劳的，是值得赞许和喜爱的；而不重视和不服从它的人，我们则认为他是值得责备的，是应该

受到惩罚的。但是，在洛克的分类中，我们的观念中没有一个是素是不存在的。

II. 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即责任和义务的观念。

责任和义务总是带有个人因素。无论什么责任都是某人的责任。

但是，责任感或责任观念（如果我们选择这种表达方式的话）不仅意味着我们赋予责任感或责任观念的人的人格，而且还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现在，我们对观念和判断的区分至关重要。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我们是否自由，我们是否有选择的权力——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判断——一种肯定的心理行为——来回答。但现在的问题是自由的观念。我们有自由吗？如果有，我们是如何获得它的？我们当然拥有它，否则我们就不会有表示它的词或短语，也不会有关于它的问题。

关于它的问题。在一个所有人都是盲人的世界里，不会有颜色的概念，不会有颜色的名称，也不会有他们能知道但看不见的物体是否有颜色的问题。

现在，自由、选择、自由意志，或者从心理学和道德学的意义上

说，行动的自发性，这些概念显然不是来自单纯的无机物。这些物体不应该具有这种思想。它也不可能来自动物；因为动物是否拥有这种产生行动的能力是一个疑问；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把这种能力归于动物，那也只是一种观点，是我们的理论或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动物所做事情的方法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是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了这种想法，我们就永远不会想到把行动自由赋予它们。也许我们无法给意志自由下定义，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并让其他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他们不仅有选择的自由，还有努力和因果的力量。我不仅有能力选择举起手或走过房间，而且我有能力使我的肢体运动起来，在行走的过程中举起我的手，移动我的脚。手不能自己抬起来；脚，如果不是因为它们与身体（这也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有联系，就不能移动——它们将永远静止不动，它们将像我的椅子腿或我的桌子腿一样静止不动，如果不是因为来自我的思想、我自己的因果力量使它们移动的话。

你说这种想法至少是与生俱来的吗？从与生俱来的意义上说，它的确是生俱来的。但柏拉图用这个词的意思是，当我们出生时，在任何经验之前，这个观念就在我们心中了。那你是说它是先验的还是直观的？它确实是直观的，因为我们是通过对自己的直观——对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的直观——而得到它的。但在这个

意义上，它与洛克的理论不谋而合，是他的第二类基本思想之一。我们有意识地——或者自认为有意识地——愿意、选择和努力。这一点无人否认。但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先验的吗？不是库桑的意思；因为，所有人都会承认，我们是从对自己心理行为的意识中获得观念的，因此它是后验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人怀疑或否认，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自由和人的道德本性的否认者认为，我们一定搞错了；不可能有自由意志，不可能有选择的自由；选择是由动机决定的；就像物质的运动是由力产生和决定的一样。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真的自由，而是我们是如何产生自由的想法或思想的？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怎么会有自由的想法？显然，它只是随着经验的积累，作为我们的意识、我们自己的精神行为而产生的，它具有作为一种基本观念的一切特征，就像白色或任何物质对象的任何属性一样真实。这种选择力或作为第一原因的作用力，是我们总是赋予心灵的一种属性，而从不赋予单纯的物质或物质事物。把它归于动物只是一个理论问题。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伦理学体系或科学的所有原始要素、思想要素或首要因素。我们有与恶相对的善的观念，有为社会存在提供必要条件的法律的观念，有选择和行动的权力的观念，有

选择和行动正确的责任或义务的意识；如果我们在追求善的过程中没有选择和行动正确，我们就会感到懊悔或自责。

但是，我无法说明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正确的事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义务去做，为什么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时，我们会感到羞愧和自责——我无法说明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我无法说明为什么我看到这张纸是白的，感觉到那块铁是硬的，或者闻到玫瑰是甜的；或者为什么当有东西撕裂我的肉或折断我身体里的骨头时，我会感到疼痛一样。我只能提到我们天性的构成，说我们是这样构成的，我们是这样造就的。进化论者说，我们是通过发育、遗传和漫长的进化过程才变成这样的。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有进化、发展或遗传。它是我们与周围事物关系的一部分。

III.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话题——有神论或宗教观念的起源。

这是库桑在“无限”这个标题下反对洛克的观点之一，或者我应该说，它包含在观点之一之中；因为在这个词的范围内，他包括了“时间”和“空间”，也许还有其他思想对象以及上帝。

形容词“无限”在形式上当然是否定的，我认为它在这方面作为谓词的力量是否定的，而且只是否定的。它可能意味着主体的真

实性，但它的使用实际上并没有肯定和预言任何主体；它只是肯定了没有限制。但是，要有限制或受到限制，它就必须是某种东西。如果我们的事物在时间或空间、距离或数量上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创造出“无限”这个词，甚至在我们对主体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这个词；因此，它可能是一什么都不是。

然而，当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词的使用与其说是为了科学上的准确性，不如说是为了流行的效果。与其说上帝是“无限”的，不如说他是“完美”的；“完美”指的是品质的纯粹性，而“无限”这个词则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它是无限制的延伸。

库桑将三个主题归入“无限”范畴，他称之为“无限”。他把时间和空间也归入这一类，并特别强调了我们把它们称为无限的事实。他说，与所有物质对象相比，时间和空间没有形式，是无限的。同样，空气也没有可见的形式。但你是否说，它的任何确定部分都是有限的，它的现实轮廓构成了形式？没错，但空间和时间是没有界限的，它们是无限的。但它们是真实的吗？它们有任何延伸吗？它们是由有限还是无限的部分组成的？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它们有任何界限，也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在界限内“延伸”或“持续”。

因此，在称它们为无限时，我们并没有肯定任何与它们有关的东西，而只是肯定了我们自己的无知。无限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属性——它不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或简单的概念；而是外延的扩大。一个有界限的物体必须是某种东西。但是，“无”不可能有界限，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无”一定是没有界限的，或者说是无限的。因此，正如库桑所认为的，我们有两种无限或无穷，一种是真实但没有限制的无限，另一种是由于它是无而没有限制的无限。

毫无疑问，我们最初的认知和体验是与感官感知的物质对象有关的。我认为，起初，所有的孩子都会想到上帝，认为他像人类一样有一个看得见的形体；在某个地方，他也有一个看得见的居所——在一个叫天堂的地方的座位或宝座，就像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人一样，只是好得多而已。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对神的特性的更成熟的概念，我想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分析结果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把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都归于上帝；对于智慧——也许在我们身上非常有限——我们把全知全能归于上帝；对于力量——也许在我们身上小到可以称为软弱，我们把全能归于上帝。我们把他说成是全善、全智和全能的，我们称他为完美和无限的，但这样做，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意识到的局限性、极大的不完美和软弱（的反面），仅仅归于他，并包含在我们对他的想法或概念中。

我并不肯定，也丝毫不认为，我们这样赋予上帝的属性，包括了我们今后对他的所有认识，也包括了宇宙中更高级的智慧生命（如果现在有的话）对他的所有认识。上帝不是，也不可能完全为我们这样的头脑所理解。我们从最低级、最不充分的观点开始，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可能会对上帝的特性有更清晰、更满意的认识。

在早期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区分惯性和自发性，也没有区分第二原因和第一原因，而在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区分是必要的。直到莱布尼茨和牛顿时代，这种区别才被充分认识和明确提出。但从那时起，它就被认为是基本的。纯粹的物质，如果处于静止状态，它本身就不能开始运动或行动；如果运动或行动，它也不能改变其行动的方向或强度，除非它受到其他东西的作用。它不能有目的和为了最终原因而行动。而我们自己的思想，一旦我们发现物质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承认，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在这些方面与我们的的心灵相似的心灵，而且它也在活动。任何宇宙理论的提出，都必然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自发的因果关系——第一因，并且是有目的和道德目标的。

而刚刚定义的惯性原理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本要素。如果物质的微粒——构成物质宇宙的分子和质量——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惰性的，而是可以像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一样随意跳来跳去，那么这些事

实或原则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立。惯性事实和必然规律是一切物理学的基础。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人类关于这一点的最早历史，那将对我们大有裨益。然而，最新的研究似乎表明，至少在雅利安民族中，存在着一种信仰——并不十分明确——一种马克斯-穆勒所说的“无意识的一神论”，即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之中——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力。在“下雨了”、“下雪了”这些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这种信仰状态中发展出来的语言使用的例子，如果不是“遗迹”的话。谁或什么在“下雨”或“下雪”？代词“它”的语法前置词是什么？也许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或回答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认为，就我的目的而言，我们每个孩子的经历都是人类种族历史的缩影，与我们面前的问题有关。我认为，所有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心思细腻、天性敏感的孩子，他们很早就会感觉到，即使他们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和认识，在大自然中，在一切现象的背后或下面，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激发着他们的敬畏和恐惧，甚至是崇敬。

现在，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同样的思维过程，早期的人类（我猜想）和许多现代的孩子（据我所知）赋予物质宇宙——“可见的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以智慧和目的，这种智慧和目的，虽然我们不知

道，但我们知道，意味着一个有思想、有目的、并付出能量和力量来实现其目的的实体心灵（上帝）。

但我们最初或最早的想法无疑是自然界中一种看不见的精神力量，就像人的思想或灵魂。我记得有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在一个明媚的夏夜，我坐在一棵高大的老橡树下，膝上坐着一个聪明、善于思考的男孩——他现在是上帝教会的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他抬起头对我说：“神父，是什么让橡树生长，又是什么让其他万物生长？”我开始谈论太阳和雨水。但他凝视着我的脸说：“不，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不能告诉你我的意思。”然后他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我也哭了。无疑，起初这只是一种情感，但很快就发展成了思想，并最终成为他坚定的信念和生活行动的指南。

正如马克斯-穆勒所说，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他们的语言中还没有一位神的名字，但在自然界的大多数物体中，这位神的思想被分成了许多个，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思想一样。因此就有了多神论；正如赫尔尼所说，这种多神论既是为了满足科学工作者的需要，使他们能够找出原因，解释他们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一切，也是为了宗教目的，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崇拜本能。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中，在早期雅利安人那里，以及在基督教时代 19 世纪有思想的孩子的头脑中，对于我们面前的问题，过去

和现在都没有任何东西，除了把我们所拥有的、从我们自己的精神行为意识中衍生出来的观念归因于上帝。而进化论——即使我们接受了这一理论——也并没有摆脱自然中存在上帝的观念。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把物质的原子想象成永恒的和未被创造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从原始的星云状态——一种绝对静止或平衡的状态——开始，而不需要某种人的作用来开始化学和机械作用，这种作用导致了我们的周围事物现在的状态。

既然它们处于运动状态，我们就可以把他看作是使它们保持运动的原力，因此，热、光等只不过是他的模式，正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那样（《第一原理》，第九章，第82节）。或者，我们也可以按照廷德尔所说的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假设，即这些更微小、更终极的粒子以及更大的质点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我们所说的热和光以及类似的力只不过是它们的活动方式——正如他所说，它们相互影响，而没有其他原因或媒介的介入——他称之为“奴隶劳动”。（《科学片段》，1878年版，第414页；1872年版，第114页）。

但即便如此，这些微粒也曾经处于绝对静止或平衡的状态，那时它们要么没有互相作用的能力，要么没有行使这种能力。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必须有上帝赋予它们这些特性，或者把它们置于一种可以行使这些特性的状态。

但不管我们的理论如何，也不管它们在星云状或“进化开始时的静止或平衡”状态下是否拥有所有这些能力，它们当时肯定没有引力。上帝一定赋予了它们引力，使它们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引力，其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显现或活跃起来；宇宙中也就不会有光、热或电。

如果我们转向另一个极端——理想主义——如黑格尔所表现的那样，情况也是如此。在不把思想等同于上帝，把上帝等同于单纯的思想，从而使二者在实质上合二为一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黑格尔体系的发展表明，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有世界，没有关于世界的思想就不意味着上帝的存在和真实；甚至连自然界中的任何事实、现象或事件，如果不是作为万物永恒创造者的上帝的某种思想的表现和体现，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无论用哪种方法，无论用哪种相反的方法，我们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上帝在万物中显现，万物在“我们在其中生活和存在”的上帝里面。

我想我们可以为这两种极端理论——不可知论和唯心论——所导致的结果而庆幸：上帝的存在和作用，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思想界，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上帝，物质不可能产生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我们的每一个思想都意味着上帝的存在。因此，上帝并不遥远，并不在人类和自然之外，只有通过过去的启示和单纯的外在仪式

和神职才能找到他。他就在此时此地，彰显在自然界的每一个现象和事实中，只要他对自然界的旨意是可想而知的——就像他与古代的先知和使徒们一样，只要他天意的旨意和对人类救赎之路的指引是可想而知的，他在他受祝福的儿子身上完全彰显并道成肉身。

我倾向于认为，人们对心灵的存在与真实的怀疑和不信任，就像对上帝本身的存在一样，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错误的理解和期望——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理解和期望是不合理的。人们似乎认为，只要能接触到心灵，他们就能看到和处理心灵。廷德尔在某处说过，“在我们想象心灵的所有努力中，我们完全失败了”。我们当然会失败；如果我们思考的是心灵而非单纯的物质，我们就必然会失败。我认为，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的语言很晦涩——没有心灵就没有物质，没有上帝就没有世界，而且根据同样的规律和必然性，心灵也不可能具有任何一种我们据以认识它或恰当地设想它的属性；就物质的所有这些属性和上帝的属性而言，上帝在所有事情上都必须是物质的对立面。这就像黑暗与光明、寂静与声音一样，它们是对立的，不可能有共同的基本属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他把上帝的灵比作风。我们看到树枝来回摆动，小草摇摆，尘土飞扬；我们知道它们并不是自己做的。但是，风，尽管我们知道它就在

那里，我们却看不见它——我们不能“想象”它——坐在房间里，我们也感觉不到它。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影响。其他生命（天使）可能有感官，可以看到它，看到上帝，就像我们看到世界一样，但我们看不到。

同样是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廷德尔），他无法将心灵“可视化”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但在上帝方面，他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他完全承认，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质完全无法解释自然界的所有现象，但他说：“当我试图给我在宇宙中看到的力量赋予一种客观形式时，它却从我身边溜走了，拒绝了所有的智力操作。”（《科学片断》，1878年版，第336页）风也是如此，我们无法“想象”它，也无法赋予它客观形式，即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可见的物体，但“它吹到哪里，我们就听到哪里”的声音”。事实上，我们在生活经验中所知道的气体和许多最有威力的物质——破坏性的和有益的——也是如此。我们既不能“想象”出它们，也不能赋予它们“客观的形式”，但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好好注意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对我们的善恶力量。我们每时每刻都依赖于它们，任由它们摆布。

但事实上，我们对心灵和上帝的认识，就像我们对其他一切事物的认识一样，是基于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原则。我们对周围自然物的认识只是作为原因——它们作为原因在我们身上产生感觉，我们通过感觉来感知或认识它们。我们知道心灵是我们内心感知、

思考、意愿等现象的原因。我们认识上帝——上帝体现在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中，体现在我们内心的思想和情感中，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中。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正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说和廷德尔所承认的那样（《第一原理》，第五章，第 27 节；《科学片断》，1878 年版，第 336 页），上帝显现在自然界或思想界的每一个现象中，因此，他是全能的、无形的、有因无果的（即他是终极原因），因此，他是万物永恒的第一因、进化的开端、一切发展的引导者、历史的主宰。当然，他没有可见的或“客观的形式”。除非他是物质，否则他不可能有任何物质形式，那样他就不是上帝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上文所述）这些人的困难源于他们的经验和哲学的狭隘性。

还有一个想法与我们的一般主题密切相关。“人若立志遵行他（上帝）的旨意，就必晓得他的教义”。在这里，就像在积极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单纯的推测性知识、推理的说服力或论证的完整性本身都不能给人确定的感觉。原则必须有实际应用。新的想法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产生想法和信念，这是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实现的。（上文）这些人通过论证和单纯的理智已经拥有了他们所能合理期待的一切。让他们尝试遵循自己的信念，在祷告、

敬拜和工作中遵行他（上帝）的旨意，他们就会知道。这就是过去十八个世纪的经验，也是数以百万计基督徒的经验。没有人失败过。

如果我提出的观点被采纳，上帝的人格（位格）将成为我们自然神学的中心思想。我们的目光将从自我——我们的人格——转向作为宇宙无限和永恒人格的上帝。这种人格（位格）的本质必须成为我们的中心思想，也将成为我们的中心思想。它不需要也不会包括我们的弱点，更不会包括我们的邪恶。但它将是本质上的人格（位格）。

赫伯特·斯宾塞把上帝说成是“大自然中的原力，因此热和光不过是他的形式”。然后，他又否认上帝的人格（位格），理由是我们在自然界中“看不到那些我们熟悉的、意味着可变意志的变化”（《第一原理》，第五章，第 29 节）。“一切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发生”。但是，“多变”的意志证明的是无知和软弱，而不是最高形式的（位格）个性。我们改变自己的目的和计划，是因为我们软弱无能，而且我们的目的往往是错误的，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不完善，但上帝不可能有这种改变的理由。

黑格尔派也是如此——他们把上帝说成是“真理和善”，而不是一个存在者——一个无限善和无限真的人（位格）。在他们那里，除了思想，没有任何东西是实质性的：思想不是一个思考的人（位格），

它只是一种模式。

但是，如果接受洛克的建议，我们就可以说，无论是否存在先天的观念，毫无疑问，存在着他（洛克）所说的第二类观念——精神观念，即关于人格的所有要素的观念。我说，接受这个建议吧，从它开始，上帝的人格（位格）思想就是我们所有自然神学的中心思想和控制思想。我们以它为思想的起点，我们以它为出发点——也许是无意识地——在我们对上帝的所有思考中，以及对作为上帝显现的自然的思考中。最后，我们将把他视为一个人（位格），他的意志和方式体现在物质宇宙的所有现象中，体现在我们内心最美好的思想和最神圣的情感中，体现在我们生命中所有事件的指导者中，用另一个人的话说，“我们可以把自己视为无数机构中的一个，他通过这些机构在我们周围看到的、感觉到的或内心知道的一切事物中起作用”。（赫伯特·斯宾塞，《第一原理》，第五章，第 34 节）。

我们对外部物质对象的认识是“不直接”的——除了通过感觉器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我们的思想，是“直接”的，没有中间器官或机构。但是，我们对上帝——他的存在和属性——的认识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对其他任何一类物体的认识都不同。它更像是我们对人类思想的认识。我们意识不到他们的心理行为和状态，但我们却能从他们的言行中看到这些行为和状态。通过这种方式和方法，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真实性不会比我们自己思想的真实性有更多

的怀疑；同时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一样多。正是如此，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着物质惰性的观念和事实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在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事实中看到上帝的存在、思想和目的的表现。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没有视觉和触觉，对于精神和灵性的东西——上帝和心灵，我们就像对待我们现在看到和听到的周围物体一样。我们会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闻到它们散发的气味，仅此而已。毫无疑问，我们一开始肯定不会把它们当作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物体；那时我们就会像现在一样，对我们经验中出现的许多错误知觉产生怀疑。经过一段时间和最仔细的思考之后，我们——我们中最聪明的人——首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了这些感觉。但是，由于我们既感觉不到也看不到它们，我们对它们就不可能有像对自然物体那样的想法——我们无法把它们“视觉化”，无法赋予它们“客观形式”，也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因此，我们现在认识心智，实际上不是看它的外观，而是看它的行为。它思考、感受、记忆和意志，但我们看不到它，我们的手无法触摸或操作它。因此，我们很难相信它是真实的，或者说，很难“想象”它的存在——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说法。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从感官知觉的对象开始的，这种关于心灵的感觉大多是经验的结果。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物质对象。但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许多起初看起来不真实、不可

能的东西，到最后看起来却是最真实、最实在的。

我所主张的体系的核心和萌芽事实是这样一种学说，即所有观念，就其基本形式或我们观念的所有要素而言，都是在对现实对象的实际认知行为中进入心灵的，而不是以其他方式进入心灵的。但是，从行为的性质来看，认知意味着被认知对象的真实性——“什么也不认知”就是“根本不认知”。

但有人说，我们对事物的实质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现象——它们的品质或比例。我们可能知道一个物体是白色的，但我们不知道白色是什么，其余的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两个命题是相互矛盾的，但它们都是假定和断言的，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似乎会根据他们当时的目的而选择其中的一个。

笛卡尔似乎表达了这种双重独断论的核心思想。他把事物的属性比作从他窗下经过的人背上的衣服，他说，就像因为遮住他们的帽子和衣服而看不到他们的身体一样，我们也因为事物的属性而看不到事物的实质。但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观点让属性成为了真正的物质，就像一个人的帽子和外衣就像他的身体一样具有实质意义一样。

我们真正认知的是事物本身，它们是白色的、坚硬的。这就是知识——我们拥有的知识，也是我们指导一切行动的知识。据说，在

休谟宣布他对外部事物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之后，有人问他，难道他真的不相信他们以为自己看到的那根柱子是真实存在的？他回答说，这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他作为一个人相信什么是一回事，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有权相信什么又是另一回事。”但人比哲学家更重要”，现在，人作为人所相信的东西，就是他们在所有实际生活事务中所依据的东西。物质世界如此，心灵也是如此。人们了解它，并根据他们意识到的东西行事。

但有人说，我们对心灵的本质一无所知，不知道它是什么。我承认，我有时倾向于认为，人们在说这些话时，对他们所使用的词语的含义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含义一无所知。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本性——也就是它们的基本属性。物质或物质对象的本质属性可能是硬度、延展性、可分性等，而这正是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它们是坚硬的、延伸的、可分割的等等。

至于心灵，我们知道它能感知、记忆和意志，因此，如果我们把它与物质和物质对象相对照，这些就是它的本质——它的本性，或者说它的差异性。

但人们似乎认为，在这些特性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物质。这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遗产。笛卡尔用刚才引用的话表达了这一观点。然而，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所认知的是物

质，是表现在其属性、行为和模式中的实质事物。这些属性、活动和模式并不是事物，而只是物体与其他物体之间关系的表达和指示。如果这张纸是白的，那么它只是相对于我们——“我们的视觉”——而言才是白的。如果这张纸是硬的，它也只是对我的手来说是硬的，因为它抵挡住了我的手的压力。对一个真正有灵性的人来说，它可能既不是白，也不是硬。

这就是我们有时听到的“知识的相对性”的基础。这也表明了这种相对性的局限性。物体的颜色和硬度的确是相对的，但它们的形态或形状却不是，那是绝对的。同样，不证自明的公理或先验公理也是绝对的，永远是真的，无处不在，对所有人和所有目的都是如此。

同样，所有知识都始于两个伟大的事实，一个是我们感知到的外在事物的现实性，另一个是我们在意识中认知到的内在心灵的现实性。无论这两者的属性和状态是偶然的、短暂的还是相对的，在适当考虑了错误的预知之后，它们实质存在的确定性是绝对的。

我们对心灵的认识是我们道德哲学和自然神学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两个科学分支都会随着我们对自然界和我们周围事物的认识而有所改变和扩展，尤其是自然神学。但我们必须从我们对心灵的认识开始。

每一次认知行为都会改变心灵。我们知道的比以前多，我们记得的也比以前多；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我们的认识和记忆，我们以后的行为也会完全不同。我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的指导。

每一个行为也是如此，我们会因此而改变。诚然，我们的活动开始时只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本能。但很快，我们就会开始认识，而我们的认识会引导、有时甚至控制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往往与我们的倾向背道而驰，因为这些倾向有时只是本能的。但是，我们出于意志力而选择去做的事情，每做一次就会变得容易一些。这种容易有时会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会习惯性地去做，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而且常常是无意识地去我们起初费了很大力气才做成的事情。这种习惯具有本能的性质，或者就像我们有时所说的“第二本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接受并遵守正确的道德准则，我们就会朝着道德完美的方向发展。如果在此基础上，我们接受关于上帝和我们与上帝关系的真正教义，并遵循这些教义，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圣洁，更像上帝。

这样，我们就有了三类基本观念——一类是通过对物质对象的实际认知而获得的关于这些对象的感性比例的观念。第二类，是我们通过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在感知事物、记忆事物、推理事物、意愿和选择事物时的运作和行为而获得的心灵观念。最后是我们对事物在我们心中所激起的感觉的观念，以及我们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这些观念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启发性和益处。在我们身上，它们以最低的形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本能，就像在动物身上一样。对动物来说，本能即使不是充分的指导，也是它们所拥有或能够拥有的唯一指导。它们也指引着我们，比我们意识到的要远得多。

以身体疼痛为例。我们是这样构成的：当有机会时，我们就会感觉到它。但我们什么时候会感到疼痛呢？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除非身体组织或身体器官的功能出了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否则身体是不会感到疼痛的。这是上帝让我们知道身体出现问题的方式。爱恨情仇也是如此。就其本质而言，爱恨情仇的目的在于，并且在适当调节的情况下，确实会吸引我们去爱美好的事物，去爱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人。同时，它们也会让我们远离那些性格相反的人。

美与神性相近，有人说，美不过是“行动中的真理”。上帝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美好、和谐和表达神圣思想的美，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艺术中。因此，他让我们远离丑陋，或者说，他想让我们远离丑陋——没有什么比罪更丑陋了。

罪。

正是出于同样睿智而仁慈的设计和目的，他造就了我们，使我们

不得不感到，凡是我们认为正确的，我们就有义务去做。我们所有的道德情感都是他赋予我们的体质的结果，是他引领我们走上正义之路。他也是这样造就我们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认识到他和他的存在，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崇拜他。

因此，在我看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所产生的想法——这些想法是由我们周围和头顶上的事物在我们心中产生的——与其他想法一样具有启发性和重要性。我们首先有外部事物的想法，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与周围的事物和我们头顶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不了解它们，我们就无法知道该做什么，也无法对未来形成充分的认识。毋庸置疑，本能是好的，而且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我们有比本能更高的东西。我们会遭受痛苦，而痛苦大多来自于我们对这些目标的无知或忽视。它们影响着我们，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们。我们对它们的体验始于本能。但是，如果我们想超越单纯的动物生活，我们就必须从这种经验中获得思想，而思想又产生知识，然后这种更高级的要素——当然是知识——以及理性和意志，通过这种知识来指导我们。即使我们要靠信仰行走，它们也必须在其适当的影响范围内指导我们。只有在知识结束的地方，信仰才会正确地开始。“人所看见的，为什么还盼望呢？”在我们能够知道之前，上帝给了我们本能。他要求我们在知识的光照下前行——无论我们拥有或能够获得什么知识，而只有当我们瞄准目标时，只有当我们的目标超出单纯知识的范

围时，我们才会凭着信心前行。

这就是神圣的秩序。上帝确实会宽恕我们的罪：但他已将知识的手段置于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他要求我们对所能获得的知识负责，并根据这些知识行事。当我们违反了自然法则或健康法则时，身体的疼痛会通知我们。当我们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时，同伴的恶意——至少是失去他们的尊重和善意——会通知我们。当我们忽视了上帝赋予我们的更高的指导和监督时，悔恨就会折磨我们。这些东西都给了我们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无论如何，这些思想都必须成为我们的道德哲学和自然神学的一部分。不，它们也是我们对启示宗教的看法的基础和佐证。

根据这种观点，不仅我们的自然神学会从自然和自然科学中获得启示，而且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和对其含义的理解也会随着我们对自然——他（上帝）的工作——的真正科学知识的进步，以及对人类历史的更好了解和理解而改善。

例如，看看我们信仰的奥秘、道成肉身、人的精神再生、敬拜的功效、圣礼的内在恩典。无论我们现在或将来能否完全理解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从历史和信徒的经历中，找到对我们的主和他的使徒们有关这些事情的话语的解释。毫无疑问，他们的意思就是那些遵从主的旨意从而了解教义的真正信徒在自己的内心体验中所发现的，并且看到主和他们在说出这些话时所表达的意思，

而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些话对于希腊人——当时最聪明的人——来说纯属愚昧。因此，历史不仅是圣经的实现，也是圣经的解释。

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一大需求——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迫切的需求——就是知识基础的确定性，这种知识可以作为信仰、信念和希望的基础。一个人看到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他也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我们可以用谨慎的逻辑引导人们看到从这些事实和原则中得出的几乎所有结论。但是，一旦我们要求他们接受任何纯粹的直觉知识，他们就会开始不相信我们的指导，并要求我们提供事实和基于事实的理由。我认为，不可知论者之所以能够获得实际优势和认可，主要是因为他们声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他们诉诸于我们知识中的一类首要事实，而思想真诚的人则追随他们并屈从于他们的指导。

但是，如果我在这篇文章中的学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掌握着另一类事实。没有人怀疑人的思想。没有人怀疑他的记忆和希望，没有人怀疑他能够受苦并且确实受苦。鉴于这些事实，可以证明道德和宗教的原则对于灵魂的福祉——只有灵魂才会受苦——就像万有引力定律或化学中的确定比例定律对于物质世界一样必要。正确的行动、信仰和希望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而这些经验事实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的。作为哲学家，人们可以怀疑或否认这些事实，但作为人，他们确实也必须相信这些事实。

一个人看到什么，他就知道什么——无论是心灵的事实，还是某种物质的事实，他都会感到非常确信，以至于他不能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某些先验公理也是如此。我们的所有理论和科学都建立在这些事实和公理之上。在所有人看来，这些事实和公理是如此确定，以至于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事实和公理，还指望你会把他当作一个有常识的人——或者说一个诚实和真诚的人——来对待。

这些事实和公理是如此肯定，所有人对它们的确定性又是如此确信，以至于没有人会想到要否认它们，除非是为了达到目的，避免得出一个他注定不会接受的结论。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事实和公理的诉求来证明他的立场是荒谬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础，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确定无疑的基础。

但我担心，对我们知识中的任何直觉因素——即有别于直觉判断的直觉观念——的任何承认或让步，都会使我们站在与不可知论者现在所占据的基础本质上和实际上相同的基础上。没有人能说清这些观念是什么。就我所知或所信，还没有人指出过一个具有这种性质的要素，而我们从实际认知中肯定拥有的东西又不能轻易地解释这种要素。

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洛克的第二类或范畴中的所有观念都可以被称为直观的——我们是通过对心灵本身——它的行为和状态——的直观而得到它们的。尽管据我所知，这一事实尚未得到明确的阐

述，但它对直观观念学说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在人们对直观观念一词的普遍接受中，如果我们接受的话，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对一个人来说是与生俱来或直观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未必如此。谁来评判？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区分洞察力和单纯的幻想？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一个人相信，他要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对基于直觉想法的、他并没有意识到的任何信念或行为负责？这样，我们岂不是把每个人都变成了自己的法律，有义务去做他认为和觉得正确的事情，但在道德或宗教方面却没有义务，除非他碰巧和我们的看法一样？如果他因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在今世或来世受到任何惩罚或处于任何不利地位，他难道不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吗？难道他没有权利像我们一样坚持自己的观点吗？如果我们因遵循自己的信念而被视为正义，并因这样做而受到豁免——即使不是实际的奖励——他难道没有权利这样做吗？——他难道没有权利享受同样的恩惠和豁免权吗？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极端。

在这次讨论中，我一直小心翼翼，没有假定或说出任何暗示观念只是方便的虚构的东西——我的想法是，知识是由关于事物的观念构成的——通过分析，这些观念可以简化为相对较少的元素。尽管如此，结果还是一样的，就好像在每一个观察行为中，都会有某种我们可以视为元素的东西进入头脑，而头脑可以把这种东西加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观念，从而代表所认知的事物。但是，

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这种情况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发生——尽管结果是一样的，就好像这些物体确实送来了“不可感知的物体”，而心灵实际上接受了这些物体并把它们组成了关于事物的观念。

如前所述，理念论最早是由柏拉图提出的。但亚里士多德多次声明，他认为这些观念只是虚构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B. I.，第九章，第 1 节；B. XII.，第五章。里德，《论文集》，第一卷，第一章，第 5 节。）库桑多次使用了暗示对其性质持相同看法的表达方式，尽管他的论证似乎暗示了其真实性。（库桑“Cours de 1829 Leon XXII.”，莱特译本，第二卷，第 339 页；亨利博士“库桑心理学”，第 251 页。“除了物质对象和被赋予感知它们的能力的心灵之外，什么都没有”。另见第 281、282、285 页）。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感知一个对象，我们有意识地感知它和思考它。我们因这一行为而改变——我们比以前知道得更多——我们也记得更多，更有智慧，并因我们当时的感知——知道和记得而采取不同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观念理论只是一种理论，用来解释和帮助我们谈论我们的经验事实；而且很可能仅此而已。

我们在地理学中通过赤道、纬线和经线来确定地点，就好像这些纯粹的虚构——这些“虚线”就在那里，所有路过的人都能看到，

就像红布条一样清晰可见，就像经线一样牢固。

这些“虚线”就像红布条一样清晰可见，像钢铁一样坚固。对于思想也是如此——除了一两个本体论性质的思想，或许还有一些纯粹心理学性质的思想之外，我们可以参照它们来描述心理过程和讨论哲学问题，并使用这种理论所隐含的语言，就好像它在事实上是真实的一样。然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必须能够在不使用这种语言的情况下解释自己的意思。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大家，我并不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也不是要证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真实性。我只是想说明我们是如何产生这些想法的。我认为，我已经通过对现实对象的实际观察和认知，解释了这些观念的来源。如果是这样的话，灵魂有别于肉体的现实性就不容否认了。

我认为，这种对我们知识的性质和范围的看法，对我们道德和宗教观念的起源的看法，以及对责任、敬畏、服从、爱、感激——还有对罪的悔恨和忏悔——的看法，为我们的自然神学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和方法。正如上帝创造了我们，使我们一看到几何学中的命题就觉得它是真的一样，在道德和宗教方面，上帝也创造了我们，使我们一看到任何事情是正确的，就觉得它是一种责任；我们一看到上帝的创造和旨意，就觉得他值得我们尊敬、服从和感激。对错误行为的悔恨变成了对违背上帝的罪的忏悔，使我们以

谦卑的态度寻求上帝可能赐予我们的任何指引。

如果现在提出的观点被接受并坚持下去，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精神和道德哲学——包括自然神学——置于与其他科学相同的基础之上。我们从观察到的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分析和概括，从而获得一般事实和基本规律。这些事实和规律构成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这个世界或未来世界的所有科学知识。信仰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有一个困难我们无法克服。我们必须依靠直觉、内省和自我意识。

我们不能像数学那样有图表，也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准备好的标本或纸模型。我们必须依靠稳定的内省能力和习惯，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在从事我们正在研究的行为时，观察我们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当然相信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无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和信念是什么，我们都不能否认，现在的人在他们的自然状态中，到处都在从这一崇高理想中堕落，令人痛心。但是，无论从哪种观点、哪种理论出发，我们都必须以他的本来面目为出发点。但是，只要我们有坚实的基础——没有人可以质疑或否认的事实基础，我们就有了“πιστις”，我们就有了推动世界前进的希望。

我这样把先验的因素排除在我们的思想和知识之外，无论是先天的、先验的还是直觉的思想，我并没有把对神的影响的认识排除在我们的思想之外，而且我希望并相信我并没有为把这种认识排除在我们的思想之外提供任何理由或借口。我们所相信的关于这种影响的一切，以及启示录可能教导我们相信或期待的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上帝能够，而且无疑也确实——在他看来是善意的——引导我们的思想形成对事物的观念，引导我们的心灵对事物的评价，引导我们的意志做出选择。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对我们采取行动的所有方式方法。我们也不能总是区分他圣灵的建议和我们自己内心的提示和建议。但毫无疑问，我们在此时此地都受到了这种精神的影响。

但这还不是全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能力和感觉器官是为了适应我们目前的环境和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我们的生命开始时是肉体的一只不过是动物而已。第一个必要条件——我的意思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最终最重要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要注意到周围的事物，了解它们的性质，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智慧从这里开始。身体必须成长和发展。在神圣的秩序中，“先有的不是属灵的”，而是先有自然的，然后才是属灵的。当那场伟大的变革来临时，“我们的凡人将披上不朽的外衣”，“我们都将改变”——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心智和感官将发生某种变化，我们将适应新的生存状态，就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适应我们目前环境的能

力一样好，一样充分。对我们来说，时间和空间可能已经结束。我们现在看到的物体的所有感官属性都可能消失，而现在看不见的东西可能会成为永恒的现实。我当然相信福音书中关于主复活后显现的叙述。我不怀疑圣保罗关于主向他显现的描述。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表明我们的能力发生了变化，构成灵界的事物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到那时，我们将为我们目前的存在状态所无法看到、听到或理解的事物做好准备，因为到那时，我们将看到我们被看到的样子，甚至知道我们被知道的样子。

“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基督用这句话来指代圣徒丰富的属灵基业。从属灵事物的开端，从属灵世界的根基开始，各种程序就一直在工作，为迎接上帝的人类儿女顺利通过凡人生命的考验，进入他们最后的家园做准备。

自然界也是如此。你看，伟大的造物主为人类建造家园，为有知觉、有智慧、有良知的生命提供居所的过程是多么漫长。看看在人类到来之前，煤炭的计量、无数的设计和调整都是如何进行的。自然的国度是在自然界建立之初就为上帝的凡人子孙准备好的，而恩典的国度则是在灵界建立之初就为上帝的不朽子孙准备好的。

=====

=====

=====

=====

=====

=====

=====

=====

劳动法和资本法。

[1886年8月20日在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宣读的论文]

作者：罗伯特-B-费尔贝恩，博士，法学博士、

纽约州安南代尔圣斯蒂芬学院典狱长

我的来意很简单，就是想表达一下我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

我勉为其难地排在第一位，为学院将持续两天的讨论拉开序幕。
我之所以同意坐在这个位置上，只是因为本来要向大家发言的那位先生因病在家休养。

在研究资本与劳动关系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人们所持的和所表达的各种观点。我经常在大学课堂上与聪明的年轻人讨论这个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是他们和我通过观察和思考，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当我翻阅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时，我发现几乎所有关注这一主题或对构成我们文明的这些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的人，都曾在我们面前发表过意见。但是，1883年在联邦各城市召开的参议院委员会会议所引发的情感和观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要想了解全国人民对这一问题的真实看法，只需查阅这次审查的报告即可。在我看来，这个委员会在允许这个问题的各方人士表达意见时，做了一项非常令人钦佩的工作。他们所保持的耐心、尊严和公正，一定会为他们的声誉增光添彩，也一定会为这样进行的审查增添巨大的力量。

当贵机构秘书写信给我，说执行委员会要求我参加这次讨论，或者如果对我更方便的话，请我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以便与研究所的会议记录一起发表时，我选择了前者。不过，事情可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简单地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发现，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因为这个问题正困扰着形形色色的人——劳动者、手工业者、劳工总监、公司总裁、制造商、杰出的专业人士和普通的哲学家。这个问题的各个阶段在他们的脑海中一一呈现。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无论你从哪个方面获得了你的观点，你都会在每天从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讨论、文章、研究和书籍中找到它。这也许是我应该回到贵秘

书最初的建议上来的一个原因，我不会妄自菲薄地认为我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任何贡献，甚至不会认为我可以从任何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不会想象我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观点，我将表达我所持有的观点，以及我在研究和思考这个伟大而重要的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对劳动者深表同情。在某些限度之外，我们都不喜欢劳动。西塞罗的“尊严”（otium cum dignitate）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无论冬夏，无论寒暑，每周每天都要劳作八到十个小时，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缓解的前景，也不指望有一天会得到休息，这样的生活至少可以说不是令人愉快的前景。我一点也不奇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有一种愿望，不，是一种决心，那就是限制劳动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甚至少于八小时。我对这一愿望表示同情，如果能够在我将提到的范围内并以我将提到的方式实现这一愿望，我衷心祝愿这一目标早日实现，并祝愿它取得圆满成功。

我相信，我是被那些仁慈的愿望所感动，这些愿望会让我为减轻各方面的痛苦而欢欣鼓舞，也会让我为实现这些目的而欢欣鼓舞，这些目的不仅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且会让我们由衷地感谢上帝“创造了我们”以及“保护了我们并赐予我们今生所有的福分”。

其次，我感谢上帝，我的命运没有被投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比这个十九世纪更早的时期，因为今天的生存手段和参与生活的乐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如果说劳动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受到了更多的规则的约束，如果说劳动使人们的工作更加单一，但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劳动者享受到了更多的生活乐趣。而且，由于智力超群，他更有能力享受这些福利。知识的巨大进步，对自然力量的把握和利用，以及使自然力量为人类的进步和舒适服务，是十九世纪的荣耀之一。它提升了人类的地位。它使人类能够享受到前两个世纪只有富人和权贵才能享受到的舒适和乐趣。正是这种知识和对物质自然力量的利用，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也使曾经只属于少数人的幸福变得触手可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位聪明的钢琴调音师来到我家，为了了解我的主题，我问他估计某座城市的钢琴数量是多少，我们都很熟悉，这座城市的人口超过 5 万，因此家庭数量约为 1 万个；他回答是 8000 个。当我对这一数字表示惊讶时，他坚持说，家庭中使用的数量是 7 000 到 10 000 个，他还说，他不知道农村地区使用的数量。这不仅说明了我的观点，即这个时代的舒适度提高了，而且奢华程度也超乎想象。如果能知道一百年前英国的一个郡有多少把竖琴，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我很高兴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人和妇女的财富、修养和品位都有了如此大的提高。

钢琴师可以大胆地认为，我国大多数工人的家里都有钢琴，而且坚持认为这是正确的。今天，这些人比过去任何时期的人都住得

更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受过更多的教育、更有能力行使人的职能。今天，人类的劳动无法生产出穷人的小屋和富人的豪宅中日常使用的各种物品。据说，仅在马萨诸塞州，机器就做了上千万人的工作。这些人即使因为新机器的引进而暂时失业，也能以他们力所能及的价格享受到舒适的生活。就拿我国长达 12 万英里的铁路来说，它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它把西部的大粮田几乎带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当然，今天的西部大草原距离纽约市比七十年前纽约州的粮田距离这个大都市还要近得多。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的西部土地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铁路把它们的产品运到市场上；即使我们当时有了运输工具，我们也没有马匹和蒸汽马车可以用来收割庄稼的机器，而今天人类（若没有收割工具）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五十年前，伊利诺伊州生产的一桶面粉运到波士顿的成本是其本身价值的十倍，而今天只需要一美元又四分之一。与当时的富人或大地主相比，这种好处对劳动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它给穷人带来的面包和给富人带来的面包一样好。因此，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比生活在一百年前无疑是一大幸事。当时特威德河畔的苏格兰农民的生活水平与今天的苏格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可同日而语。这主要归功于机械的引进，归功于利用自然的力量来完成人类的工作。

其次，我想说的是，今天的道德和机械力量使世界变得更加公平。你经常听到有人说，今天的财富积累得更多，而贫穷却更集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今天有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今天有更

多的人过着不舒适的生活，有更多的人生活在肮脏、污秽、不健康的环境中。但是，贫穷和财富一样，也有其局限性。它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没有庄园主的盛气凌人或居高临下。劳动者没有畏首畏尾的屈从，也没有战战兢兢的忧虑。人类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每一方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们已经正确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即使不是完全的力量和资源，也是大致的力量和资源。如果说还有很大的进步和改进的余地，但这仍然是向上迈出的一步，它无疑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舒适。它可能使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些浪漫，但却赋予了它一种现实，带来了一种祝福和安慰。今天的工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有尊严，有地位，当它们与自尊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展现出一个让我们钦佩的人。人们常说，穷人、劳动者和服侍人的妇女被排斥在我们的教堂之外，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富人的华丽服饰和装饰品，但这种说法往往并不公正。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他们。没有什么乡绅的座椅会将她们拒之门外。在我们农村地区的教区教堂里，除了穷人的骄傲和缺乏自尊—缺乏真正的独立之外，没有任何障碍。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因为富裕的邻居穿着华丽而退缩，不愿意进同一扇门，不愿意跪在祭坛的栏杆前时，这往往是一个可悲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借口，也是对真正人格气概的极大蔑视。他们往往寻求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或是一种亲切的认可，而这恰恰显示出一种不符合人格独立精神的畏缩。在我们的时代，物质自然的力量、蒸汽和电磁的力量已经开始运转，成为巨大的平衡器。它们改变了我们文明的形式。

在许多方面，它们使这个世界与两代人之前的世界截然不同。这是劳动人民最应该欣赏的变化。它并没有让富人倒下，而是让他留在了原地；但它无疑提升了劳动者的地位。它显示了劳动人民对世界的重要性。它表明，世界在某些方面依赖于他（劳动者），也依赖于世袭统治者。它表明，一个人的头脑与另一个人的头脑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说富人的幸福不亚于他们，那么他们也同样重要；而劳动者则得到了提升，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他的人格气概得到了奇妙的发展，他的重要性也大大提高。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社会是法律的结果。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他是为联合和社会而生的，他的幸福来自联合。使我们聚集在一起并调节我们的关系和依赖的法律，就像使太阳系的行星和卫星各就各位并保持其位置不变的法律一样，是不可阻挡的。柏拉图在创作《共和国》时，实际上只是分析了人类社会的现状。他并不想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是希望找到这个社会的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托马斯-莫尔爵士写作《乌托邦》的目的与此类似。它旨在通过哲学家的理想来规范和调节社会。在近代，1789年革命之后，法国构建了一个新社会，但这个新社会几乎在萌芽之前就已化为乌有。我们今天的新“和谐会”和摩门教会，它们的存在不是源于受到适当约束和规范的自然倾向，不是源于符合神的样式和模式的天性，而是源于变态的天性，它们已成为文明世界的丑闻。我们所处的社会之所以存在，是因

为我们的天性中存在着某些需求、力量和倾向。1824年，在罗伯特-欧文的指导下，印第安纳州瓦巴什河畔建立了一个定居点，他在那里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社会主义试验。

物质体的吸引力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的作用遵循一定的规律，其均匀性和恒定性就像引力与距离的平方反比定律一样确定无疑。正是这些规律使我们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你无法用投票的方式让它消失，就像你无法通过决议消灭太阳系一样。毫无疑问，你可以使某些力量更直接地作用于某个部分或某个方向，或者你可以抑制某些力量，从而为某些趋势指明新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所提到的新力量，在我们这一代已经给某些其他力量指明了新的方向。就像在物质哲学中一样，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结果。但它仍然是一种结果。这个社会是法律、自然力量、某些原因统一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会发现从历史开始的每一个社会中都有首领和下属、富人和穷人、有影响力的人和依附者。据说赫胥黎说过，“他宁愿生在费吉群岛的一个野蛮人家里，也不愿生在伦敦的贫民窟里”。但是，如果自然界发生了这种怪事，他可能会发现自己终生都要依附于一个更加野蛮的首长，而不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拥有一个独立的人的可能性。摩西说过，“穷人永远不得离开这地”（《申命记》第十五章第二节）；我们的主在审视社会的自然分化时，表明我们天性中的仁慈之情应当永远在社会的这一部分人身上得到体现。

我还要说的是，贫穷的退化与社会的积累一样，都遵循着一种规律。生产和生产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它们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看看一个大城市的运作；就拿纽约市来说吧。想一想，每天有多少易腐烂的材料被运来维持生活，如果没有这些材料，人口就会减少。再看看她的各种职业人口，以及男人和女人的各种口味，发现它们都被填满了，只有少数剩余的没有被雇用。

可见，在这一切中，有一种规律在起作用；一种事物、一种活动、一种贸易分支正在对另一种事物、一种活动、一种贸易分支产生影响，并使之趋于平衡。整个贸易体系、供求体系和消费体系是一个和谐而平衡的体系。一眼就能看出，它是遵循规律的。

同样，我认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富人和穷人，为什么会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规律的结果，正如社会的发展和贸易的运作都是规律的结果一样。有某些力量在起作用，这些力量是原因，必然会产生结果。富人和穷人一样，永远不会离开土地。财富、积累、对大部分土地和产品的控制，都是野心、头脑、进取心、冒险精神、远见、智慧和胆识的结果。正是这些目标和希望滋养和培养了所有这些伟大的品质。它们是工业和所有商业美德的回报。社会的真正形式是由大自然决定的，我们无法改变它的本质特征。我们只能改进它，让它更加和谐地运转，让它为每个阶级带来更大的利益。所有的共产主义哲学都建立在对事实的

错误分类，以及没有给予每个因素应有的重视之上。如果说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其弊端，那么我们也必须记住，它也有更大的益处。正是这种社会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所承认的好处。如果我们把它推翻，不出半代，它就会凭借其自身的自然吸引力和亲和力，再次形成与现在相同的社会。劳动者和富人都必须满足于现有的社会，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个社会。他们必须各尽所能，减轻社会的痛苦，加强社会和谐的纽带。

我再次指出，正如有贸易和供求规律一样，也有调节劳动和资本的规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付出，而且付出是有代价的。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都有其市场价值，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会带来回报。

只要这种价值得到承认和回报，社会就能持续发展和进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工业世界、贸易世界、生产和消费世界事实的科学。它观察和收集事实，给它们命名，对它们进行解释，即把它们放在因果的合理关系中。它不像数学、天文学或化学那样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还有许多事实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结果，因此这个问题变得十分棘手。天文学的“三体”问题并不比社会经济运行的事实需要更复杂的研究，它们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最近有人提议，应该对这门科学进行划分，这样就可以召集许多人的智慧来完成一个人无法完成的工作。因此，在这门学科的研究中出现巨大的混乱

并不奇怪，而且在实践中遵循日复一日实施的贸易法则要比在纸上阐述这些法则的理论关系要容易得多。从参议院委员会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趣的现象。我们只能对委员会耐心听取政治经济学庸医和江湖骗子的所谓哲学感到惊讶。约翰-罗奇先生曾向该委员会表示，在错误观点和奢侈要求的影响下，许多制造商（他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有能力的话，都愿意出售自己的企业，并满足于将这笔钱投资于政府证券所带来的普通收入。错误的观点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它们不仅会把资本，而且会把能够使用资本、能够把资本成功地用于社会的头脑赶出企业，赶出市场。罗奇先生在这次考察中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教训，他讲述了四十年前他和纽约阿莱尔工厂的三位工友是如何开始自营业务的。第一次试验后，三个人退休了，只剩下一个人，毫无疑问，他们每个人都是同样娴熟的工人。但这个人有信心和勇气；而这种信心和勇气，十万人中没有一个人拥有。信念和勇气与资本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积累资本的品质。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财富的继承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这场争论中，人们常说，许多今天拥有财富的人并不是靠什么获得财富的。但是，对于砌砖匠来说，砌砖匠可能会这样说，就像砌砖匠对于从父亲或祖父的劳动和智慧中继承了巨额财产的人所说的一样。但我想，草匠的孩子对他来说同样珍贵，他们的幸福对他来说就像百万富翁的孩子一样重要——他为他们的抚养、教育、未来的繁荣和成功所做的牺牲，就像百万富翁或努力积累财富的

人为自己的孩子所做的牺牲一样多。这是我们的天性使然。它源于人心中情感。家庭主妇和百万富翁一样都是人，百万富翁心中对子女的爱和家庭主妇是一样的。如果你违反了这一法则，你就会破坏社会。你试图组织一个无视你天性中这些深刻原则的社会，它就埋下了腐朽和死亡的种子。希腊家庭试图忽视我们的天性原则，而基督教则发展了这些原则。因此，基督教家庭取代了希腊家庭。你们对财富的积累施加了参议院委员会提出的一些限制，你们将暂时压制那些使社会进步的原则的运作。你会浇灭我们的雄心壮志，挫伤我们的勇气，而正是这些雄心壮志和勇气，建造和改善了我们的铁路，铺设了我们的远洋电缆，把我们的汽船送进了世界上的每一个港口，把我们的产品运往他们那里，把他们的奢侈品带回给我们。积累财富的人是公众的恩人。他的财富来源于他的事业，而这些事业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有利于他自己，也有利于整个社会。财富的继承人也是如此。他不会像我们的政府那样，把财富以硬币的形式存放在金库里，而是将其投资于需要劳动的工程，这些工程使工业有了报酬，使众多的人有了工作，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父母和孩子们有了面包吃。二十三年前，我所乘坐的铁路几乎是一种耻辱。你可能买了票，在耗尽等待的耐心后，回家去，希望明天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但今天，因为它是在一个懂得如何积累财富的人的明智监督和管理下运营的，你可以通过它的正常运营来确定你的手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人是公众的恩人。他为他人开辟了一条获得产业回报的道路。他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成功和繁荣。他让工人有可能买到钢琴。

然而，我们却听到有人对铁路的持有者和管理者嘀嘀咕咕。据说他们是私人公司，可能会压迫工人和穷人。他们想把铁路和电报从他们手中夺走，置于政府的领导之下，这样就可以把它们置于政治野兽的捕猎范围之内。他们可能会让社会沦落到斯巴达人的地步，让公共餐桌为我们提供黑汤。是什么造就了商人的智慧、工程师的勇气、建筑师的品位和劳动者的勤劳，——是每个人都知 道，他将收获自己的成果，他可以把这些成果传给他的孩子；这些成果不仅会给他带来直接的舒适和快乐，而且不会随他而去。这是因为生活的规律、贸易的规律、工业的规律得以运行，并带来自然和适当的结果。正是这一点发展并造就了现在的国家。它消除了区别，让法律、自然法则、贸易法则、工业法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再次指出，社会上出现的弊端大多是违反贸易法和卫生法的结果。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和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的案例中，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和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都有舒适的房屋，租金适中，其中许多房屋还归工人所有。这些房屋的建造和分配都遵守了卫生法。他们的工资给了他们舒适的生活。欢快和满足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晚上下班后，曼彻斯特的主要街道上挤满了快乐的人群。而在福尔里弗，住宅的布置没有考虑到健康、方便或舒适。家庭并没有提供人们所追求的幸福；不满和罢工时时有发生。我想，我们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如此。劳动人口拥挤在一起，导致了肮脏、

不健康、不满以及对自身状况和生活本身的憎恨。我毫不怀疑，许多不满情绪的真正原因是生活方式。我也毫不怀疑，如果把工人们在罢工和争吵中毫无用处的努力转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善就会发生，他们就会有更好的房子，至少有办法保持清洁、健康和舒适。我们常说，酗酒是影响社会的不幸和罪恶的根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如果给工人一个舒适的家，就会使酒馆失去许多常客和顾客。在许多情况下，它是猥亵窝的解脱。我并不认为不整洁或肮脏是许多地方的必然结果。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清洁的愿望或鉴赏力，几乎任何地方都会有清洁。但是，房子和房子的环境应该能够带来清洁和健康。在我看来，如果工人本身以及那些心怀社会福祉和进步的人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为人们提供干净整洁的住宅，在那里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保持体面，建造无愧于“住宅”之名的住宅，那么我们听到的大量抱怨和不满就会停止。

一位工人在参议院委员会上冒昧地说，他认为，如果我们的百万富翁把他们的一些巨额馈赠用于为劳动者提供住宅，会比用于建立公共机构更有意义。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钱用于提供房屋，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能够进入这些房屋，我们就可以省去一些医院。当然，我们需要的远不止是经过改良的公寓。

但是，尽管我们朝着基督教哲学的方向作出了种种努力，贫穷、肮脏、下流、不满和犯罪仍然会存在。朗姆酒会喝得酩酊大醉，

家庭会变得贫困，下流的行为会大行其道。贫民窟不是贸易法则或劳动法则的结果。它们是无知、懒惰和不洁的结果。我确信，如果纽约的任何一栋公寓由基督教哲学研究所的成员居住，他们会让大量的新鲜空气和克罗顿水进入，不到二十四小时，这里就不再是贫民窟了。贫民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堕落的心灵，源于对懒惰的热爱和对肮脏的漠视。但我所说的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

其次，我想说的是，支撑这个国家所有行动的伟大原则是各得其所。这是民法对正义的定义。罗马法的本意是每个人都应享有公正，享有自己的公正。早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罗马法就承认每个人的自然平等——他生来就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法律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权利，并维护他对权利的享有。查士丁尼学说提出了这一主张。它被认为是人性的正常状态。罗马法在中世纪的革命中被一扫而空。但它再次在现代社会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的原则在联邦每个国家的制度中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里，每个人都被宣布生而平等，有权享受自己的好运气和智力能力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及城市可能带给他的一切。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缔造者。共产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样，都是试图扰乱这种状况，并将利益赋予少数人。中世纪欧洲的法律让封建主变得无所不能。正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在这些殖民地和州将这一切一扫而空。共产主义就是企图引入法律的力量，从个人手中夺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并将其分配给国家的所有成

员。这是对智慧、正义、正直、技能、信仰和勇气的征税；这是对沉闷、迟钝和懒惰的奖赏。

当有钱有势的人通过肆意妄为、压榨穷人、不尊重劳动者的要求而仅仅通过提高生产价格来获取财富时，当二十家制造商联合起来关闭他们的工厂，在已经盈利的情况下停止生产，从而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时，他们就违反了我们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他们依赖于劳动者，而劳动者也依赖于他们。他们的财富生产依赖于劳动人民的劳动，就像劳动人民的工资依赖于资本家的技能、信心和勇气一样。当你联合起来阻止一个的时候，你也就在同样的程度上阻止了另一个。这是对正义的践踏。你们不允许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工资。资本家通过积极而坚决的意志行为，阻止了劳动者发挥自己的天赋，阻止了劳动者获得自己的正当回报。资本家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来这样做，我现在没有时间一一列举。另一方面，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迫使资本家接受他们的观点，也同样是对正义的践踏。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工作收费，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当他们说其他人不得代替他们工作时，他们就肯定超越了正义的界限。如果国家动用一切力量，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保护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权利，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在所有这一切中，除了正义——每个人都应被允许最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本——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求。这似乎就是这个寓言所规定的原则：“朋友，我没有亏待你；你不是为了一便士而同意我吗？拿着你的

钱走你的路吧。我要给这最后一个人，就像给你一样。我用自己的钱做我想做的事，难道不合法吗？”如果我们都能学会这个简单而伟大的原则，即主持公道，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东西；如果每个人都能公正地使用自己的东西，那么社会就会得到调节和平衡，社会就会和谐而安宁地向前发展。

毫无疑问，基督徒还有更多的责任。毫无疑问，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的宗旨就是寻找能够减轻苦难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能够使每个人拥有并享受自己的权利义务，而且还能使人们认识到源于基督徒兄弟情谊的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将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能够相互分担负担，并以这样一种方式消除匮乏和苦难，使这种更加幸福的状态看起来是自然原因的结果，而不是慈善机构屈尊的恩赐。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那些必须成为我们所有哲学基础的基本原则，那些必须调节我们所有关系的原则，那些必须造就我们文明的原则。那么，这个问题就留给本研究所去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它可以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它可以给任何自然力量以什么新的方向，——从而产生更好的结果，使社会更加和谐，产生更多的人类幸福。

=====

=====

=====

=====

=====

=====

=====

=====

=====

=====

=====

基督教对财富的利用。

[1886年暑期班《资本与劳动讨论》论文。]

作者：塞缪尔-M-汉密尔顿，博士，纽约。

有人说得好，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更好地分配财富的问题超越了其他所有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欧洲，在美国国内，劳苦大众也开始以不祥的持续性和诚恳的态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财富？”“为什么我们不能分享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他们被告知，今天的群众生活比五十年前要好得多。他们欣然承认这是事实，但他们会问：“我们条件的改善与我们之上更幸福的阶层条件的改善有任何可比性吗？商人王子每年要花费成千上万美元购买他本可以不买的奢侈品，而我们却常常要看到我们的孩子和妻子因为缺少健康的家庭、缺少换换空气、缺少适时的休息而受苦，这是什么规律，是人的规律还是神的规律？”

今天，令许多人心痛的并不是一些人拥有的更多，而另一些人拥有的更少。而是第五大道和 D 大道之间的惊人对比。

我的论点是，基督教是解决这一代人社会动荡的真正良方。费希特说过：“基督教蕴含着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革新力量。迄今为止，它只作用于个人，并通过个人间接作用于国家。但它注定要成为国家的主要组织力量，到那时，它将以其丰富的祝福向世人展示自己”。我相信，无论是教会本身，还是教会之外的人，对基督宗教的理解还没有达到一半。我相信，如果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关于财富的教诲得到了一致的执行，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折磨我们的社会骚动。

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处理贫富问题的。他是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这样做的。他给年轻富人的建议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宝在天上”。他的意思不可能是让这个年轻人把财富任意挥霍在恶人和游手好闲的人身上，从而使他们变得更糟。但是，在他的财产和他周围大众的贫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如果他想讨上帝的喜悦，基督建议他不要自私地使用他的财产，而是明智地使用这些财产，以减轻那些没有他那么富裕的人的匮乏，改善他们的命运。同样，基督对贫穷和匮乏的态度也可以从撒该信主后的行为中发现。这个人为什么要捐出自己一半的财产来养活穷人呢？当然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样使用财富是耶稣所要求的，也是他所乐意的。财主和拉撒路的寓言所讲的道理又是何等

明白。谴责富人的罪行无非是，他富有却忽视了穷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与拉撒路站在一条鸿沟的同一边。结果呢？他从未与拉撒路站在同一边。在另一个世界里，鸿沟一如既往地又深又宽，只是财主站错了边。上帝最不能容忍的人，就是自私地使用金钱的人。在这样的人和上帝自己之间，上帝会设置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应该让穷人过上更舒适的生活。绝对的平等并不是上帝的目的。我们从耶稣的话语中可以了解到这一点：“穷人常与你们同在”；当然，上帝并不希望贫富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就像现在的世界所允许的那样，也不希望人类的自私使这种差别变得如此之大。他不认为一个人非常富有，而他周围的人却有需要救济的呼声是正确的。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有多么难啊。”这并不是因为他（财主）富有，而是因为如果他（财主）继续非常富有，而有许多方法本可以利用他的财富来提升和改善大众的命运，他却不愿意施行，——那么他就一定是吝啬的、自私的和不像基督徒的。

基督教的财产法就是这样：“我把自己献给了救赎我的耶稣基督。我的财产必须随我而去；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任性处置它。我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式使用它，但正确的法则是我从基督那里学到的。我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但我的欲望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我用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享受，但我最高的喜乐是为基督带来荣耀”。因此，在基督徒与财产的关系中，自私的原则被完全排除在外。在每一点上——获取的方式、拥有的数量、花费的方式——他都必须考虑，不是什么能取悦自己，而是什么能荣耀基督。

现在，假设基督关于财富使用的这一教导真的付诸实施，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所有的慈善事业、所有的卫生改革、所有的教育设备、所有的传教机构都会有充足的资金供应，而这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继续巨富，尽管有些人仍然会比其他人富有。穷富对比肯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惊人。因此，根据福音的原则，所有非常富有的人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富有是以牺牲某些同胞的利益为代价的。话又说回来，如果基督关于财富的教导真的得到了实践，那么现在社会穷富两大阶层之间的怨恨就会逐渐消失。因为，如前所述，造成嫉妒和怨恨的毕竟不是生活的不平等，而是财富的滥用、不计后果的浪费，以及许多财富拥有者的奢侈和豪华。* 在劳工报纸上，每一个公开的自私奢侈的例子，每一个罪恶的奢华舞会，都一定会遭到义愤填膺的谴责 * 参见伊利教授的《美国最近的社会主义》，第 70-72 页。

这源于一种受伤害的感觉。另一方面，当彼得·库珀去世时，一份狂暴的社会主义报纸上却出现了对他一生的彻底赞赏。财富花得好，永远不会成为嫉妒的对象。因此，我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解

其作为平等或优越的对手的东西，都会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

阿诺德的这首诗掀起了支持佛教浪潮的高潮。德国出版了一些书籍，展示了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惊人巧合，其用意在于，基督教是后起之秀，是佛教的借鉴者。一份报纸称，巴黎即将开设一座佛教寺庙，供西方信徒虔诚地膜拜这位印度救世主。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什么佛教？半信半疑的怀疑论者倾向于认为，在佛教中找到了基督教的源头，也许是基督教的上乘之作。一位回国的传教士说：“我回国后发现异教很流行。在这样一个时代，阿诺德的书，以其诗歌的魅力、感性的肖像画和东方意象的光芒，怎么可能不受欢迎呢？”但是，冷静思考的“检查”来了，在威尔金森教授的批评中，我们看到了结果。真理从不回避诚实的调查和比较，《新约》和拿撒勒人信仰的朋友们在这个例子中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评论中，作者并没有声称《亚洲之光》是为了伤害耶稣，但许多读者却在其中发现了与耶稣的主张相对立的观点。

我们的评论员从（1）艺术的角度和（2）忠于历史的角度对阿诺德的书进行了研究。《亚洲之光》是好诗吗？对这两个角度得出的大胆结论都是否定的。诗歌的华丽装饰和历史事实的黯然失色都强加给了读者。威尔金森教授对这首诗的评价有时可能有些过高，由于没有充分理解佛教与普通印度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前者对某些事情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

正如他自己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对佛教教义和历史的研究是在很远的地方进行的，而且是从最好的、唯一的权威人士那里获得的第二手资料。

威尔金森教授在谈到所评论的这本书是艺术还是诗歌的问题时，坚持认为它不是好作品，尽管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一些很高的评价。如前所述，华丽的东方意象的魅力以及流行主题的新颖性和趣味性，都影响了更好的判断力。评论家的决定非常明确：“一言以蔽之，《亚洲之光》的诗句并不好。这首诗的某些部分，尤其是第五、第六和第七卷，诗句相当正确、流畅和通顺。它甚至变得非常顺耳，并不罕见。但一般情况下，诗歌只是单纯的韵律，没有任何运动和停顿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韵律、还包括节奏与和谐所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节拍本身往往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不好，而是坏；而且不是简单的坏，而是公然的坏”。

同样，好的诗歌应该实际或理想地忠实于事实或事物的本质。威尔金森教授认为，这首诗缺乏纯粹而高雅的品位。例如，诗中有一种华丽、庸俗的风格，掩盖了其高尚思想的贫乏。“珠宝”、“甜美”、“柔和”、“温柔”、“明亮”、“高兴”、“美丽”、“光芒四射”、“丰富”、“庄严”等形容词层出不穷。评论家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点比较性的计算。阿诺德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六次“珠宝”一词，而弥尔顿和莎士比亚从未使用过，丁尼生也只用过一次。《亚洲之光》只有 4500 行，而《失乐园》有 10500 行，但在前者的诗

中，“甜美”一词以某种形式出现了 69 次，即每 65 行出现一次，而在弥尔顿的伟大作品中只出现了 66 次，即每 159 行出现一次。在丁尼生的多部作品中，形容词“明亮”出现的次数比阿诺德的诗少得多，分别为 28 次和 24 次。“柔软”在丁尼生的所有诗作中只出现过两次，而在这首诗中出现了 24 次，以此类推。这种批评形式有其价值。给人的印象是，阿诺德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心，要把“光”写得尽可能“甜美”、“柔和”、“温柔”、“明亮”、“欢快”、“美丽”、“光彩照人”、“富丽堂皇”和“庄严肃穆”。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是，“爱情”一词，除去其转折词，在这本书中大约每 40 行就会出现一次，因此“整首诗都是相当爱情化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始（佛教）传说中，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夫妻之爱！这样的诗歌符合现实吗？评论家很可能会问：“这种变态难道不畸形吗？”

他（威尔金森）对这首诗的部分内容提出了更严重的指控：“诗中的描写有时有失道德风范”。塔尔博伊斯-惠勒在《印度史》中说：“文中所表现的感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诗人（阿诺德）为我们描述了佛陀在离世前最后一次造访宫殿，过着完整的苦行僧生活。我们无需引用阿诺德的大量语录来说明这一点。威尔金森教授说，这幅画是“道德败坏的作品，也是诗人品味低下的作品”。这个“过度感性的描述”，尽管巧妙地将整个场景描绘成纯真和爱情的场景，但它是“一部道德败坏的作品”，这与历史不符，

这一点可以参考原始（佛教）传说。在这个（佛教）传说中，王子要与四万名王后分离，过苦行僧的生活，以便成佛（知者）：“有的在打哈欠，有的衣冠不整，有的又在咬牙切齿，有的在睡梦中哭喊，有的口吐白沫，有的不安地翻滚着身体，摆出不体面的姿势；因此，这个地方不久前看起来还像德瓦拉卡（众神的居所）之一，现在看起来却像一座炼狱”。我们读到，佛陀“对他所看到的感到厌恶”。

但我们已经进入了评论家工作的第二部分。这首诗忠于历史吗？这首诗中的佛教是否符合现实？评论家无可辩驳地声称并证明，我们在阿诺德的书中看到的是夸张和伪造。我们必须求助于现有的唯一的历史和传说，阿诺德也是根据这些历史和传说创作了他的诗歌。著名的东方学家和系统的学者对这些原著进行了翻译和阐释。斯本斯-哈代（Spence Hardy）无疑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他长期居住在佛教大国锡兰。哈代先生研究并忠实地翻译了构成佛教圣典的书籍。著名的东方学专家里斯-戴维德博士和印度文学的资深学者莫尼尔-威廉斯教授等人都是权威人士，他们对原著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我们必须从中了解其真实性。这一点我们在“亚洲之光”中找不到。首先，原著中的乔达摩并不是阿诺德先生所说的“光明”。威尔金森教授的指控是这样说的：“因此，我不会说阿诺德先生蓄意摘录《圣经》中的词句，这些词句因与耶稣有关而被基督教的想象力和基督教的心灵所接受，并将其应用于乔达摩，以欺骗惊讶和困惑的心灵，使其半信半疑地认为，耶稣

毕竟只是一个或大或小的类中的一个，而乔答摩是其中的另一个，是同类。但我可以说，而且我也愿意说，如果阿诺德先生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险恶目的，他不可能选择比他的实际情况更合适的方式来实现它”。阿诺德先生有意无意地在传说中加入了更多的内容，使他笔下的英雄成为“最高尚、最温柔、最仁慈的人，只有一个例外”。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把佛陀描绘成以基督徒的感情来爱他的妻子，并巧妙地描绘了佛陀为了过苦行僧的生活而离开了他亲爱的妻子这一伟大的故事。但（原始）传说中并没有这样的情节。我们知道，他“厌恶地”离开了家，“就像一个人被告知他的房子着火了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佛教作为一种体系，不会在这首诗中忠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是通过作者的想象力折射出基督教之光的东西。在哈代这样的翻译工作者的翻译中，我们可以更真切地看到佛教，哈代在其作品的序言中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工作.....：

“在编写本手册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一个目标——什么是佛教？对这一主题的浓厚兴趣、强烈的求知欲、诚实的态度、在信奉这一体系的国家的长期居住、日常使用我主要翻译的语言以及与释迦牟尼佛僧侣的长期交往，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优势。我不知道自己遗漏了该体系的任何重要特征。佛教作为一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教的翻版，更严格地说，是婆罗门教的翻版，理论上忽

略了种姓的压迫制度。在佛教中，婆罗门教的‘吸收’教条以‘涅槃’（nirvan）或‘寂灭’（anniversal）的形式再次出现，如果说它与‘吸收’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话。佛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着虚假的联系。但是，两位著名的权威，里斯-戴维德博士和马克斯-穆勒，都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历史联系，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根本没有联系，除非佛教中一定有某些真理，而所有真理都是相通的。那么，这个在某些方面已成为时尚的、被吹捧为几乎等同于基督教、甚至高于基督教的体系究竟是什么？它不是宗教，因为它没有上帝，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崇拜。相反，它是一种具有生存哲学的伦理体系，必须根据其伦理和哲学主张对其进行评判。”

阿诺德先生在他的诗的最后一卷中似乎有一种佛教解说词，威尔金森教授告诉我们，很难将其与“纯粹的废话”区分开来。这些诗句为这一体系提供了可信的证据。然而，当我们翻阅一位毕生研究该记录的人的忠实译本时，我们就会了解到佛教的道德是什么。我们发现，佛教的诫命因案例分析和法利赛式的改良而变得毫无意义和不切实际。举两三个例子来说明：首先，在佛陀的诫命中，不得夺人性命。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摩西禁令中的谋杀，而是剥夺任何生命。这里没有死刑的规定，而且禁止摧毁所有单纯的动物生命，哪怕是一只昆虫。请注意为这条诫命编织的理由：“如果投掷飞镖或标枪的目的是夺取某人的生命，而武器却杀死了另一个人，这就不是谋杀”。“当命令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

点——以特定的方式——用特定的武器夺取特定的人的生命时”，而杀人的行为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不满足这一切，“这就不是谋杀”。同样，以禁止说谎为例，在定义谎言本质的其他评论中，有这样一句话：“谎言的本质是什么？”除了“欺骗”和“谎言足够逼真”的评论之外，还加上了第三条和第四条评论：（3）“必须竭力阻止对方了解真相”。（4）“受骗者必须不能发现所告诉他的并非事实”。最明显的谬误也可能因为这样的教导而变成真理，或者至少不必被认为是谎言。

关于两性的相互关系，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书中提到了许多不可接近的妇女类别（而不是关系），整个注释让有邪恶倾向的人可以接近妇女类别。然后，“有四件事是构成这一罪行的必要条件：1. 必须有一个人是非法接近的。2. 必须有邪恶的意图。3. 必须有某种行为或努力将该意图付诸实施。4. 必须实现这一意图”。这一切是多么地低于耶稣及其使徒的简单教导。评论家说得好：“如果佛教道德能够游泳的话，就让它带着这样一块磨石游泳吧，它的脖子上打着一个谁也解不开的结”。

提到佛教体系中的妇女问题，就能说明佛教道德的这个问题。斯坦顿夫人（C. Stanton）最近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试图指责基督教在对妇女的评价和对待妇女的方式上低于其他宗教。尽管与佛教相比，保罗在妇女和婚姻问题上的言论似乎有些强硬，但他的训诫却触动了人们对妇女的温柔体贴，

他也承认许多妇女的辛劳，她们是他“在基督耶稣里的帮手”——其中包括与丈夫一起为他“舍了颈项”的百基拉；马利亚，她“给了我们许多恩惠”；雅尼娅，“使徒中值得注意的”；“亲爱的珀西丝，她在主里多有劳苦”，还有“在主里劳苦的特里芬娜和特里福拉（一位或两位女士）”。谈到佛教，我们会发现许多硬邦邦的说法与对女性的任何正确评价都不相符。事实上，在一个教导只有在转世轮回中改变性别，女人才能获得至善的体系中，对妇女的评价怎么可能不是这样谬误的呢？这种评价是什么：“女人性急，爱争吵，怀恨在心，恶贯满盈”。佛陀说：“任何女人，只要有适当的机会，能够暗中进行，并受到引诱，就会做出错误的事情，无论妍妇多么丑陋”。虽然佛教中有诫命教导丈夫要对妻子和蔼可亲，但正如可以清楚看到的那样，这是男人对“他所拥有的女人”的和蔼可亲，引用文献中的话，这意味着女人的劣根性。在追求最高的善，涅槃，无论是毁灭（寂灭），还是他们认为是永恒的无意识的安息的幸福时，候选人“必须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必须避免所有会导致他生为女人的罪孽”。

很明显，基督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异之大，让比较变得可笑。让任何人认真、诚实地研究这两种制度，研究这两种制度最早的文献，他一定会确信，一种似乎是神圣的，而另一种则是尘世的。《新约》的历史和教义直白、简单、崇高，而佛教的传说和教义则朦胧不清，细节轻浮、不切实际，令人厌烦。耶稣在朴素、纯洁和威严方面是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佛陀是一个梦幻般的隐士，

关于他的琐碎细节在传说中比比皆是，但其存在本身却受到怀疑。

至于这两种制度的实际结果，人们似乎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基督教使国家和世代得到了幸福和提升，而佛教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印度、中国、日本——这些都是佛教活动的主要地区——日本是佛教传播到的最后一个国家，回顾佛教在那里的历史和影响，马克斯-穆勒写道：“当然，日本已经成熟，可以做得更好”。撇开传教士在这些伟大领域的见证不谈，似乎几乎无法忽视的是，通过任何普通的观察方式或对事实的解释，任何人都无法不看到佛教是多么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即使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从历史中看到耶稣对人类所做的伟大工作。莱基在谈到基督教时说，“事实上，它在激发人类情感、促进虔诚、创造纯洁和仁慈的理想方面的作用，可能超过了有史以来对世界产生的任何其他影响”。根据里希特的名言，耶稣“在强者中最神圣，在圣者中最强大，他用那只被刺穿的手，将帝国的大门从铰链上掀开，将世纪的溪流从它的渠道中扭转过来，并且仍然管理着时代”。

这两种体系对人类命运这一可怕问题的回答存在着多么难以估量的巨大差异。在佛教中，到头来，所提供的最高福祉并不是具有任何积极价值的存在，而是凄凉的“涅槃”（寂灭）——某种非实体的空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基督教体系中，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理念，那就是当下实际的圣洁生活，以及通向未来幸福生活的自觉喜悦和崇高活动。”亚洲之光”的评论者（威尔金森）让

这本书和佛教体系显得十分遗憾。但他（威尔金森）并没有对这一体系（佛教）不公平，他本可以更充分地说明这一体系（佛教）的“空洞和琐碎的特点”；但他没有这样做，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是出于“对读者仁慈的考虑”。对于他的处理方式，他（威尔金森）说：“佛教没有正当理由抱怨。这个体系很容易就会显得更加荒谬”。但是，对于那些因一时的多愁善感而将目光转向这盏可怜而昏暗的“灯”的人来说，评论家的告诫是及时的：“当伟大的太阳自己已经坐在清晨点燃的天际线时，你还在为暮色中的流星吟唱颂歌，这是多么愚蠢啊！”

REV. DR. 霍华德-克罗斯比博士说，有一类人喜欢标新立异，他们喜欢任何奇特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并加以鼓吹。我在这个城市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喜欢搞怪才信佛的，他留着长发，戴着宽大的帽子，到处宣讲佛法。另一个有可能成为佛教徒的阶层是浪漫的年轻姑娘们。她们喜欢那种含糊不清的情感，喜欢抓住任何朦胧的东西，并认为这非常令人愉快。第三类人喜欢邪恶，基督教要求心灵纯洁，而他们无法忍受这一点，他们会去做任何能让他们心灵不纯洁的事情。

我相信，在英国和美国，所有自称热衷于晚期佛教的人都包括这三类人。我想你会发现，那些生活在光明中的人是那些热爱基督、热爱基督教的人。

REV. DR. DEEMS说： 有些人希望成为无神论者，但又有某种宗教信仰。佛教正适合他们。佛教似乎是一种宗教。如果它是一种宗教，那它就是完全无神的。如果我想宣传无神论，那我就会打着佛教的幌子。

=====

=====

=====

=====

=====

=====

=====

=====

=====

=====

遗传，而非宿命论。

[以下内容是《社会心理学》一文的结尾，该文在《双月刊》上连载数期。]

译者：已故 J. G. 威尔逊博士

我想总结一下这篇长篇研究的结论，用几个简单明了的命题把它们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心理学秩序中，遗传是一种影响，而不是一种宿命。它通过我们的本能、种族特征、生理冲动和诱惑渗透到我们内在的中心。但是，除非是在病态的情况下，它并不会支配道德人格，使其丧失自我，造成不负责任。然而，尽管遗传只是一种影响，或者说是多种影响的结合，我们仍应极其谨慎地加以防范，尽可能地加以打击和压制，以免它成为我们后代生活中的沉重负担。它在几代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团结法则，使我们对自己的责任加倍，对后代的责任也加倍。我们对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一个人可能会在许多方面损害其子孙的道德健全，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许多机会传播自己的真正的、非自愿的愚蠢行为，而且——还因为他本应该有效防治的某些精神疾病的萌芽；因为在违反健全的生理规律的情况下缔结的婚姻；酗酒的习惯造成了严重的精神错乱，在这种情况下怀上的孩子也会因此而堕落；甚至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造成了大脑的疲劳；或者是由于过于自满地培养了古怪的情绪；由于习惯性的亢奋或忧郁，一个人可能会像哈姆雷特一样被置于愚蠢的运动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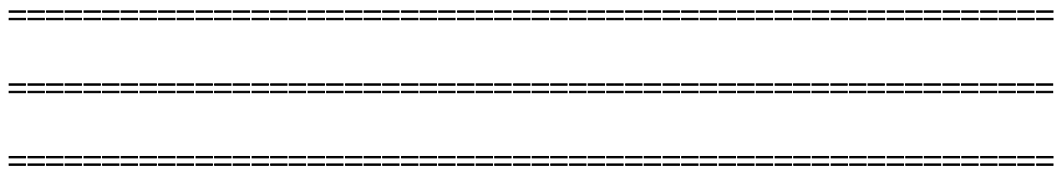
想想我们对种族未来的历史所承担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就令人不寒而栗。一个恶习，一个嗜好，都可能在无法亲身体会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样，良好的习惯、对高尚纯洁情感的喜好、

高尚的思想修养和对意志的孜孜以求，都可能最愉快地改变一个人的天性，甚至是可传递的气质。因此，我们自身就有一种传递邪恶的能力，一种生理或本能上的原罪，我们可以将这种原罪减弱或削弱。祖先的后代不认识他们的祖先是谁，每一代人都会受到正义和慈善法则的约束。我们的道德教育绝对有必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在影响人类的所有因素中，逝者是最强大的因素之一。一个早已逝去的人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不否认任何这些影响的前提下，我们正视它们，衡量它们，在确定了它们在生活中的位置之后，我们努力限制它们。我们努力证明，在每一个生命体中，都有一种摆脱了遗传规律的个性因素，在人身上，这种因素使自己的个性得到了升华。人的自由是生命的终极。因此，人不仅仅是商业力量相互作用的脆弱产物。他是一种有别于其他任何生命的存在，能够通过良知和自由无限发展。尽管我们遇到了来自外部或我们自身所承受的所有影响，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着自我意识、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这种不可与任何其他因素相提并论的因素，体现在每一个自由行为中，它是对遗传法则的抗议，它在所有真正道德的生活环境中中止或抑制了它（遗传性影响），它开始了一系列新的行为。

总之，它（自我意识、自我认知、自由意志）摒弃了懒惰的宿命论的过于简单的借口，从而产生了责任感。它体现在教育中，即我们自己给予自己的教育，以及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的教育；后

一种教育是双重意志的行为，是他人的意志对我们的意志的作用。它体现在性格的形成上，这部分是人自己的工作，是人的道德生活的表现，是人经历的斗争和考验的活生生的历史。在特权阶层的形成过程中，在选拔他们的勇气或优点的过程中，以及在使他们走向毁灭的衰落过程中，它都发挥了作用。最后，人类个性中最不可否认的表现和最引人注目的因素，即它的社会启示，就是进步的历史。遗传所能解释的只是后天状态的传承；它所能解释的最重要的现象集合就是文明，也就是说，正如它所定义的那样，一个社会在任何特定时刻的资产表与负债表，它所拥有的坚实的、固定的、储存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思想、情感、制度、工业资本、科学和道德。进步的，或者演进的，即获得一种新的状态，一种新的艺术、工业和科学的风格，是每一种和所有决定前进和运动的效果。这是一次成功的伟大创举。不再向前发展的文明，是那些被世袭、传统和例行公事所浸透的文明。一旦努力停止，流动和生命停止，停滞就开始了，颓废就近在眼前。因此，这两个原则（流动和生命）的作用非常明显。在知识和社会秩序中，遗传起着保护作用；在生命的斗争中，自由起着创造作用。未来属于那些懂得如何将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并在持久的行动中加以协调的个人和民族——主动性和对过去的尊重。





音乐对思想和心灵的使命。

[1886年8月18日在新泽西州Key-East的研究所暑期班上发表的演讲]。

演讲人

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本杰明-C-布洛吉特教授。

本演讲的主题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引起我国专业音乐家队伍以外人士特别关注的问题。在本世纪初，美国的音乐实践几乎完全局限于吹号管，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而在有文化的人中间，古老的清教徒格言“一个基督徒少女甚至不应该知道什么是笛子或琴”似乎根本没有过时。从那时起，音乐作为艺术和科学，在所

有文明世界的发展都是现代史上的奇迹之一；而在任何其他国家，音乐的发展都不像我们的国家那么明显（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四分之一世纪前，英国人曾嘲讽道：“谁会读美国人的书？”现在看来，英国人的回答并不比同时期德国人的嘲讽更果断：“美国人懂什么音乐？”

从最微薄、最不被看好的起点开始，音乐品位一步步提高到了与“歌曲之乡”本身相当的水平。四十年前，巴赫或贝多芬的大师级作品在我们最大的城市都无法得到欣赏者的聆听，而今天，这些作品中的任何一部在德国都不比在这里更为人所知，而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已经开始把美国公众的认可视为他们可以追求的最高荣誉。

然而，尽管人们对音乐的热爱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对这一切的意义和价值却知之甚少。我认为，有识之士普遍认为，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标志和手段，但稍加调查就足以表明，这种舒适的观点并非基于对艺术原理的理解。必须承认，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流行音乐。我们在普通的音乐厅、海滨酒店，甚至在家里最经常听到的音乐，无论是否装腔作势，都不值得认真思考。它只能与手摇风琴的可怜曲调相提并论，就像汉斯-布赖特曼（Hans Breitmann）的愚蠢粗俗与真正的诗歌、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咆哮与真正的演说、我们铁路沿线围栏和岩石上的涂鸦与提香和透纳的艺术一样，与真正的音乐毫无共鸣。我不否认，

这种所谓的流行音乐可能具有某种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性质下，它能给气氛增添一种感官上的愉悦，这并不完全值得鄙视，但其效果纯粹是感官上的，根本不是精神上的。

此外，还有某些种类的音乐，它们被迫引起公众的注意，对人们的感情和思想产生更强大、更坚决的影响；例如，军乐，在现代历史上，它不止一次地激励士兵们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看似不可能的英雄气概，而且，正如 1854 年在因克曼（Inkermann）所发生的那样，它在我们眼前重演了耶利哥在进攻者的号角声中倒下的古老奇迹。

舞厅音乐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享乐者的青睐的，因为它具有诱惑力，能够创造和强化舞蹈所带来的情感和欲望。

医生们普遍认为，音乐的某些特质在使神经系统的紊乱状态安静下来方面具有价值；一些作家认为，音乐的某些乐段对他们具有刺激精神活动、驱散想象力眼前的迷雾、帮助完成可靠而令人满意的智力工作的作用。我的研究曾一度进入了一位化学家好友的实验室，他带着善意的赞美向我保证，我的钢琴演奏对他进行最困难、最令人不快的操作大有帮助。

不过，尽管音乐的这些应用和其他应用可能很有价值，只要仔细研究其影响的秘密，就能或多或少地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些说明，

但我此时此地并不关心它们，我更关心的是音乐与人的心理和精神存在的本质关系，这种关系是这些应用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就像物理学中太阳光的交织与眼睛的关系，或共同和弦的声音与耳朵的关系一样；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是真正的音乐理论或由音乐产生的最优秀的文化进程的唯一基础。

芒格博士一年前在本研究所发表了题为“音乐，上帝和未来的启示”的演讲，这是对这一一般性论述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最新论述之一。他在讲话中极力主张，科学是真理和规律的启示，要由人的理性来接受，声音也是感情的启示，要由人的感性来接受。一个由反复无常的神所统治的世界是不可能科学的，因此，在一个没有感情、没有同情、没有爱的神的世界里，音乐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并没有断言眼睛或触觉所接收到的印象无法唤醒情感，但我们断言形式和物质的介入会严重阻碍情感的产生，因此它们必然会迫使人们首先和主要地关注音乐，直到音乐被唤醒。

而在音乐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隔音乐作品所产生的精神状态和听众的接受精神。音乐本身就是纯粹感情的表达，它对感情有着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引用芒格博士的话：“诚然，我们可以通过视觉来观察和感受，但如果造物只通过眼睛展现给我们，我们所感受到的就会远远少于我们所知道的。因此，如果我们用眼睛观察造物，发现万有引

力和结晶的数学规律，从而推断出这些规律背后有一颗心，通过这些规律与我们的的心灵对话，那么，如果我们用耳朵聆听触动我们心灵的声音，就会推断出声音规律背后有一颗心，试图通过这些规律向我们揭示它自己”。

因此，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艺术不仅仅是莱布尼茨所认为的“神秘算术练习”，而甚至是向我们揭示和传达上帝之心的情感的杰出手段，也是我们向我们的伙伴解释这些情感的杰出手段，那么我的演讲主题就会比通常赋予它的意义更加重要、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音乐对我们的思想和心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它与我们精神和道德品质的发展有着同样重要的关系，正如它对我们品味的提高和我们所谓的审美能力的正确发展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有人可能会对这一立场提出巨大的主观论据辩驳。有人会反对说，许多杰出音乐家的传记，以及我们普遍观察到的有关普通音乐家，甚至我们所认识的杰出音乐家的精神和道德状况的事实，似乎都不能证明他们有一个真正的音乐家的高尚品格。

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理论。在我的论证中，很难对这一反对意见做出明确的回答，但如果能立即提醒我们：（1）由于每个真正的音乐家天性的敏感性，他特别容易受到某些种类和暴力的诱惑；（2）

音乐与其他任何艺术一样（但比其他任何艺术都更敏感、更有灵性），可能会成为不纯洁的感情、变态的想象和不圣洁的情感的载体。因此，它可能会产生腐蚀性的影响，并被迫为罪恶服务，使屈从于它的力量的人堕落和感性化，而不是提升和灵性化。(3) 如果我们试图解释音乐在某些情况下显然无法实现这里所说的对它的所有期望，那么公共生活的反作用力，以及每个人都会受到的无数诱惑，往往足以压倒人类对品格的最有力的渴望——这些肯定不应被忽略。(4) 许多在艺术殿堂中担任领袖的人，被同时代的人公认为艺术精神和力量的代表，却对艺术的真正品质一无所知，也没有受到艺术净化作用的影响。他们对真善美最崇高的启示充耳不闻，这些启示以愉悦感官的和谐之音沁入敏感的心灵，他们无法了解伴随着这些启示而来的对思想和情感的真善美的诱人劝导，而这些劝导对那些能够并确实接受它们的人来说是如此有力和珍贵。

因此，我们承认，所有的艺术，就其精细程度而言，都可能被亵渎，因此，音乐作为艺术中最精细、最有灵性的一种，可能是所有艺术中被亵渎得最彻底、最有害的一种，但这种亵渎总是显而易见的。高雅艺术是不会屈服于亵渎的，它的所有言语都会颤抖着提出抗议，并使其失去所有动人的优雅和崇高的尊严。

因此，我在此提出我的第一个观点：音乐与我们内心和周围最美好的事物息息相关。最美好的情感、最崇高的志向、最甜美的情

怀，都与音乐息息相关。

并不是我们日常交谈中表达的所有思想都能在音乐中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并不是每一节诗歌都能被吟唱出来。只有当思想高尚而细腻时，其相关的情感才会借助音乐来表达。不是 Thespis 的喜剧，而是 Sophocles 的高雅悲剧；不是 Corneille 和 Molière 的杂耍，而是 Racine 和 Goethe 的高级概念；不是 Dean Swift 的琐碎，而是 Thomas Moore 热情的爱国主义和细腻的心灵启示、这些都是我们的音乐艺术一贯并不断进行的鉴别。门德尔松无法创作歌剧，因为他找不到，而全世界的文学作品也无法为他提供一个值得一写的歌词。对他来说，音乐是一门过于高雅的艺术，不能与庸俗或通俗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装腔作势、油嘴滑舌和阴谋诡计与音乐的天才和使命完全不相称，因此他搁笔了。亨德尔在创作《哈利路亚大合唱》时所经历的那段耳熟能详的经历，标志着他关于音乐的使命和事工的理论出现了危机，比传记作者向我们介绍的他的思想或生活中的任何其他方面都要明显。他们说，他变得举止温和，对伤害无动于衷，热心虔诚，善待不幸的人，等等。对我们来说，关于他的重要事实是：直到 1741 年，意大利最鄙陋的文字作家的庸俗讥讽和猥亵足以唤醒他的音乐抱负，激起他的最高渴望，而从他的灵魂获得卓越荣耀的那一刻起，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有能力用歌声唱出在他心中诞生的神圣情感。从“Laschia ch’io pianga”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从《里纳尔多》的感性曲调到他的清唱剧的铿锵有力。在这个问题上，

你从哪个方向寻找证据并不重要；音乐可以被篡改，可以被迫为最低级的服务服务，但它会彻底丧失音乐中的精华。然而，如果你想寻找真正的音乐，它不仅能愉悦听众，还能提升和发展听众的思想和心灵，你就会发现它的基础在于作曲家和诠释者的精神和道德品格。关于英雄主义、爱情、苦难或崇拜的诗歌，为了能与歌曲完美结合，它们的情感必须是高尚而美好的。如果音乐要汇聚其核心精神，并像精致而生动的香水一样沁入人们的心田，那么夸夸其谈就不能代表骑士精神，感性主义就不能代表纯洁的感情，庸俗的感伤主义就不能代表真正的高雅，虚伪就不能代表宗教。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音乐——成为经典的音乐——都是纯美情感的表达。在物质世界中，没有比优胜劣汰更不可阻挡的法则了，音乐也是如此，它将有价值的与无价值的、真诚的与虚伪的、有益的与强化的与令人颓废和堕落的区分开来。帕莱斯特里纳的弥撒曲、巴赫和亨德尔的清唱剧、贝多芬的交响曲以及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对各个阶层的人所产生的奇妙而不衰的力量，人们并不总是知道其中的奥秘。心理学的任何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一点，也无法为其提供任何可观的启示。唯一的解释在于，作曲家心中纯洁而崇高的情感被一切真正灵感的神源唤醒，并注入作品之中，在创作过程中虔诚而顺从地遵从属于音乐本质的形式和诠释法则，因此，当听到这些声音时，我们的心灵捕捉到了精神的震撼，我们被唤醒并与之契合，这与我们精神本质的敏感性和接受性成正比。

如果音乐与我们内心最美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一定是上帝的，并在为我们工作的神圣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确信，这些力量胜过反对我们的力量。它必须特别适合表达宗教情感，所有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历都满足了这一期望。

芒格博士在前面引述的演讲中不仅表明音乐属于宗教，而且表明它与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说：“在音乐的鼓动下，人们能更好地战斗，但没有音乐，他们也能很好地战斗。商业不需要音乐。快乐需要它，但声音和年轻生活的热情可以弥补它的不足。法律的制定和法庭的辩护都不需要音乐。生活中的每一个部门都可以不需要它，只有一个部门需要它，而且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会有缺乏，但不会失去功能。但是，宗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事物和崇拜，没有它就无法存在。它将最崇高的乐器据为己有，不拒绝任何乐器。它吸引着伟大的作曲家，首先使他们适应自己的气质，然后让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总是被证明是他们最伟大的作品”。

音乐拒绝与我们日常交往中的普通情感发生任何必然联系，而只认同其更高层次、更罕见的体验和共鸣，它将自己的选择之手伸向了宗教生活中最深沉、最神圣的情感，并将其所有令人惊叹的丰富的强化和表现资源用于帮助升华这些情感。

“新的激情在我们心中被唤醒、

没有名字的新激情；
朦胧的真理，我们只知道是幻影、
在火焰中清晰明亮。
灵魂充满渴望、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宽广和延伸；
我们听到无声的奇事
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想法已经有人提出过，但由于与我的主题有关，它需要更具体的处理：这就是，音乐既不是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思想的表达，而是感情的表达；音乐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的、预定的东西。它并不立即关注信念和观点，而是关注内心的基础情感——爱情、喜悦、悲伤、畏惧和信仰，这些都是由此而生的。一个只会思考而不会感受的人可能是一个统计学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哲学家，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缺乏精神本质的元素，而只有这些元素才能将自己注入艺术的形式之中。同样，一个没有感受力的人，要想在艺术作品面前留下深刻印象，也是完全失败的。无论他能得到什么，他都无法得到内在的精神——对艺术家来说，这种精神就是一切和全部——因为他缺乏接受能力，而只有这种接受能力才能让精神显现出来。你一定记得乔治·麦克唐纳在描述约瑟夫·贾斯帕的音乐效果时说：“一个人不可能理解音乐，除非他对音乐谦卑，必要时同意不理解音乐。当一个人静下心来，顺从地打开心灵的耳朵，只要求聆听时，当问题的

涨潮退去，个性静止时，音乐的雨露就会找到通往它们的道路，浸透并沉入心灵的泥沙，向下，向下，远远地，在思维场所的下面，向下，到达音乐的区域，那里是灵魂的隐秘工场，那里是准备好神圣材料供人去创造的地方”。“艺术的功能是看到并描绘无形的、理想的、与宇宙法则和神国的真实关系；为无知的大理石注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完整的生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熠熠生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栩栩如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轮美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叹为观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心旷神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心潮澎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振奋”。

只是，无论是表达者还是接受者，都必须坚定地忠于真理，以免混乱的幻想遮蔽了清晰的视线，神圣的声音也在世俗的欺骗性歌声中迷失了方向。关于音乐的性质和影响，已经有很多论述，但由于在这一点上的错误，这些论述都是虚假和误导性的。思想与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们自身意识的启示中，以及在对周围人的行为和动机的观察中，都在不断地引起我们的注意——每一种都对另一种产生控制和塑造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有可能把它们想象成是不可分割的，而不能认识到它们各自受到的影响。因此，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确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即音乐直接诉诸于人的情感，以不可抗拒和无与伦比的力量对他们施加影响。正如科学是思维从它所承认和接受的固定规律中推导出来的一个系统——是智力的产物，是针对智力的一外部世界是一个物质结构

（无论它如何与精神相通，对于隐藏在物质背后的精神意识而言），通过五官吸引着人的品性——义务、责任、对与错都是通过人的五官来理解的、因此，作为上帝向他的儿女们亲自显现的感觉世界，不是针对他们的感官，也不是针对他们的头脑，而是针对他们的心灵——这些东西都是灵性的。只有在心与心的接触中，通过爱的彰显唤醒爱，通过与“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父的独生子”的灵性接触和相交，在人的心中产生圣洁的欲望和情感，救赎和灵性生命才得以实现；正是这个充满恩典、美丽和公义的情感宇宙，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推动着自己与人类交流的每一种方式，无论是来自自然世界还是心灵世界，它创造了艺术，作为更直接接近人类精神的一种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精神交流可能性的扩大，一种艺术形式又取代了另一种艺术形式，直到在音乐中，我们有了一种无限的艺术，它不受形式和物质的阻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媒介。

这种纯粹的精神媒介拥有比人类语言更精细、更灵活、更广泛的词汇（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尽管它汲取了演说和戏剧的所有恩惠和诱人的说服力——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是我们所能触及的、能对心灵产生影响的、任何其他影响所无法比拟的力量。但是，有人经常对这种艺术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正是我试图证明其至高无上性的依据，即这种艺术的作用领域是情感生活。有人认为，任何激发情感的东西，如果没有直接的原因或明确的

行动目的，都会削弱和降低人格；构成人格的是高尚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是高尚的欲望、情感和想象；构成宗教生活的是英雄主义、荣誉和慈善行为，而不是信仰、希望和爱的精神氛围。这种观点的肤浅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正如在人类生活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支配意志和推动动机一样，在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想的背后和下面，也有我们天性的基础领域，那里有我们的爱、欲望、愿望和精神感知；有我们的信仰和希望，无论理智遇到什么困惑，无论认识遇到什么困难，这些信仰和希望往往都不会放弃对我们的控制。

正是这种中心自我的特质——情感的存在——赋予了思想和生活所有值得或不值得、强大或弱小、虔诚或邪恶的特征；正是在这种中心自我中，在理性和意志之下，在这个控制情感的区域中，神圣的艺术带着它对真、美、善的催人奋进的启迪，它为想象力提供了崇高和高尚的理想，它对纯洁、高尚和高雅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最诱人的说服力。

当今时代自诩为实践主义；但除了荣耀的无可置疑的优点之外，它还包含着许多无益之处，相反，对品格和文化都充满了危险。如果这种对实践的神化所教导的人生哲学抛弃了理想，使我们在生活或思想的任何领域都受制于所看到的和已经达到的目标，如果它暗示，高尚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任何可考虑的动机或动力，或者这种情感、思想和行为的任何有价值的回报，都是世俗的一

功利的——认真地关注我们物质生活中的普通问题，——那么它不仅是最有害和最具破坏性的，而且这种实用主义（实践主义）在最大程度上变得不实用，——因为为了忠实于自己，实用主义必须在所有方面以确保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回报为目标。实际上，忠实于自己的日常义务的最高动机，不，是唯一充分的动机，是在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东西之外——在情感和信仰的领域，即在内心和超越的领域。诚然，虽然有些梦境只是无序幻想的无序运作，但有些超凡脱俗的幻象则是纯洁灵魂对精神世界的清晰展望，是沿着上帝向我们揭示的在其广阔领域中运作的普遍规律的路线。因此，世界上真正的诗人、画家、音乐家都是历史的先知，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明眼人，是真正的哲学家，是文学艺术的启蒙者，是实践的导师，是人类的拯救。

有人又说，由于艺术本身不一定具有道德性，因此可能成为不道德的激情的载体，由于艺术的影响是在理性和意志的领域之外施加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理性和意志的支配，使思想和心灵屈从于艺术的影响所带来的危险超过了从艺术中期望得到的对道德和美德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反对艺术的人说，多少次，舞厅音乐的阴险淫荡足以从善意的男人和少女的心灵中熄灭一切道德痕迹；音乐家们又是如何借助他们的艺术，将最庸俗、最败坏风气的情绪渲染到二十年前意大利歌剧令人作呕的歌词中！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对意见和前一种反对意见一样，都说明有

必要明确而仔细地地区分两种艺术，一种是建立在正确的道德品质基础上的艺术，是表达纯洁、美好和高尚的感情的艺术，另一种是由于其起源、目的、关联或精神而显得琐碎或令人陶醉的艺术，即使不是不纯洁和堕落的艺术。然而，音乐对思想和心灵的内在价值，以及在有利的条件下和在上帝的祝福下对音乐的合理期望，远远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音乐可能出现的变态现象构成了有利于音乐的有力论据，就像心灵在失足时可能堕落到深渊一样，更加深刻地说明了音乐所具有的美德和力量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忘记，音乐的本质和历史决定了它必须受到有益和健康的影响，音乐尤其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宗教是音乐精神最真实的体现者，也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音乐的细腻、狂热、虔诚和崇高可以得到诠释，并深深地打动人心。两代以前，一位古雅的作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罕见地清晰而准确地解释了音乐的这一功能：“音乐是一种语言；她向心灵的情感诉说着语言只能向理解诉说的东西。她的旋律与和声，经过适当的组合和恰当的演绎，能够理解并奇妙地超越一切修辞的力量。神学与音乐结合在一起，携手前行，穿越时空，并将永远继续说明、美化、强化、打动和固定基督教宏大而重要的真理”。在文章的后面，作者说：“音乐，作为一门科学，给人以理解的乐趣，是理性思维的盛宴。作为一门艺术，它给人带来听觉的愉悦，并通过听觉穿透心灵，渗透灵魂的所有力量。它对人的影响也是惊人的”（安德鲁-罗。《音乐论》。费城，1814年）。

一种音乐能激发人的怜悯、宽厚、温柔和爱，另一种音乐能激发人的勇气，还有一种音乐能激发人的悲痛、哀伤和哀悼，或激发人的庄严、敬畏和虔诚以及爱的情感。诚然，还有一些音乐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激起和助长堕落心灵的邪恶激情。我们应该培养这样一种美好音乐，它本身的性质就是为了防止心灵的邪恶倾向——引导灵魂走上理性和正当的道路，激发虔诚的情感，促进庄严的献身精神，提高灵魂赞美上帝和羔羊救恩的热情。

我们可以引证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众多作家和人类思想的各种语言，以表示对这一见证的赞同，并证明我们的艺术不仅具有履行这一神圣使命的神圣资格，而且在人类的各个世代中，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歪曲，但它的传道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是在思想上，也不可能将其从我们内部和周围的正义力量和影响的阵列中减去，否则就会篡改所有的历史，否定人类最精选和最好的经验。爱国主义、奉献、忏悔、信仰、爱、悲伤、喜悦、胜利这些最美好的心灵共鸣，如果没有音乐这门艺术中的艺术的传授，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完整的表达，它能够穿越心灵体验的整个范围，以完全属于自己的真实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诠释心灵体验的每一个阶段。只要我们愿意给它空间，它就会进入我们更高层次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为我们的欢乐时光发出欢欣的声音，在患难时刻发出同情的温柔低语，抚平我们的忧伤，“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就将它们（苦难与忧伤）的锐利悄然带走”。

如果我们愿意在上帝的殿堂里向他（上帝）献上恰当而有价值的敬拜，我们会多么迅速而自然地，用音乐来诠释我们的愿望，发出我们敬慕和赞美的声音！在这样的时刻，尽管灵魂的情感常被世俗羁绊，尽管有世界的侵扰，但灵魂是如何被音乐的旋律所唤醒，就像插上了强大的翅膀，超越了那些令人不安的忧虑和疑云的干扰，直到上帝似乎近在眼前，上帝欢迎我们的珍贵感觉温暖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产生了虔诚的热忱！教堂建筑以其肤浅的方式努力为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中那些在宗教仪式期间参观过宏伟大教堂的人，都知道仪式是多么宏伟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种效果根本无法与管风琴音乐的震撼力相提并论，——管风琴音乐充斥着巨大的建筑，就像“万千竖琴与歌声”一样，将我们敬拜的喜悦和激情汇聚在一起；或者与会众齐声高唱合唱曲的宏伟气势相辉映，后者就像被压抑的洪水一样，将无数人心中的感恩之情倾泻而出。旋律的力量何其强大，它能卸下繁重的工作负担，以其诱人的安宁和平静唤醒疲惫的心灵！因此，在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都能发现天父在音乐中的仁慈供应与他儿女最深切的需求和体验之间存在着最奇妙的对应关系。

“哦，音乐！你当然是关乎对于上帝的崇拜、

 但你不像赞美或祈祷、

 比你甜美的旋律更好；

你是另一种崇拜、

一种神圣的流露、
因为那是崇拜的沉默之声、
如果它能成为声音，那就是你的声音”。

结论。

首先，如果我们同意这里所阐述的关于情感与智力和道德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学说，那么，音乐在情感领域对善良和纯洁产生强大影响的同时，必然能够以最具控制性和决定性的方式将这种影响传递给思想和心灵，促使人们产生崇高的思想和目标、加强对理解力提出的真善美的印象，增强对真与假、细与粗、高尚与卑鄙、温柔与庸俗的清晰的心理辨别力，并使意志倾向于接受和履行“一切真实、诚实、公正、纯洁、可爱和有美誉的事物”。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1797年他在米兰的一次演讲中说：“音乐作品，如果是大师的作品，永远不会不触动人的感情，并通过感情对心灵产生比一本好书更强大的影响，因为好书说服了我们的理智，却不会影响我们的习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是一位权威人士，其智慧的力量和道德品质的纯洁性无人质疑，他写道：“音乐声音的科学，虽然可能被贬低为只吸引人的耳朵，但可以公正地认为，它是将肉体与智力愉悦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我们该如何解释亨德尔、巴赫或贝多芬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他们必须与文学巨匠—霍默、丹特和米尔顿—齐名，但他们却承认，除了最基础的学校教育之外，他们的所有教育都归功于音乐？门德

尔松、舒曼和瓦格纳——这些人的天性、环境和历史迥然不同，但他们都是精神力量和道德活力的拥有者，都是具有清晰洞察力和哲学习惯的人，他们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却一致认为音乐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能够陶冶、锤炼和强化心灵，使整个天性与善良和真理产生共鸣。

难道伟大的能力或伟大的机遇不会使拥有者受到特殊的诱惑吗？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那些意志坚强、思想纯洁的人经常陷入最严重罪恶的可怕失误呢？罪的悖论确实令人费解，但它们在各行各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

还有一个奇怪而又无法解释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的创作者，他们的思想和言谈似乎常常不受其主要作品精神的影响。幽默大师通常都是思想严肃的人，而且常常是情绪低落的人。哲学家并不总是深思熟虑的人，甚至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学者。品味高雅的艺术家并不总是整洁的。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的天才和崇高目标，有时伴随着对最深的道德诱惑的压力和力量，这需要不断的警惕和祈祷才能克服。兰德爾说：“我不相信，最好的爱情诗作家曾经爱过”。画家们离开卑鄙的放荡场所，去描绘天国

的景象，演说家们在向人们宣扬爱国主义和美德的强大激励之后，又在野兽般的酒醉中回家。然而，尽管如此，即使是恶毒的艺术家向人们展示的真正的美也是来自上帝的，因为所有的美都来自上帝，都是上帝的美。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艺术家自己也感受到并承认它的神性，并努力（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是勉强和徒劳的）使自己的生活在适应它的精神。

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真正的艺术家都是非常例外的。他们具有敏感的天性和高尚的情操，内心本质上是虔诚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不断地、富有同情心地接受着最深沉、最崇高的宗教感情，以便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表达。他们也总是具有罕见的辨别力——能迅速识破奸诈，直指事物的核心。对世界的无知，对礼仪格言的不适应，思想和行为上的不完美甚至罪恶，这些都是可以解释的，——但不能否认他们天赋的神圣性；而我们发现，从古至今，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教会的还是民间的，都记载着他们为真理和正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正是对艺术的歪曲或偶像崇拜，使艺术在某些最辉煌的时期成为腐败和罪之奴役的时期。每当个人或群体以艺术的卓越取代品格，或以品位取代良知，他们就脱离了神圣的秩序，使艺术和品格都陷入无可救药的毁灭之中。在雅典，在那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崇

尚艺术的时代，当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刚刚创作出他们无与伦比的悲剧，灌输着最坚定的荣誉和美德的教诲时；——当“完美演说家”伯里克利的时代”，当画家帕尔哈西乌斯（Parrhasius）和宙西斯（Zeuxis）正值盛年，菲迪亚斯（Phidias）正用他的凿子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作品来装饰神庙时，——人们却忘记了老师的警告，在对艺术的偶像崇拜中变得庸俗，将艺术（而非艺术所要颂扬的神圣真理）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

于是上帝赐予了他们一个人，这个人虽然自己也是一个爱美者和雕刻家，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本人的外形和面容几乎是怪诞的，肩膀不平，鼻子上翘，嘴唇肥厚，眼睛突出，但他却拥有坚毅的品德，这是他的艺术的基础，使他成为他的时代最显赫的人”。——如果雅典听从了苏格拉底的教诲，不朽的美不在于风度，也不在于任何外在的艺术创造，而在于他们身上所应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和积极的美德，这种力量 and 美德在帕台农神庙的雕刻形体粉身碎骨之后仍将永存，——那么雅典可能会得到拯救，并有能力为基督教这一即将在世界上兴起的宗教作出光荣的贡献。

我们的音乐艺术曾三次被它的拥护者推崇到宗教崇拜仪式的首位，接受人们的敬意，而不是激励他们敬拜上帝和顺从真理；每一次，它都义无反顾地被当作篡夺者从上帝的殿堂中扫地出门。在这些案例中，错误不在于艺术，而在于对艺术的歪曲管理。

想想一个半世纪前莱比锡的那位伟人，塞巴斯蒂安-巴赫

（Sebastian Bach），他的清唱剧和康塔塔（cantatas）既是圣经注释学的杰作，也是音乐形式的典范，他虔诚的信仰和甜美的基督教精神被注入了那些庄严的管风琴作品中，尽管这些作品已经存在了整整一百年，但现在却仍然成为全世界音乐家的灵感源泉，其庄严和优美的情感就像东方的珍品香水一样散发给我们所有人。

亨德尔说过，在他创作《弥赛亚》的 21 天里，他似乎看到了天堂被打开，上帝的天使升天又降下。在写到“他（耶稣基督）被人藐视，被人弃绝”时，他泣不成声，这首伟大清唱剧的原始乐谱都被他写作时的泪水弄得模糊不清。

海顿告诉我们：“当我创作《创世记》时，我感到自己被宗教感情深深地渗透了，在我坐下来写作之前，我恳切地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使我有价值地赞美他”。

贝多芬是一个虔诚敬畏的人，具有崇高的信仰、无私的奉献精神 and 英雄般的自觉性；门德尔松作为基督徒、学者和音乐家同样杰出，他的伟大超越了他所有的合作者，不是因为他的天才或能力胜过他们中的任何人，而是因为他的清澈纯洁（W. C. Wood 牧师，《论文：艺术与品格》，1878）。他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艺术与品格——心智的和精神的品格——息息相关，并与在上帝的旨

意下为人类的扩大、成长和成圣而努力的各种力量相辅相成。同样，我们还可以提到古今中外许多其他作曲家和演奏家（名单上将包括所有真正伟大或具有永久影响力的作曲家和演奏家），他们的伟大事业已经深入到成千上万人的心中，——在他们的心中燃起了爱，燃起了信仰，燃起了希望，而他们正是在这种爱、信仰和希望中诞生的。

“音乐在人间也是如此；

上帝如此旨意，并派遣它出来、
在价值之上再添价值。

新的创造之花

用悦耳的声音诠释他的美丽——

只有新鲜的快乐；

因为专注的心灵

通过和谐的力量

自己也变得和谐；

常常

在外物中沉思神圣秩序的魅力

很快她（人的心灵）就会在内心深处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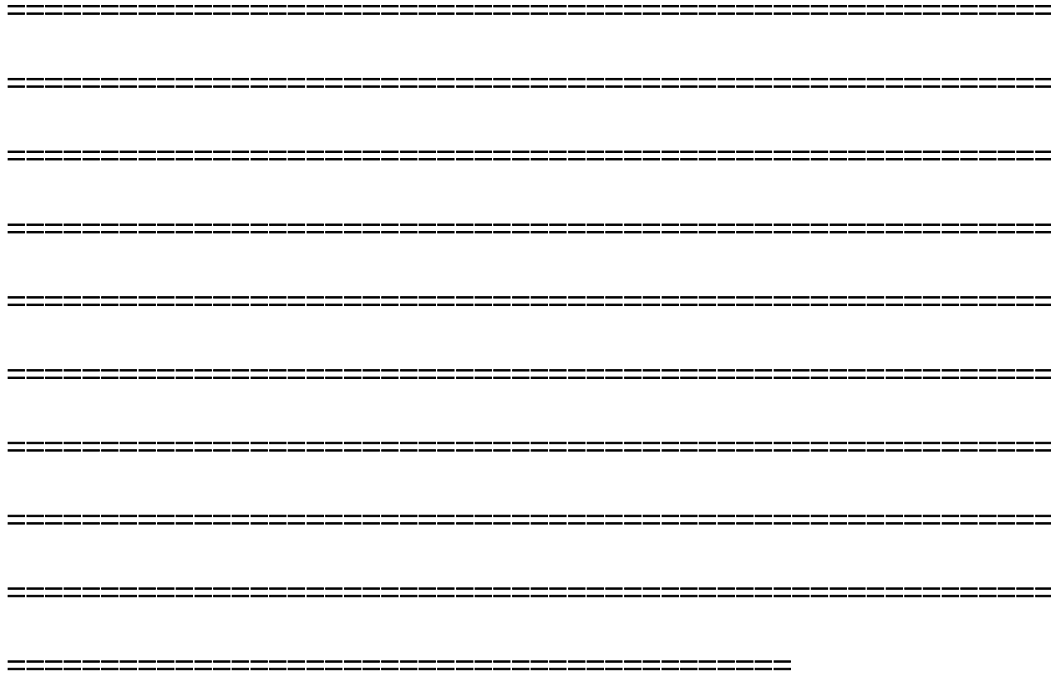
找到一种类似的秩序

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挥这种优雅的爱

她那经过锤炼的力量

每一种激情都变得

变得更温和、更有魅力。”



劳工问题与教会

[1886年8月21日在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宣读]。

作者：WM. 戈德温-莫迪，纽约布鲁克林

在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中，有些时候和场合必须唤起他们所有的道德力量并付诸行动，以维护和保护他们的制度，延长他们的存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导致和发动叛乱战争的事件中就遇到了这样的时刻。当时的问题——导致我们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南

北战争)和血流成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单一阶段的劳工问题。

而现在，在机器和改进的工艺成为一般生产的主要因素、贸易成为普遍分配途径的第一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我们再次面临劳动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一阶段的问题，而是其最具体的形式，即：广大人类在哪里、以及怎样才能找到能够保证所有生活必需品和舒适的职业？今天，这个问题的形式可能会让最无畏的人脸红，因为它充满了最大危险的威胁，并要求立即解决。

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问题——在生产和分配中使用的资本被理解为这种矛盾关系——岂不是大错特错？当然，资本是劳动的自然成果，至少在其正常状态下是如此，我们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任何植物和它结出的果实之间存在对立。

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劳动队伍中，特别是在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存在着最致命的对立和冲突。劳动不是寻求增加舒适和减少劳累，以此作为对生产力每一次进步的合理补偿和调整，而是自相残杀，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失业，并与那些可能找到工作的人展开激烈的竞争。

劳动力队伍中的这种冲突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一批闲散的工人，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他们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不得不在廉价成为决定性因素的领域中与他们的同伴展开竞争，并以他们

所能获得的最好条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无论工时多长或工资多低。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也被迫加入了竞争，失业工人随时都在提供自己作为随时可用的武器，与资本进行斗争，并激化劳工之间的冲突。就这样，劳动在各个方面不断迫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

在我国，这些对立和冲突在劳工队伍中的首次发展是在大约四五十年前，当时人们首次努力限制男孩学习技艺的人数。在这种限制的作用下，许多人变得不适合担任任何需要技能的职位，他们要么被迫无所事事，要么被迫从事最卑贱、最不稳定的工作。在我们伟大的内战（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年里，全国到处都是无所事事和半工半读的男女。

但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禁止无限制学徒的禁令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严格的执行，工人组织也被组织起来，他们还剥夺了任何非特殊劳工组织成员的工作权利，并使之受到可能认为适合执行的规则和条件的约束，这些规则和条件带来最可怕痛苦和惩罚，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指出从十多年前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地区发生的莫利-麦奎尔暗杀和纵火案开始，这些劳工组织（它们只代表了广大劳工中的一小部分）对“渣滓”和“老鼠”实施的可怕暴行，到现在广泛而普遍地诉诸个人暴力和各种性质的恐吓。

[自本报一读以来，有两万五千人同时放弃了他们在芝加哥的高薪工作，并向成千上万急于从事他们已离开的工作的失业者和贫困者开战。在这片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土地上，数百名手持温彻斯特步枪的正规警察和特别警察，以及两个团的国家军队，被召集来保护那些愿意工作的人免受那些不愿意劳动的人的恐吓和谋杀性攻击，他们所展示的图景很可能会让我们修正我们的一些讨论方法。

同样，纽约州从事针织品生产的约两万名雇员的罢工，以及他们对所雇用的“渣滓”力量提出的禁止性要求和对他们的惩罚，也是对人类的自然和公民权利的践踏。]

这是工人们对他们的同胞犯下的恐怖罪行的一个未写完的篇章，在野蛮人的战争之外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罢工偶尔带来的工资增长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很少是永久性的，或者说从来就不是永久性的，很快就会出现反作用或并发症，使劳工的处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糕，而且肯定会增加就业的不确定性和闲置的数量。

实际上，在生产性行业就业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存在的唯一冲突，就是有组织的劳工向资本发起的战争，迫使资本拒绝雇用所有不

属于特殊劳工组织的劳动力。正是在这些普遍的条件下，才产生了现在如此普遍的所有工业和社会弊端；证据似乎是确凿无疑的，我们所面临的弊端和危险的真正根源在于我们目前的工业方法所产生的大量令人恐惧的闲置现象，而这绝不是必要的。

如果劳工组织从一开始就把努力的方向放在通过提高和增强机器的生产能力来改善所有劳动者的状况和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而不是向他们的同伴开战，把他们赶出工作岗位，那么现在的悲惨状况就永远不会出现。即使是现在，如果他们能够采取权利平等和普遍福利的政策，他们也会得到全人类的衷心赞同和支持，并很快达到预期目标。但是，以他们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手段继续追求他们目前的目标，就会像以前一样，成为改进的最大障碍，如果人类能够躲过可怕的灾难，那将是人类的幸运。

我想利用这次讨论的几分钟时间，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身边证明这些观点正确性的大量事实中的一小部分。

在本世纪头几年，一般生产中还没有机器。当时，我们国内制造的全部产品基本上都是本国家庭工业的产品。我们的农业仅限于耕种自留地，其面积很少超过 200 英亩，犁地面积一般不到 100 英亩。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在农场上生产出家庭生计和舒适所需的所有产品，剩余的产品才进入市场，以获得农场无法生产的产品。

羊毛和亚麻都是在家里种植、纺纱和织布，然后制成衣服，供家人穿戴。不扶犁、不使镰刀的时候，农民往往是自己和邻居的鞋匠和木匠，此外还自己制作工具，做其他各种今天的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城镇的民居里，织布机和纺车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的所有产业都是家庭式的，家庭的力量和家畜牛马是当时唯一使用的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人，无论老幼，无论男女，都能找到充足的工作，在我们的土地上，富足和满足是共同的命运。人们几乎不知道有闲人，也从未见过流浪的乞丐。一般来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立的屋檐；需要救济和支持的穷人仅限于病人、弱者、老人和孤儿。

现在，这一切都变了。父辈们的家园正在迅速成为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今天占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英亩的巨型农场，在那里，一切都为市场而生产，没有任何东西供家庭使用；在那里，妇女、儿童和家庭关系不构成固定的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在那里，机械、蒸汽和其他自然力量是生产的主要因素，取代了父辈们的肌肉和牛。家庭纺车和织布机已不复存在；它们已成为简单的记忆，而我们的各种制造品都是巨大的磨坊、工厂和车间的产品，庞大的机器不断变得越来越能自我操作，需要的监督和人力也越来越少。

然而，我们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农场——它们不是家园，而是中世纪的邪恶残余——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们的土地上又重新出现了封建奴役的佃农，但却没有数百年前的家用制造业，而这种制造业曾使当时的状况得以维持。

今天，机器收割机取代了我们父辈的一百五十把镰刀；一个使用机器纺纱机的人所做的工作，相当于我们母亲的六千个纺车；一个使用动力织布机的女孩所织的东西，相当于一百个使用旧式手工织布机的女孩所织的东西；一台机器印刷机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一万台旧式手工印刷机所做的工作。梳理机也是如此，所有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都由机器来完成，据我所知和所信，只有排字劳动除外，它实际上仍与四百年前古登堡和浮士德时一样。然而，机器很可能很快也会垄断这项工作。

美国劳工局劳工专员卡罗尔-D-赖特阁下说过，“粗略估计，1882年，在某些工作领域，每个工厂系统的雇员平均至少取代了50个个体系统的雇员”。

这意味着每个男女工人为自己和全世界提供生活必需品和舒适的能力增加了五十倍。五十个房间、五十件外套、五十套衣服、五十顿饭，而以前只能提供一顿饭，或者以其他形式提供相应的食物。但我们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我们的使用能力仍然有限。

我们不能同时出现在五十个地方，或占据五十栋房子或五十个房间，或吃五十顿饭，或穿五十倍于我们父辈的大衣和裙子。

我们使用和消费所有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要求和能力实际上并不比我们父辈的要求和能力高。然而，我们却对惊人增长的生产力竭尽全力，却丝毫没有试图调整这些相互冲突的发展。后果是什么？难道它们不是完全合乎逻辑和我们所期望的吗？

首先，国家的劳动大军中现在只有一部分人在从事以前需要所有人劳动的工作，许多人被迫无所事事、匮乏，并与他们的工友就现在所做的工作进行破坏性的、甚至是致命的竞争。

其次，这种闲置和竞争直接导致了工资的不断降低，消费的减少，贸易、运输和所有就业来源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士气低落和社会所有利益的破坏。

这些力量的发展和运作在人力的取代和机器的替代中稳步前进，起初速度缓慢，但后来越来越快，直到1850-1860年的十年间，每年数以千计的企业倒闭表明了国家的怠惰和窘迫，在1857年的恐慌中达到了顶峰，有4932家企业倒闭，随后在1859-1861年的三年中又有14582家企业倒闭。布坎南总统在 1857 年 12 月 8 日的致辞中，以如下措辞提请国会注意我国劳动和商业的“糟糕状况”：

“我们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的所有要素，然而，尽管有这些优势，我们的国家在货币利益方面目前却处于令人痛心的状况。在所有产品和所有国家财富要素都无比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制造业停滞不前，我们的公共工程停滞不前，我们的各种私人企业被遗弃，成千上万的有用劳动力失业，陷入匮乏”。

正是在这十年间，加利福尼亚每年出产一亿美元的黄金，为至少五十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这些人本来是找不到有报酬的工作的。然而，人们却在不断地走向更加无所事事和日益窘迫的境地。

在这里，我们有最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在我们讨论的这十年间，黄金的产量超过了世界上以往任何时候的水平，但这并不能阻止随着人们就业的减少而加剧的贫困和苦难。

但在（南北战争）萨姆特第一枪打响后的一百天内，一切都变了。三十七万五千人在政府部门——陆军和海军——找到了工作，还有同样多的人在生产战争物资和军需品，或当车夫，或在公路上或战场上从事其他服务。闲人越来越少。随着战争的进行，军队不断扩大，对工业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仅在北方就有至少三百万男男女女为政府服务，导致工资大幅提高，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运输费用增加。即使是普通的田间工人，工资也涨到了每天三美元，一般的平均工资都高于这个数字。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然后突然停止，原因是政府不再需要军队和海军，也不再需要支持军队和海军所需的给养，也不再需要战争物资，在这些行动中工作了三年多的三百万男男女女突然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的工资停发了，他们的工资所维持的生意也没有了支撑。

据估计，按平均每天两美元计算，当时被解雇并退出贸易、运输和消费的人的工资或收入为每天六百万美元，即每年十亿八千万美元。

当时被扫地出门的劳动者一直持续到现在，除非他们在自己的同伴中强行瓜分，或从其他人那里夺取。这一时期的全民就业始于战争，止于战争结束。普遍的繁荣始于全民就业，止于闲置的恢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闲置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因此，考虑到那些只是部分就业的人所损失的时间，再加上实际上没有工作的人数，现在我国的闲置人口不会少于全部劳动力的一半。

在战争的四年中，工业和商业的繁荣程度令人惊叹，这体现在倒闭的企业数量从 1859-61 年三年的 14 582 家减少到 1863-65 年三年的 1 545 家。当时，普遍就业的工人阶级将他们的工资投入到贸易和运输领域，其影响立即遍及我们整个社会体系，这切实证明了就业工资是那个时期惊人繁荣的真正原因。

亚当-斯密说得好：“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最初不是靠金银而是靠劳动得来的。”。

从战争（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即 1865 年，只有 530 家公司倒闭，到 1873 年，公司倒闭数量达到 5183 家，并再次出现恐慌。然而，闲置和困境的增加并没有随之减少，而是更加迅速地发展，直到 1878 年，当年的倒闭数量上升到 10 478 家。此时，铁路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1882 年一年就修建了 11,500 英里的铁路，达到了最高峰，大量工人被雇用，他们的工资立即进入了贸易和商业的各个领域，使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繁荣。1880 年，倒闭的企业突然减少到 4735 家，这几乎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希望，好日子又回来了。但是，1882 年见证了这一行业的顶峰，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至少有 “565,000 名从事路基铺设和铁轨铺设的工人（大部分是普通工人）被辞退，重新回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因为在 1885 年，铁路建设已减少到 3,000 英里。

除了这一大批无所事事的普通工人之外，还必须加上同样数量的熟练工人，包括煤矿和铁矿的矿工、冶炼工人、磨工以及其他所有工人，他们需要在一年内制造出不少于 90 万吨的铁轨和钢轨，用于建造 8500 英里的铁轨；铁轨、桥梁、车间、车站和仓库所需的枕木、木材和板材的切割工，以及这些建筑所消耗的其他材料；为刚刚建成的公路配备全部机车车辆和机械所需的工人；以

及运输这些大量材料和供应食物等所需的人员。

在过去的三年里，由于仅减少了一个行业的就业机会，就有不少于一百万人陷入了无所事事和匮乏的境地。

按每人每天一美元的工资估算，仅铁路建设一项的减少，就使贸易、运输和消费损失了一百万美元，即每年损失三亿美元。

要知道，一百万男子作为一家之主，自然要养活不少于四百万的妇女和儿童，其中还有许多老弱病残者；或者说，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总共有五百万人要解决温饱问题——这个数字相当于纽约州的全部人口，而且所有其他行业也受到类似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目前存在的大量闲置现象所造成的困境的严重程度有一些了解了。

过去三年的企业倒闭数量高达 33,035 家，与战争和全民就业三年的 1,545 家企业倒闭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了过去三年的普遍困境。这一点还表现在，倒闭数量从 1878 年的 10,478 家突然减少到 1880 年的 4,735 家，紧随仅有的一个大行业（铁路行业）就业人数的增加，而且随着该行业就业人数的减少，倒闭数量又迅速上升到更高的数字。

标志着这一铁路建设时期的经济事件与战争时期的经济事件完全

一致，而战争和铁路建设事件给工业带来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应当加以利用。这是常识的教训，是遵守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的强化。它告诉我们，采取任何手段，无论是战争手段还是和平手段，只要能结束我们所有行业、贸易和运输中目前存在的破坏性竞争，并使所有人都能持续就业，就一定会再次带来工资增长、价格上涨、利率提高和普遍繁荣的结果。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实现这些结果。

毫无疑问，工资将不再像现在这样平均每天低于一美元，而是再次达到平均每天至少三美元，其中的每一美元都将用于贸易和运输，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和舒适用品，然后再连同生产和分配所消费的每件产品的所有费用或利润一起归资本家所有。面包师、银行家、屠夫、医生、律师、牧师、教师、商人、运输商、投机者和资本家都通过这些业务获得了他们创造的财富份额。付给工人的每一美元都在生活的千百种工作中循环往复，为所有这些工作施肥，在每一次变化中付出代价，最后回到它的出发点，数额增加，实力增强，可以从事新的工作和更大的工作。

所有的财富都是这样创造和增加的，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这些过程，每年从劳动报酬中创造的贸易额可以增加；但现在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从实际闲置者的消费中获得收益；而由于工资低和就业不稳定，就业者的消费降到了最低点。正是从人民大众的消费中获得的收益决定了贸易量和资本的增长，无论

其规模是大是小。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永远不应忽视。

因此，贸易和运输的真正利益要求在各个方向上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发展到最高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最大的贸易量，收集最丰富的通行费。只有这样，劳动的所有要求才能得到满足，因为劳动的所有必需品和舒适品都将得到最充分的供应。这样，社会的所有要素都将达到最繁荣的程度，目前造成痛苦的原因也将消失。

要达到这些目的，就必须减少劳动时间，使所有人都能就业，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至于时间是多少，这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不是就业时间，而是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需求是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在生产过程中，所有人的工作所占用的时间是每天两小时还是二十小时，这并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要就业，没有人闲着，因为每一个闲着的工人都是消费、贸易和运输的损失单位，也是劳动队伍中破坏性竞争的单位。这一点的证据是，现在，每个人都在永无休止的斗争中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作斗争，结果是各方冲突、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但在这里所要求的条件下，这些冲突将停止，法律将取代无政府状态，秩序将从混乱中产生。

在日常劳动时间的问题上，科学头脑会发现，减少劳动时间，通

过全民就业来增加富足和舒适，是对发明和使用机器进行普遍生产的合理回报和充分补偿；基督徒会认识到，有一个主宰一切的天意在引导这些事务，以提升和改善整个人类大家庭的状况。

但是，在城市和制造业城镇，有待解决的问题以最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七十年前，只有百分之五的人生活在城镇；而现在的居民有百分之三十五生活在城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下，在农村中，闲散人员、部分就业人员以及来自被蹂躏的家园和小作坊的穷人，因为无法再与庞大的农村邻居竞争，而被驱赶到快速发展的城镇和城市，在那里，他们与我们大量的外来移民汇合在一起。这些庞大的外来人口就像牲口一样挤进了贫民区，而这正迅速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的唯一家园。亚伯拉罕-S-休伊特阁下是成千上万人的雇主，1885年4月14日，他在纽约慈善组织协会发表讲话时说：“但现在，在这个庞大的工业组织中，这里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显眼，更加令人惊叹；然而，那些被挤出劳动队伍的人却陷入了无以名状的贫困和穷困之中。没有人知道或关心他们……我只知道他们[他的雇员]是一大群人，每周都要发一次工资，当没有工作的时候，或者当某些不再有用的成员被改进的工艺从工人队伍中扫除的时候，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目前，较好的城镇住宅的常见建筑形式是五层或六层高的街区，每栋房屋的正面有 25 英尺，每层可容纳四个家庭，但底层除外，

底层的后部可容纳两个家庭，前部设计为商店或店铺。这样，一个屋檐下就可容纳 18 或 22 户人家，每英亩可容纳 2000 多人，每平方英里可容纳 125 万多人。但是，挤在这些房子里的实际人数一般都远远超过了预计的人数，而且在不少情况下，人数还增加了一倍多。

关于这些居民家中的条件，一位著名的卫生工程师查斯·温盖特 (Chas. F. Wingate, Esq) 说：——“根据实际统计，白天有九到二十个人住在这些房间里，每个房间的平均面积不超过十英尺。一栋三层楼的建筑有六个房间，一共住了六十个人”。关于另一个房间，他说：“我问他前一天晚上有多少人住在这个房间里。他回答说有 35 人，大前天晚上的人数也差不多。”

温盖特先生在评论他的所见所闻时写道：“一想到在其他几十座建筑中也有这些场景的复制品，让人不寒而栗。只有伦勃朗的铅笔或多雷的蜡笔才能将这种环境中的深邃阴影表现得恰如其分”。

第十区卫生援助协会报告说：“一个由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组成的家庭收留了十四个寄宿者，住在三个房间里。在另一个地方，两个小房间里住着十五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旧衣服和垃圾。一位主任发现父母、三个孩子和 15 只鹅住在一个肮脏的地窖里。另一位主任参观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妇女和五个小孩，他们已经饿了两天，什么都没吃。还有一

位妇女，在饿了两天后，被一个没有人性的房东赶了出来。许多房间白天被悲惨的居住者出租给十几个男裁缝和女裁缝，他们胸膛凹陷，痲病缠身，每天在服装或缝纫机上工作十四到十六个小时，房间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气氛，他们肆无忌惮的玩笑影响着年幼的孩子”。

贫民窟委员会向州参议院提交的报告称，据估计，纽约市有两万六千所贫民窟，居住着一百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唐人街的死亡人数从 1870 年的 5111 人上升到 1884 年的 5650 人。如果不是因为住在贫民区的病人去了慈善医院，他们的死亡数字还会更高。

这些关于目前居民家中实际情况的报告，描绘出了目前工业和社会趋势的发展轨迹，其色彩之丰富，令人难以想象。必须牢记的是，整个贫民窟系统及其所有弊端都是在过去四十年里发展起来的，而这四十年恰恰是我们当前生产系统发展最活跃的时期。

在这些问题上，纽约绝非例外。纽约的情况在我们所有的其他城市和制造业城镇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布鲁克林、波士顿、芝加哥、辛辛那提、克利夫兰、法尔河、洛威尔、匹兹堡、圣路易斯等城市。

这些贫民区人们的家园也是所有肉体疾病的温床。在这些温床里，

不仅繁殖和强迫着我国人民一直与之抗争的疾病，而且还繁殖和强迫着意大利、埃及和俄罗斯最可怜的穷人所特有的可怕疾病。它们简直就是人类的屠宰场，用这片土地上的青春和力量为我们的亡灵之城提供食物，比任何时候的战斗和所有战争机器都更加无情、更加迅速。

我们的人民大众并不情愿屈从于这些条件，而那种认为他们涌入城市是一种主观选择的普遍说法，已经远远超出了愚蠢的界限，它暴露了一种对控制条件的无知，这种无知简直就是犯罪。对于穷人来说，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选择的。富人可以而且确实在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和周围环境；但穷人必须在环境的逼迫下选择去或留。

此外，我们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仅在纽约市，有组织的慈善机构和家庭慈善机构每年就花费 750 多万美元，此外还有数不清的个人施舍，用于救济因游手好闲和无报酬工作而造成的贫困。

据慈善组织协会报告，该市有 330 个地方慈善机构，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发放慈善物资；还有 490 个教堂和宗教礼拜机构，其每年大部分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救济他们周围的苦难。

这些教堂和机构实际上代表着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无穷力量，如果它们的应用符合经济规律的话；但现在，这种力量却在错误制

度的延续和痛苦的倍增中耗尽了。因为，尽管花费了巨额资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现有的罪恶和苦难却在迅速增加，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根据目前的方法，所能做的最多只是提供非常暂时和部分的救济，而没有希望或期望改变产生大量贫困和悲惨现象的趋势或减少其力量，因而使他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成为一场失败的战斗。然而，这场战斗必须继续下去，直到采用一种更好的工业制度，尽管目前的努力不是为了防止和消除现行制度的罪行和苦难，而是为了用富裕餐桌上的一些面包屑来掩盖匮乏的呼声。

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正如下文所述，这整件事直接违反了上帝的法则，也与经济科学的所有准则相抵触。病人和残疾人、寡妇和无父无母的人是神圣慈善的唯一对象：所有其他人都必须自食其力。人类的经济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在这里描述的（不劳而获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在旧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下不可能存在的状况，而这种状况现在正以加速的力量和速度发展着。这些情况难道不意味着危险迫在眉睫吗？这种危险有多大，让几乎普遍的不满和动乱、永无休止的罢工、各种性质的谋杀和暴力以及伴随着普遍的工作斗争而出现的各种程度的苦难来回答吧。

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劳动问题不是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的问题，也不是金钱的问题，更不是工作以外的任何其他问题；

它的解决不能从农业措施或金融方法中找到答案，就像误以为治疗一个脓疱就能治愈一个绝望的水痘一样；更不能从罢工或抵制中找到答案，而是要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有保障、有报酬的工作。

教会及其牧师与这个问题的关系是什么？从目前的介绍来看，这显然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否因此就不属于基督教或神职人员的讨论范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我们拿起上帝的话语，就会发现其中的经济准则似乎与我们的工业发展所提供的教训完全一致。

在第一步，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命令：“你要流汗吃饼，直到归于地”。这是上帝在亚当违背上帝的旨意，将他赶出伊甸园时宣布的经济法令。从那时起，生命和生命所代表的一切都必须由工作来维持，而工作只能以它所支持的生命为终点，并且只能以生存和舒适的要求来衡量，这是生命永恒不变的条件。

同样，当摩西在西奈半岛的闪电和烟雾中，从上帝手中接过律法书时，他发现上面有全能者用手指写下的命令：“你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上帝的安息日；在这日你不可作任何工”。在这里，重复了工作的命令，并明确无误地宣布，工作应像对食物的供应和对食物的需求一样持续不断，即每天——每七天中的六天。在神圣的法典中，这一法则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中优先于其他所有法则；在生活经济中，遵守或不遵守这一法则

将决定健康或不健康发展的趋势。

主祷文中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其中清楚地表达了持续供应的必要性。当然，没有人会相信基督是在教导他的门徒，让他们在没有上帝对亚当和律法表中所宣布的条件的情况下，祈求上帝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也不能认为他是在给出一种不适用于人类迫切需要的祷告形式。很明显，这个请求的意思是，神要赐给我们机会和能力，使我们能够按他的吩咐，用脸上的汗水来获取和食用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这些都是全能者的法规，它们规定了劳动与人类所有物质条件的关系，必须成为教会事工的规则和指南。在这些法规中，我们找到了劳动问题的神圣解决方案，人类的智慧和经验对此别无选择。事实上，我们在本世纪的工业和社会经验提供了最充分的证据，证明必须应用神圣的律法作为我们唯一的补救办法。

根据这些诫命，神职人员的首要职责难道不是在圣经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并遵循这一问题直至实现神圣的要求吗？他们是被选中并被任命的人民教师。他们自愿承担这一职位的职责，并通过庄严的誓言承诺查考圣经以了解至高者的旨意，并指导人们履行生活职责。首要职责是工作。那么，宣讲工作的福音难道不是他们的职责吗？他们必须看到，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以及因无所事事而产生的难以言表的痛苦，他们难道不应该立即问

一句：你们为什么整天无所事事；并认真地努力地研究其中的原因吗？

莱特先生告诉我们，每 50 人中就有 49 人被机器取代，难道现在还不应该做些什么来了解他们的情况吗？休伊特先生说，这些人被“改良的工艺”扫地出门，“被挤出工作行列，沦为毫无特色的贫困和贫民”，难道现在还不应该对这些人的数量和状况进行调查吗？我们的这些兄弟呢？难道他们的鲜血不会像亚伯的鲜血一样，在地上向上帝呐喊吗？

除了作为神圣律法传道者的责任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似乎表明，神职人员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可以冷静地研究我们的重大工业和经济问题。他们既是雇主的朋友，也是雇员的朋友；既是富人的朋友，也是穷人的朋友；他们完全没有嫉妒和怨恨，这种嫉妒和怨恨是由于长期存在于劳动队伍中的紧张关系而产生的。牧师们没有自然的或后天的私利来反对或支持任何一方，也没有真实的或想象的伤害来惩罚任何一方。他们与生俱来的愿望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和进步。毫无疑问，教会中聚集了这个时代大部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完全有能力研究本世纪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在为所需的调查做准备方面，神职人员比俗人有一个特别显著的优势；他们不必在有能力了解近期发展的实际影响以及如何从中

获得最大利益之前，就去学习那些经济谬论，这些谬论不仅是一代人的谬论，而且是几代人的谬论。

首先要做的是了解与问题相关的主要事实。艾布拉姆-S-休伊特阁下在上述讲话中指出：

“要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坐在书房里看书，也不能听信任何人关于应该怎么做意见。不，在企业中，当我们有问题要解决时，我们会坐下来研究实际条件。首先需要的是对事实的了解，对其本质的认真思考”。

休伊特先生无疑是对的。我们需要的是当今的事实，是当前条件整体发展的事实。我已经指出，在各个方向上正在发生的巨大运动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事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事实——赤裸裸的事实，它们会宣扬自己的道理。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可靠信息的事实，这些信息包括：全国实际闲置的人数；——在各种职业中，依靠劳动维持生计和舒适生活的工人和妇女的人数；失业的人数；部分就业的人数；他们的就业或闲置的人数，以及完全就业的人数。

八年前，在 1880 年的人口普查中，我曾通过联邦政府机构努力获取与这些重要事项有关的事实。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文学和

教育界人士、政府和法律界人士、新闻界人士、制造业人士、贸易界人士和劳工界人士纷纷准备并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在《人口普查法案》中加入一项规定，要求对人们的就业和赋闲情况进行统计。

伊利诺伊州已故参议员戴维斯于 1879 年 2 月 28 日向参议院递交了这份法案，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他们不相信，我也不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任何基于未知可靠数据的理论来解决。他们需要的是政府获得权威信息，让人民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并据此制定明智的立法。这些信息可以作为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进行推理的安全基础，没有这些信息，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推理。”

“主席先生，无论人们对造成我们劳工困难的原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很明显，如果没有所要求的统计资料，就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请愿书中所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国会的认真考虑。我很高兴地说，人口普查特别委员会已经就请愿书中的一些问题采取了行动”。

在同一场合，胡尔参议员在提请注意所希望进行的调查的重要性以及他之前在众议院为采取类似行动所做的努力之后，说道：

“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同意一件事，那就是希望政府能为劳工阶层获取统计信息，供其使用并为他们谋福利，尽管他们之间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我感到惊奇的是，在以前有人提出这一要求并得到国会其他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政府，特别是国会，对这个国家广大劳动者的要求无动于衷。我相信，尊敬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将成功地使参议院对这一此前一直未能得到关注的提案给予积极关注”。

戴维斯参议员提到的人口普查特别委员会采取的有利行动是通过了该法案的一项修正案，规定普查员应查明每个被普查的人是“就业还是失业，如果失业，则应查明在一年中的哪段时间失业”。人口普查法案在成为法律时，将这一特别规定作为其一部分，但受托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完全无视和蔑视他们据以行事的法律以及他们的就职誓言，忽视并拒绝按要求进行这项人口普查，而且在他们的报告中没有一处提到这一问题。结果是，今天，人民和政府在这些最重要的利益方面没有权威的信息，在我国人民群众目前的悲惨状况下也没有采取行动的数据。

在有关劳动和工资的其他问题上，人口普查报告只会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并导致最错误的结论。如果故意阻止收集法律所要求的信息——隐藏和误导人民群众的实际状况，那么就没有更多的办法了。事实上，毫无疑问，所达到的目的就是所提出的目标。

因此，有必要唤起人民的道德力量，在这些问题上采取行动，并研究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可以获得的事实，以便对人民进行指导，再次成功地寻求政府的援助，并作出规定，防止上次人口普查中的失败重演。

只要我们掌握了所需的事实，神职人员、民众和立法者就能很快得出正确的结论，并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但是，只要目前对这些事情的无知状态继续存在；只要故意无知和持有偏见的人可以否认最明显的事实而不必担心会被成功揭露；只要政府代理人和其他有此愿望的人可以成功地隐瞒所需的信息，并用无关紧要的事情误导和欺骗公众，那么情况的困难就会长期存在。如果上一次人口普查是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工业状况，而进一步推迟采取能让我们获得明智行动所需知识的措施，肯定会使我们的工业和贸易每年付出数十亿美元的代价，人民的苦难和生命财产的破坏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我到这里来，就是要提请你们注意这些研究的重要性，并请求本基督教哲学研究所和全国的神职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使这些研究取得成效。我确信，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神职人员有能力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发起一场运动，迅速解决我们的困难。

他们身处数百万诚实、敬畏上帝的工人和妇女中间，被他们所包围，他们的枷锁并不轻松，他们的负担也绝非轻而易举。难道我

不能恳切地恳求你们和他们按照上帝的吩咐做些事情，减轻他们的轭，减轻他们的负担吗？根据神圣律法的简单原则来从事这项事业，就会发现联合起来的教会的有组织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而个人的行动却收效甚微。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最大的福祉。

在这里，教会所肩负的责任既不能高估，也不能回避，有益工作的机会和取得成就的可能性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因为漠不关心和忽视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将是无与伦比的灾难和无法抹去的污点。

=====

=====

=====

=====

=====

=====

=====

=====

=====

关于穆迪先生演讲的评论 moody's lecture.

作者：REV. J. B. LOWBER, PH. D., Paducah, Ky. -- 社会是法律

作用于人类本性的结果。政府是社会手中保护社会的工具。劳工问题只能从永恒的角度来解决。

认为机械是一种诅咒是错误的。在上帝的经济体系中，机器的目的是让人类从劳作中得到休息，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培养自己的最高能力，为永生做好准备。如果少数人像贪婪的孩子一样，把一切都据为己有，其他人当然会受到伤害。但是，上帝已经给这些人打上了谴责的印记。要么使用，要么失去。一个国家或个人如果不能正确使用所获得的东西，就一定会失去它。滥用流入西班牙国库的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就是一个例证。只为自己和家人获取财富的人，会为后代积累悲哀。任何懂得社会学规律的人都不会成为守财奴，因为这肯定会毁了他和他的家庭。一个名叫约翰-A-康姆的老守财奴曾问莎士比亚，他死后要为他写什么墓志铭。诗人这样回答：

“一百个人中有一个躺在这个坟墓里、
百分之一的人的灵魂得不到救赎；
如果有人问谁躺在这坟墓里？
哦，魔鬼说，他就是我的约翰-A-康博”。

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应该为当前的冲突承担责任。他（资本家）不断地违反经济规律，只要他这样做，当然就不可能繁荣昌盛。他（劳动者）花工资买酒喝，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一

个公认的事实是，酒类交易是造成这个国家贫困的最大原因之一。取缔酒业将大大有助于解决劳动力问题。它对社会的危害比奴隶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政治体的寄生虫；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因此应该禁止它。我认为，我们应该像苏格兰老妇人在谈到埋葬魔鬼时所希望做的那样来对待这种酒类贩卖。我们应该把它的脸朝下埋葬，这样，如果它再活过来，就会越抓越深。

海伦-克兰女士，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帕克市——作为这个协会的成员，我可能是在这个讲台上发言的先驱妇女；因为我是卫理公会教徒，我们卫理公会的妇女从小就在会议上发言。

我并不认为贫穷的技工或工匠的苦恼和贫困是机器的增加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的懒惰、怠惰和不良习惯。多年来，我一直与城市慈善机构和传教工作有联系，并与我的丈夫一起从事牧灵探访工作，因此我有很多不同寻常的机会来亲自观察。让我举出1878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个大型制造业城市的例子。许多人赖以生存的机车厂和炼铁厂要么关闭，要么开工不足。受雇者可以说是熟练工人，但由于酗酒和吝啬，他们没有任何积蓄，因此许多人陷入贫困，并申请城市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几十个人站在街角，绝对拒绝为每天一美元的工资而工作。

为了每天一美元的工资，城里的大型丝绸厂和棉纺厂全日开工，为数百名妇女和女孩提供了就业机会，她们成了许多家庭的经济支柱。如果这些游手好闲的男人能回家洗碗，给孩子们洗脸，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还会对他们的男子汉气概有几分敬意；但是，没有，他们宁愿游手好闲，当劳累了十几个小时的妇女们回到家时，她们不得不为家庭做家务。我注意到，那些最强烈要求短工时和高工资的男人，却非常愿意让家里的女人每天劳作 12 或 15 个小时。再举一个例子。在某铁路中心，人口主要由铁路雇员组成。这些人大多脾气温和，工资优厚且稳定，但他们却非常吝啬，在商店里打白条。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至于为教会或慈善事业发出的呼吁必须在发薪日之后才能取得成功。

穆迪先生的文章将救济这些现有困境的问题交给了牧师和教会，并希望纽约市的神职人员在这方面做出有组织的努力。

这些人中有很多人不在教堂里。牧师在讲坛上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但谁能组织教会力量，把清洁、勤劳和节制的福音传到不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家里，谁就能为教会和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与各种形式的罪的斗争必须是一场手与手的斗争，谁能通过与人们的个人接触最接近他们的心灵，谁就能赢得最大的胜利。



劳动者不是商品

以下是亨利-C-波特牧师在 1886 年于新泽西州基东区(Key-East)举办的暑期班上宣读的以下文章，曾刊登在主教致其教区神职人员的书信中。

耶稣基督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兄弟情谊法则，并通过诫命和榜样教导人们，无论是地位、财富、学识还是聪明才智，凡是被委以管理特殊天赋之重任的人，都不应将其视为己有，而应将其视为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你们要互相担当重担，这样就履行了基督的律法；”“你们身强力壮的，应当担当弱小者的软弱；”“今世富足的人，要乐于施舍，乐意分配；”这些话和其他类似的话并不是指单纯的施舍和有区别地分配施舍。政治躯体上的伤口并不是靠这样的恩赐来愈合的，也不是靠这样的礼物来把分裂的人性的肢

体捆绑在一起的；市政和机构的慈善事业是否在抚慰或愈合伤口的同时也刺激了伤口，这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劳动者希望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是公平和友爱，而不是施舍，是对其人格的承认，而不是对其劣根性的屈尊。

正是在这一点上，前景是最令人沮丧的。财富在我们中间的增长，不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是把他们分开。现在，富人与穷人、雇主与工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远。太多的人越来越不了解穷人的生活，也很少花时间或根本不花时间去了解。劳动者的工资可能比三十年前多，无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但他的需求比他的工资增长得更快，他满足这些需求的机会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他对体面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他的家往往并不是更体面，而且每天都在变得更加昂贵。他的思想视野开阔了，但合适的食物却越来越少。他的本能和抱负被唤醒了，这些本能和抱负在他身上当然与那些境况更优越的人一样光荣，但财富对这些本能和抱负的引导或满足却作用甚微。据说，穷人的举止比过去对富人更加傲慢无礼，这使人们不愿意去了解他们和为他们服务。我不明白为什么贫穷要屈服于富裕，因为富裕往往是一种偶然的区别，而且往往是一种没有任何特别的道德或智力优势的条件。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穷人的举止如果是傲慢无礼的，那也是从那些至少有机会让他们懂得，没有什么傲慢比单纯的财富更让人难以忍受或更无理取闹的人那里学来的。如果我们今天收获的是较富裕阶级和较贫穷阶级之间相互仇

恨的果实，我们完全可以承认，错误并不完全在任何一方，现在是我们觉醒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彼此作出牺牲，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仇恨。

这些牺牲与其说是对金钱的牺牲，不如说是对安逸、对自我放纵的无知、对轻蔑的冷漠、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负和肤浅的牺牲。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社会领导权掌握在一些人的手中，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像古代人一样“日复一日地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而对那些赚取他们所花费的红利、支付他们所拥有的房屋租金的人却漠不关心，那么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厄运，而且是最坏的厄运。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法规书上写满规范罢工的法律，对那些组织抵制个人自由（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的自由）的人们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我们可以操练军队，完善我们的警察；但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福利不在于这些，而在于人民的满足和忠诚。而这些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的。

当资本家和劳工雇主永远摒弃了这样一种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这种谬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宗教领域，这种谬论本质上是错误的，即劳动力和劳动者都是商品，可以根据市场的决定进行买卖、雇佣或解雇、支付多或少的报酬；当工人和主人的利益合二为一，而劳动者的份额不仅仅是工资时；当所有生产者的头脑和双手对所生产的产品共同利益原则得到明智而慷慨的承认时；当我们同胞的福祉、他们的家园和食物、他们的快乐以及他

们更高的道德和精神需求被视为——我们不敢(像该隐那样)说“我岂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到那时，我们才有希望弥合那些严重的社会分歧，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反省内心”。

=====

=====

=====

=====

=====

=====

=====

=====

=====

=====

劳工问题与安息日律法

[1886年8月，在Key-East暑期班上讨论了劳工问题。DEEMS, the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has since been published in the Methodist Review, edited by Rev. Dr. Curry.]

关于主日问题的言论和文章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少有智慧的人都

厌倦了这一问题，并放弃了对它的研究。同样，安息日问题也被如此普遍地从宗教角度进行讨论，以至于转移了人们对其科学重要性的关注。那么，让我们简要地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以及这个自古以来就为人所知的基本法则与当今时代的劳工问题之间的联系。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关于安息日的启示书籍和宗教教义，那么很明显，我们的科学调查会引导我们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最坚硬的材料在被制造成文明用具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当于安息日的规律。一辆火车车厢或私人车厢，一辆由木头和铁制成的交通工具，只要每隔七天让它们得到充分的休息，它们的组合寿命就会更长。如果每隔七天冷却一次，蒸汽锅炉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效果会更好。人们发现，如果每隔七年让田地休耕一次，就能从一个产业的产业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现在，这些田地是由多种元素结合的土壤构成的。至于第七天休息的要求是存在于元素中，还是存在于元素的原子中，还是存在于元素组合成我们所说的土壤中，似乎还没有定论。这一点还没有得到科学研究的证实；但事实是，一英亩的土壤本身就含有这种类似的安息日要求。

反复的实验表明，动物也是如此。如果一匹役马有好的马厩、好的梳洗和好的食物，它在第七天和第一天一样能拉很多东西。在类似的有利条件下，第 14 天和第 21 天的拉力也是一样的。但

如果一家铁路公司使用两百匹年龄相仿的马，其中一百匹马连续奔跑，另外一百匹马每隔七天休息一次，那么这家公司很快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

对于人来说，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一样的。两个体力和脑力相当的律师，一个人一年中有三百六十五天致力于他的职业，而另一个人则每隔七天就谨慎地放弃与他的职业理论或实践有关的任何思考；——不需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显示出两种模式的差别。宗教似乎与此无关。一个神职人员可能是圣人，但如果他不在每周的七天时间里抽出一天，坚持不懈地放弃一切神学研究和牧师工作，他就会逐渐开始忍受违反律法的惩罚。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牧师中会有如此之多、如此之早崩溃的原因之一。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团体的人像基督教牧师一样，如此普遍地违反安息日。社会的规章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其他人在七天中有一天不工作，银行和交易所在七天中有一天不营业，法院也是如此。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还有很多；但牧师可以从星期一早上开始，在一周中的每一天每一夜都工作，星期六晚上熬夜完成布道准备，然后参加主日学和布道，主持圣礼，也许星期天主持葬礼，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同样的工作，持续一周。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不会引起别人对他破坏安息日的注意。但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的规律都是一样的。身体健康、延长工作和享受生活的能力，以及长寿本身，这三样东西都取决于是否拥有相当于第七天

的休息时间。主教和无神论者同样可以遵守这一法则。休息时间可以用于宗教活动，也可以不用于宗教活动；但第七天必须歇息，不能从事其他六天的活动。无论是否有来世，遵守这条律法对于享受现在的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动物的纤维神经中，以及在最高级动物的大脑中，没有比安息日法则更明显的了。似乎没有其他法则能比安息日法则更长久地为人类所知。在现存的最古老的文献中也有关于它的记载。我们无法确定它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人所知的，因为在人类所拥有的最古老的著作中，它被假定为早已为人所知，在当时是以宗教的形式呈现在人类思想中的，显然丝毫没有怀疑它具有我们习惯认为的科学基础，就像我们在后世发现它所具有的那样。在最古老的圣书中，它被用于宗教目的。希伯来人的上帝，通过他的宗教的第一批牧师，在神权的基础上将一个民族宗教秩序化，上帝为他们指定了七日中的一日，七年中的一年，以及七乘以七（四十九）的年末的一年来举行某些宗教仪式，并将其与某些民事安排联系在一起。

任何宗教，如果在本质上没有建立的基础，都不可能在任何民族中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以色列的制度就有这样的基础。宇宙中所有脉动的节拍都是八度，标志着七个系列的结束。不难看出，如果一个虔诚的人观察到这一点，然后被问及以色列人的上帝为什么要颁布希伯来古书中记载的制度时，他会这样回答：所有宗

教的基础都是对上帝的承认，对上帝对宇宙所有权的承认。七日律法是上帝对时间所有权的宣示，也就是说，是对人类生命所有权的宣示。安息年是上帝对土地所有权的宣示。在禧年，不动产归还，债务取消，奴隶获得解放，这是神对所有可被视为财产的东西的所有权的宣示。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承认上帝的普遍所有权与为人类要求这种所有权之间的区别。

关于宗教好还是非宗教好的科学问题，可以通过研究承认上帝对万物的所有权，或者相反，实际上生活在土地、时间和所有工业产品绝对属于人类的假设中的大规模结果来确定。如果我们有一块广袤的土地，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思想和行为都承认上帝的所有权，他们的宗教活动时刻提醒着他们这一真理，并在他们心中燃起适合接受这一真理的情感、那么，如果我们再有一块面积相等、人口相等的土地，但那里的人们彻底拒绝接受上帝的所有权，而且从不允许在个别情况下举行任何承认这一真理的宗教仪式——如果我们能在一个足够长的考验季节结束时，比较一下这两个民族在身体、智力、道德和社会状况方面的结果，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全面、清晰和充分的证据来永远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那么，就拿一个理性地遵守安息日律法的社区——我不是说犹太教的安息日，也不是说清教徒的主日规定，而是说理性地遵守科学上可以证明的安息日律法的社区——与另一个安息日观念（不是说被拒绝，而是根本被忽视）一直不存在的

社区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开始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了解。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条（安息日）律法与当前劳工问题的联系。

这些劳工问题似乎源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使用大量资本和众多劳动力的地方，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劳动力方面被指责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工资；资本方面被指责为不能从所雇用的劳动中获得足够的生产果实、以证明增加工资报酬是合理的。在这两种说法的背后，我们会发现，通常情况下，当大量资本聚集在一起，并由一个公司使用大量的人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时，问题就会爆发出来。在资本方面，我们会注意到，就公司和工人而言，通常都会违反安息日规律。公司每周都不会让工人和机器休息一天。根据安息日规律，机器必定会损坏，工人必定会做不好工作；因此，由于忽视遵守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固定的规律，公司的收入每年都会减少。如果一条铁路的火车在某个晚上的 12 点钟停下来，静静地躺上 24 个小时，而它的所有雇员都完全从他们的劳动中休息下来，无论是做礼拜还是做其他任何必要的休整，那么毫无疑问，在这一年中，它的净利润就会通过减少支出而大大增加。

此外，由于事故对机器造成的伤害大大减少，利润还会进一步增加。在不遵守物理定律的地方，事故肯定比遵守物理定律的地方多得多。每周工作七天的道岔工、制动工和工程师，他们的大脑、

神经和肌肉会逐渐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从而增加了他们对破坏财产的事故的责任。

此外，公司为一周的工作支付六天的工资，这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而为六天的工作支付整整一周的工资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人说是乌托邦式的想法，那么我的回答是，这种说法意味着，有理性的人要想出合理的方法来遵守众所周知的物理定律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改革，也就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但是，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这种事情是不切实际的呢？假设我们承认，为了公共利益，某条铁路上的客运和货运线路上的所有车辆都必须在连续几年内日夜不停地运行。即便如此，也不一定就不能遵守安息日法。我们确实会让我们的员工休息，以便睡眠。忽视睡眠的后果如此之快，如此之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听从这一迫切要求；因此，人们在二十四小时中的有限时间里工作，无论每天工作六小时、八小时、十小时还是十五小时，都被称为一周的工作。二十四小时是一天，但我们从不要求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一周工作七天。即使公路各部分的工作都是连续进行的，在每个部门安排这样的人员接力也是非常可行的，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遵守安息日的律法。

此外，若不让工人休息，公司自身也会受到伤害，因为所有工人的素质都会下降。如果为了家中妻儿所需的工资而诱使工人周而复始地工作，那么这个人的道德感和脑力都会退化。

抛开一切宗教信仰不谈，只要有任何其他理由可以证明说真话或不偷窃的必要性，安息日法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我是五百个人的雇主，他们就会知道，如果我以希望得到报酬或害怕损失为由，诱使他们违背他们本性中有关休息的规律而继续工作，那么，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也会让他们违背真实性或财产权而继续工作。除了宗教方面的考虑之外，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义务的话，那么这三个方面的义务都是平等的；如果我同意我的雇员违反安息日的法律，那么我就同意他们降低了对财产权的高度尊重；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抽取了属于我的东西，那么我就是在教他们这样做。一个人不可能长期违反安息日律法而不变得不诚实和不老实，就像一个人不可能伤害自己的大脑而不伤害自己的胃一样，反之亦然。

现在让我们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谈谈。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会给劳动者带来不正常的卫生健康状况，通常表现为需要某种人工刺激物来弥补失去的休息。在许多情况下，酗酒是违反安息日律法的自然生理结果。酗酒的代价有三个方面。首先，它会使劳动者损失一部分时间，从而减少他的工资。其次，它使劳动者以低劣的方式完成工作，从而减少了规定的工资。第三，除了主要成本外，它还涉及到其他方面不需要的开支。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劳动者出于何种动机蔑视安息日律法，他都会受到惩罚。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假设每个资本家在雇佣工人时，都会为每个人六天的工作支付七天的工资，这样他在第七天就不会因为要求的、绝对不可或缺的休息而感到不安。假如他让他的所有机器在第七天休息，同时，假如每个劳动者都绝对不从事一切通常的工作和其他各种磨损和体力劳动，并在第七天休息，那么，资本和劳动的紧张关系不就会立即开始放松吗？

如果对劳动规律的科学研究结果有任何依赖的话，那么这种放松就会发生，至少会达到使这种关系大致和谐的程度。这样，双方之间的所有讨论就会减少紧张、激情和痉挛，每个问题都可以在显示其与双方利益的关系的角度下加以审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圣经本文中全面讨论劳工问题的方方面面具体细节，而是要把圣经本文应用于研究资本和劳动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唯一、既定规律的关系上。

=====

=====

=====

=====

=====

=====

=====

=====
=====
=====

纽约市的怀特博士 (Dr. Eskine N. White) 在下面的文章中准确地描述了一类不信神的人：

人们因知识分子的骄傲而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远离上帝，声称要在当今的哲学偶像中寻找一个神。诱惑的形式是这样的，“如果我想证明我的智力活力，我就不能接受任何值得信赖的东西。我必须要求解释一切，以解开其中的奥秘；然后，我决不能接受任何无法通过连续的逻辑步骤证明或无法通过科学实验展示的东西为真。我父辈们的古老信仰非常简单，也非常令人欣慰，但我绝不能被我天性中任何无法解释的本能所误导，也不能被任何佯称来自看不见的世界的启示所迷惑。可以肯定的是，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头脑简单的男人都接受了这种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而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理智检查，但我需要证据。”

现在，如果这是一个真正渴望了解真理的人的真诚之言，并且他唤醒了所有的能力，打算公平地研究基督教的证据，那么这一切都很好；这样一个真诚的探索者会得到上帝的帮助。但可惜的是，有太多的人被知识的虚荣心所迷惑，而他们既没有知识的力量，也没有知识的诚实。他们听说有一个又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自娱自

乐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不信者，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或者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他们没有进行原创性的调查。他们不认真研究证据。如果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发现的话，那也是在破坏性的一面。他们自认为，他们是这个或那个科学家的门徒、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思想的独立性。但现在，没有人比我更赞成独立思考—没有人比我更赞成为自己心中的盼望提供理由的真诚决心。我很高兴知道有人在诚实地要求证明甚至是最高的神圣真理，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人出于智力上的虚荣，出于想要看起来理解他从未真正研究过的东西的欲望，出于自称为这个或那个伟大的大师的野心，背弃了他祖先的信仰，对上帝同在的迹象闭目塞听，对圣灵的影响铁石心肠，那就是“为了一个糊涂账而出卖了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一得克萨斯大学的哈尔斯泰德教授从能量守恒学说出发，提出了以下非常尖锐而有力的论点。

“科学家们已经证明了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它统治并包含了物质世界的所有过程；它表达了所有自然力的一个完全普遍而又特别的特性，就普遍性而言，它与质量的不可改变性并列。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各种自然力之间的联系多得数不胜数；但它们都一再证明，宇宙中的能量总量在所有变化中都保持不变。正如实验所证

明的那样，如果失去了一定量的机械功，我们就会得到等量的热，或者化学力；反之，如果失去了热，我们就会得到等量的化学力或机械力；因此，在各种自然力之间的所有交换中，能量确实可能以一种形式消失，但它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完全等量；因此，它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而是始终保持着完全相同的量，这一规律适用于有机自然界的各种过程。现在，如果我们所说的精神能量确实是这个宇宙中与物质有关的实际能量总和的一部分，那么这种不变的能量中就会有一部分不时地作为精神能量而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一定量的化学能消失了，但作为精神能量又重新出现了，或者也许作为精神能量消失了，但作为机械能或热能又重新出现了。但科学的绝对检验证明，情况绝非如此。没有任何一点物理能量会因为物理能量的消失而变成精神能量，哪怕只是一瞬间。在大脑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中，没有任何一点能量不是作为物理能量实际存在的。在能量转化的链条中，没有任何一个点可以插入任何思想性质的东西作为可能的环节。因此，思维和物理能量在本质和种类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永远不可能转化为另一个。因此，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

=====
=====
=====
=====
=====

=====

=====

=====

=====

=====

保罗在雅典

[1886年8月22日在美国基督教哲学研究所演讲]

作者：查尔斯·迪姆斯，博士，法学博士、

该研究所所长。

这位基督教最伟大的传教士的言论和方法值得所有基督教思想家和工作者的学习。保罗在传教时选择了大城市作为活动中心，这无疑是圣灵的指引和帮助。他在耶路撒冷、雅典、罗马——这些城市代表着宗教、文化和权力。也许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一代人来说，在伟大的使徒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比他对雅典的访问更需要、更有益的研究了，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基督教与在高级艺术和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接触。这些是文化的唯一领域，因为科学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

在到达雅典之前，保罗似乎对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概念；但他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个地方对基督教运动的战略优势，于是他派人回庇哩亚去找西拉和提摩太，以便在他的使徒工作中能有这两位宝贵的合作者。在等待他们的过程中，他并没有闲着。他研究雅典。他利用一切机会播撒福音的种子。

保罗看到雅典时，这座城市已经有大约十六个世纪的历史了。

在他来访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为了迎合当时盛行的偶像崇拜，这座城市被建筑和雕塑装饰得富丽堂皇。到处都是庙宇，小的典雅，大的宏伟。到处都有祭坛，供奉着希腊神话中所有已知的神；在通常伴随着精神冷漠的慷慨和好客中，也发现了刻有“献给未知之神”的祭坛。

美学本能的满足并不能蒙蔽保罗的双眼，在这外在美的外表下，致命的癌症正在吞噬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他一刻也没有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好奇的旅行者，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基督教传教士。安息日，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与他们讲道；其他日子，他则在“市场”——人们聚集的地方——讲道。

热心基督的人从来都不会缺少位置。他与一个人同工，就像与一千个人同工一样认真；他在一个房间里工作，就像在一个大教堂里工作一样愉快。在最小的地方忠心的人，会被调到更大的地方。

使徒无法躲藏在他的同胞和同教的一个不起眼的小会堂里，躲藏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大都市的某个角落里，而是很快就被吸引到了 agora，一个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商人，还有政治家、演说家、诗人和哲学家聚会的地方——一个人如果想在雅典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经常出现在这个时髦的集会上。

保罗从外部被盛行的偶像崇拜所激起，从内部被他对主人和新信仰的持续热忱所推动，他到处宣扬耶稣和复活。无论他的论述方法如何变化，他的基本主题都是复活的耶稣。在他的脑海中，似乎永远都存在着这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与耶稣有着不可估量的切身利益，耶稣因人的罪行而被释放，又因人的称义而复活。在集市上，或许我们应该称之为集会室，他遇到了一些人，他们代表了当时雅典哲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当时已有两个多世纪历史的流派。

斯多葛派代表泛神论，认为“万物”，即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他们认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灵魂；上帝与物质是不可能分离的；灵魂就是物质，而死亡则是这一更精细的物质回归到万物之中，即回归到上帝之中；当他们听到死人复活的消息时，在他们认为已经确定无疑的哲学学说面前，这一消息显得如此荒谬，以至于被认为是是不可能的。

伊壁鸠鲁派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物质是存在的，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任何看似有序和设计的产物，都不过是永恒存在的原子偶然结合的结果。这种学说必然排除了上帝、灵魂、道德和责任。它涉及到，我们称之为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在死亡时消散于元素之中。当然，除了功利之外，该学派不可能有任何道德源泉；也不可能有任何涉及未来奖赏或报应的依据。对他们来说，复活也是荒谬的。

《使徒行传》中没有提到的第三个学派叫做“学术派”，在保罗时代，他们教导说，如果真有上帝，也没有什么是人可以知道的。

因此，使徒在他的时代遇到了错误哲学的变种，而在我们的时代，基督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十八个世纪以来，天才的、费力的谬误论者没能发明出一个新的谬误。在十九世纪末，他们还是十九世纪初的样子：泛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今天，我们在柏林、伦敦和纽约发现了这样的人，十八世纪前，保罗在雅典发现了这样的人。但那时基督教刚刚兴起，他所遇到的人们好奇地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思想流派。他们引诱保罗和他们一起从拥挤的广场来到安静的亚略巴古，在那里，他们高高在上，在他们最高法院的高处不受干扰，他们可以确定这种新哲学的性质。

在他们对保罗的邀请中，礼貌和讽刺交织在一起，其语调和腔调与当今泛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与基督教思想家交往

时的语调和腔调如出一辙。”我们希望能够知道这些奇怪的东西意味着什么”。讽刺的是，这暗含着对他们已经从保罗那里听到的东西的贬低。“如果我们不能一目了然，那就不能说明什么！”今天的谬误论者就是这样说的，就像雅典的谬误论者一样。如果不是泛神论、唯物主义，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那么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奇怪的”——也就是说，与文化领域格格不入。保罗接受了挑战，表明了立场，开始为耶稣作见证。

他的回答彬彬有礼，没有丝毫的讽刺意味，是所有基督教教师的榜样。他站在一个鼓舞人心的环境中。如果他抬头仰望，雅典卫城巍然屹立，美轮美奂，最高艺术的杰作以最丰富的姿态、最优美的布局堆砌在这片土地上最高贵的祭坛上，为民众所崇拜、哲学家所鄙视的神灵献祭。如果他俯瞰这座城市，就会看到奇妙的特修斯神庙、巨大的密涅瓦神庙、复仇女神庙和胜利女神庙。到处都是偶像崇拜带来的艺术装饰，时代最好的果实生长在宗教之树上，即使这种宗教是偶像崇拜。

保罗以礼貌的话语开场。作为一个宗教传道者，他承认他的听众是虔诚的。他告诉他们，无论他把目光投向哪里，他都能从他们所有的艺术作品中发现，雅典人是一个比一般人更敬畏上帝的民族。这是对他们城市的微妙赞美，他们显然为自己的城市深感自豪。这个明智的开场白为他介绍自己的宗教开辟了道路。他提请他们注意，在他们美丽的雅典，有一座刻着“献给不知名的神”

的祭坛；他提到这个事实，与其说是贬低，不如说是赞扬。这就是使徒的精神。他的方式也值得研究。

无论哲学家们可能持有何种观点，人的本性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每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都证明了这一点，而神庙中的巨额开支也证明了有神论的思想既强大又切实可行。它体现在精美绝伦的祭坛和富丽堂皇的圣殿中。无论上帝在哪里，无论他是谁，人类内心的本能都是向他致敬。人出于本能而祈祷，就像婴儿出于本能吮吸母亲的乳汁，蜜蜂出于本能构造自己的多边形巢。如果祈祷是推理的结果，廷德尔教授和其他人可能会建议将其置于某种理性的“检验”之下，但将任何本能置于这种检验之下都是科学上的荒谬。当幻想和想象力耗尽之后，遵循本能，可能仍然会有神——可能会有神——应该受到尊敬。为了满足人们对神的追求，雅典人为一个尚未为人所知的神建立了祭坛，或者说，即使他们的祖先曾经认识，他们也已经失去了这个祭坛。在这样一个祭坛上，刻着知识和无知的忏悔。祭坛上刻的不是“献给未知的众神”，因为那是承认只有一个神，而他们所有其他的祭坛都是无用的。也不是刻给“未知的上帝”。即使他们不知道，别人也可能知道。祭坛上的传说是雅典人可悲的忏悔，他们承认有一位神，但他们不认识他。

这是向哲学家们发出的关于保罗的强烈呼吁。人们想要认识上帝。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学术派已经在雅典存在了几代人。难道

哲学家们并不比普通人更聪明、更好吗？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哲学就毫无价值。如果他们更聪明、更优秀，为什么他们不向人们传授有关神的知识呢？他们不知道吗？那么这就是对无知的忏悔。保罗说：“所以，你们在无知中所敬拜的，我就告诉你们”。

这就是本世纪基督教教师应该采取的立场。让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泛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说：“先生们，教导人们认识上帝吧。如果你们因为公认的无知而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要动。我们知道上帝，我们将把他介绍给人们”。如果他们反过来对基督教教师说：“那是你们的自欺欺人；我们是谦卑的；我们宣称如果有上帝，他是不可知的”。这就是他们的谦卑吗？他们傲慢地断言，他们已经了解了所有可能被了解的事物，并宣布上帝不在任何地方。他们“谦虚地”断言，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别人不可能知道。但雅典人没有现代赫伯特-斯宾塞主义者那种顽固的自负。他们（雅典人）只是说：“上帝是存在的，但对我们来说，他是不可知的”。保罗在雅典哲学家圈子里所说的话，基督教教师可以对泛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和不识字的大众说：“你们在无知中崇拜什么，我就告诉你们什么”。

使徒接受了泛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承认，接受了石坛上所刻之物的暗示，假定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断言一个存在是不可知的，就意味着它的存在；使徒通过宣讲福音的真理来直面听众的错误。这对所有愿意

传播自己思想的思想家来说都是一个最宝贵的榜样。在我们准备好宣讲一种健全而真实的信仰之前，试图从一个人那里夺取任何信仰，无论这种信仰有多么缺陷和错误，都是不明智的。传教士必须让最底层的非洲人保留他的信仰，直到他能给这个野蛮人一个可以合理崇拜的上帝。如果任由错误的根部萌芽，那么砍掉它的顶端生长又有有什么用呢？还有什么比让真理的种子、根茎和嫩芽占据土地更好的方法来排除有毒的生长呢？

似乎很难看到使徒如何能提出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的错误之处进行更简洁、更紧凑的驳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谬误的核心。没有“众神”，多神论是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谬论。神是存在的。无神论是人类厌恶的真空。神是一个人（位格）。他有意识的存在，有设计的智慧，有决定的意志，有自发的活动。他是创造者。他创造了“万物”，因此他不可能是“万物”，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自身的创造者。泛神论斯多葛派的理论在人格（位格）的创造者的概念面前消亡了，唯物主义派的理论在人格（位格）先于一切物质存在的概念面前消亡了，非物质的创造物质的概念也消亡了。上帝是每一事物的创造者，而不是任何事物或所有事物的产物。他先于万物而存在。他可以没有万物，万物一刻也离不开他。

使徒多么迅速地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他没有争辩。他像每一位基督教教师一样，权威地断言。对“唯一的上帝”人格（位格）的

断言，使他有理由向他们的理性和良知发出呼吁，而理性和良知永远是基督教教师的职责所在。在他的头顶上，使徒看到了庙宇林立的雅典卫城。雅典卫城是美丽的，是建筑的乐园，但对于那位创造了世上所有采石场的大理石、人脑中所有的智慧和地上所有的天的神来说，这座圣殿是多么渺小。那块石头、雅典娜-波利亚斯女神，与那位创造并充满天地的神相比，是多么的渺小。他向听众们强调了这一点。从他脚下望去，一定有许多祭坛映入他的眼帘。也许此时此刻，祭司们正带领着戴着花环的受害者举行祭祀仪式。这意味着什么？难道创造万物的上帝需要的是人力所能满足的吗？这就是偶像崇拜的堕落含义。而这（偶像崇拜）是一种贬低人的谬论，它的谬误毒射多方。整个异教徒的献祭制度都是为了贿赂被崇拜的神。它建立在颠倒宇宙事实的谬误之上。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上帝创造的。没有没有上帝的自然，没有上帝之外的“造物主”。这种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异教。雅典的异教不比这更好。保罗所说的“人造的圣所”是由上帝的双手建造的，是用上帝制造的材料建造的。如果在其中对上帝进行精神上的崇拜，那是很好的；但试图将不可估量的上帝限制在任何墙壁之内，或将他所创造的宇宙的任何部分视为不神圣，都是违背常理的。

这自然导致保罗对宇宙的机械理论进行了打击。宇宙不是一台自动机器。虽然“万物”不是上帝，但上帝无处不在“万物”之中，他既创造了万物，就通过永恒和直接的临在来维护万物。这是我们必须不断反对的当今无神的科学假说的学说。没有一种哲学体

系教导上帝的积极存在、无处不在，我们就无法填补科学的空白。生命是什么？生命从何而来？生命如何延续？这些都是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从来没有一种科学理论能够解释自然界中经常出现的断裂、灾难和大灾难。即使是现代的进化论，也是一个纠缠不清的网，一个暗藏陷阱的领域，或者仅仅是一个科学梦想，一个在科学基础上完全无法证明的假设，如果上帝被省略的话。但是，在保罗的哲学中，生命是上帝不断从自身中赐予他的某些受造物的，通过这种赐予，上帝将它们与所有无机体区分开来。

这一真理在荣耀上帝的同时也荣耀了人类。古老的斯多葛学派和爱斯基摩学派贬低了上帝和人，他们把上帝和人都看成是“万物”的组成部分和依赖者，或者说上帝什么也不是，而人则比泥巴好不了多少。

上帝赐予生命，也赐予空气和生命所需的其他一切。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己产生的。上帝“给予”一切。对神的正确认识会导致对人的正确认识。上帝的统一和人类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上帝，一个人类；多神，多人性。多神论造成了民族的狭隘和骄傲。雅典人认为自己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原住民，蔑视所有其他民族。异教存在的地方都是如此。没有这个（统一）概念，科学就无法统一关于自然或人类种族的观念。从（人类）种族的统一性出发，我们必须达到上帝的唯一性；相信不同的自然起源，

就不难达到不同的神话；多神教赋予种族以区别并保持种族的差异，而一神论则产生并保持人类统一的观念。

使徒进一步向他的听众施加压力。每个人的存在不仅依赖于上帝对生命的不断眷顾，而且民族的延续和国家的生命也受到天地主宰的意志的限制。希腊民族应该延伸多远，希腊文化的影响范围应该有多大，民族生活的持续时间有多长，这一切都取决于上帝对他们直接执行他自己的旨意，因为他已经确定了民族的边界，安排了他们的持续时间和继承制度。保罗教导他的听众，作为一个民族，必须依靠上帝，并在承认上帝对民族大家庭的主权中，奠定了国际交往、礼让和繁荣的基本原则。除非“人的议会”承认上帝的主权，并运用自己的力量制定措施，使上帝的旨意在人间处处得以实现，就像旨意在天上一样，否则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其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此，个人和国家的存在，以及关于国家历史的天意，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使人们可以寻求上帝。如果没有上帝可寻，那么宇宙就是漫无目的的，科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没有基础，没有统一的思想。但是，保罗从他这句话的语法结构本身就表明，他相信，如果没有启示的帮助，人类在寻找上帝的努力中是徒劳无功的。上帝离每个人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

然后，使徒顺着他所说的上帝“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远”的暗示，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它必须成为所有稳定科学的启示基础和所有

连贯哲学思想的纽带。

“我们在他里面生活、活动、存在”。在场的泛神论者不可能把这句话当作是对他们理论的承认，因为演讲者事先已经做了防范，断言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天地的主宰，因此必须独立于万物而存在。另一方面，神吸收宇宙的任何部分，即印度教的涅槃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使徒在阐述他的哲学体系时，坚持了人的个体人格和神的个体人格（位格），并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里面”；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才“活着”、“活动”和“存在”。

科学的法则是，能够解释最多已知现象的假说将被采纳为工作假说。自保罗发表演讲以来，1800年已经过去，而在后来的岁月里，科学活动日益活跃。结果是，如果现在选出一百位最有能力、最值得信赖的科学教师，他们中可能没有六位会就生命的定义达成一致，可能没有三位会愿意把自己的声誉寄托在任何一种理论能解释大多数已知现象的论断上——除了保罗在《使徒行传》演讲中宣布的理论。

现在，在非常大胆而清晰地阐述了他的福音哲学之后，使徒又明智地提醒他的听众，他所引用的某些希腊诗人也曾说过这一真理，从而使他的听众和睦相处。人们认为这是诗歌的狂想，作家们甚至可能认为这是诗歌的比喻，但这是一个严格真理的确切表述：“

我们是他（上帝）的后裔”。他在结束反对偶像崇拜的论证时，说明了异教的思维习惯是多么不合理，而偶像崇拜的宗教崇拜正是源于这种思维习惯。人是造物主和天地万物之主的儿女，而金银和石头则是上帝的力量所产生的惰性无机物。前者（偶像崇拜者）认为“神”就像这些矿物和金属，这违反了思想的所有神圣性。一个人拿起了一块大理石，斟酌着他应该塑造哪位神灵，以及如何表现这位神灵，甚至他理想中的神灵的表现也取决于他的技艺高低，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让偶像崇拜变得令人厌恶。将任何偶像，甚至是他们伟大的密涅瓦，与任何一位活生生的希腊女性（神的儿女）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人类技艺最精湛的作品与会呼吸、会微笑、会跳舞、会思考、有爱心和可爱的神的女儿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鸿沟：偶像与神之间的差别是多么不足道也！

在所有这些论述中，都展示了使徒的智慧，他在努力摧毁一个强大而根深蒂固的谬论的同时，避免了对个人和民族生命的伤害。他没有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完全错了”，而是说“我们不应该这样想”。

在说明了上帝在世界的创造和人的良知中的启示之后，他开始完成关于上帝在救赎中的启示的论述。上帝给了人类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前两者（世界的创造以及人的良知）。他（上帝）没有对玷污他的偶像崇拜表现出特别的报复，只是让人承受这种错误可能产生的伤害。“但现在，他吩咐世人在各处改变心意”，对上帝有

正确的思想。世界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它将受到审判。它将在公义中接受审判。它将在一个人身上得到审判。上帝指定了这个人。上帝已经指定了那一天。世界的审判将取决于对他（耶稣基督）的信仰。一个人的品格将由他对他的信仰决定。一个人的智力和精神命运将取决于他对他的信仰。他是世界的危机和审判。因此，必须为人们的信仰提供一个最可靠的基础；这个充分的基础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然后，哲学家和普通人联合起来，以冷漠和嘲讽的方式，打破了这一宏伟、崇高和紧凑的论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可能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这一论述。但是，正如另一位使徒所指出的那样，这位认真的使徒成功地让一些人看到了上帝通过创世和人类历史的启示；上帝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启示；以及上帝在律法和福音中的启示。如果能让他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准确地全面阐释这些思想脉络，如果能向我们传达一份忠实的报告，那么世界就会有一幅完整的基督教哲学素描。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圣经），对人类的价值超过了希腊所有文学作品中流传下来的其他一切。

当保罗说话的时候，偶像挤满了雅典的街道和高地，泛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把持着雅典的学校和法庭，这座城市是希腊的眼睛，就像希腊是世界的眼睛一样。今天，那些偶像和祭坛只是艺术珍品；他们的崇拜门廊和学院已成为过去。上帝命定的“人”（耶稣基督）在雅典卫城上受到崇拜，今天在希腊国王

的宫殿里受到崇拜，是天上或地上唯一在雅典城接受独特宗教崇拜的。自从保罗的声音被淹没在那些对他们无法反驳的东西嗤之以鼻的人的嘲笑声中之后，今天，人们以更多的智慧和道德力量，以更丰富的例证，坚持、解释和执行着保罗话语中的哲学体系。今天，任何一个人的智力和道德价值，他在人中的高度、广度和分量，都是由他对上帝命定为世界审判者的那个人（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衡量的，“他（天父上帝）使他（圣子耶稣）从死里复活，已向众人保证了这一点”。

=====
=====
=====
=====
=====
=====
=====
=====
=====
=====
=====
=====

观点与评论。

苏格拉底哲学与基督教。W. Lowber 博士为《基督教思想》撰写

了以下论文：

雅典的哲学是她所有纪念碑中最完美的。她的艺术中最完美的瑰宝已成为废墟。不朽的菲迪亚斯的作品只剩下一些碎片。曾经为雅典卫城加冕的宏伟雕像也只剩下一些残片。但雅典的哲学一直是后世的奇迹。现代哲学是否有超越古希腊哲学的进步，这一点可以放心地表示怀疑。可以肯定的是，在解决人类生活这一重大问题上，苏格拉底学派的立场比许多现代哲学家的立场更为合理。苏格拉底学派坚持认为生命来自上帝，而现代达尔文学派却试图从无感觉的物质中推导出生命。

在伟大的苏格拉底出现之前，希腊哲学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事实上，在所有拥有哲学的民族中都存在着这两种倾向。爱奥尼亚学派是感性的，意大利学派是唯心的。现实主义学派的第一位哲学家是著名的米利都的泰勒斯，他出生于公元前六百年。他的最大问题是事物的起源。自然界中有什么基本元素是万物的起源？泰勒斯的基本元素是水。他的继承者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无限的物质是空气，而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则宣布它是火。虽然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学派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它并没有像现代唯物主义者那样走得那么远。它肯定认识到物质之外的东西。如果泰勒斯只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就不可能使用下面的语言：“万物中最古老的是上帝；最美丽的是世界；最敏捷的是思想；最智慧的是时间”。许多现代哲学家甚至可以从希腊思想的萌芽学派中学

到一些东西。

毕达哥拉斯是意大利学派最早、最著名的哲学家。他于公元前 584 年生于萨摩斯，与现实主义学派的泰勒斯同时代。他教导人们神的统一性，但他并不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主宰着万物的起源及其各种组合。第一个（泰勒斯）学派关注的是感官感知到的简单自然现象，而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更进一步，关注的是仅通过思维就能认识到的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当物质现象是思维的唯一对象时，哲学就会倾向于感觉主义；同样，当物质现象的关系是思维的唯一对象时，哲学就会倾向于唯心主义的抽象。这两种倾向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学派中清晰可见，并产生了苏格拉底出现时希腊几乎普遍存在的怀疑主义（怀疑人生和世界是否有意义）。当今时代的许多著名哲学家也采取了同样的片面立场；当你听到其中一位专家的演讲时，你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在他狭隘的视野范围内。赫胥黎教授在他关于教育的著作中，不是把整个科学圈都包括在内，而是把这个圈割裂开来，从而使他的体系成为一个半圆。他几乎完全忽视了真正教育的最高要素。

在哲学的第一个时代结束时，当希腊的思想家们在绝望中陷入怀疑论时，苏格拉底出现在了哲学的舞台上。公元前 469 年，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附近，是雕刻家索弗罗尼斯库斯的儿子。他曾一度继承了父亲的职业，传统称他创作了一些有趣的作品。他的外

貌对他很不利。据说他鼻子扁平，嘴唇厚，眼睛突出，还是个秃头。然而，他拥有强健的体魄，训练有素。当兵时，他赢得了所有人的钦佩；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勇敢、更能自我牺牲。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一旦有必要，他随时准备为国家而战。

雅典没有第二个人像苏格拉底这样了解政治，但他并不寻求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他完全无私，只想向雅典人传授那些对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原则。他知道，在人们愚昧无知、自私自利的地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繁荣昌盛；因此，他成为了一名教师，以培养雅典人的最高品质。人性中有某些高尚的因素，如果得到彰显，就会使社会繁荣昌盛；但另一方面，如果低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就会使任何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走向毁灭。苏格拉底非常希望雅典共和国能够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如果他的建议被采纳，那么雅典共和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永久的国家，而不会受到那些邪恶倾向的影响，这些邪恶倾向很快就见证了雅典共和国的毁灭。

这位伟大的导师几乎总能看到极端之间的黄金分割点，他不难看出雅典这种极端民主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在努力抵制这种危险倾向的同时，当然也反对专制主义。他的理想与我们在美国共和政体中实现的理想相去不远。虽然美国宪法是对过去的继承，但它无疑体现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哲学家所教导的最伟大的原则。苏格拉底认为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道德体系，甚至为我们国家的杰出政治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雅典人将他们最伟大的朋友（苏格拉底）判处死刑，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这就是世界历史。各国通常并不感激他们最伟大的恩人。没有什么比批评家更吃力不讨好的了。人们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自己的缺点，尤其是当他们并不打算放弃这些缺点的时候。从事酒类生意的人通常不喜欢节制戒酒的人。苏格拉底是一位杰出的批评家。他对雅典的一切罪恶都有话要说。犹太人厌倦了拿撒勒人耶稣的教诲，雅典人也厌倦了他们的正义传道者。他们决心用某种方法让他闭嘴，他们认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处死他。

苏格拉底开创了哲学的新纪元。他看到了之前学派中的邪恶倾向，急于使自己的体系更加实用。他认为人和社会才是正确的研究对象。和约翰逊博士一样，他不崇尚外在的自然，认为所有的麦田都是一样的。他更愿意花时间研究人。他创立了伦理学，他在这一领域的学说在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

苏格拉底对真理有着不可战胜的信念；他把真理当作自己灵魂的主人，耐心地追求与真理的完美交流。他和耶稣一样，认为只有真理才能给人自由。有一次，当他与政府当局发生冲突时，他的语言几乎与彼得和约翰被犹太公会禁止传道时所用的语言如出一辙：“在神的眼中，听你们的而不听神的是否正确，你们自己判断吧；至于我，我已经发誓遵守律法，我不能背叛自己”。这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认为，他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任何事情都不能妨

碍他完成使命。他称之为“使命”的忠实监督者显然是良心的声音。他觉得那是神圣的声音，总是听从它的警告。如果所有人都能聆听上帝安放在每个人心中的监督者不断发出的警示之言，这对世界将是有益的。这位伟大的希腊道德家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教导我们只能从神的作为中认识神，从而承认了神的旨意学说。他的宗教具有严格的人道主义色彩，因为他宣称人的福祉是宇宙的目的。他喜欢研究终极原因，对终极原因的关注超过了对有效原因的关注。虽然他并不否认“下位（低位）神”，但他对“下位神”的看法就像我们对天使的看法一样——认为“下位神”远远低于“至上神”。我相信苏格拉底是一神论者，但他并没有完全忽视（摒弃）当时的多神论。

苏格拉底可能并不信奉柏拉图所讲的理念学说；但他肯定相信，人类心灵中潜藏着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某种知识或绝对真理的基础。这些原则在理性的子宫中萌芽，通过反思可以使其诞生。这就是他采用他所成功使用的教学方法的原因。他的目标与其说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发展头脑中已有的元素。他力图把已经存在于心灵中的秘密真理传递给心灵，因此心理学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认为，苏格拉底造福世界的方式并不在于他所传授的知识，而在于他的教学方法。他将培根后来应用于物理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心灵和人性的研究。这就是应用于意识事实

的归纳法。什么是归纳法？就是从结果中发现原因，从现象中发现存在，从事实中发现规律的过程。他是通过观察和分类意识事实来做到这一点的。他对心灵现象进行了分析。亚里士多德称苏格拉底是归纳推理和抽象定义的创始人。因此，认为归纳法是现代科学发明的方法是错误的。所有进行过推理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过归纳法；苏格拉底使用归纳法的科学方式与现在任何科学家使用归纳法的科学方式一样彻底。

研究苏格拉底生平和学说的人，会发现他在许多方面与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十分相似，苏格拉底哲学与基督教之间几乎是完美的和谐。与这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代的人声称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这并不奇怪。苏格拉底和耶稣一样都是公众教师，他的时间都用来为他人谋福利。他至死忠于自己的原则，以殉道者的方式死去。虽然我相信他是耶稣的先驱，但我们不能以同样的原则来解释基督的一生，因为我们不能以同样的原则来解释苏格拉底的一生。苏格拉底当然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但拿撒勒人耶稣却不仅仅是一个人。苏格拉底以殉道者的方式死去，而耶稣则以神的方式死去。

将耶稣与苏格拉底相比，他（耶稣基督）甚至比伟大的希腊人还要高，就像高山耸立在大海之上一样。苏格拉底的工作是地方性的，而耶稣的工作是世界性的。与苏格拉底的哲学相比，耶稣的教义对世界的影响显示了基督教的无限优越性。当我们考虑这两

位教师的周围环境时，我们会被耶稣超人的品格所折服。苏格拉底直到中年才开始传授哲学。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准备。耶稣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30岁就开始讲课，苏格拉底讲了将近40年，而耶稣只讲了三年半。苏格拉底生活在世界上最有知识的城市，访问了伟大的文化中心。耶稣生活在一个被人鄙视的小镇，生活在一群文盲之中，但他的教诲却完美无缺，无需修改。他（耶稣基督）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即使是他的敌人也无法在他的生活和教义中找到任何瑕疵。他（耶稣基督）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理想肯定不是最伟大的天才所能发明的。过了很长时间，连他自己的门徒都无法理解他的王国所具有的精神性和普遍性。

基督教教父们几乎一致认为，苏格拉底哲学是基督教的准备。苏格拉底教导说，宗教义务有三：敬畏、感恩和顺从。无论在哪里传授这些知识，人们都会为基督教做好更好的准备。苏格拉底哲学的倾向是将人们的思想从多神教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并将有神论（一神论）的思想突出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虽然苏格拉底没有明确拒绝多神论，但他的哲学倾向于削弱多神论。他承认在诸神之外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当人们学会崇拜他时，就会逐渐放弃对低等神灵的崇拜。虽然希腊人中的其他人，甚至在苏格拉底之前，都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但苏格拉底哲学的倾向是将有神论的概念精神化。他不仅教导人们只有一个神，而且神是精神（灵）。他还教导人们服从作为精神（灵）的神，这净化了人们的道德意识，使希腊人为更好的东西做好了准备。

苏格拉底哲学非常明确地教导了未来的生活、这是基督教的重要准备。就在去世前，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与他的朋友们谈论了未来状态的话题。克里托问他想怎样下葬。哲学家告诉他，只要能找到他，怎么葬都行。然后他转身对朋友们说：“我无法说服这位善良的克里托，让他相信正在和他交谈、为我的论点集思广益的我，就是名副其实的苏格拉底；但他坚持认为苏格拉底就是他将会看到的这具躺在地板上的尸体，他还问他该如何埋葬我”。苏格拉底坚持说，他死后将离开他们，去往福地。人对未来的状态有一种本能的预期，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苏格拉底对内在的人研究得如此透彻，以至于在这一点上非常满意。苏格拉底临终前的辞世，对于那些生活在高度基督教文明中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苏格拉底哲学关于未来状态的教导是基督教的重要准备。基督通过对肉体 and 精神的救赎，带来了生命和不朽。

=====

=====

=====

=====

=====

=====

=====

=====

=====

=====